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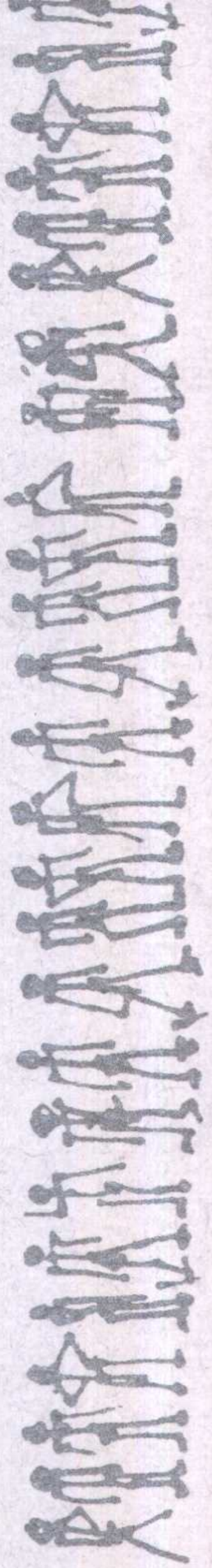
沈志华 /编著

斯大林与铁托

——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



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

ISBN 7-5633-3521-8

9 787563 335213 >

ISBN 7-5633-3521-8/D · 085

定价:23.00 元

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

沈志华 /编著

斯大林与铁托

——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沈志华编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0
（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
ISBN 7-5633-3521-8

Ⅰ．斯… Ⅱ．沈… Ⅲ．苏联－外交关系－南斯拉夫 Ⅳ．D85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242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cn）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890 mm×1 240 mm　1/32
印张：11.375　字数：328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3 000　定价：2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冷战国际史研究及其他

——“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丛书总序

“冷战”作为世界现代历史上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阶段[①],已经结束了。正是因为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世界两大阵营相互对抗已经成为历史,人们才有可能在冷战格局已不复存在的条件下,回过头来对于冷战的起源、美苏冲突的演变过程、中苏结盟和走向分裂的原因、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内部结构、冷战对苏联解体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比较客观的重新思考。于是,从90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关于冷战及其历史的研究和讨论掀起了新的热潮。[②] 在参与学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题目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几十年的研究状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在西方学界把冷战史称为冷战国际史。[③]

---

① 对于冷战的概念,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冷战发生的年代也有各种说法。有的认为冷战发生在战后美苏对抗开始的年代,有的认为发生在战时后期苏联与西方盟国之间出现矛盾和裂痕的时候,还有的认为早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冷战时代就开始了。不过,一般说来,第一种看法为多数人所接受。尽管在导致冷战爆发的具体时间和事件上尚有分歧,但冷战的特定意义在于以美苏两国为中心的世界两大集团的形成并处于对抗状态则是共识。

② 有人统计,目前在国际互联网上,仅yahoo一个网站中即有“冷战”网址91个,而有关冷战的网页则达11.7万之多。

③ 我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时,曾与那里的学者讨论了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这一概念的含义,故有此说法。

80年代以前，东方[①] 各国，包括中国学者，对冷战历史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他们大多没有加入国际学界这一领域的研究行列，即使有所涉猎，主要也是资料性和介绍性的论著。[②] 那时的冷战史研究似乎只是西方学者的专业特权，其研究的主体和中心则在美国。这不仅体现为研究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来自美国档案，而且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也是以美国在各个时期的相关政策及其得失为主。于是，美国学者在冷战研究中便自然处于明显的世界领先地位，他们的论著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而且形成了不同学派。[③]

在冷战结束后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作为冷战一方的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其中特别是以前作为冷战主角之一的俄国，开始大量解密和公布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这成为20世纪末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④] 由于过去苏联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历史资料处于封闭的状态，人们对于冷战历史中诸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往往是片面的、迷惑的、不确定的，甚至是错误的。只有在这些历史档案大量解密并陆续公布于世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重新认识。而这一状况从根本上改变了冷战史研究集中体现在冷战一方——西方学术领域的现象。由于可用档案和史料范围的扩大，导致了相应的结果：其一，这些新档案文献来源地——俄国、中国以及原东欧国家的学者纷纷加入了冷战史研究序列。不仅他们本身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与西方学者直接对话，而且他们的论著也不断得到评介、引用，并被译成其他文

---

① 这里使用的是广义上的东方概念，包括了东欧、苏联和亚洲地区。

②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刘同舜教授主编的大型资料性著作《战后世界历史长编》，该书自1975年出版第1卷，至今已有9卷，按专题介绍了西方有关冷战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史料，可以称为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③ 在冷战激化的年代，占主流地位的是传统学派；美国反战高潮时期，产生了修正学派；到缓和呼声响彻世界时，后修正学派又应运而生。这本身也说明了当时美国在冷战研究领域的中心地位。

④ 关于俄国档案解密及其利用的情况，参见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载《历史研究》，1998(5)。

字,引入世界论坛;[①] 其二,研究领域大为拓宽,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多样化。研究者有机会接触到俄国、中国和东欧各国的档案文献,因而就有必要和可能从冷战的角度,即战后世界格局划分的特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这些国家当时的发展模式和外交思路,或者从国际的角度,即一种能反映苏联、中国、东欧以及西方的观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冷战的起源及其历史进程。[②]

当然,冷战史研究国际化的趋势并不是自然和自发产生的,它离不开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不过,在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当首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于1991年设立的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1992年7月,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与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签订了一项合作协议。该协议的特点是通过由威尔逊中心出资组织专题学术讨论会的形式,向会议和与会学者提供有关题目的俄国档案材料。作为该协议的执行人,冷战国际史项目与各国研究机构合作,连续组织了若干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③] 在这些会议上,各国学者不仅发表了许多优秀学术论文,展开了深入讨论和交流,而且从不同国度和角度提供了大量有关冷战各种专题的最新档案文献。冷战国际史项目还每年出版一期学术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 Bulletin*),免费寄送给需要这些材料的各国学者。[④] 该刊物的最大特点是:一

---

① 尽管没有统计,但近年来,在美国历史研究刊物上以英文发表的俄国、中国和东欧各国学者关于冷战的论著和有关资料,显然是空前的,甚至在西方单独或与西方学者合作发表专著的也不乏其人。

② 美国冷战史研究大家、耶鲁大学历史教授约翰·盖迪斯1997年出版的那本专著的书名——*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以及他在序言中对此书名的解释,特别能说明这一现象。

③ 这包括:1993年1月的莫斯科会议("冷战会议",与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合作),1995年7月的华盛顿会议("朝鲜战争历史"),1996年1月的香港会议("冷战在亚洲",与香港大学合作),1997年10月的北京会议("冷战与中苏关系",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合作),1998年6月的奥斯陆会议("关于冷战历史的档案文献",与挪威诺贝尔研究所合作),等等。

④ 该刊物已经进入国际互联网,网站:yahoo,网址:http://cwihp.si.edu。

方面发表各国学者对于冷战研究的新成果，一方面刊载大量译成英文的中国、俄国和前东欧国家关于冷战的档案文献，从而大大促进了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方便了各国学者对不同语种档案文献的利用。此外，冷战国际史项目还提供资金，每年组织一批中国、俄国和前东欧国家学者前往华盛顿作数月的访问研究。① 该项目不仅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研究条件，而且毫无保留地向他们提供各国档案的复印件。② 这些做法对于推动冷战国际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在互补和交流中提高各国学者的研究水平，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冷战史研究之所以在冷战结束后出现如此繁荣局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冷战思维（例如对抗）和冷战策略（例如遏制），并没有随着具有特定意义的冷战时期的结束而结束。产生冷战现象的条件还存在，产生冷战思维的基础还存在，那么，是否还会出现新的冷战？对抗双方的主角会是谁？一旦出现新的冷战将把人类社会引向何方？这是萦绕在政治家和学者头脑中挥之不去的疑虑和担心。于是，人们需要历史，需要研究历史上究竟是哪些因素的合成造成了人类对峙的冷战局面，究竟是哪些力量的聚合使得人类曾经走到了自我毁灭的边缘。特别是面对21世纪的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人们力求历史给予答案，以避免人类社会曾经经历过的愚蠢行为，避免那些可能给自身带来灾难的不理智和不明智的举动，使21世纪真正成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世纪。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才刚刚起步。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学者在冷战历史的某些领域是颇有建树的。例如关于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中苏同盟的起源、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以及朝鲜战争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可以在国际论坛上与各国学者对话的水平。这就构成了我们把冷战国际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发展起来的良好基础。然而，也正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基础还显得十分薄弱。

---

① 据我所知，自1993年起在冷战国际史项目作访问的中国学者有牛大勇、陈晓鲁、郑永平、张小明、任东来、李丹慧等人。

② 我和李丹慧仅1998年12月至1999年2月在那里工作期间，即复印了7纸箱约万余页美国、俄国及一些东欧国家的档案材料。

首先，对于冷战史研究的许多方面，我们还涉足不深或刚刚开始探索。例如，伊朗事件、土耳其危机、马歇尔计划、柏林危机、共产党情报局、苏南冲突、核武器的发展与军备竞赛、华约与北约的对抗、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关系、匈牙利事件、加勒比海危机、柏林墙危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战争，如此等等。而所有这些与冷战发展密切相关的事件，都是目前国际史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而且有关这些历史事件的档案文献也已经陆续公布出来。至于有些领域，我们则根本没有涉及。例如，冷战与经济的关系：如何使用经济手段进行冷战，或反过来，冷战如何影响了经济发展道路。[①] 在这些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上，我们必定是大有作为的。

其次，我们较少从中国的角度来考察和评价冷战的历史，或者从冷战的角度来研究和解释中国的历史。中国在冷战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中国的政策如何影响了冷战，冷战又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如果我们把中国当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纳入冷战的框架进行考察，例如中国对美政策的演变、中苏关系的恶化、台海危机及对台政策、中印边界冲突、中国与越南的战争、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与第三世界的交往，等等，特别是充分使用中国的档案文献，那么，我们无疑将对冷战国际史研究做出独到的贡献。

还有，目前中国对冷战历史的研究还处于单兵作战的状态，没有形成系统和规模，学者之间也缺乏交流和互补。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我们组织起来，加强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为此，北京大学历史系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联合建立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代史料与研究中心，希望通过这样的学术机构，组织专题讨论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同时，收集和介绍各国有关冷战历史的档案文献，并在条件成熟时设立专业史料保管和利用机构，并以此联络各方面从事冷战史研究的学者，把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

---

① 不过应当指出，在这方面，西方的研究也刚刚开始。直到1997年美国才出现了第一部专门讲述经济在冷战中的作用的专著，即 Diane Kunz 的 *Butter & Guns: American Cold War Economic Diplomacy*。

这些也正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代史料与研究中心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发起和组织出版这套“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系列论著的宗旨和出发点。本系列采取自由投稿方式，纳入系列的著作形式不限，可以是专著，也可以是译著，可以是论文集，也可以是文献资料集。但无论何种形式，必须保证以足够的历史档案文献作为论著的基础，因为利用第一手史料从事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条件，目前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① 而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与国际学术界展开对话，才能把我国的世界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最后应该指出，虽然冷战国际史研究正在成为中国和世界历史论坛中的热点，并且逐步引起世人的关注，但以后的道路很可能是艰难的和漫长的。所谓艰难，是说人们——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要摆脱以意识形态对立为基点的冷战思维，要摒弃以武力威胁为行动准则的冷战策略，要真正树立以维持世界和平为己任的新观念，必然会有一个对以往教训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所谓漫长，是说新的档案材料——特别是东方国家的档案文献——还需要不断挖掘，更要求使档案文献的保管、解密和使用逐步走向科学化、正规化和制度化。而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就迫使学者不断地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表述。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以及还没有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在这个意义上，爱德华·卡尔的一句名言特别值得回味：“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②

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　沈志华

1999 年 4 月 30 日

---

① 近年来，不仅中国的有关档案文献相继出版，美国的冷战史料不断引入中国，而且大量译成中文的俄国历史档案也即将与学者见面。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重点科研项目、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拟于今年开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陆续分卷出版。这套总计 30 卷、1 500 万字的大型文献集预计 2001 年出齐。

② 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中文版，28 页，商务印书馆，1961。

目 录

序　言　苏南冲突与解密档案文献 …… 1
联　盟　冷战与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转变 …… 4
冲　突　巴尔干联邦与希腊革命…… 17
分　裂　斯大林的压力和铁托的抵制…… 29
徘　徊　南斯拉夫在困境中探索…… 41
改　革　走上独立发展的铁托道路…… 54
结　语　一个暗杀铁托的未遂计划…… 69
关于苏南冲突的档案文献(1944 年 4 月至 1952 年 11 月)…… 74
1　莫洛托夫与吉拉斯关于南斯拉夫形势和政策的谈话记录(1944 年 4 月 24 日) …… 75
2　斯大林与赫布朗关于南斯拉夫军队和外交问题的会谈记录(1945 年 1 月 9 日) …… 83
3　莫洛托夫与舒巴希奇关于南斯拉夫外交问题的谈话记录(1945 年 4 月 6 日) …… 99
4　萨德奇科夫与保加利亚公使托多罗夫关于成立南斯拉夫联邦的谈话记录(1945 年 10 月 23 日) …… 104
5　萨德奇科夫与南斯拉夫人民农民党领袖关

于选举失败原因的谈话记录(1945 年 11 月 12 日) …… 106
6 萨德奇科夫关于南斯拉夫新宪法草案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5 年 12 月 17 日) …… 108
7 萨德奇科夫关于南斯拉夫政治局势给莫洛托夫的信(1945 年 12 月 18 日) …… 113
8 斯大林与铁托会谈的苏方记录(1946 年 5 月 27 日) …… 118
9 斯大林与铁托会谈的南方记录(1946 年 5 月 27 日) …… 125
10 斯大林与铁托会谈的南方记录(1946 年 6 月 9 日)…… 127
11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菲京关于南斯拉夫人民阵线内反对派活动给苏斯洛夫的报告(1946 年 6 月 30 日)…… 135
12 拉夫连季耶夫与铁托关于反对派活动等问题的谈话(摘录)(1947 年 4 月 2 日) …… 137
13 拉夫连季耶夫与卡德尔关于参加马歇尔计划问题的电话记录(1947 年 7 月 4 日) …… 141
14 拉夫连季耶夫与卡德尔关于南斯拉夫干部政策问题的谈话记录(1947 年 7 月 6～7 日) …… 142
15 拉夫连季耶夫与铁托关于阿—南争论问题的谈话记录(1947 年 8 月 14～15 日) …… 144
16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整理的关于南

斯拉夫现状的备忘录(摘录)(1947 年 9 月)
…… 146
1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同东欧各国签订互助条约问题给外交部的指示(1947 年 10 月 14 日) …… 152
18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情报局会议后南斯拉夫反应的调查报告(1948 年 1 月 28 日) …… 153
19 科拉罗夫关于苏、保、南领导人会谈的笔记(摘录)(1948 年 2 月 10 日)…… 157
20 吉拉斯关于苏、保、南代表会谈给南共中央的报告(1948 年 2 月 10 日)…… 166
21 卡德尔等人关于 2 月 10 日会谈情况的电报(1948 年 2 月 11 日)…… 175
22 莫洛托夫接见卡德尔会谈纪要(1948 年 2 月 11 日) …… 176
23 关于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的议定书(1948 年 2 月 11 日)…… 178
24 卡德尔关于同莫洛托夫会谈情况给铁托的电报(1948 年 2 月 13 日)…… 179
25 莫洛托夫召见卡德尔会谈纪要(1948 年 2 月 13 日) …… 180
26 铁托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给吉拉斯和卡德尔的电报(1948 年 2 月 13 日)…… 182
27 莫洛托夫与卡德尔关于铁托访苏和贷款问题的谈话记录(1948 年 2 月 13 日)…… 183
28 拉夫连季耶夫与铁托关于苏南经济关系问题的谈话记录(摘录)(1948 年 3 月 10 日)
…… 185

29 莫洛托夫就苏南关系一些问题致铁托电（1948 年 3 月 13 日）…… 188
30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南斯拉夫意识形态问题给苏斯洛夫的报告(1948 年 3 月 18 日） …… 190
31 铁托就苏南关系一些问题给莫洛托夫的信(1948 年 3 月 18 日)…… 202
32 莫洛托夫关于撤回苏联专家致铁托或卡德尔的电报(1948 年 3 月 18 日)…… 205
33 铁托关于苏联撤回专家致莫洛托夫的信（1948 年 3 月 20 日)…… 207
34 莫洛托夫关于召回苏联专家与波波维奇的谈话记录(1948 年 3 月 24 日)…… 209
35 波波维奇关于会见莫洛托夫致铁托电（1948 年 3 月 24 日)…… 211
36 波波维奇关于会见莫洛托夫给铁托的报告(1948 年 3 月 25 日)…… 212
37 斯大林、莫洛托夫关于苏南关系诸问题致铁托的信(1948 年 3 月 27 日)…… 215
38 铁托、卡德尔关于答复对南共的指责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信(1948 年 4 月 13 日）…… 221
39 南共中央关于中央全会决定给联共(布)中央的通报(1948 年 4 月 13 日)…… 235
40 日丹诺夫关于转交匈共信件致铁托的信（1948 年 4 月 14 日)…… 237
41 南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苏联公开苏南分歧致日丹诺夫的信(1948 年 4 月 16 日)…… 238
42 波波维奇关于会见莫洛托夫致铁托电

（1948 年 4 月 19 日）…… 240
43 莫洛托夫关于会见波波维奇给拉夫连季耶夫的通报（摘录）（1948 年 4 月 19 日）…… 243
44 拉夫连季耶夫与贝勃勒关于苏南关系恶化问题的谈话记录（摘录）（1948 年 4 月 21 日） …… 244
45 莫洛托夫致拉夫连季耶夫转贝勃勒的电报（摘录）（1948 年 4 月 23 日）…… 247
46 西米奇关于与拉夫连季耶夫会谈的纪要（摘录）（1948 年 4 月 23 日）…… 248
47 拉夫连季耶夫与别洛夫斯基关于保南联盟问题的谈话记录（1948 年 4 月 27 日）…… 250
48 联共（布）中央关于南共问题致南共中央的信（1948 年 5 月 4 日） …… 251
49 铁托、卡德尔关于处理分歧问题的意见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信（1948 年 5 月 17 日） …… 271
50 苏斯洛夫关于召开情报局会议致铁托的信（1948 年 5 月 18 日）…… 273
51 铁托关于南共不出席情报局会议致苏斯洛夫的信（1948 年 5 月 20 日）…… 274
52 苏联关于对意和约给南斯拉夫的照会（1948 年 5 月 20 日）…… 275
53 莫舍托夫递交联共（布）中央信件时与铁托和卡德尔的谈话记录（1948 年 5 月 22 日以后）…… 277
54 联共（布）中央关于驳斥南共答复致南共

中央的信(1948 年 5 月 22 日)…… 282
55 南斯拉夫关于对意和约给苏联的照会(摘录)(1948 年 5 月 28 日)…… 286
56 莫洛托夫关于赫布朗和茹约维奇问题给铁托或卡德尔的电报(摘录)(1948 年 6 月 9 日)…… 288
57 南共中央关于赫布朗和茹约维奇问题致联共(布)中央的声明(1948 年 6 月 17 日)…… 289
58 联共(布)中央关于赫布朗和茹约维奇问题致南共中央的信(1948 年 6 月 19 日)…… 290
59 情报局关于邀请南共出席情报局会议的信函(1948 年 6 月 19 日)…… 292
60 南共中央关于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的声明(1948 年 6 月 20 日)…… 293
61 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摘录)(1948 年 6 月 28 日)…… 295
62 南共中央关于情报局决议的声明(摘录)(1948 年 6 月 29 日)…… 302
63 南共中央关于召开南共五大致联共(布)中央的信(1948 年 7 月 1 日)…… 309
64 南斯拉夫政府关于召回南公民给苏联的照会(摘录)(1948 年 7 月 6 日)…… 310
65 基尔萨诺夫与费依奇关于从苏联召回所有南斯拉夫公民的谈话记录(1948 年 7 月 6 日)…… 311
66 南斯拉夫关于抗议苏联怂恿反铁托分子的照会(摘录)(1949 年 5 月 23 日)…… 313

67 苏联关于有权帮助南“爱国流亡者”的复照(摘录)(1949 年 5 月 31 日)…… 315
68 苏联政府关于南斯拉夫逮捕苏联公民的抗议照会(摘录)(1949 年 7 月 25 日)…… 317
69 南斯拉夫关于逮捕苏联公民问题的复照(摘录)(1949 年 7 月 30 日)…… 318
70 南斯拉夫关于与奥地利边界问题给苏联的照会(摘录)(1949 年 8 月 3 日) …… 320
71 苏联关于南斯拉夫与奥地利边界问题的复照(摘录)(1949 年 8 月 11 日)…… 322
72 苏联政府关于南斯拉夫虐待苏联公民的抗议照会(摘录)(1949 年 8 月 18 日)…… 324
73 南斯拉夫关于与奥地利边界问题的再次照会(摘录)(1949 年 8 月 20 日)…… 326
74 南斯拉夫关于虐待苏联公民问题的复照(摘录)(1949 年 8 月 23 日)…… 329
75 苏联关于南—奥边界问题苏联立场的照会(摘录)(1949 年 8 月 29 日)…… 331
76 苏联政府关于废除苏南友好条约的照会(摘录)(1949 年 9 月 28 日)…… 333
77 共产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关于南共的决议(1949 年 11 月 19 日) …… 334
78 南斯拉夫关于苏联敌对活动提交联合国的控诉(摘录)(1951 年 11 月 9 日)…… 339
79 苏联代表关于南斯拉夫控诉提交联合国的答复(摘录)(1951 年 11 月 28 日) …… 342
80 铁托在南共六大指责苏联帝国主义的发言(摘录)(1952 年 11 月 3 日)…… 346

序言：
苏南冲突与解密档案文献

1948年上半年，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冲突。这场冲突在刚刚组建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了巨大震动。随着南斯拉夫共产党被作为社会主义的叛徒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便出现了继苏联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之后以清除“铁托分子”为名的第二次大清洗运动，而这次清洗已经远远超出了苏联的国界，在东欧各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被撤职、被逮捕、被枪毙。从此，各国社会主义便纳入了统一的斯大林模式。

苏南冲突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后社会主义同盟的第一次大分裂，其结果对以后几十年苏联、东欧乃至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都具有重大的影响。然而，这场冲突究竟缘何而起？隐藏在意识形态方面唇枪舌战背后的真实原因何在？铁托与斯大林之间的分歧是如何导致社会主义阵营走向分裂的？共产党情报局对南共的处置及对东欧国家“铁托主义分子”的清洗对于当时刚刚形成的冷战格局又起到了何种作用？囿于当时的立场和历史条件，苏南双方所发表的文件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往往是片面的、零碎的，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在1948年6月将南共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联共(布)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和对外关系的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报告说：“近来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国内外政策的主要问题上执行的是一条错误路线，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路线”，“南共领导正在实行一条对苏联和

联共(布)不友好的政策”。[①] 出席会议的欧洲各国共产党对此一致表示赞成[②]。以后,这种看法便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正统观点,以至在1960年代中苏论战时,中国共产党还认为,战后不久南共就“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使南斯拉夫的党和国家政权逐步地蜕化变质”[③]。

另一方面,南斯拉夫人的说法则是,苏南冲突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而冲突的原因在于斯大林对南共执行的与莫斯科方针相抵触的特殊政策不满。[④] 具有各式不同说法的这种解释在以后几十年中为许多西方学者所接受[⑤]。

无论是突出意识形态(苏联),还是侧重国家关系(南斯拉夫),上述两种说法都片面地、过分地强调了苏南之间的历史分歧,都认定南斯拉夫在战后就走上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独立道路,似乎1948年的冲突就是这种长期以来双方分歧的延续和结果。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在一个长时段内,事物的发展总是互为因果的。然而,这并不排除在历史上一定的短暂的时期内——比如说几年之内,就事态变化的本质而言,原因和结果是两个可以分开而且必须分开的逻辑概念。换句话说,究竟是南斯拉夫执行的背离莫斯科的独立路线导致了苏南冲突,还是苏南分裂促使南斯拉夫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是需要通过历史研究来回答的问题。不过,由于苏南冲突这段公案的历史真相一直封存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秘密档案之

---

① 日丹诺夫:《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报告》,1948年6月21日。见《共产党情报局文件资料汇编,1947、1948、1949年》(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 1948, 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407~417页,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② 东欧各国及法、意各党代表在情报局会议上的发言,见《共产党情报局文件资料汇编》,418~447页。

③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载《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162页,人民出版社,1965。

④ 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论述,见爱德华·卡德尔的《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中文版,新华出版社,1981)、米洛凡·吉拉斯的《同斯大林的谈话》(中文版,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兹冯科·施陶布林格的《铁托的独立道路》(中文版,新华出版社,1987),特别是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的《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和《铁托传》(中文版,三联书店,1977)等著作。

⑤ 比较典型的论述可见斯蒂芬·克利索德编:《南苏关系(1939—1972):文件与评注》(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0)一书的概论。

中,历史研究者似乎很难依据当事各方以往出于政治目的所发表的文件,对此做出准确的和冷静的判断。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随着苏联和一系列东欧国家出现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终于有大批历史档案文献抹去尘埃,得见天日了。① 记得一位美国档案学家曾经说过:过去档案文献创造了“历史”,而现在档案文献又成为历史的见证。以此来描述苏南冲突历史真相与档案文献的关系也许是恰当的。随着档案文献的披露,历史需要不断地重新认识和阐释。1990 年代初,《苏联外交部通报》、《历史问题》、《历史档案》等俄文刊物陆续公布了一批关于苏南冲突的档案文献。后来,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公布的档案中,也有不少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献。此外,还有一些俄国和美国学者在其论著中引用了他们自己在档案馆发现的有关文献。这就使得人们可以通过梳理比较全面的原始材料来看清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的历史真相。②

① 笔者在《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载《历史研究》,1998(5)]一文中,介绍了俄国档案的保管状况、解密过程以及国际学术界对这笔宝贵财富开发和利用的情况。

② 本文使用的俄国档案,除引自笔者在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和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收集的档案复印件外,还转引自俄文刊物、专集和国外学者的论著。至于东欧国家的档案,则全部转引自俄文或英文材料。

联盟：
冷战与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转变

当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布加勒斯特会议宣布将南共开除的时候，不仅在南斯拉夫引起了震动，而且也使西方国家感到“大为惊奇”。[①]事情的确来得突然。1948年1月共产党情报局还在其总部所在地贝尔格莱德召开编辑部会议，半年之后，南斯拉夫共产党竟然被作为异教徒逐出教门，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里首先需要回答：是不是如苏联领导人所说，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南共执行了一条背离莫斯科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或者如南共领导人所说，其原因在于南斯拉夫早就对斯大林的政策和方针采取了抵制的立场？

历史文献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直到1948年初，南斯拉夫一直是苏联最忠实的盟友，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贝尔格莱德无论在革命性，还是在社会主义化的程度方面，都紧步莫斯科的后尘。而斯大林对铁托虽说是心存芥蒂，但对他的期望和利用，也超过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如南共领导人后来回忆所说，在与南斯拉夫王国流亡政府联合作战、与德国军队交换战俘以求得到喘息、承认南斯拉夫解放委员会以及接受国王回国等问题上，铁托与斯大林之间有不同意见，甚至互有不满情绪，但是就总体而言，南共与苏联的关系是友好的和密切的。

---

① 《南苏关系》，377～386页、123页。

按照德迪耶尔的说法,铁托与斯大林之间在战时所发生的“最严重的分歧”涉及1943年11月29日南共在雅伊策召开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会议决定成立民族委员会作为南斯拉夫的临时政府,并且做出了关于剥夺王国流亡政府的合法性和禁止彼得国王回国的决议。关于这次会议所做出的决定,铁托事前没有同斯大林协商,莫斯科是在决议通过之后,也即是从南共中央11月30日的电报中获悉的。斯大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认为“这是在苏联和德黑兰决定的背后捅了一刀”。位于莫斯科的自由南斯拉夫电台奉命不得发表会议的各项决议,特别是关于不让彼得国王返回南斯拉夫的决议,甚至南共驻莫斯科代表弗拉霍维奇还受到警告,他为自由南斯拉夫电台和莫斯科电台编排的全部节目都将受到检查。直到英国电台广播了这些决议,莫洛托夫才同意让步。①

不过,被南斯拉夫人着力渲染的这次分歧,并没有给苏南关系带来值得记载的直接后果。几个月后,南共中央书记吉拉斯访问莫斯科,受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热情接待。据吉拉斯回忆,在会谈中,“斯大林虽然没有许诺承认民族委员会为南斯拉夫的临时政府,但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加强这个政府是很关心的。……显然,如果时机适宜,即如果苏联和英国之间,确切地说民族委员会和王国政府之间能够寻找出临时妥协的办法的话,苏联政府会立即承认民族委员会”。与此同时,在援助南斯拉夫军队的问题上,当吉拉斯按照铁托的要求提出借贷20万美元时,斯大林表现得极为慷慨大度,不仅认为所要数字太少,而且答应立即予以提供,甚至表示援助是无偿的。斯大林说:“你们在流血,而我为提供给你们的武器还要向你们要钱吗?我不是商人,我们都不是商人,你们所从事的事业和我们的事业一样,我们有责任和你们分享我们所有的东西。”斯大林所要求的只是南共应当同南斯拉夫王国政府的新代表舒巴希奇——他承认人民解放军是同占领军斗争的主要力量——搞好关系,争取达成某种协议。② 莫洛托夫在

---

① 《铁托传》,5~7页;《苏南冲突经历》,72~75页;吉拉斯前引书,3~4页。

② 吉拉斯前引书,47~48页、56~57页。1945年3月7日南斯拉夫民主联邦临时政府成立时,在28名政府成员中,11人为共产党人,舒巴希奇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这无疑是苏南两党意见取得一致的结果。

单独会见吉拉斯时向他解释说,苏联政府与开罗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关系"纯粹是形式上"的,苏联"正在进行与在开罗的政府断绝关系的有关准备工作"。至于对铁托政权的承认问题,莫洛托夫说莫斯科已经为此"采取了准备措施",只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莫洛托夫还做出保证,苏联将在军事装备和技术上支援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①

至于在其他细小问题上的矛盾和摩擦,也都得到了及时解决。无论如何,从根本上讲,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理念和感情上与莫斯科是相通的,他们"把对苏联领导的忠诚看成是它的建设和发展的因素",在南共看来,"斯大林不仅是不可争辩的和天才的领袖,而且是新社会的理想和希望的化身"。无论发生什么问题,他们总是"想办法说服自己",并"把这一切不愉快的事实从自己的记忆中排挤出去"。所以,在整个战争期间,南共始终与莫斯科保持着通讯联系,并接受苏联政府的指导和帮助。②

在斯大林看来,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和游击队对于苏联的欧洲战场,特别是战后苏联安全的保障体系,也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早在1943年共产国际就认为,从军事和政治意义上说,南共都"应当成为巴尔干国家的核心"。③ 尽管苏联本身还通过租借法案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但与此同时,莫斯科给予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援助与西方盟国提供的援助旗鼓相当。据卡德尔引用的资料,在1943年10月15日至1945年5月这段时间内,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从西方盟国得到了388门火炮,2 660门迫击炮,107辆坦克,13 447挺轻机枪以及137 000支步枪;而在1944年至1945年间,从苏联得到了895门火炮、3 364门迫击炮、65辆坦克、68 000挺轻机枪和重机枪以及96 000支步枪。④

战争即将结束时,斯大林已经看出他在东欧国家中所能依靠的首先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国家政权的南斯拉夫共产党,而铁托也知道南斯拉

---

① 莫洛托夫与吉拉斯谈话记录,1944年4月24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全宗6,目录6,案宗58,卷宗794,1~9页。

② 吉拉斯前引书,1、4~5页。

③ 克利索德前引书,218页。

④ 《卡德尔回忆录》,47页。

夫的安全和发展必须依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此时,苏南领导人频繁接触,讨论战后政治、经济和苏南关系问题。1944 年 11 月,即欧洲战事结束前半年,访问莫斯科的南共中央书记卡德尔就建议和苏联共同成立联合股份公司,以便开采南斯拉夫的矿产——铜、汞、铝矾土。① 南共政治局委员赫布朗 1945 年 1 月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答应战后向南提供经济援助,特别是派出军事顾问和提供技术装备,帮助南改编和建立现代化的军队。斯大林甚至原则上同意了南斯拉夫战后对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希腊等周边国家的领土要求,只是建议由当地居民自己提出并入南斯拉夫的请求,并希望南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最好征求一下苏联的意见。② 1945 年 4 月,南政府副总理舒巴希奇赴苏与莫洛托夫讨论了苏南友好条约问题,并就外交、经济和政治问题交换了意见。③ 4 月 11 日,双方签署了"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这是当时苏联与东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友好条约。

战后初期,斯大林的主导思想和战略目标是保持大国合作态势,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 - 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为此目的,在雅尔塔体系划定给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外,斯大林主张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进入资产阶级议会,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④ 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斯大林在保证各国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反对他们按苏联模式建立垄断政权的企图,而是劝告共产党与自由党人、社会党人和农民党结成联盟,建立联合政府。

还在战争期间,当 1944 年 9 月苏联红军攻占罗马尼亚以后,留守后方

---

① 卡德尔与佐林会谈记录,1944 年 11 月 23 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44,目录 28,案宗 114,卷宗 4,220 ~ 221 页。载《历史档案》,1993(2),16 页。

② 斯大林与赫布朗会谈记录,1945 年 1 月 9 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全宗 6,目录 7,案宗 53,卷宗 872,8 ~ 28 页。

③ 莫洛托夫与舒巴希奇谈话记录,1945 年 4 月 6 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6,目录 7,案宗 53,卷宗 872,29 ~ 30 页。

④ 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载《东欧中亚问题》,1996(6)。

的内务部部队接到命令说:“不得破坏罗马尼亚的国家制度”,不得废除地主所有制,“在我们的占领区绝对禁止实行苏维埃化”等。1945 年 3 月 28 日,日丹诺夫针对芬兰共产党人在告选民书中表露的组成一党政府,以及“把芬兰归并于苏联”的愿望,批评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想使自己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的话,你们就不能孤立于议会中的其他党团之外”,并指出,芬兰“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牢固的政府”。1945 年秋天,苏联驻匈牙利公使普希金批评匈牙利共产党“脱离了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芬兰都采取的共同路线。在那里,都建立了经选举产生的民主力量联盟。这种符合我们政策的联盟在匈牙利只存在到市级选举时为止。共产党只有通过与民主政党的联盟才能巩固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并指示他们说,“共产党不仅要同社会民主党,而且必须同民族农民党结成联盟,还必须同国内最有影响的政党小农党结成联盟”。① 甚至到 1946 年 9 月底,斯大林还明确地向季米特洛夫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保加利亚不要急于推进社会革命进程,而要根据大局的要求考虑社会革命进程的发展。斯大林解释说:“我们曾认为苏维埃的形式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惟一形式。事实表明,苏维埃的形式是最好的形式,但不是惟一的形式。”②

与东欧其他各党不同,苏联虽然也曾表示反对在南斯拉夫实现苏维埃化,反对由共产党单独成立临时政府,③ 但实际上,对于南共领导人在国内政策方面逐步实施的比较激进的措施,莫斯科很快就采取了默许甚至赞赏的态度。南斯拉夫于战后采取了更加紧密地向莫斯科靠拢的方针。尽管铁托在 1945 年 8 月 10 日答外国记者问时,否认实行了社会主义的社

---

①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РЦХИДНИ),全宗 77,目录 3,卷宗 60,第 7、40 页;卷宗 63,33 页;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77,目录 27,案宗 121,卷宗 11,25 页。转引自 Г.П.穆拉什科、А.Ф.诺斯科娃:《战后东欧的苏联因素(1945 ~ 1985)》(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5 ~ 1985)),载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编:《“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 ~ 1985 年》(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ей Воины":1945 ~ 1985),76 ~ 77、89 ~ 90、79 页,莫斯科,1995。

② 内·甘乔夫斯基:《季米特洛夫的晚年》,106 ~ 10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③ 莫洛托夫与吉拉斯谈话记录,1944 年 4 月 24 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6,目录 6,案宗 58,卷宗 794,1 ~ 9 页。斯大林与赫布朗会谈记录,1945 年 1 月 9 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全宗 6,目录 7,案宗 53,卷宗 872,8 ~ 28 页。

会措施,但后来还是承认在南斯拉夫建立了与苏联相类似的政权形式。[①] 在战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南斯拉夫便使国内农业走上了集体化道路。1945 年 8 月,临时国民议会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当年底又通过一项法律,取消了农民的一切债务。1946 年 7 月,国民议会通过了合作社基本法,开始向集体经济过渡。1946 年 12 月通过了全面国有化法令,它在许多方面只不过是把现状正式肯定了下来。从理论上说,在少数几个未列入国有化的工商业部门中,私有制仍然允许存在,但是,实际上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②] 对此,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 1947 年的一份报告中给予了高度评价,赞扬南斯拉夫在东欧国家中率先为新制度奠定了基础,其政权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对其他国家具有榜样作用”。[③]

在政治方面,南共虽然同意组成各党联合政府,但并没有采取保证各党权力平等的实际措施。1945 年 11 月南斯拉夫人民农民党领袖向苏联大使萨德奇科夫抱怨南共在制宪会议选举中没有遵守与他们达成的精诚合作的诺言,希望莫斯科出面干预。苏联大使以不干涉内政为由采取了回避态度。[④] 同年 12 月 14 日南斯拉夫通过了新宪法,萨德奇科夫在向莫斯科汇报时满意地指出,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依据苏联宪法制定的。尽管该宪法保留了部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的内容,“但是草案的其他各条均体现出未来阶级区化政策的基本路线”。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卡德尔在回答苏联大使关于社会主义提法的问题时说,南共将在该宪法的基础上“收拾资产阶级”,并且“势必要走上用暴力镇压他们反抗的道路”。至于南共针对反对党所采取的措施,苏联大使也表示满意,认为“成效已经显现出来”。

---

① 铁托答外国记者问,1945 年 8 月 10 日;铁托在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47 年 9 月 27 日,见《铁托言论选》,中文版,22~23 页、54 页,三联书店,1963。在苏南分裂以后出版的文本中删去了这句话。

② 详见查尔斯·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中文版,106~108、18~19 页,商务印书馆,1963。

③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 575,目录 1,卷宗 41,第 1~22 页。转引自 Л.Я.吉比扬斯基:《共产党情报局在 1947~1948 年的行动:根据档案文件》(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1947~1948гг. По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载《近现代史》,1996(1),164 页。

④ 萨德奇科夫与约万诺维奇和日夫科维奇谈话记录,1945 年 11 月 12 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6,目录 7,案宗 53,卷宗 868,16~18 页。

苏联大使还指出,南共"正确地认为举行制宪会议选举和宣告共和国成立是在确立新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他们把这一胜利与苏联积极支持新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相联系"。①

在此期间,苏南进一步加强了经济、政治合作。1946年1月,铁托向苏联大使提出,根据以前的协商,打算派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讨论培训和装备35万~40万人的南斯拉夫军队,并表示可以利用建立苏南联合公司的形式使苏联能给予南斯拉夫的军事工业以更广泛的援助。② 1946年6月8日,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米高扬和南斯拉夫贸易部部长彼得罗维奇签署了经济合作的协定书。规定在南斯拉夫建立8个合营股份公司——开采和加工石油,开采铝土矿及生产铝,开采和生产铅,勘探和开采煤,有色金属,民用航空,多瑙河航运公司,南苏银行。并拟定审议建立林业和造纸工业公司的建议。协定书还规定苏联在电气化、食品、纺织、化学、机械工业、建筑材料生产和农业领域向南斯拉夫提供援助。③

苏南之间的政治合作主要体现在对马歇尔计划的立场和建立共产党协调组织的问题上。1947年6月5日,上任不久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一项由美国提供全面援助的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使莫斯科面临一种两难选择:要么冒险让西方的影响渗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要么就使东欧与西方脱离接触,从而违背自己的意愿迅速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④ 斯大林选择了后者。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标志着斯大林战后对外战略的根本转变,即由大国合作政策转向集

---

① 萨德奇科夫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5年12月17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296,案宗154,卷宗3,22~28页;萨德奇科夫给莫洛托夫的信,1945年12月18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29,案宗117,卷宗28,139~146页。

② "关于在南斯拉夫建立弹药生产基地"的备忘录,1946年5月27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30,案宗118,卷宗10,19~20页。载《历史档案》,1993(2),29页。

③ 俄罗斯联邦对外贸易部档案馆,全宗·条法司,目录11 876,案宗55,第14~16页;第17~19页。载《历史档案》,1993(2),30页。由于在谈判中出现矛盾,这些公司后来只建成了两个。

④ 沃伊泰克·马斯特尼:《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27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

团对抗政策,而为实现这一转变的首要措施就是建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①] 与其他所有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不同,在这两个问题上,南共都是积极和主动向莫斯科靠拢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参与了共同谋划。

如果说其他东欧国家都是在苏联的压力下被迫拒绝马歇尔计划的,那么南斯拉夫则是在事前即主动与苏联进行了协商,并采取了共同立场。由于不了解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的底细,以及苏联本身战后经济恢复的迫切需要,莫洛托夫应邀于 1947 年 6 月 27 日赶到巴黎,与法国外长皮杜尔和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进行磋商。当时,吉拉斯作为南斯拉夫代表出席了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法共代表大会。在巴黎会谈因实施马歇尔计划的方式——制定统一的欧洲经济计划还是各国分别提出援助要求——出现分歧而宣告破裂后,莫洛托夫在苏联大使馆接见了吉拉斯,双方在下面的两个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一、抵制马歇尔计划;二、批判法国共产党的所谓"民族主义路线"。据吉拉斯回忆,当时莫洛托夫对是否应该同意让东欧国家参加英法召开的讨论马歇尔计划的会议表示犹豫,吉拉斯则代表南政府明确表示反对。莫斯科随后发来的电报中表示的意见与南斯拉夫的立场一致。此后,南斯拉夫还任命吉拉斯为代表,准备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东欧国家会议,以便集体对倾向参加马歇尔计划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加压力。[②] 7 月 7 日夜晚,莫斯科向东欧各党领导人发出急电,禁止他们的国家派代表出席将在巴黎召开的讨论马歇尔计划的会议。而在此之前 3 天,即 7 月 4 日,卡德尔就打电话告诉苏联大使拉夫连季耶夫说:"鉴于各方面的新闻记者和外交官纷纷询问南斯拉夫在详细拟定美国向西欧国家提供

---

① 笔者对这一观点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载《东欧中亚问题》,1996(6)。关于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以及共产党情报局的最新俄国档案材料可见 C.D.帕里什:《走向冲突·1947 年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 The Soviet Reaction to the Marshall Plan, 1947), M.M.纳林斯基:《苏联与马歇尔计划》(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shall Plan),载《冷战国际史项目工作报告》(9)(1994 年 3 月);《共产党情报局文件资料汇编》;《共产党情报局在 1947~1948 年的行动:根据档案文件》,载《近现代史》,1996(1)、(2)。

② 吉拉斯前引书,98~99 页。

经济援助的措施方面的立场,南斯拉夫政府打算发表一项声明……:南斯拉夫不能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参加拟定这样的计划,因为英国和法国政府的建议是试图形成一种允许某些大国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局面,并使小国的经济依附于这些大国,进而使小国丧失民族独立。"① 无疑,南斯拉夫与西方尖锐的对立状态② 使莫斯科感到,抵制马歇尔计划首先可以得到贝尔格莱德的赞成。而铁托也认为莫斯科将对西方采取的强硬立场,恰恰是与南共以前的激进主张相吻合的。这里,与其说是铁托要追随斯大林,毋宁说是莫斯科需要贝尔格莱德的支持。这一点特别表现在组建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上。

"建立新国际"的问题最早是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 1946 年 5 月 17 日在匈共中央会议上提出来的。斯大林在 6 月 8 日夜晚与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也讲到要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并建议由南斯拉夫人发起。虽然就新国际的作用而言,拉科西和斯大林都严厉指责了第三国际,而强调新的国际组织只是交流情报和经验,并不是要约束各国共产党的行动,③ 但是当 1947 年 8 月建立情报局的任务真正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斯大林却感到他所需要的国际机构恰恰是要用来规范欧洲各国共产党行为的。这一点,从 1947 年 9 月共产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形成的决议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东欧各国取消各党的民主联合政府,而成立清一色的苏维埃政权;批判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仍然固守的合法斗争策略,而主张通过

---

① 拉夫连季耶夫与卡德尔的电话记录,1947 年 7 月 4 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6,目录 9,案宗 82,卷宗 1285,62 页。

② 驻贝尔格莱德的美国外交官斯蒂芬回忆说:"在外交领域,南斯拉夫是所有苏联卫星国中最坚定、最好战的一个。"见查理斯·斯蒂芬:《苏南破裂的紧张时刻:来自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个人看法》(The Emergence of the Soviet – Jugoslav Break: A Personal View from the Belgrade Embassy),载《外交史》,1982 年第 6 卷第 4 期,387 页。

③ 乔巴·贝克什:《1946 年初苏联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计划:匈牙利档案馆的新材料》(Soviet Plans to Establish the Cominform in Early 1946: New Evidence from the Hungarian Archives),载《冷战国际史研究项目公报》(10)(1998 年 3 月),135 ~ 138 页;《铁托传》,88 ~ 89 页;《铁托的独立道路》,49 ~ 50 页。在南斯拉夫新公布的关于 6 月 8 ~ 9 日夜晚苏南领导人的谈话记录中,提到这一问题时只有一句:"共产国际——没什么好说的。"载《历史档案》,1993(2),25 ~ 28 页。

罢工等革命行动与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斗争。特别是苏联在会议上提出了"两个阵营"的理论,更加表明了莫斯科要求各国共产党行动一致的决心。①

斯大林为这次会议做了充分准备,通过对东欧各党情况的分析,确定以南斯拉夫作为会议上的合作伙伴。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会前编写了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状况的报告,其中赞扬最多、评价最高的就是南共。在对其个别对外政策提出批评意见——与对其他各党的批评相比要轻微得多——的同时,报告高度评价了南共在战争年代武装斗争中的作用和成就,以及在建立和巩固共产党政权,建立相应的社会经济模式中取得的成绩。报告特别赞赏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尤其是贝尔格莱德反对西方的坚定立场,称其是"巴尔干和平和民主的堡垒"。报告也没有忘记肯定南斯拉夫的亲苏政策:"新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发表的所有言论","证明了与苏联的亲密友谊,充满了对苏联深深的感激之情";南斯拉夫在国际舞台上"始终不渝地支持苏联代表提出的所有建议,并且坚持苏联代表的观点"。②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上述报告之后,对外政策部还为日丹诺夫在会上的发言准备了几份材料,其中对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提出了批评意见。与不久前的报告相比,在名为《南斯拉夫的经济和政治现状》的备忘录中,虽然也列举了南共所取得的成绩,但是没有更多的赞美之词,反而对南共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指责:如南共领导人"某些过高评价自己成就的倾向和把南斯拉夫共产党摆在巴尔干地区某种'领导'党地位的意向";"不顾及其他国家和兄弟党的利益,表现出民族的狭隘性";"长期以来一直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采取错误的立场,而无视民主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同英美两国进行斗争的共同利益",以及"对意大

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丹诺夫报告的初稿中本来没有"两个阵营"的提法,这一概念是在请示了斯大林之后加进去的(参见帕里什前引文)。这显然说明苏联领导人在马歇尔计划提出后,下决心放弃过去与西方的合作政策。

②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 575,目录 1,卷宗 41,1~22 页。转引自《近现代史》,1996(1),164 页。这样的记录总共有 37 份。关于东欧其他共产党的报告见全宗 575,目录 1,卷宗 9、11、14、32、33、39、41。

利共产党的活动及其领导人陶里亚蒂同志的令人不能容忍的尖刻批评”；带有干涉内政倾向的对保加利亚宪法草案的尖锐批评；对阿尔巴尼亚渴求同苏联建立直接联系十分妒忌，认为阿尔巴尼亚只能通过南斯拉夫政府同苏联保持联系，等等。① 不清楚到底是对外政策部里对南共存在不同认识，还是政治局要求下面提供两种可供选择的材料，但无论如何，苏联领导人最终确定把南共作为会议中的依靠力量而不是批判对象。斯大林不仅于会前就有关事宜与铁托交换了意见，而且还删去了会议报告草稿中对南斯拉夫批评的段落。1947 年 9 月上半月，日丹诺夫为情报局成立大会撰写报告草案时，似乎是为了形式上的“平衡”，在使用很多篇幅批评法共和意共的同时，也顺便提了一下南斯拉夫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的错误。然而，在会议的正式报告中，连这一点小小的批评也不见了。②

于是，在 1947 年 9 月 22～28 日召开的会议上，南斯拉夫人便成为联共(布)代表团最积极的支持者。卡德尔在发言中做出了这样的论断：“莫斯科－贝尔格莱德联盟——这是我们取得独立的主要支柱。”不仅如此，南共代表按照莫洛托夫和吉拉斯巴黎会谈的既定方针，并遵照日丹诺夫当时的具体授意，在会议上对法共和意共提出了公开批评。③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满意地向斯大林汇报说：“吉拉斯非常完整地阐述了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错误，自战争时期开始评述，批评非常尖锐，论据也特别充分。”④ 对于卡德尔和吉拉斯在会上关于南共情况的报告，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南共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政治和组织上加强人民阵线。动员党和人民阵线的一切力量为实现五年计划而斗争。正如卡德尔和吉拉斯所声明的，在这次斗争中，他们将在所有方面都采用苏联的经验。

---

①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 575，目录 1，卷宗 41，18～24 页。

②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卷宗 91，46～47 页；卷宗 98，2～3 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文件资料汇编》，15、17～18 页。在公布的报告文稿中，对法共和意共的责难被省略了。

③ 卡德尔和吉拉斯的发言见《共产党情报局文件资料汇编》，123～142 页。

④ 谢尔盖耶夫(日丹诺夫)和鲍里索夫(马林科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7 年 9 月 25 日。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卷宗 92，54 页。见《共产党情报局文件资料汇编》，326 页。

南斯拉夫已经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并在新开端的基础上——即建设社会主义和彻底铲除国内的,特别是农村的资本主义成分——发展农业。”“卡德尔和吉拉斯的报告得到了极好反响。”① 会议决定将情报局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这一点也反映出南斯拉夫对苏联的支持和斯大林对铁托的欣赏。② 此后,情报局编辑部又提出在贝尔格莱德建立一个无线电中心,以便“与所有的情报局成员国共产党及联共(布)中央”进行秘密的双向无线电联系。对此,南共欣然同意,并责成内务部长兰科维奇负责,于一个月内与苏联合作完成这项任务。③

或许是对斯大林青睐的回报,或许是对莫斯科转变政策表示支持,情报局会议后南共表现得更加积极。1948 年 1 月 28 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情报局会议后南斯拉夫反应的调查报告指出:“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的决议受到南斯拉夫人民的热烈欢迎。所有的南斯拉夫报纸和杂志,以及南斯拉夫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们,都发表文章和演说,高度评价决议是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重要文献。……现在这些决议是南斯拉夫主要的外交政策。”其结果“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了南斯拉夫人民对苏联的好感。南斯拉夫人民一致欢迎和赞同苏联代表在国际会议上的工作”。“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对外政策完全符合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宣言的原则。”④ 这一评价充分表明,此时苏联对南共的表现仍然十分满意。

---

① 谢尔盖耶夫(日丹诺夫)和鲍里索夫(马林科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7 年 9 月 25 日。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卷宗 92,46~51 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文件资料汇编》,322~323 页。

②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在 9 月 25 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捷共和南共都要求把情报局这种具有协调职能的机构设在他们那里。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卷宗 92,54 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文件资料汇编》,326 页。

③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卷宗 1136,1~3 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 1947~1948 年的行动》,载《近现代史》,1996(1),162 页。

④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情报局会议后南斯拉夫反应的调查报告,1948 年 1 月 28 日。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 575,目录 1,卷宗 53,296~299 页。尽管情报局会议之后,苏联驻南使馆不断向莫斯科寄发有关批评南领导人的情报,但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司长拉夫利舍夫于 10 月 8 日给莫洛托夫写了一个报告,坚决反对大使馆带有偏见的描述。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44,目录 31,案宗 124,卷宗 29,7~9 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 1947~1948 年的行动》,载《近现代史》,1996(2),169~170 页。

然而,在此时亲密的苏南关系当中,却隐藏着一种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斯大林转向冷战政策的实质,以及铁托对这一实质的误解。与当时"自由世界"政客们所持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铁托所持的就是这种看法——刚好相反,斯大林进行冷战的目的并不是要发动世界范围内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①,他的战略目标依然是保证苏联在雅尔塔体系中划分的势力范围,只不过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已有所改变,即内线发动进攻,外线实行防御。如果说以前斯大林希望通过放松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以取得美国的合作,那么现在斯大林则想通过采取强硬路线,迫使华盛顿承认苏联在东欧的绝对地位。至于苏联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斯大林并不想让那里的革命斗争影响其在冷战初期的战略安排和步骤。铁托过高估计了莫斯科强硬路线的革命性,他没有想到南斯拉夫在情报局会议后所推行的革命战略,恰恰打乱了斯大林的安排和步骤。而斯大林则低估了铁托的独立性和倔强性格,他没有想到南共会在苏联提出反对意见后仍然坚持自己激进的外交政策。这样,一场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①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苏联没有邀请中国和希腊共产党参加波兰会议,而当时这两党正在领导着各自国家的显然是追随苏联道路的革命斗争。也许正是由于美国人直接参与了这两个国家的冲突,日丹诺夫在情报局会议上洋洋万言的报告中,只有区区四行文字谈到美国对中国和希腊的干涉,而对于这两个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则只字未提。参见《共产党情报局文件资料汇编》,152~181 页。

冲突：
巴尔干联邦与希腊革命

苏南冲突的焦点集中在巴尔干地区。1948 年 1 月，莫斯科得到的两个消息使斯大林大为震怒：一个是南斯拉夫试图派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理由是希腊反动派可能对阿发动进攻；一个是季米特洛夫在罗马尼亚对记者发表谈话时宣称，一旦条件成熟，在巴尔干和多瑙河一些国家之间将决定成立联邦或关税同盟，这些国家是罗、保、南、阿、捷、波、匈，其中还特别提到了希腊。这两件事情的要害是事先都没有向莫斯科通报，更没有得到批准，而其结果则可能在敏感的希腊问题上引起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武装干涉，导致美苏直接对抗。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仅仅几个月后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斯大林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于是，苏联下令，要南、保领导人到莫斯科进行紧急会谈。苏、南、保三国领导人 1948 年 2 月 10 日举行的著名会谈是苏南冲突的起点，不过，要了解他们在会谈中的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以及会后所采取的相互抵触的措施，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会谈所涉及的南保关系、南阿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希腊问题的复杂背景。

关于建立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联邦的主张，是 1944 年秋天铁托与斯大林初次见面时，斯大林亲自向铁托提出的。11 月 22 日会见卡德尔、西米奇和舒巴希奇时，斯大林又催促南斯拉夫人尽快进行此事。当时，苏联显然是想借助与在盟国中享有声誉的南斯拉夫实行联合，使处于战败国地位的保加利亚得以摆脱英美的控制和监督。于是，南保双方于 12 月底和翌年 1 月初进行了商谈。但是南斯拉夫对此态度消极，保加利亚内部对

是否成立联邦也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关于联邦应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保加利亚人希望两国以平等地位进入这一联邦，而南斯拉夫人则要求保加利亚必须作为南斯拉夫现有六个联邦共和国之外的第七个共和国加入联邦，所以会谈没有结果。1月底，莫洛托夫又把南、保代表团召到莫斯科，与苏联代表共同做进一步的讨论。尽管会谈各方一致同意建立联邦是需要的，但在如何组建联邦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最后，鉴于时机尚未成熟，决定先不签署建立联邦的条约，而起草一个合作互助的条约。后来因英国提出抗议，合作互助条约的签署也推迟了。① 新的档案文献表明，在建立联邦的原则上，苏联是站在保加利亚一边的。斯大林1945年1月9日接见赫布朗时说，南斯拉夫关于联邦的条约草案不合适，“这个联邦的前景是在二元制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全联合这两个国家”。斯大林强调，必须逐步走向联合，但只能“是自由结成联邦的两个国家的有机联盟。不能造成想吞并保加利亚人的印象”。苏联之所以急于促成联合，是担心“如果形势急剧转变，保加利亚人可能会倒向美国和英国，甚至倒向土耳其”。②

由于得到苏联的支持，保加利亚还是希望尽快建立起这个联邦。1945年10月，保加利亚驻南公使托多罗夫两次与萨德奇科夫谈话，表示保加利亚方面对未能及时建立联邦感到遗憾。③ 1946年初，保加利亚政府又一次向南斯拉夫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提出继续进行一年以前中断的谈判。对此，南斯拉夫持明确的反对态度。铁托在与苏联大使会谈时，“以异常坚决的口气声明，他现在不能支持与保加利亚结成联邦这种思想”，因为保加利亚仍然是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国家，特别是因为，共产党在保加利亚的影响与在南斯拉夫是无法相比的。同时，鉴于保加利亚人可能会重新提出这个

---

① 详见《卡德尔回忆录》，110～114页；克利索德前引书，106～108页。

② 斯大林与赫布朗会谈记录，1945年1月9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全宗6，目录7，案宗53，卷宗872，8～28页。

③ 萨德奇科夫与托多罗夫谈话记录，1945年10月23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目录7，案宗53，卷宗868，3～4页。

问题,铁托请求苏联大使明确一下莫斯科对这一问题的意见。① 此后不久,在与苏联大使商议铁托访苏的议事日程时,铁托再次提出要讨论同保加利亚的关系问题。②

作为给斯大林准备的与铁托会谈的背景材料,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司长拉夫利舍夫起草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尽管使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结成联邦符合两国的利益",但是,在缔结与保加利亚的和平条约以及解决两个国家内部的复杂的政治问题之前,无论是结成联邦,还是缔结南保之间友好互助条约,都为时尚早。③ 这份报告使斯大林稍微改变了一下策略。在5月27日苏南领导人的会谈中,当斯大林提到南保联邦时,铁托说:"搞联邦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并重复了对拉夫连季耶夫讲过的理由。斯大林立即反驳说:"这件事应该做","开始可以限制在友好互助条约问题上,但实质上应该做得更多一些"。对此,铁托只得表示同意。④ 随后,南斯拉夫代表团与同时赶来莫斯科的保加利亚领导人举行了会晤。6月7日,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与南、保代表团举行了三方会晤,商妥两国实行最紧密的合作,但同盟条约要等到对保和约签字后再行缔结。⑤

显然,苏联当时主张南保以某种形式联合起来,索菲亚对此表现积极,而贝尔格莱德则采取了消极观望的立场。但是,一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南斯拉夫迅速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和强大起来,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足以使铁托加强了成为巴尔干地区主宰的欲望和信心;另一方面,南保关系日益密切,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私人交往已经不同寻常。1947年2月10日对保和约在巴黎签字以后,南保两国加快了实现同盟和

---

① 铁托与拉夫连季耶夫会谈记录,1946年4月22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30,案宗118,卷宗15,39~41页、47~48页。载《历史档案》,1993(2),31页。

② 铁托与拉夫连季耶夫会谈记录,1946年5月20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30,案宗118,卷宗15,第100页。载《历史档案》,1993(2),31页。

③ 关于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1946年5月27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30,案宗118,卷宗10,13~17页。

④ 斯大林与铁托的会谈记录,1946年5月27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АПРФ),全宗45,目录1,卷宗397,107~110页。

⑤ 《季米特洛夫的晚年》,68页。

联邦的步伐,以至铁托在6月可以雄心勃勃地对保加利亚报界人士宣称:“自由的巴尔干各国人民”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坚如磐石的统一体”。7月底铁托邀请季米特洛夫前来谈判,并顺利地排除了阻碍南保关系发展的马其顿问题——同意将原属保加利亚的皮林马其顿并入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8月1日,南保领导人在布莱德签署了4项涉及双边关系的条约,并且发表了公开声明。①

但此时斯大林的心情已经完全不同了。对马歇尔计划的猜疑,对德国局势的忧虑,特别是正在考虑之中的对西方政策的调整,使莫斯科感到必须统一安排和妥善处理所有欧洲事务。因此,当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向苏联通报即将签订条约一事时,斯大林于7月5日答复说,南保条约应当延期到和平条约生效后再签订。使斯大林感到意外和气愤的是,铁托和季米特洛夫都认为无须等到和平条约的正式批准,可以先草签南保条约,并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他们在没有得到莫斯科首肯的情况下,竟然擅自付诸行动了。8月12日斯大林在给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内容相同的信函中严厉斥责了他们的行为。②

这两位领导人虽然接受了莫斯科的批评,但只是放慢却没有停止他们的工作。1947年秋天,铁托成功地访问了索菲亚、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这无疑使他感到自豪和荣耀。在11月访问保加利亚时,铁托发表讲话说:“很多人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联邦。但我们正在创立的是一个关系更密切,范围更广泛的联盟,至于联邦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是苏联的“忠实朋友”,并说“永远也不可能有任何力量会把我们同我们的伟大兄弟、同苏联人民分开”。11月28日,南保领导人签署了为期20年的合作和共同防御条约。③ 两周后,

---

①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等编:《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中文版,23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② 以上材料出自保加利亚国家中央档案馆和铁托档案馆,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载《近现代史》,1996(1),168~169页。有的学者认为斯大林对此事并没有强烈反应。见《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34页。

③ 斯蒂芬前引文,第390页;《季米特洛夫的晚年》,186~188页。条约原是无限期的,在报请莫斯科批准时,期限被改为20年。

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科斯托夫谈到,最近的事态发展正在导致“在不久的将来成立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联盟并建立一个共同的南部斯拉夫国家”①。正是在这种乐观的气氛中,季米特洛夫在与罗马尼亚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后发表前述关于东欧国家联邦的讲话。

1948 年 1 月 22 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对季米特洛夫的讲话发出警告,声称西欧将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东欧的苏联化。② 或许是缺乏政治敏感,或许是出于职业惯例,1 月 23 日的《真理报》未加评论地转载了季米特洛夫讲话的大部分内容。但斯大林对此事则十分敏感。第二天,索菲亚便收到了莫斯科发来的一封含有严厉斥责内容的密电,批评季米特洛夫的行为“对新的民主制国家有害无益,使英美更容易反对这些国家”。1 月 28 日,《真理报》又发表了编辑部述评,表示绝不赞同季米特洛夫在联邦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并认为这种联邦是“不可靠的和凭空虚构的”。季米特洛夫对苏联领导人的激烈谴责立即做出了顺从的反应,首先以保通社 1 月 29 日声明的形式,然后又在 2 月 2 日祖国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公开表示接受批评。他还把保通社的声明寄给了苏斯洛夫,让他转告斯大林,相信他与苏联立场将保持完全一致。但这根本没能使莫斯科感到满意。1 月 30 日,苏斯洛夫在回电中对保通社声明试图进行解释和修正的说法再次提出了批评,并责令保共领导人立即前往莫斯科。③ 显然,斯大林认为事态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的行动性质相同,而且还在于时间吻合——莫斯科正在为铁托对阿尔巴尼亚的擅自行动大伤脑筋。

南阿关系的背景更为复杂,在斯大林看来,也更为敏感。还在战争当中,南共就成为阿尔巴尼亚游击队的支持者和庇护者,而且两者都是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建立起新政权的,所以关系密切。按照赫布朗的话说,“阿

---

① 《国际事务概览(1947 ~ 1948 年)》,235 页。

② 《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37 页。

③ 以上电报存保加利亚国家中央档案馆,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 1947 ~ 1948 年的行动》,载《近现代史》,1996(1),160 ~ 161 页;1996(2),159 页。关于季米特洛夫的反应,参见《季米特洛夫的晚年》,219 ~ 220 页。

尔巴尼亚人是南斯拉夫最好的朋友”。但是在盟国关于战后势力范围的划分中尚未确定阿尔巴尼亚的地位时,斯大林对南阿关系的发展持谨慎态度。在雅尔塔会议之前,斯大林叮嘱赫布朗说,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应当慎重”,“必须等一等,斟酌一番”,应当避免在那里与英国人发生冲突。①

战后一段时期,苏联不想因为与阿关系密切而引起西方盟国的猜疑,且鉴于南阿关系的历史状况和对南共的信任,所以同意让阿共接受南共的领导,有关阿共的事务也交由贝尔格莱德处理。莫斯科与地拉那的联系是通过南斯拉夫人进行的,包括苏联提供的武器也是经由南斯拉夫转交的。② 随着南阿关系的日益发展,南共便提出了阿尔巴尼亚加入南斯拉夫联邦的问题。对于阿党内反对这一方针的政治局委员谢伊富拉·马列绍瓦,南共认为有必要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施加影响,以清除这种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的人物。1946 年 2 月,阿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于谴责“机会主义”之后,将马列绍瓦开除出了领导集团,同时把发展与南斯拉夫“更加紧密而又具体的兄弟情谊”列为党的任务之一。③

1946 年 3 月 27 日,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邀请阿共总书记霍查正式访南,以订立南阿友好条约。同时,签订关于密切经济合作、简化(在颇大程度上废除)两国之间边界制度的各项协定,以及关于共同防御的秘密军事协定。4 月初,南阿分别通报莫斯科征求意见。④ 南阿谈判的前景引起了莫斯科的严重关注。当铁托在 4 月 22 日与苏联大使谈话时透露出“阿尔巴尼亚早晚应当加入南斯拉夫联邦”的口风后,拉夫连季耶夫接到了紧急指示,应向南斯拉夫领导方面查明情况,同阿尔巴尼亚拟议中的条约可能是针对谁的。4 月 23 日,卡德尔做出了说明:条约是针对意大利的,但既然在条约中规定了在保卫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领土完整和

---

① 斯大林与赫布朗会谈记录,1945 年 1 月 9 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全宗 6,目录 7,案宗 53,卷宗 872,8 ~ 28 页。

② 《共产党情报局在 1947 ~ 1948 年的行动》,载《近现代史》,1996(1),166 页。

③ 铁托档案馆,全宗 KMJ,I - 3 - b/19,转引自《历史档案》,1993(2),17 ~ 18 页。

④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44,目录 30,案宗 118,卷宗 10,1 ~ 2 页;卷宗 15,24 ~ 25、56 页。载《历史档案》,1993(2),18 页。

独立方面互相帮助的条款，那么间接地也是针对希腊的，因为后者曾经妄想得到阿尔巴尼亚南方的一些地区，如北埃皮尔。① 铁托本来已确定就南苏经济合作以及请苏联帮助援建“军工生产基地”的问题，亲自前往莫斯科参加与苏联政府的谈判。拉夫连季耶夫根据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通知铁托说，同意他在巴黎和会以后进行访问。但5月7日，苏联大使通知铁托说，访问将安排在巴黎和会之前，即5月下半月进行。同时，苏联政府将要同他讨论南阿条约的问题。② 显然，关于南阿条约谈判的消息促使苏联方面突然把访问的日期提前了。

在铁托到达莫斯科之前，拉夫利舍夫起草了《关于南阿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称，签署南阿友好互助条约是“有益和重要的事情”，但建议在条约中不要直接提及意大利。至于“讨论阿尔巴尼亚归入南斯拉夫联邦的问题”，报告建议这件事应推迟进行，“以防止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国际地位复杂化”。报告还建议不签订南阿秘密军事协定，不签订专门订有简化边界条款的协定，以免引起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注意。③ 于是，在1946年5月27日与铁托的会谈提到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时，斯大林首先指出：“阿尔巴尼亚内部的政治局势现在还不明朗，有消息说，那里在共产党政治局和恩维尔·霍查之间出了一些什么问题。传来的消息说，科奇·佐泽希望在党代表大会之前来莫斯科，以便观察、分析、研究某些问题。恩维尔·霍查也表示希望与佐泽一道来莫斯科。”铁托显然感到这样做有损于南阿的特殊关系，因此表示，应该让霍查先到贝尔格莱德来，待情况查明后再前往莫斯科。莫洛托夫解释说：“我们曾经多次制止阿尔巴尼亚人前来莫斯科的意向，但阿尔巴尼亚人始终坚持这一点。”斯大林则表示同意铁托的意见，他指出：“阿尔巴尼亚人前来莫斯科，在英美方面可能引起不良的反应，而且这将加剧阿尔巴尼亚外交局势的复杂化。”接着，斯大林问到霍查

---

① 卡德尔与拉夫连季耶夫的会谈记录，1946年4月23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30，案宗118，卷宗15，45页。载《历史档案》，1993(2)，18页。

② 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30，案宗118，卷宗15，31、62、76、100页。载《历史档案》，1993(2)，17～18页。

③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30，案宗118，卷宗10，1～3页。载《历史档案》，1993(2)，31页。

是否同意阿尔巴尼亚作为联邦成员加入南斯拉夫的问题。对此,铁托作了肯定的回答。这时,斯大林根据会谈前苏方准备的意见提出:"目前要同时解决这样两个问题,即阿尔巴尼亚加入南斯拉夫联邦的问题和的里雅斯特的问题,对南斯拉夫来说将是困难的。""最好首先讨论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友好互助问题","应该为这一条约找到一种形式,以便使阿尔巴尼亚更接近南斯拉夫"。① 铁托顺从了斯大林的意见。7月初,霍查访问南斯拉夫时,在莫斯科同意的范围内与铁托签署了条约和协定。不久,阿政府便得到通知,为了"加强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的联系",苏联政府支持签订这些文件。②

此后,看似顺利发展的南阿关系渐渐露出了危机的苗头。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冷战的出现。南阿友好互助条约的签订在西方和巴尔干地区引起了轩然大波,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各大报纸纷纷进行指责,而特别感到愤怒的是希腊人。雅典《论坛报》的一篇社论直截了当地指出: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条约是对希腊和联合国的挑衅。这一条约可能成为巴尔干火灾的起因!③ 西方世界对南阿条约的强烈反应,使斯大林感到必须限制南斯拉夫在希腊内战中的行动,而南斯拉夫对希腊游击队的援助都是通过阿尔巴尼亚进行的。另一方面,当斯大林有心在东欧共产党中进行整肃,以便于采取统一行动时,南阿之间的亲密关系,特别是将阿尔巴尼亚纳入南斯拉夫的道路,在莫斯科已经行不通了。斯大林开始关注地拉那了。1947年7月,斯大林邀请霍查和组织书记、内务部长佐泽访问了莫斯科,此后苏联与阿尔巴尼亚逐渐建立了直接联系。莫斯科不仅派遣苏联专家到阿尔巴尼亚勘探石油,而且向地拉那派出了公使。为了安抚铁托,苏联公使丘瓦金通知南斯拉夫人说,斯大林向霍查表示,苏联在南阿关系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并将一如既往地尊重贝尔格莱德在阿的特殊地位。但

---

① 斯大林与铁托的会谈记录,1946年5月27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97,107~110页。

② 拉夫连季耶夫与霍查会谈记录,1946年7月24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30,案宗118,卷宗15,167~168页。载《历史档案》,1993(2),31页。

③ 《霍查政治传记》,124~125页。

是,斯大林在会见霍查时曾声明,阿尔巴尼亚是独立的国家,应该独立自主地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实际上暗示了苏联对南斯拉夫对阿政策的不满。①

在这种背景下,阿党内以政治局委员、经济部长纳科·斯皮洛为首的反南势力悄悄崛起,并且越来越赢得霍查的信任,而以佐泽为主要代表的亲南派则遭到冷遇。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的合作消极起来,斯皮洛与丘瓦金的交往却日趋密切,阿电台和报纸也不断出现对苏联的赞扬和吹捧。②铁托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忧虑和不满,在致函霍查提出警告未能奏效以后,于1947年8月直接向苏联提出了要求。他向拉夫连季耶夫明言:"在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的莫斯科之行以后,某些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开始对南斯拉夫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并且错误地评价南斯拉夫对阿奉行的友好政策。"铁托指责斯皮洛"奉行使阿尔巴尼亚疏远南斯拉夫的政策",对南共扶植起来的霍查采取模棱两可的立场也表示不满,同时赞赏佐泽是"最坚定的和始终如一的领导人"。铁托要求苏联同意他非正式地邀请霍查和佐泽访问南斯拉夫,并认为应当向霍查和佐泽指出,"不能把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看成是苏联希望阿尔巴尼亚疏远南斯拉夫的表现,而是恰恰相反,应当将其视为是对两个邻国之间亲密关系的促进"。同时,南共还打算向阿尔巴尼亚人建议解除斯皮洛的职务。③

自然,铁托的要求没有得到回音。至11月,当南共认为阿党内部反南派的行为已超出限度时,铁托又发出了一封措词更加激烈的信件,要求阿共中央政治局弄清事实,做出解释。鉴于铁托和南共的威望和影响,霍查只得召开中央全会,讨论铁托的信件和斯皮洛事件。看到霍查再次与佐泽接近以后,斯皮洛感到失望而开枪自杀。关于斯皮洛的死,霍查含糊其词地向莫斯科解释说,斯皮洛有反苏情绪,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对此,丘瓦金呈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份长篇报告,认为这种说法没有证据。据说,斯

---

① 《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载《近现代史》,1996(1),166页。

② 《霍查政治传记》,132~134页。

③ 拉夫连季耶夫与铁托谈话记录,1947年8月14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目录9,案宗82,卷宗1285,110~112页。

皮洛是斯大林看中的人,因此,这一事件震动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大发雷霆,指责苏驻阿使馆,怎么能够允许斯皮洛自杀?怎么可能对这么重大的事件毫无防范?然而,铁托并不知道莫斯科已另有打算。南共于12月初致函苏联领导人,提出对斯皮洛的指控,并要求莫斯科同意召回苏联驻阿专家和采取措施加强南在阿的支配作用。作为答复,斯大林建议派吉拉斯或其他"非常熟悉阿尔巴尼亚情况"的"负责同志"到莫斯科来。①

1948年1月15日,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会见了吉拉斯。会谈中,斯大林虽然表示斯皮洛自杀一事不应发生,但是当吉拉斯试图进行解释时,斯大林却打断他的话说:"我们在阿尔巴尼亚没有什么特殊利益可言。我们同意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在不到十分钟就结束的谈话中,斯大林做出结论:苏南在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上没有分歧,甚至委托吉拉斯替苏联政府起草一封给铁托的电报,通报这一结论。② 斯大林这番话的真实用意究竟何在,引起了研究者的疑问。③ 目前尚未发现新的档案证据可供参考。不过,从事态的发展以及谈话时的语气和用词可以判断,斯大林说的是反话。况且,此事直接涉及斯皮洛与苏联的关系,斯大林显然也有难言之隐。莫斯科在等待彻底解决问题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来了。根据南斯拉夫档案材料,在得到吉拉斯发自莫斯科的关于苏联立场的报告后,1月19日,铁托建议霍查在阿南部提供一个基地,供南斯拉夫的一个师进入,理由是有消息说,存在着希腊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支持下侵阿的危险。④ 也许如有人认为的那样,是铁托

---

① 《霍查政治传记》,135~138页;吉拉斯前引书,104~106页;《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载《近现代史》,1996(2),158页。苏南往来信件见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卷宗99,1~5、8页。

② 吉拉斯前引书,111~115页。

③ 《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载《近现代史》,1996(2),158页。

④ 《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载《近现代史》,1996(2),158~159页。按照南斯拉夫人过去的说法,是霍查主动要求南斯拉夫派遣两个师的部队赴阿尔巴尼亚的南部,南政府原则上同意了这一要求。见《铁托传》,第111页。但新材料表明,在阿党政治局讨论这一问题之前,霍查曾问过斯大林的意见,而莫斯科立即答复:没有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这种行动是完全不必要的。斯大林还解释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轻易激怒我们以前的盟友们。"见《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38页。

误解了斯大林的真实意图,以为莫斯科仍然承认南斯拉夫在阿的特殊地位。但更可能是铁托借题发挥,另有所图。吉拉斯后来披露,铁托出兵的真实意图是为使阿成为南斯拉夫联邦的第七个共和国做准备。① 无论是斯大林关于维持南在阿优势地位的表示鼓励了铁托,抑或是斯大林关于南阿不得急于合并的警告刺激了铁托,总之,铁托做出这样的决定时没有同苏联商量,也没有向苏联通报。莫斯科从霍查那里得知这一情况后,激烈地谴责了南领导人的这类行动,并指出在理解南阿两国关系时,苏联同南斯拉夫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拉夫连季耶夫紧急约见铁托,要求对方确认是否存在南军队将进入阿的决定。铁托对此予以承认,但申辩说是征得霍查同意的,并强调发生对阿入侵的可能性。铁托还提出,他不同意莫斯科关于在南军队进入阿的情况下,美英除进行舆论攻击外还会出兵干涉的说法。但同时也表示,既然苏联反对此举,南政府将不会派出军队。斯大林对铁托的答复仍不满意,要求派"南斯拉夫政府的重要代表"来莫斯科讨论"分歧"。②

在南向阿派驻军队的问题上,斯大林除了担心南阿关系进一步发展可能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形成威胁以外,更多考虑的则是与阿尔巴尼亚密切相关的希腊局势。如果说苏联对南保关系和南阿关系的政策在冷战政策确定前后有所变化的话,那么斯大林对希腊革命的态度则始终是谨慎和保守的。因为希腊与阿尔巴尼亚在北埃皮尔地区有领土争端,根据南阿条约,一旦希腊使用武力,南斯拉夫就有义务向希腊宣战。但是早在 1944 年 10 月与丘吉尔划分两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时,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斯大林就把希腊给了英国。③ 希腊本来就不是苏联的

---

① 见《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37 页。

② 《共产党情报局在 1947～1948 年的行动》,载《近现代史》,1996(2),158～159 页;吉拉斯关于苏南保代表秘密会晤的报告,1948 年 2 月 10 日。转引自《历史档案》,1997(4),102～103 页。

③ 过去有人对斯大林与邱吉尔的这个协定持怀疑态度,但苏联档案中的新证据说明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协议。见俄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卷宗 283,3～16 页。转引自纳林斯基:《斯大林与多列士:1944～1947 年》(И. В. Сталин и М. Торез, 1944～1947гг.),载《近现代史》,1996(1),19 页。

势力范围,而美国对希腊革命的强烈反应也迫使莫斯科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谨慎从事。从美国政策的角度看,希腊问题与土耳其和伊朗事件一样,都是杜鲁门主义产生的重要背景,是对西方心目中苏联扩张野心和世界革命运动的本能恐惧,而苏联的对策则反映出斯大林维护雅尔塔体系的主旨,特别是1947年马歇尔计划引起苏美关系趋向紧张以后,斯大林更不想在巴尔干地区引火烧身。所以,莫斯科不得不"一再以国际形势微妙而须审慎从事为由"来敷衍希腊游击队。据希腊游击队领导人马科斯回忆,莫洛托夫一直为了外交上的原因拖延被编成"外籍军团"的志愿军进入希腊作战,后来答应如果成立"一个正式政府",苏联"将立刻承认"。然而,当1947年底希腊临时民主政府宣布成立后,莫斯科又答复说,"要等弄清英国人和美国人会做出什么反应,才能承认这个政府"①。在这种情况下,铁托试图向阿尔巴尼亚派遣军队,显然是斯大林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何况南共还是背着莫斯科做出这一决定的。

斯大林对希腊革命和民主政府的态度最突出地表现在2月10日苏南保三国领导人的会谈上,而正是这次会谈,成为苏南走向分裂的起点。

① 《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第243页;克利索德前引书,218~219页。

分裂：
斯大林的压力和铁托的抵制

斯大林召集南保领导人谈话的目的是向他们施加压力，迫使南共和保共服从莫斯科的指挥，回到共产党情报局已经确定的统一路线上来。如果铁托像季米特洛夫一样表示顺从，苏南分裂局面本来是不会形成的。然而，南共对斯大林在2月10日会谈中做出的决定采取了抵制的立场，这是苏联绝对不能容忍的。

在这次长达3小时的会谈[①] 中，斯大林态度严厉，“怒容满面”，时常粗暴地打断南、保领导人的讲话，以致他们往往无法明确和连贯地陈述自己的看法。会谈的中心议题是指责南保两国在签订南保条约、发表关于东欧国家联邦的声明以及向阿尔巴尼亚派驻军队这三个问题上所犯的原则

① 关于2月10日会谈的史料，过去有吉拉斯、卡德尔的回忆录和德迪耶尔在《铁托传》中的记述。目前新发现的有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外交部长科拉罗夫关于这次会谈的记录（保加利亚国家中央档案馆，全宗147，目录2，卷宗62，5～35页，载《历史档案》，1997(4)，96～102页）和吉拉斯关于这次会谈给南共中央的报告（铁托档案馆，全宗KMJ，I－3－b/651，33～40页，载《历史档案》，1997(4)，102～109页，英译本载《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0)，128～134页。由于政治原因，吉拉斯在写回忆录时未能使用这份档案）。此外还有当时苏方的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253，20～21页），可惜笔者至今尚未得到这个档案文献。尽管在细节上有一些出入，但在所谈问题的提法和原则上，南斯拉夫人的回忆与档案文献还是比较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档案文献中的记载更加全面和细致，而回忆录中有不少场面和心理的描写。以下对会谈的记述综合参考了这些材料，因此，除档案文献新增加的内容外，不再注明出处。

性和政策性错误,其根本原因在于南保两国在采取这些行动前没有预先征得苏联政府的同意,从而违背了共产党情报局波兰会议所形成的互相协商、统一行动的决议。问题的性质在于南保两国的政策与苏联的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此,斯大林要求南保两国在会谈后分别与苏联签署一份关于在所有对外政策问题上必须经过双方协商的文件。

档案文献充分表明,斯大林所担心的,就是美国和西方对此做出强烈反应,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从而使莫斯科在国际舞台上和处理苏美关系时陷入被动局面。斯大林批评季米特洛夫的声明是在帮助美国的反动派,"当前美国正在进行大选前的斗争。对我们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那里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如果美国反动财团在大选中重新进入政府,"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和我们的行动过错造成的"。在谈到阿尔巴尼亚问题时,斯大林说,"如果铁托向那里派去一个师或仅仅一个团",美国和英国"就会大喊大叫说,阿尔巴尼亚被占领了","就会充当阿尔巴尼亚独立的保护者的角色"。莫洛托夫则举出战前国联因苏芬冲突宣布苏联为侵略者为例,担心美英"可能使联合国走到反对我们的地步"。总之,这些"共青团员式"的"左"派热情将为国际反动派提供借口,而给苏联造成不利。①

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斯大林指出:希腊问题是可能导致一场全面战争的"国际大问题",因此,对于阿尔巴尼亚只能派出教官,提供武器装备,如果遭到侵犯,"让他们自己保卫自己的独立",这样美国人就很难发动进攻了。对于希腊游击队,既然他们没有可能取得胜利,就需要收缩那里的游击运动。如果我们帮助游击队,英美就会插手,英美想在希腊建立军事基地,不能为他们提供借口。至于马科斯政府,应该让与希腊相距较远的国家首先承认,而周边国家最后承认。

此次谈话中最令人费解的是斯大林关于巴尔干联邦的说法,虽然几份材料的用词不同,但都记录了斯大林如下的意见:只有三个联邦是可能的和自然的,即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联邦,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联邦,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但所有这些国家成立一个联邦是不现实的。斯大林还

---

① 科拉罗夫关于苏南保代表会谈的记录,1948 年 2 月 10 日,转引自《历史档案》,1997(4),98~99 页。

反复强调,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应立即实现联合,然后阿尔巴尼亚再加进去,而且条件已经成熟,不能拖延。如果愿意,明天成立也可以,首先可以从政治联合开始,这样别人进攻阿尔巴尼亚就困难了。就目前的材料看,还很难对斯大林这番话的真实用意做出确切的判断:真是考虑到巴尔干的局势,还是迁就南斯拉夫的意愿①,或者像南斯拉夫人后来断定的那样,莫斯科企图通过联邦这种形式,通过俯首听命的保加利亚人,加强对南斯拉夫的控制和影响?无论如何,斯大林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特别是会谈前后苏联在经济和军事援助方面采取的消极态度,使南共领导人产生了对立情绪,并对斯大林的意图做出了最坏的估计。他们决定进行抵制。

南斯拉夫领导人到莫斯科本来是准备商谈在军事工业和贸易方面经济合作问题的。吉拉斯来莫斯科特意率领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在1月15日与斯大林和16日与布尔加宁的会谈中,苏联对于吉拉斯提出的关于援助军事工业设备的要求满口答应下来,但就是拖着不办。在吉拉斯之前来莫斯科商谈续签换货议定书的外贸部副部长茨尔诺布尔尼亚已经等了三个星期,当他和吉拉斯终于见到米高扬时,得到的还是一张空头支票。经济谈判毫无进展,显然,莫斯科首先要解决苏南对外政策的分歧。② 果然,2月10日的会谈根本没有涉及经济问题。在会议结束后给铁托的电报中,南斯拉夫代表团失望地报告说:"我们没能提出任何一个我们的经济问题。为此,卡德尔想拜会莫洛托夫。我们将尽快回国。"③ 2月11日夜晚,卡德尔在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签署了苏南两国"有义务就涉及两国利益的所有重要国际问题进行相互协商"的议定书。④ 此后,他立即向莫洛托

---

① 据卡德尔的回忆,在谈到联邦形式时,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竟同意南共的主张,即只能是七个成员平等的联邦,而不是两个国家的联邦(《卡德尔回忆录》,第127页),但在其他材料中没有这样的记述。

② 吉拉斯前引书,114~115页;《铁托传》,107~108页;《苏南冲突经历》,144~145页。

③ 卡德尔、卡巴里奇、吉拉斯给铁托的电报,1948年2月12日。铁托档案馆,全宗KMJ,I-3-b/651,45~46页。转引自《历史档案》,1997(4),111页。

④ 关于1945年4月11日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的议定书,1948年2月11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6,卷宗908,151页。转引自《历史档案》,1997(4),109页。参见《卡德尔回忆录》,133~134页。

夫提出应“尽快解决军事物资供应问题,以及为南斯拉夫的军事工业提供设备的问题”,并抱怨说,“在莫斯科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已就这些问题工作了数个星期”。对此,莫洛托夫推说不了解情况。鉴于南斯拉夫当年的出口能力不够抵补南斯拉夫为完成其五年计划而必需的某些货物(电力设备等)的进口,卡德尔提出了由苏联向南斯拉夫提供6 000万美元借款的要求。莫洛托夫对此也只是同意向政府通报。① 两天后莫洛托夫答复,军事物资供应的问题需要再研究,至于借款一事,则因苏联财政困难而无能为力。② 2月26日,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克鲁季科夫通知茨尔诺布尔尼亚,他代表苏联政府宣布,现在不能签订1948年5月至年底的贸易议定书,南斯拉夫也没有必要派遣贸易代表团来莫斯科。③

不过,事情也并不完全是南斯拉夫人回忆录给人们留下的那种印象,似乎莫斯科只是靠高压手段迫使南共就范。斯大林在会谈中对季米特洛夫讥笑、讽刺、辱骂、挖苦,而对南共领导人则显得客气和宽容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与保共依靠莫斯科扶持的发展道路不同,南共的天下是自己打出来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有一定地位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斯大林确实不想过分刺激桀骜不驯的铁托,以免撕破脸皮,把南共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当卡德尔转告莫洛托夫,铁托打算亲自来莫斯科作正式访问,“以便消除同苏联政府相互关系中的各种误会”后,莫洛托夫答复:“斯大林同志和其他同志都很高兴与铁托同志会面,时间按卡德尔讲的在3月或4月。”④ 此外,2月23日吉拉斯回国后曾向拉夫连季耶夫提出,为何苏联不发表铁托在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在收到拉夫连季耶夫关于吉

---

① 莫洛托夫关于1948年2月11日24时会见卡德尔的日记。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6,卷宗908,149~150页。

② 莫洛托夫关于1948年2月13日18时会见卡德尔的日记。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目录10,案宗79,卷宗1106,1~2页。参见《卡德尔回忆录》,134页。

③ 拉夫连季耶夫与铁托谈话记录,1948年3月10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目录10,案宗76,卷宗1106,57~61页。铁托致莫洛托夫的信,1948年3月18日,载《历史问题》,1992(4~5),124~125页。并参见《苏南冲突经历》,144~145页。

④ 莫洛托夫关于1948年2月11日24时会见卡德尔的日记。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6,卷宗908,149~150页;莫洛托夫关于1948年2月13日18时会见卡德尔的日记。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目录10,案宗79,卷宗1106,1~2页。

拉斯所提问题的电文后，苏联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征得副外长佐林的批准，于3月初建议国立政治书籍出版社立即把铁托的上述报告收录进铁托文选和演讲集里，该书那时已经译成俄文准备出版。[①] 可见，莫斯科还是在力争使南斯拉夫服从自己的要求，然而，铁托对苏联压力的抗争和抵制终于使斯大林失去了耐心。

铁托对2月10日会谈的反应首先表现在他2月13日给吉拉斯和卡德尔的电报中，他对“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结果”表示不满，因为会谈的结论“束缚了我们的双手”，以至南斯拉夫无法在“边境防御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为了向斯大林施加压力，铁托通报了阿尔巴尼亚最近的困难局势，希望代表团能以此为由继续谈判，以得到莫斯科对一旦“阿尔巴尼亚遭到进攻”应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具体答复”。[②] 南斯拉夫代表团回国后，在2月19日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莫斯科之行的详细情况，会议认为，由于苏联在保加利亚的特殊影响，建立联邦可能成为对南实行控制的手段，因此应当拒绝同保加利亚就联邦问题进行磋商。会议还确定了继续维持南在阿优势地位的方针，并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苏南关系问题。2月底至3月初，在南斯拉夫的影响和推动下，不了解2月10日莫斯科会谈情况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再次向苏联提出了因存在着希腊威胁而让南军队进入阿的必要性，同时还提出了南阿统一的建议。[③] 这对莫斯科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

最令克里姆林宫震惊的是贝尔格莱德传来的南共中央政治局3月1日扩大会议的情况。会议讨论了关于莫斯科会谈情况的报告、五年计划、军队和军事工业以及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的问题。铁托在会上指出，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走进了死胡同，并且特别强调，苏联推迟签订贸易协定

---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32，案宗128，卷宗8，107页；卷宗18，7～8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载《近现代史》，1996(1)，160页。

② 铁托给吉拉斯和卡德尔的电报，1948年2月13日，铁托档案馆，全宗KMJ，I－3－b/651，53～54页。转引自《历史档案》，1997(4)，113页。

③ 见南斯拉夫档案文献及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472，78～79、84～86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载《近现代史》，1996(1)，160页。

是对南施加经济压力，其目的是使南斯拉夫处于从属地位。至于南保联邦，南共领导人指出，由于保加利亚在政治上党内派别纷争，在经济上贫穷落后，目前联合的条件尚未成熟，而苏联极力主张立即实现联邦，是在使用“特洛伊木马”的计策。铁托最后强调，这场争论关系到“南斯拉夫的独立问题”。会议一致通过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只有政治局委员、财政部长茹约维奇默不作声，会后，他把一切情况向苏联大使馆做了汇报。①

不过，铁托并非决定就此便与斯大林分手。他在3月10日同拉夫连季耶夫谈话时激动地表示，南斯拉夫政府不明白，为什么苏联拒绝和南斯拉夫签订贸易协议，而同时正在和其他国家签订这样的协议。铁托接着说，众所周知，南斯拉夫在战争时期是苏联的忠实盟友，并且南斯拉夫的民主制度比其他东欧国家更巩固。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没有贸易协议，这个问题不能像外贸部声明那样向南斯拉夫人民解释，而这一点又不能向人民隐瞒。铁托反复说道，莫斯科的决定让人不能理解，这个决定与两国的友好关系是不相容的。“这样对待南斯拉夫，我们感到委屈。”铁托还说，也许苏联对南斯拉夫有些不满意，但即使在一个家庭中也有兄弟间的不和。最后，铁托请求把这一切转达给苏联政府。②

然而，关于南共3月1日政治局会议的密报已经使斯大林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在他看来，铁托是在有意对抗莫斯科。3月11日拉夫连季耶夫奉召紧急回国。③ 此后苏南两国便开始在推迟签订贸易协定、调整卢布和第纳尔的汇率、拒绝海军和军火工业的援建等具体问题上互相指责，矛盾逐

---

① 《铁托传》，122～125、137～140页；《卡德尔回忆录》，第273页。现在的档案材料证实了南共领导人当时的猜测，茹约维奇确是拉夫连季耶夫的情报员，他以前不止一次地把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特别是南共领导人在小范围内表露出来的对苏联的不满情绪透露给苏联大使。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30，案宗118，卷宗15，112～113页；卷宗16，75～76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载《近现代史》，1996(1)，160页。

② 拉夫连季耶夫与铁托谈话记录，1948年3月10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6，目录10，案宗76，卷宗1106，57～61页。

③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202，目录5，案宗110，卷宗1，17页。载《历史问题》，1992(4～5)，130页。

渐升级。[①] 3月18日莫斯科通知铁托，鉴于南斯拉夫经济委员会违背协议，拒绝向苏联贸易代表列别杰夫提供他所需要的经济资料，苏联决定撤回全部在南苏联专家和工作人员。[②] 与此同时，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向苏斯洛夫提交了关于南斯拉夫所犯错误的长篇报告。报告首先指出，“南斯拉夫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接着从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忽视苏联作为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决定性力量、过高地估计南斯拉夫在发展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成就、过低地估计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富农的危险、对共产党在人民民主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采取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态度等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南共的错误表现及理论根源。[③] 正是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3月27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派专使向铁托递交一封对南共进行全面指责的信。斯大林把苏南关系恶化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南共所采取的反苏政策的立场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④]

铁托收到这封引起苏南全面论战的来信后的最初感受，用他自己的话说，好像遭到雷击一样，但他很快镇静下来，并召集卡德尔、吉拉斯等人商议对策。他们一致下决心接受莫斯科的挑战，并决定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如何回复斯大林的指责。在4月12日秘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代表们慷慨陈词，异常激动，纷纷表示拥护南共领导人抵制苏联压力和指责的立场。会议严厉指责了茹约维奇的亲苏态度，还对他是否向苏联使馆提供情报的事情提出质问。第二天继续召开的会议通过了给莫斯科的复函，并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反党案件。[⑤] 在4月13日发出的

---

① 莫洛托夫给铁托的电报，1948年3月13日；铁托给莫洛托夫的信，1948年3月18日。载《历史问题》，1992(4～5)，124～125页。

② 莫洛托夫给铁托或卡德尔的电报，1948年3月18日。载《历史问题》，1992(4～5)，125页。

③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南斯拉夫意识形态问题给苏斯洛夫的报告，1948年3月18日，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3，9～24页。

④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铁托的信，1948年3月27日。载《历史问题》，1992(4～5)，127～129页。

⑤ 《铁托传》，127～130、132～140页。赫布朗因党内矛盾已于1946年6月被贬职。

回函和关于南共中央全会决定的通报中，铁托首先把苏南争论的起因归结为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向苏联提供的虚假情报，然后逐一驳斥了苏联的严厉指责。① 南斯拉夫不肯屈服的行为激怒了斯大林，他不再像同志和兄弟那样参与争论了。5月4日和22日，以联共(布)中央名义发出的信措词更加激烈，态度更加严厉，表明了斯大林与铁托彻底分手的决心。②

斯大林决心整治南共，除恼怒于铁托的反抗态度和顽固立场外，更担心以铁托的威望和影响力，东欧各党会纷纷仿效，打出独立的旗帜，从而引起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破坏苏联的战略部署。莫斯科已经看到了这种危险的信号。2月19日匈共总书记拉科西访问苏联时提出，经与南共和捷共领导人磋商，他建议召开情报局会议，讨论承认希腊临时民主政府的问题，并表示匈共已经接受了马科斯和铁托的代表的要求，同意“把支援希腊民主军的工作部门移到匈牙利”，为此将每月从预算中拨出200万福林。③ 还在2月中旬的时候，日丹诺夫和苏斯洛夫就在与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得知，南共建议奥地利共产党人分裂奥地利，即在苏占区建立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单独政府。3月22日拉科西又来信说，在3月15日同奥共领导人谈话时，匈共主张，现在要让“邻近的人民民主国家”帮助“奥地利的同志在共同行动计划的基础上改变奥地利的局势”。拉科西还说，匈共和南共领导人都支持意共领导人正在讨论的计划：如果美国干预将于4月份举行的选举的话，意共打算在意大利北部发动武装起义，并夺取政权。④ 在莫斯科看来，这些都是冒险主义的行为。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3～4月间提供的关于东欧各党独自行动

---

① 铁托、卡德尔给斯大林、莫洛托夫的信；南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的通报，1948年4月13日，载《历史问题》，1992(6～7)，158～164、164～165页。

② 联共(布)中央给南共中央的信，1948年5月4日、22日。载《历史问题》，1992(10)，141～151、154～155页。

③ 苏斯洛夫与拉科西会谈纪要，1948年2月19日，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5，59～62页。

④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卷宗100，第6页；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5，69～79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载《近现代史》，1996(2)，164页；《战后东欧的苏联因素》，102页。

的一批材料,更使斯大林感到不安。这些材料批评大多数匈共领导人可能担心被指责为是“莫斯科的代理人”,因而对苏联冷漠。“这表现在共产党领导人在匈牙利不仅不宣传也没有兴趣宣传苏联和苏联文化,而且容忍许多粗暴歪曲苏联现实和包含有赤裸裸反苏内容的书籍和出版物进入匈牙利。”材料还指责波兰领导人试图“证明自己道路的特殊性”,“对苏联不友好,特别是对苏联在社会主义中的经验和成就视而不见”,没有同波兰民族主义的各种倾向进行斗争,害怕被人指责为“使波兰苏维埃化”。至于捷共领导人,材料说他们“以民主改造捷克斯洛伐克的共同纲领把自己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系在一起”,使民族政策“服从于同资产阶级实行民族统一的利益”。“他们笃信同资产阶级政党‘密切’合作的可能性,实际上滑向了对反动的资产阶级一味让步和妥协的道路。”①

显然,如果不采取措施迅速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一旦铁托的分裂行动在东欧各党当中产生连锁反应,其后果不堪设想。斯大林决定发挥共产党情报局这一机构的组织力量,在打击南斯拉夫的同时,震慑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党。为此,斯大林把3月27日斥责南共的信件抄送东欧各党,并针对南共在复信中提出的邀请联共(布)代表到贝尔格莱德解决分歧的建议,在5月4日的信中提出将召开情报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最初,只有匈共在4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激烈谴责南斯拉夫人的决议,并且将决议寄给了联共(布)中央,大多数东欧情报局成员党的领导人在接到苏联3月27日给南信件的复本后,并没有立即对此做出苏联所希望的那种反应。保共政治局于4月6日通过了与苏联立场保持一致的决议,但并不认为有必要将决议寄送莫斯科,而波、罗、捷各党则认为没有必要就苏联的信件通过一个专门的决议。哥穆尔卡在开始时甚至表示对南斯拉夫人的指责不可信,并认为莫斯科所采取的行动是过分的。但是在莫斯科的压力下,东欧各党纷纷开始效法匈牙利的做法。4月18日和19日,季米特洛夫和哥穆尔卡分别把他们通过的决议寄给了联共(布)中央。4月22日,莫斯科收到了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同意苏联指责南领导人的决议。4

①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5,64~65页;卷宗1161,2~5页;卷宗1162,61、45~46页。转引自《战后东欧的苏联因素》,103~104页。

月23日,又收到捷共中央主席团在4月19日通过的决议。随后,联共(布)中央便将这些表示支持苏联立场的决议全部转寄给南共中央。在4月底和5月上旬,法共中央政治局和意共中央书记处也分别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不知道是莫斯科的授意,还是出自对南共的同情,或许二者兼而有之,东欧各党领导人纷纷对铁托进行说服。5月6日,保共中央政治局让季米特洛夫"给铁托写了一封私人信函,向他指出南共所走道路的危险性"。5月16日乔治乌-德治在同南驻罗大使谈话时说,如果南斯拉夫人不参加会议,将使南共与其他党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这只能"对敌人有利"。他劝告南斯拉夫领导人承认哪怕是部分承认"错误",派铁托为首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联共(布)中央进行直接的谈判以调整两国关系和停止冲突。①

在这种气氛中,5月18日苏斯洛夫致函铁托,正式通知他:联共(布)中央建议6月8~10日召开九国共产党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讨论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现状问题。但莫斯科很快就接到了铁托的回函,南共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② 5月22日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署名的致南共中央的信告知,会议改在6月下旬,信中还强调,"无论南共中央的代表是否出席",会议都应当举行,而"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意味着南共中央走上了"脱离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统一阵线的道路"。③

或许真是要做最后的努力,哥穆尔卡5月25日致函南共中央进行劝说,希望南共相信苏联所说的话,即不参加会议"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脱离世界革命运动的后果",并表示准备于6月5~10日同波党政治局委员贝尔曼一起来贝尔格莱德。但铁托拒绝波兰人来访,对于6月8日德共主席皮克提出的6月17~18日在索菲亚与他会晤的请求,也没有应承。根据南斯拉夫从驻苏使馆和派驻联共(布)中央的南共中央代表那里收到的各

---

① 《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载《近现代史》,1996(1),165~167页。

② 苏斯洛夫给铁托的信,1948年5月18日;铁托给苏斯洛夫的信,1948年5月20日,铁托档案馆,全宗KMJ,I-3-b/651,第1、2页。转引自《历史问题》,1992(10),152~153页。

③ 联共(布)中央给南共中央的信,1948年5月22日,载《历史问题》,1992(10),154~155页。

种报告来看,在5月底到6月初的时候,苏联方面曾经暗示,只要南斯拉夫哪怕部分地承认"错误",冲突就有可能解决。① 但同时也有证据表明,苏联此时早已做好了在情报局会议上批判南共的准备。从4月下旬至5月,根据苏联领导人的指示,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开始查阅30年代与铁托及南共活动有关的共产国际文件。日丹诺夫利用这些材料起草了会议报告和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6月初提交给斯大林的第一份草稿后来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作了修改。6月7日,日丹诺夫把新的草稿递交斯大林。但在斯大林审阅后,这份草稿又做了很大的修改,主要是加重了对南领导人的指责。②

无论如何,在铁托看来,如果出席情报局会议就意味着投降、无条件的投降,而南共中央则意识到铁托若出席会议,其人身安全没有保障。③ 1948年6月20日,南共中央发表了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的长篇声明。④ 实际上,苏联人已经估计到这种结局,他们甚至不需要对会议的报告和决议做任何修改,因为在编写这些材料时,"已经考虑到了南斯拉夫人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这种情况"⑤。至此,苏南冲突已经有了结局:铁托被斯大林逐出了教门。联共(布)在会议上组织了对铁托集团的批判。⑥ 然而,最有代表性的举动是并非情报局成员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做出的。在情报局会议期间,霍查召开了阿共九中全会,并发表了由霍查亲自执笔的阿共中央公报。公报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一致地、完全地支持共产党

---

① 《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载《近现代史》,1996(1),166~167页。

②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3,52~68页;全宗575,目录1,卷宗411,1~146页;全宗77,目录3,卷宗105,49~50页;全宗494,目录277,卷宗21,329a~329、330~337页;全宗77,目录3,卷宗104,1~26页。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载《近现代史》,1996(2),168页。

③ 《苏南冲突经历》,176~177页;《铁托传》,105~152页。

④ 声明全文见《苏南关系》,375~377页。

⑤ 茹拉夫廖夫(日丹诺夫)、马克西莫夫(马林科夫)、索罗金(苏斯洛夫)致菲利波夫(斯大林),1948年6月21日,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卷宗106,21页。见《共产党情报局文件资料汇编》,488页。

⑥ 东欧各国及法、意各党代表在情报局会议上的发言,见《共产党情报局文件资料汇编》,418~447页。

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严厉谴责南共领导人的公开叛变行为。他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他们公然地、可耻地向光荣的社会主义国家、向光荣的列宁－斯大林党、向民主反帝阵营宣战。南共领导人是卑鄙的托洛茨基叛徒，他们出卖了英雄的、兄弟的南斯拉夫人民的神圣事业，把他们引向灾难。”随后，阿尔巴尼亚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的所有27个条约和议定书，关闭了在地拉那的南斯拉夫文化中心，禁止在地拉那报亭出售南共中央机关报《战斗报》，命令所有南斯拉夫专家于48小时内收拾行李，无条件离开阿尔巴尼亚。①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曾有一句名言对苏南冲突做出了形象的总结：“马克思是共产党人的上帝，列宁是共产党人的耶稣·基督，斯大林是共产党人的第一任教皇，铁托是共产党人的第一个马丁·路德。”② 不过应当指出，所谓铁托的独立道路是苏南冲突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起因。

① 《霍查政治传记》，156～157页。

② 转引自《苏南冲突经历》，279页。

徘徊：
南斯拉夫在困境中探索

这里所谓的南斯拉夫独立道路，包含两个概念：一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南斯拉夫游离于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之外，不仅从地理角度，而且从政治角度，都在东西方冲突之中占据了稳固的中间地位；一是在对内政策方面，南斯拉夫经过自身的试验，最终走出绝境，抛弃斯大林模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然而，就其结果而言，无论是不结盟运动，还是工人自治制度，在南斯拉夫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说，这是铁托一生之中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摸索、最痛苦的选择。

苏南分裂以后，南斯拉夫面临的处境极为艰难。为了彻底孤立南斯拉夫，斯大林首先决定切断南斯拉夫与所有东欧共产党的联系，为此，联共(布)一方面在1948年6月的情报局会议上组织对南共的批判，一方面准备揭露东欧各党中存在的亲南倾向和民族主义情绪，以此威慑各党领导人，消除南斯拉夫的影响。在情报局会议筹备过程中，联共(布)对外政策部就已经起草了东欧各党要从南共“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情报分析报告。收集的材料涉及波、捷、匈、保、罗各党，甚至已经对波兰工人党和哥穆尔卡本人准备好了“组织结论”。① 一旦发现东欧共产党内出现铁托主义的苗头，这些早已准备好的材料就会立即抛出来。后来苏联在东欧挑起的大清

①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1，20～22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载《近现代史》，1996(2)，170～171页。

洗运动,给这些材料找到了用场。

情报局还采取了许多没有公布的组织手段,以加强苏联对东欧各党的控制,割断他们与南斯拉夫的联系。如将情报局总部和刊物编辑部从贝尔格莱德迁往布加勒斯特①,废除南斯拉夫人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的两个巴尔干地区组织:巴尔干国家工会公约理事会和巴尔干青年理事会,理由是它们妨碍了世界工会联合会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内部统一。② 特别是通过了从组织上防止出现南共式"异端"、加强情报局各党统一行动的决议。决议不仅提出必须制定一个共产党情报局的章程,而且根据苏斯洛夫的建议确定建立共产党情报局常设机构书记处。决议规定,书记处由情报局各党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它的基本任务是保障各党之间的联系和监督情报局刊物编辑部的工作。③

随着苏南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也开始恶化。1948 年 7 月 6 日,南斯拉夫驻苏联临时代办费依奇会见苏联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代理司长基尔萨诺夫,通知他南斯拉夫政府决定召所有在苏联的南斯拉夫公民回国。基尔萨诺夫则转达了苏联外交部的指示:苏联的战争残疾人组织决定不参加南斯拉夫人民阵线战争残疾人协会即将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战争残疾人代表大会。④ 7 月 10 日和 15 日,南斯拉夫两次照会苏联外交部,请求"苏联提供可能,让所有的在苏联学习和在各个机关工作的南斯拉夫公民

---

① 当苏联代表提出迁址问题时,罗、匈、波代表都争先恐后地建议让自己国家的首都成为新的总部。苏联方面选择了布加勒斯特。见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8 年 6 月 21 日。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卷宗 108,23 ~ 24 页。载《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资料汇编》,493 ~ 494 页。

② 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8 年 6 月 20 日。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 77,目录 3,卷宗 106,5 ~ 7 页。1947 年 11 月,南斯拉夫倡议并召开了巴尔干地区工会协商会议,并缔结了巴尔干国家工会公约。巴尔干青年理事会也是在此前不久由南共建议成立的。还在情报局会议之前,莫斯科就向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党提出停止这些组织活动的建议。见《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资料汇编》,482 ~ 483 页、449 页、480 页。

③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资料汇编》,449 ~ 451 页。

④ 基尔萨诺夫与费依奇谈话记录,1948 年 7 月 6 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6,目录 10,案宗 78,卷宗 1102,1 ~ 2 页。

返回南斯拉夫”。经请示斯大林,莫洛托夫给予了坚决的批示:“不予答复。”①

南斯拉夫提出这样的要求和苏联拒绝给予答复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莫斯科开始在南斯拉夫党内和国内组织所谓“健康力量”。苏联最早看中的是南共领导层里的亲苏派人物赫布朗和茹约维奇。当联共(布)中央“获悉南斯拉夫政府已宣布赫布朗和茹约维奇为叛徒和卖国贼”② 后,担心他们遭到不测,于1948年6月9日致函南共,信中声明:如果“南共中央政治局决心从肉体上消灭他们”,“那么联共(布)中央将认为南共中央政治局是刑事杀人犯”。苏联还要求“在联共(布)中央代表的参加下对所谓赫布朗和茹约维奇向联共(布)中央提供错误情报一案进行调查”。③ 据说,莫斯科已经内定茹约维奇为南共总书记,赫布朗为政府总理,苏联情报机关甚至曾考虑过组织力量把他们从南斯拉夫营救出来。④ 自然,南共中央拒绝了苏联的要求⑤。此后,情报局在6月28日的决议中公开号召南共党内的“健康分子”站出来,他们的任务是:“迫使现在的领导人承认他们的错误,并公开地、诚恳地加以纠正;迫使他们与民族主义决裂,回到国际主义上来,千方百计地巩固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⑥

由于铁托和兰科维奇的严密控制,南斯拉夫的“健康力量”没有发展起来,莫斯科便开始着手组织南斯拉夫“流亡政府”。8月11日夜晚,在苏联

---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6,目录10,案宗78,卷宗1102,3~6、7、9页。

② 当时南共对赫布朗和茹约维奇的指控没有做任何公开的报道。5月6日只公布了他们被解除职务的命令。5月7日他们秘密被捕。5月12日,南共中央通过的将他们开除出党的决议,同样是按照特别秘密的程序发给各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显然,莫斯科的消息又是通过秘密途径得到的。

③ 莫洛托夫致铁托或卡德尔的电报,1948年6月9日。载《历史问题》,1992(10),156页。因拉夫连季耶夫5月15日回国述职,这个声明是由临时代办阿尔米亚尼诺夫向卡德尔口头宣布的。

④ 《南苏关系》,125页。

⑤ 南共中央致联共(布)中央的声明,1948年6月17日。载《历史问题》,1992(10),156~157页。

⑥ 共产党情报局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结论,1948年6月23日。见《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资料汇编》,455~461页。

的策动下，南斯拉夫高级将领约万诺维奇上将、佩特里切维奇少将和达普切维奇上校试图逃往罗马尼亚，但他们在越境时被打死或捕获。叛逃现象在驻外官员中更为普遍，很多外交官宣布站在苏联一边。8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南斯拉夫前驻罗马尼亚大使拉多万·戈卢博维奇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的一封信，在这封完全是根据情报局决议精神写的信中，戈卢博维奇宣布辞去他在布加勒斯特所担任的职务。不久，在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的政府官员中也出现了分裂，大使馆代办布兰科夫连同他的九个同事叛逃，剩下的人员则被驱逐出境。[①] 与此同时，南斯拉夫边界也处于紧张状态。据卡德尔在联合国发言中列举的事实，仅从1948年7月1日至1949年9月1日这段时间，在南斯拉夫东部边界就发生了219起武装冲突事件。[②]

最令铁托头痛的是莫斯科实行的经济封锁。战争结束后，南斯拉夫立即集中全力于经济恢复工作，到1947年，已经达到战前水平。随后，铁托便开始仿照苏联模式在南斯拉夫推行了雄心勃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然而，按照南斯拉夫计划工作人员的说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依赖于从苏联、东欧各国输入大量的生产资料，特别是采矿设备和工业设备。当时南斯拉夫的进口物资大约50%来自于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方集团国家，而某些主要商品的依赖性还要大得多，如全部煤和焦炭，80%的生铁和肥料，60%的石油产品，以及实际上全部的特种机械、钢管、铁路车辆和机车，都需要从苏联及其卫星国进口。[③]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导演的经济封锁对南斯拉夫来说就意味着灾难。情报局会议以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撕毁合同、压缩贸易，对于已经签订合同，甚至已经付了款的极为需要的制造品、工业品和原料拒不交货。订约当年，莫斯科就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的主要商品协定，并宣布把苏联同南

---

① 《苏南冲突经历》，222～223页；《南苏关系》，125页；坎农（贝尔格莱德）致国务卿，1948年11月5日，美国国家档案馆，RG－59，860H.00（W）/11－548。转引自马斯特尼前引书，53页。

② 《苏南冲突经历》，374页。

③ 乔治·霍夫曼、弗雷德·华纳·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中文版，上卷，177～178页；下卷，178页，商务印书馆，1963。

斯拉夫的贸易削减八分之七。1949 年 1 月,苏联建立了欧洲经济互助委员会,其宗旨除了对抗马歇尔计划,就是对南斯拉夫实行禁运,并缩小这项基本上属于政治性质的政策可能对经互会各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以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答应的投资贷款只实现了 6.3%,与苏联商定的 67.5 亿旧第纳尔的贷款只实现了 0.6%。到 1949 年 4 月,南斯拉夫与苏联、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的全部贸易已处于停顿状态,与波兰的贸易量减少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在米高扬访问布拉格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也于 6 月 11 日宣布停止向南斯拉夫运送货物。如此,南斯拉夫被迫宣布延期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封锁给南斯拉夫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4.29 亿美元。①

与此同时,由于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南斯拉夫的国防开支迅速增加。1946 年和 1947 年的军费开支平均每年为 3.1 亿美元,1948 年增加到 4.38 亿美元,1949 年增加到 5.28 亿美元,以后几年平均为 6.65 亿美元。国防费用在国民收入中占的百分比,1949 年为10.2%,1952 年即增长到 21.5%。居民生活水平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至 1952 年,南斯拉夫个人消费比 1948 年降低了 14%,已经下降到战后的最低水平。②

看起来铁托的统治的确面临险境,前途未卜。情报局的决议公布以后,西方媒体纷纷预测,在苏联的压力下,铁托政权无法支撑下去。6 月 29 日这一天,伦敦《泰晤士报》报道说:“很难设想,现在治理着南斯拉夫的那些人还能继续掌权”;曼彻斯特《卫报》发表社论认为,“南斯拉夫政府很可能已经转入他人的手中”;路透社则援引了《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的说法:“华盛顿的消息灵通人士认为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之间不会决裂,铁托元帅要么满足克里姆林宫的要求,要么被撤换。”按照情报局刊物主编尤金离开贝尔格莱德时的预言,铁托集团的统治“连三个星期都坚持不了”。③

---

① 《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30 页;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 年》,中文版,344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卡德尔回忆录》,234 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上卷,177~178 页;下卷,178 页。

② 《卡德尔回忆录》,235~236 页

③ 《苏南冲突经历》,193~196 页。

然而,铁托不仅坚持了下去,而且带领南共开辟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的独立道路。不过,他们并不是直接走上这条新路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摸索过程。

不仅苏联的影响和斯大林的威信在南斯拉夫党员和群众当中具有深厚的基础,就是在铁托和南共多数领导人的头脑中,共产主义的传统理念和斯大林主义的思维框架也是根深蒂固的。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对于铁托来说十分尴尬的局面:情报局关于开除南共的决议发表后,南共却要在公开场合为斯大林唱赞歌。为庆祝南共五大召开,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有15 000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上通过了给斯大林的致敬电,《战斗报》7月3日发表了这封电报:"我们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我们从第五区人民阵线盛会上向你并通过你向苏联全国致以热烈的问候。斯大林同志,我们深信,你将竭尽一切努力排除对我们全国,对我们党和我们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没有根据的指责。我们对你,对苏联全国,对你们为全人类所做的一切的爱戴是无限的,诚如我们相信你将竭尽一切使真相不久就大白一样。"电报的结束语是:苏联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万岁!教导我们热爱苏联的铁托同志万岁!我们的伟大朋友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万岁![①]

在7月21日召开的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铁托一方面对情报局的指控提出反驳,一方面强调了与苏联的团结,并表示希望与苏共消除分歧。铁托在发言中说:"我们认为,决议里最使人感到痛苦的,就是指控我们背离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指控我们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国际主义者,指控我们已经抛弃了马列主义科学。""我们的对外政策和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因为苏联的对外政策过去和现在都符合我国的利益,符合和平的利益。"铁托最后表示:"我愿强调指出,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改善南苏两党之间的关系。"他赢得了会议代表的支持,大会在"铁托!斯大林!"的热情欢呼声中闭幕。[②] 尽管铁托后来向他的同事解释说,这样做是出于策

① 《苏南冲突经历》,211~213页。

② 《南苏关系》,396~397、124~125页。

略的考虑①,但实际上更大的可能是铁托的革命理想和激情使他在苏南冲突之初并没有想到要与斯大林彻底决裂,因为他们的理想和实现理想的途径都是一致的。按照南共中央组织书记兰科维奇的说法,南共五大制订党章,尽管已在共产党情报局决议公布之后,但还是"照抄了苏联共产党的党章"。②

在南共被开除出情报局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南斯拉夫在对外政策方面仍然寻求与苏联东欧集团保持一致。南共五大闭幕的第二天,在贝尔格莱德拉尔切夫人民大学会议厅召开了一次讨论多瑙河航运管理条约的国际会议,参加的有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代表以及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代表。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在会上发生了公开的冲突。西方国家代表强调"既得权利",而东方国家代表则力主维护沿岸国家利益的原则。会上,南斯拉夫代表团坚持支持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立场,对于苏联的建议一概毫无保留地表示赞成,甚至对于会议的官方语言只用俄语和法语而不包括英语这样的建议也不例外,以至给南斯拉夫驻外官员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在五大以后,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变得十分亲近了。"③ 此外,在《真理报》发表了情报局决议之后,驻莫斯科的美国记者找到南斯拉夫使馆的文化参赞,试探南斯拉夫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可能性。兰科维奇得到消息后立即指示驻莫斯科的代办费依奇,必须提醒使馆全体同志注意,对于任何人的任何挑衅都不要上当。④ 直到9月26日,铁托还公开表示在欧洲地区南斯拉夫是站在苏联一边的,他甚至很自信地认为,斯大林迟早是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寻求同南斯拉夫的妥协的。⑤ 尽管莫洛托夫在11

---

① 1952年6月德迪耶尔问铁托,是什么动机促使他在五大结束时欢呼苏联和斯大林。铁托回答说,出于斯大林在群众中的威信,必须十分谨慎。我们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让苏联以其行动使得群众自己喊出"打倒斯大林"。见《苏南冲突经历》,212页。

② 兰科维奇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载1952年11月9日《政治报》。转引自《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29页。

③ 坎农(贝尔格莱德)致国务卿,1948年7月31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1948年,第4卷,634~637页,华盛顿特区,1974;《苏南冲突经历》,216~217页。

④ 《苏南冲突经历》,289页。

⑤ 雷姆斯(贝尔格莱德)致国务卿,1948年9月27日,美国国家档案馆,RG-59, 860H.00/9-2748。转引自马斯特尼前引书,53页。

月7日苏联国庆时再一次号召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举行反铁托的起义，但是《战斗报》在12月21日斯大林69岁生日那一天还发表了题为《伟大斯大林的六十九年》的长篇社论，并且用三栏版面刊登了斯大林的照片。而在1949年1月20日列宁逝世纪念日，《战斗报》则发表文章宣称，南共遵循“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与此同时，《斯大林选集》被纳入了出版计划。①

1949年初经互会成立时，尽管铁托估计到南斯拉夫将被排除在这一组织之外，但为了表示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倾向社会主义阵营，铁托还是提出了要求加入经互会的申请。② 在南斯拉夫的请求遭到拒绝以后，铁托依旧努力在外交政策上与苏联集团保持同一条阵线，这特别反映在对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立场上。1949年3月北约成立时，南斯拉夫对其所进行的强烈抨击，同莫斯科的做法如出一辙，以致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坎农汇报说，南斯拉夫在对待大西洋联盟的立场上是“完全克里姆林宫式的”。③

据1949年上半年在南斯拉夫进行采访的美籍南斯拉夫作家阿达米克描述，他与铁托、卡德尔、皮雅杰、兰科维奇、吉拉斯、基德里奇等高级领导人会见后留下的印象是，一直到6月底，他们仍然保留着一线希望，“幻想会有可能发生某种事情，促成同莫斯科的和解”。④

最令人不解的是，南共在经济领域开始加紧推行一种完全仿照苏联全盘集体化方式制定的农业政策。这被认为是南斯拉夫“战后政治生活中

---

① 《苏南冲突经历》，298～299页。

② 详见《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29～30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上卷，174～175页。

③ 贝尔格莱德致国务院，1949年3月31日，美国国家档案馆，RG－59，860H.00/3－3149。转引自亨利·布兰兹：《对冷战的重新定义：1948～1960年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政策》(Redefining the Cold War: American Policy toward Yugoslavia, 1948～1960)，载《外交史》，1987年第11卷第1期，47页。

④ 路易斯·阿达米克：《鹰与根》(The Eagle and the Roots)，76、130、250页，纽约，1952。转引自《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29～30页；另参见《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上卷，174～175页。

斯大林主义气味最浓的一项措施”。①

1949年1月底,南共中央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党在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促进农业生产方面的基本任务的决议。在这一决议的基础上,重新掀起了大规模地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宣传工作和群众运动。虽然南斯拉夫在1946年就通过了合作社基本法,开始向集体经济过渡,但当时没有采取强迫措施,特别是对富农也实行了一视同仁的政策。正是在这一点上,莫斯科指责南共“没有在农村中进行阶级斗争”。② 现在情况不同了。在对个体农民进行猛烈宣传的同时,还使用了许多行政手段迫使他们加入合作社。凡是抗拒的人,不论贫富,处处受到阻难和恫吓。国家征购剩余农产品的定额和税率都定得高到无法缴纳的程度,目的就是要迫使所有抗拒集体化的农民破产。在法律规定的四种农业合作社的形式中,国家政策特别导向个体农民加入第四种合作社——最接近苏联集体农庄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大规模群众运动中,这种高级形式的合作社有了迅猛发展:1948年底还只有1 318个,到1950年底已增加到6 964个,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的数目也从60 156户增加到323 849户,合作社的土地从323 984公顷增加到1 782 614公顷。③ 只是由于苏联集体农庄的名称在欧洲极易引起人们的反感④,所以南共在合作社名称这一点上还坚持了自己的特点,除此之外,南斯拉夫开展的新集体化运动在实质上与苏联模式并没有多大区别,正如1953年联合国的欧洲经济调查报告

---

① 《苏南冲突经历》,299页。

② 联共(布)中央给南共中央的信,1948年5月4日。载《历史问题》,1992(10),141~151页。

③ 《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111~112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141~145页;《苏南冲突经历》,430页。

④ 在情报局会议筹备时,匈共总书记拉科西和波兰工人党政治局委员贝尔曼就指出,他们国家的农民害怕集体农庄,建议以“合作化”取代“集体化”的术语,但遭到日丹诺夫的否定。(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575,目录1,卷宗48,102~103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载《近现代史》,1996(2),171页。)波兰工人党甚至决定不搞集体农庄,而提出了自己的合作社计划,同样也受到了苏联的严厉批判。(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1,15~18页。转引自《战后东欧的苏联因素》,105页。)

所做的结论:当时南斯拉夫的农业法律,“除了细节以外,同东欧各国制定的农业法律差不多”。①

然而,绝大多数农民都强烈反对这种苏联方式的农业集体化运动,高额的税收和征购也遇到农民的顽强抵制。因此,集体化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即使在其高潮的1950年,集体化土地的面积仍然只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25%左右(其中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集体化农民在农户总数中只占17%。在牧场、草原、果园、葡萄园地区,集体化的比例还要低得多。② 到1951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下降,已经达到某些观察家认为的“一次全国规模的减产罢工”的地步。由于农民的消极抵抗,农业产量出现了灾难性滑坡,而1950年夏季的旱灾更是雪上加霜,以致1951年的谷物生产只达到战前产量的41%。③ 面对事实,铁托后来承认:尽管知道集体农庄在苏联“经过20多年,情况仍然不妙,而我们却还是走俄国人的路,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④

在政治方面,南斯拉夫受到的压力也出乎南共的想象。尽管铁托做出了一些缓和关系的表示,但斯大林毫不领情,社会主义阵营对南共的围攻愈演愈烈。这场运动首先是在东欧各国批判以前信奉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道路”,继而开始处理倾向南共观点或同情铁托的各国领导人,最后发展成一场以揪出铁托分子为名的令人胆战心寒的大清洗运动。

1948年夏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斯兰斯基还可以自豪地告诉他的英国客人说,他们正走在一条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但是不久之后,莫斯科就清楚地声明说,除了苏联的道路外,没有其他什么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日丹诺夫的秘书尤金对此解释说:“人民民主”已经不再是一个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漫长的过渡阶段,而是一种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目的上,都同正在苏联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丝毫差别的制度。⑤

---

① 《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144~145页。
② 《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111~112页。
③ 《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上卷,178页。
④ 《苏南冲突经历》,433页。
⑤ 马斯特尼前引书,54页。

似乎是为了证明像铁托那样偏离莫斯科路线的人没有好下场,在1948年8~9月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上,曾经反对建立情报局,并对处理南共问题持怀疑和保留态度的总书记哥穆尔卡被撤职,其罪名是"不懂得联共(布)的领导作用","不信任苏共和苏联",否定"苏联的建设道路";在苏南争论中,对南共采取"调和和妥协的态度",对情报局处理南共的决议持"否定态度"。① 1949年1月,哥穆尔卡被开除出党。

然而,这还只是莫斯科准备清理"铁托分子"的信号,真正的清洗是从1949年夏季开始的,首当其冲的便是昔日南斯拉夫"最好的朋友"——阿尔巴尼亚。1949年5月阿共亲南派领导人佐泽被捕,经过不到一个月的秘密审讯,便以"铁托主义者"的罪名被处决。9月10日匈牙利政府公布了对三个月前已开除党籍的外交部长拉伊克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的起诉,经审判后,包括拉伊克在内的四个人被送上了绞架。起诉人的发言清楚地说明了这场审讯的动机和政治目的:"匈牙利人民法庭宣判拉斯洛·拉伊克这一帮阴谋分子有罪,在道义上和政治上也宣判了南斯拉夫的叛徒铁托、兰科维奇、卡德尔和吉拉斯这个犯罪集团。这次审讯的国际意义就在于此。"② 如果说哥穆尔卡、佐泽、拉伊克多少还有些同情铁托或抵制莫斯科的话,那么保加利亚共产党前任总书记、政府副总理科斯托夫则是一向对南共政策表示不满的人,但他也没有逃过厄运。11月30日,科斯托夫被送上了被告席,随后亦遭枪决。其关键性的罪状竟是1934~1935年科斯托夫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曾建议让铁托担任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③ 在所有这些审讯中,都把最荒诞不经的阴谋诡计归罪于铁托、兰科维奇以及其他南共领导人,按照审讯的结果,这些人在战前、战争期间以及战后时期,一直就是卖国贼、叛徒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代理人。这样,就为第三次情报局会议对南共进行更加骇人听闻的指控做好了舆论准备。

---

① 刘邦义:《试析1948年波兰的转折——苏联模式在波兰的实施及其破产》,载阚思静、刘邦义主编:《东欧演变的历史思考》,80~85页,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

② 费德南·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二卷:斯大林主义的顶峰》,中文版,234~23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

③ 克劳丁前引书,238页。

1949年11月19日,情报局在匈牙利召开的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凶手和间谍手中”的决议。决议认为,从情报局1948年召开的上一次会议到今天,“铁托匪帮”终于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向法西斯主义的过渡”。“南斯拉夫政府完全处于外国帝国主义集团的控制之下,并变成了他们侵略政策的工具,这导致了南斯拉夫共和国丧失了独立和自主。南共中央和南斯拉夫政府完全与帝国主义集团联合起来反对整个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阵营,反对全世界的共产党,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决议指出,拉伊克-布兰科夫审判的结果充分证明,“南斯拉夫的叛徒们,按照帝国主义分子的意图,其任务是在人民民主国家建立由反动派分子、民族主义分子、教权主义分子以及法西斯主义分子组成的政治匪帮,以便依靠他们,在这些国家里进行反革命的政变,使他们脱离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最后服从于帝国主义的统治。铁托集团已经将贝尔格莱德变成了美国人进行特务活动和反共宣传的中心”。情报局决议最后号召所有共产党员和工人党员“同铁托集团——被雇佣的特务和杀人犯进行斗争”,帮助南斯拉夫“回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①

最后,在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问题上,南斯拉夫人也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威胁。1948年8月18日,莫斯科在照会中抗议南斯拉夫逮捕并虐待苏联公民,进而威胁说,苏联政府“将不会容忍这样的情况,……并将被迫采取其他更为有效的措施”。② 于是,南斯拉夫边境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在北面,根据南斯拉夫掌握的情报,至少有七个苏联摩托化师部署在匈-罗边界。还有材料说,一支干涉部队曾经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境内集结过,其中还包括6 000名西欧国家反铁托的志愿军,甚至在保加利亚的布拉戈耶夫格勒市还建立了一支空降部队。③ 在南面,阿尔巴尼亚在科索沃问题上又埋下了新的钉子。1949年9月24日,根据霍查的旨意,阿劳动党的书记雅科瓦在发罗那的群众集会上公然号召生活在南斯拉夫境内的几十万阿尔巴尼亚族人分离出来,加入“主体国”,他说:“科索沃人

① 见《共产党情报局文件汇编》,701~704页。

② 《南苏关系》,218页。

③ 《铁托的独立道路》,93页;《南苏关系》,218页;马斯特尼前引书,72页。

的道路是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及国际主义共产党人一道，起来反对铁托集团，唾弃铁托，争取自由。那时科索沃的问题就会得到公正解决。根据自决原则，科索沃的未来是科索沃并入阿尔巴尼亚！”① 对此，南斯拉夫已经做好了进行游击战的准备，铁托号召南斯拉夫军人起来抵抗任何入侵，哪怕是苏联红军的部队。② 不过，由于担心西方国家介入对南斯拉夫的武装进攻，使苏联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与西方形成直接对抗，莫斯科始终没有下达开始军事行动的命令。尽管如此，南斯拉夫依然是内外交困、四面楚歌。

铁托在苏南分裂以后做出的接近苏联并与斯大林和好的表示，无非是要向各国共产党证明南共仍然在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无非是要稳固南共在南斯拉夫的领导地位。然而，严酷的事实终于使铁托和南共领导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斯大林主义并不等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模式并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惟一道路，而恰恰是因为坚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使得铁托在国内难以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在国外难以求得回旋余地摆脱孤立状态。铁托被迫去寻找一条适合南斯拉夫国情的独立的发展道路。

① 《霍查政治传记》，184～185 页。

② 《南苏关系》，128～129、221 页。

改革：
走上独立发展的铁托道路

南斯拉夫的独立发展道路首先是在对外政策方面突破的。在斯大林确定了与帝国主义阵营实行对抗的冷战政策以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直接与西方发生关系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行径，是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正是出于这种无形的压力，铁托在苏南分裂之初，对待与西方接触的问题特别谨慎。[①]但是，国内经济萧条，国外政治孤立，迫使南斯拉夫开始考虑与西方的关系问题。

苏南在外交上的公开对抗是从 1949 年 5～6 月巴黎外长会议讨论对奥地利缔结和约开始的。战后，南斯拉夫要求奥地利赔款并割让卡林西亚和施蒂利亚部分领土，这些要求过去一直是得到苏联支持的，甚至到 1949 年 2 月，莫斯科还在与美英法的争执中站在贝尔格莱德一边。但在巴黎会议期间，苏联完全撤销了这种支持，6 月 20 日发表的会议公报排除了南斯拉夫对领土的最低要求。此后，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便通过声明和照会不断地进行公开指责和攻击。9 月 28 日，苏联宣布废除苏南友好条约。

---

① 尽管在苏南分裂之初，南斯拉夫便与美国就悬而未决的经济争端达成了协议：南斯拉夫答应偿还涉及国有化的美国财产、租借法案款项和其他债款，美国则交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南斯拉夫王室政权委托美国保管的价值 4 700 万美元的黄金；当年 12 月，南斯拉夫又同英国签订了一项价值 3 000 万英镑的贸易协定；然而，签约的两方面都不认为这些协定带有任何政治色彩。（《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上卷，第 182 页；查理斯·斯蒂芬前引文，第 397 页。）

随即,南斯拉夫指控莫斯科在南煽动叛乱,而苏联则宣布南斯拉夫驻苏大使姆拉佐维克是间谍,双方先后召回了本国的外交人员。9 月 30 日至 10 月 4 日,匈、波、保、罗、捷纷纷步莫斯科后尘,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的友好条约。① 至此,南斯拉夫与苏联、东欧集团的外交关系已经名存实亡。

如卡德尔所说,当他在 1949 年 9 月第四届联大发言抨击莫斯科时,南斯拉夫"已经制订了自己的对外政策主张"。卡德尔在发言中批评"把世界划分为集团和势力范围",主张各国之间应和平共处、积极合作,主张各国人民的独立以及政治和经济的自由,主张各国人民有权自己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反对一个国家干涉其他国家的社会制度,等等。"实际上,这已经是不结盟政策的基本原则了。"② 根据这一原则,贝尔格莱德开始寻求与西方的和解。

针对 1949 年 4 月 4 日希腊外交部长察尔达里斯关于希南可能和好的说法,铁托 7 月 11 日在波拉的讲话宣布将逐渐关闭与希腊的边界,暗示着南斯拉夫不再支持希腊境内的反政府斗争。8 月 17 日,南斯拉夫驻雅典代办拜访了希腊外交部——这是自 1946 年以来贝尔格莱德主动采取的第一次外交行动。南斯拉夫与意大利在 1949 年初已经小有接触,开通了边境贸易渠道,调整了在亚得里亚海的捕鱼范围。7 月 30 日铁托接见意大利大使,进一步推进了和解进程。8 月 4 日双方签署了为期一年的贸易条约,8 月 6 日签署的双边协定则解决了意大利的战争赔款和归还财产问题。尽管在的里亚斯特问题上,南意之间的分歧仍然延续了一段时间,但此时两国外交关系上的冰冻总算化解了。③

铁托摆脱双重压力的主要出路是缓解与美国的关系,打破莫斯科经济封锁的关键因素也在于取得美国的经济援助。因此,美国对南斯拉夫态度的转变以及要求贝尔格莱德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决定南斯拉夫是否

---

① 《国际事务概览,1949 ~ 1950 年》,346 ~ 353 页。关于解决对奥领土问题的争论,详见 375 ~ 382 页。

② 《卡德尔回忆录》,155 ~ 156 页。

③ 《国际事务概览,1949 ~ 1950 年》,358 ~ 361 页。关于的里亚斯特问题的争论详见 361 ~ 367 页。

能够顶住苏联的压力生存下来，并在两大集团对抗中保持超然立场的重要环节。

鉴于南斯拉夫一贯的激进宣传和革命行动，美国政界对铁托的敌视态度是根深蒂固的。美国对苏南冲突发展结果的最初反应体现在6月8日坎农大使给国务院的一份电报中。该电在分析苏南冲突的种种现象后得出结论说，在南斯拉夫的新形势下，美国制定的对南政策应尽量与现行政策保持一致，“没有必要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动”。① 有些人甚至认为整个苏联与南斯拉夫的争执也许只是个骗局，艾森豪威尔在1949年2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4次会议上就提醒说，这是“一个极其巧妙的圈套，以促使美国为东欧的复苏提供资金”。②

然而，多数意见则认为在对抗莫斯科的斗争中应该利用苏联与其卫星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马歇尔早在1948年7月10日给伦敦的信中就表示了国务院对苏南冲突事件的考虑：“我们不应该打击铁托想密切与西方关系的任何举动，应该等待他的接近。”1949年2月1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文件《苏联与南斯拉夫的经济关系》阐述了美国政策的基本目标，即确保铁托的处境“不因为我方的任何举动而更为困难”。③ 两个月后，凯南关于“要不惜一切代价加深克里姆林宫与其国外代理人之间的猜疑”的说法，更明确地表明了美国利用支持铁托主义来削弱苏联对东欧控制的政策。④ 到1949年8月，多数美国官员已经认识到，如果要削弱并最终消灭苏联势力对西方的威胁，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

---

① 坎农致国务卿，1948年6月8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8年，第4卷，1070～1072页，华盛顿特区，1974。

②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4次会议记录，1949年2月18日。杜鲁门图书馆，杜鲁门文件，总统秘书卷，第220盒。转引自布兰兹前引文，43页。

③ 国务院致伦敦，1948年7月10日。美国国家档案馆，RG－59，860H.00/7－1048；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8/1号文件：《苏联与南斯拉夫的经济关系》，1949年2月15日。杜鲁门图书馆，杜鲁门文件，总统秘书卷，第205盒。转引自布兰兹前引文，42～43页。

④ 罗伯特·乔伊斯关于政策计划人员会议的备忘录，1949年4月1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年，第5卷，12页。转引自马斯特尼前引书，72页。

培植异端,鼓励建立一些非共产党政权,即使他们在本质上说是共产主义的”。①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49 年初杜鲁门政府为扩大对南斯拉夫的出口,改变了办理出口许可证的程序。② 铁托对此作出了反应,他在 4 月 9 日人民阵线代表大会上发言说,南斯拉夫没有理由拒绝与西方做生意,但这不表明南共改变了革命立场。他在抨击了情报局企图推翻南斯拉夫政权的阴谋后重申,南斯拉夫必须准备单独对付来自各方面的进攻,决不会加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7 月 11 日,铁托明确承认南斯拉夫正在谋求从西方得到贷款。8 月 29 日,贝尔格莱德正式宣布已经吁请美国为南斯拉夫购买工业设备提供贷款。1949 年 8 月,美国政府决定允许南斯拉夫在美国购买价值 300 万美元的一套精密轧钢设备,9 月 8 日,美国进出口银行同意给予贝尔格莱德一笔 2 000 万美元的贷款,其中 1 200 万美元用于购买采矿设备。12 月 27 日卡德尔向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承认在这 2 000 万美元贷款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 900 万美元贷款后,世界银行也已原则上同意贷给南斯拉夫 2 500 万美元。卡德尔还报告说,南斯拉夫已经同 24 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与 46 个国家有商务关系,并且同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关系正在改善。但他又指出,这种改善并没有影响南斯拉夫的国内外政策。③ 1950 年 3 月 1 日,进出口银行宣布再向南斯拉夫提供 2 000 万美元的贷款。而铁托 5 月 31 日在普罗库普列的演说中,一方面公开表示欢迎这些贷款,一方面继续强调借款并不损害南斯拉夫的主权,南斯拉夫并没有把自己出卖给美国。④

1950 年夏季,南斯拉夫遭受严重旱灾,边界地区又受到敌对武装力量的威胁,迫使贝尔格莱德向美国提出了更大规模援助的要求。杜鲁门在决定动用 1 600 万美元共同防御基金作为救济南斯拉夫旱灾之用后,又于 10

---

① 《美国对苏联在东欧卫星国的政策》,P.P.S.59,1949 年 8 月 25 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 年,第 5 卷,21~26 页,特别是 25 页。转引自马斯特尼前引书,72 页。

② 布兰兹前引文,43 页。

③ 《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 年》,368~369 页。

④ 《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 年》,369~370 页。

月底向国会提出了3 800万美元粮食援助的议案。然而,铁托过去采取坚定的反对美国的立场,现在又强调外交上的独立政策,使得不少美国政客特别是军界人士对是否应该援助南斯拉夫持怀疑态度,他们担心南斯拉夫军事潜力的任何增强都会损害美国利益。① 于是,国会拖延了一个月才举行了讨论这一议案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面对众议员们的质询和抱怨,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帕金斯解释说:"南斯拉夫在保持其独立的同时,已经成为维护欧洲和平的力量。它的人民决心保卫他们的独立,这有助于其他国家人民的独立和安全。"至于南斯拉夫的军事潜力,帕金斯坚信,那"是对冒险政策和侵略的威慑力量,无论是在巴尔干或是在欧洲其他地区"。他还强调,尽管南斯拉夫仍然是"共产党国家,是专制政权",但他们"正在反对苏联帝国主义,这是该国维护自身独立的权力,是他们的武装力量和人民反对外来压力和侵略、保卫独立的愿望和能力"。杜鲁门在11月29日致国会的信件中也劝告议员们:"南斯拉夫持续不断的独立行动,对于美国的安全十分重要。一个正在反抗苏联帝国主义野蛮的威胁并把苏联势力排除在一个欧洲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之外的国家,我们是可以协助维持它的独立的。这显然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正在此时,朝鲜战争局势的变化促使美国国会下决心解决援助南斯拉夫这一棘手问题。数十万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的顺利推进,打破了麦克阿瑟关于美国兵可以回家过圣诞节的诺言和自信。面对这种局面,在国会里,甚至最顽固的反对共产主义者也愿意相信在欧洲利用铁托或许有助于减轻美国在亚洲的压力。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所说,铁托与莫斯科的决裂给美国在中欧带来了一些有利的机会,只要可以把南斯拉夫从敌方阵营中争取过来而保持中立,就是一个进步。于是,国会参众两院分别投票通过了白宫的议案。② 显然,南斯拉夫采取的中立立场已经为西方所接受。

通过与苏联分裂后一年多的国际交往,南斯拉夫对于自己能够同西方打交道而不至损及独立这一点的信心大为提高,进而希望利用西方的

---

① 布兰兹前引文,44页。

② 《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年》,370~371页;布兰兹前引文,44~45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上卷,182~183页。

军事援助加强对抗莫斯科的实力地位。在美国方面来说,从 1950 年的经济援助到随后一年的军事援助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尽管仍然有人对此持批评态度。迟至 1951 年初,南斯拉夫还拒绝寻求美国的武器装备。1950 年 10 月外交部长卡德尔告诉艾奇逊,这样的要求只会给苏联正在妄图使其侵略合法化提供借口。次年春季,南斯拉夫人对于莫斯科发出的含有战争威胁的叫嚷变得越来越紧张,开始倾向于利用西方的军事援助来保护自己了。1951 年 5 月,第一批军火从英国运抵南斯拉夫。6 月 18 日,访问华盛顿的南斯拉夫总参谋长告诉艾奇逊,苏联一心想破坏南斯拉夫的独立,现在的问题"不是他们会不会,而是何时会采取行动"。此后 10 天,南斯拉夫便正式向美国提出了军事援助的要求。①

1951 年 11 月美国与南斯拉夫签订的军事援助协定和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贝尔格莱德,把南斯拉夫与西方的关系推到了高潮。对于贝尔格莱德来说,"这项协定的政治意义在于顶住东方的军事压力和冲破东方的封锁"。而杜鲁门则满怀信心地向国会指出,南斯拉夫的武装力量现在已经构成"在东南欧地区防止侵略的重要屏障","为了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安全",对铁托的军事援助是必要的。到 1952 年底,南斯拉夫从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获得的军事援助已达 2.4 亿美元。②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当然不免从否定的角度指责南斯拉夫已经投入帝国主义怀抱,而更多的西方观察家则从相反的角度评价贝尔格莱德对外政策的转轨,特别是在巴尔干条约签订的过程中,有人甚至预言南斯拉夫"正在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席位前进"。③ 这实在是一种误

---

① 会谈备忘录,1950 年 10 月 19 日、1951 年 6 月 18 日,杜鲁门图书馆,艾奇逊文件,第 65、66 盒。转引自布兰兹前引文,46~47 页;马斯特尼前引书,117 页。应该说,南斯拉夫确实对苏联可能的入侵感到担忧。1951 年 11 月 9 日,南斯拉夫正式向联合国控诉苏联的敌对活动。南斯拉夫代表指出:"三年多以来,苏联政府一直在直接地或通过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政府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政府,进行煽动、组织反对南斯拉夫的活动,并对它施加挑衅性的压力。这些敌对行动表现在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见《南苏关系》,439~443 页。

② 《卡德尔回忆录》,240 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318 页。

③ 布兰兹前引文,47 页。

会——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确实非常乐观地看待南斯拉夫与希腊和土耳其关系的改善,并因此而产生了缔结一项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巴尔干条约的想法,而且指望铁托能够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所往来。当然,不可否认南斯拉夫为了自身的安全也有利用北约的愿望。1950 年 2 月铁托还把北约看成是一种“挑衅力量”,到 1951 年秋天美国军事代表团到达贝尔格莱德的时候,铁托却已将北约的建立称之为“苏联政策的必然结果”了。只要与南斯拉夫的原则不相违背,铁托保证愿意“在一切具有国际性质的问题上”与北约组织成员国合作。后来,南斯拉夫对西德参加北约组织的愿望也表示了欢迎的态度。①

作为共产党人而又被排除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明知不能与帝国主义联手但又需要得到西方的援助,铁托当时的处境的确十分尴尬,其言论和行为也往往自相矛盾。不过,总体说来,南斯拉夫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坚持了独立自主和“积极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当南斯拉夫受到西方将其拉入北约的直接或间接的压力越来越大时,确有少数人倾向加入北约组织。② 但铁托仍然表示,南斯拉夫不希望缔结任何条约,甚至也不希望同希腊和土耳其缔结一项地区性条约。尽管出于对苏联及其卫星国威胁的担忧、恐惧和对西方援助的依赖,1953 年 2 月 28 日南斯拉夫与希腊和土耳其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但是这一条约并不是那种合乎西方口味的巴尔干条约。事实上,其中一项条款还是专门用来排除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任何联系的。③ 以后的事实表明,随着南斯拉夫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加强,巴尔干条约的正式签署,与其说是北约组织已经“延伸到了克里姆林宫墙下”④,毋宁说南斯拉夫在北约和华约之间建立了一块同时与东西方进行周旋的基地。

如果说南斯拉夫国内政策的转变是美国加强对贝尔格莱德提供援助

---

① 《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319~320 页。

② 《卡德尔回忆录》,158 页。

③ 《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319~320 页。

④ 出席布莱德签字仪式的一位英国外交官的用语。见《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324 页。

的前提条件之一[①],那么对于铁托来说,改革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则是南斯拉夫迈出的通向独立发展道路的最重要的一步。南共对国内政策的改变是从 1950 年 6 月开始的。

面对广大农民的不满情绪和急剧恶化的农村状况,铁托在 1950 年 3 月的竞选演说中,保证今后对农产品的强制征购将比较公平地进行,过去执行这一政策不当的地方干部将受到惩处。1950 年 6 月 9 日,南斯拉夫公布了一项新的农业合作社基本法,代替了 1946 年的合作社法,更否定了 1949 年初制定的激进政策。合作社新法又重新强调了自愿原则,认为这是组织一切合作社所必需的,并且坚持综合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内部实行完全自治的原则。此外,为了进一步把南斯拉夫生产合作社与苏联式集体农庄区别开来,在合作社形式上,新法律强调要发展综合合作社——四种合作社中较低级的形式,其功能主要在流通和加工领域——使之成为整个合作化的主要形式。社员对他们带进合作社的土地保留所有权,他们如果愿意,可以在从合作社收益中取得自己的劳动报酬以外还收受一笔固定的土地租金作为赔偿。在新法律规定建立的所有四种类型的合作社中,社员都可以保有最高达一公顷的土地留归自用。纵观 1950 年合作社法,其目的是在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传统感情与农业社会化的发展要求之间探索一条中间道路。[②]

然而,这项农业改革政策在实际运行中遇到重重阻力。在南斯拉夫党和政府多数干部当中,传统的意识形态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人们的头脑深处,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仍然是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再加上 1950 年夏天出现的毁灭性旱灾,逼迫政府不得不继续从个体农民身上收取过多的农产品,农业改革因此而步履蹒跚。虽然合作化运动的步伐总体上是放慢了,但苏联集体农庄式的合作社却还有所发展,到 1950 年底比上年还增加了 338 个。而地方党组织对合作社的管理,仍然像

---

① 布兰兹前引文,46 页。

② 《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40 页、113 页。关于四种类型合作社的区别,详见《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143~144 页。

以前一样独断专行。①

按照1949年初的规定,个体农民加入合作社三年以后,可以重新决定是否继续留在合作社内。于是,1951年便出现了大量农民提出退社的问题。当南共政治局为此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时,占上风的还是意识形态的传统派,他们主张对申请退社的农民进行压制。然而,面对普遍出现的农业危机——农民怠工、生产下降、牲畜减少,南共领导人被迫对整个合作化政策进行一次彻底检查。这次检查的重点是再次强调从生产合作社转到综合合作社上,以此作为未来农业政策的基础。1951年11月24日,南共中央给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出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未来方针"的指示,强调综合合作社应该作为"促进农业生产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的杠杆";应该取消国家强制征购剩余农产品制度和废除工业品和农产品的配给制度;建议利用税收来打击"农村中的残余富农";将在每一个生产合作社中建立起新的自治制度和会计制度;对生产合作社进行改组,并解散经营不善的合作社,等等。与这种农业政策的新措施相辅而行的是取消了肉类、牛奶、奶制品、土豆、饲料和油脂的强制收购(但仍然坚持国家征购大量谷物)。②

此后,党内以巴卡里奇为首的改革派推出了合作社内部管理的会计方法和逐步增加自治成分的改革方案。到1952年春季,政府采纳了这些改革办法,随即取消了谷物的收购,个体农民获得了购买农业机器的有限度的贷款;按照土地的好坏、农作物品种和土地面积征收的纳税制度也建立起来了。不过,这些措施仍然不说明农业政策发生了根本改变。铁托在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演说表明了南共对农业政策的基本观念和倾向:"没有农村中社会主义成分的胜利,在我们国家里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③

---

① 《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40~41页、114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145页。

② 《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112~114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146~147页。

③ 《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126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147页。

1952年南斯拉夫再次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农民也继续对合作化采取抵抗立场，结果导致当年谷物产量已不及战前平均产量的37%。对美国粮食进口的依赖性①，以及国际局势的严重性②，迫使南斯拉夫领导人更加彻底地重新估计农业政策——看来需要根本放弃农业合作化的方针了。1953年3月20日，南斯拉夫政府公布了关于“财产关系和农民生产合作社的改组”的新法令。这一法令标志着南斯拉夫农业政策的根本性改变，其中心内容如卡德尔所说：“不能否认，农业合作化运动，首先是农民生产合作社这一类型的合作化，正遭遇到非常严重的内部困难。这种困难主要表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民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发生动摇……因此在加入或退出合作社方面认真地坚持自愿原则是十分必要的。”这项法令允许解散或者改组生产合作社。除了那些在政府公地上组织合作社的人以外，所有农民现在都可以自由退出合作社，取回他们的土地、房屋、存粮、牲畜以及他们原来参加合作社时交出的一切其他财产。执行这一法令的结果是，到1953年底农民生产合作社仅剩下1 152个了。而综合合作社的数目则增加到7 114个，社员人数已占全国农民的85%。③

尽管在农业改革方面还有许多矛盾需要克服（如农产品收购、贫富差别等），还有许多新问题需要解决（如雇工、土地买卖等），但是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已经确定下来，即以农民个体经营为生产主体，再通过综合合作社的形式在流通领域把农民组织起来。而根据1953年3月法令改组后的综合合作社所遵循的新方针，与当时在工业部门实行的工人管理的办法更加接近了。这种农业社会化的原则与当时正在研究的对工业企业实行工人管理的制度，在理论上是一致的、同步的。

南斯拉夫对于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同样不是一帆风顺的，实际上，从1950年6月宣布《关于工人集体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组合的根本

---

① 1953年从美国进口粮食54.8万吨，占南斯拉夫粮食进口总量的72%。《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146页。

② 仅1952年，就发生了2 390起边界武装冲突事件。《苏南冲突经历》，405页。

③ 《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147～148页；《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116～118页。

法》(即《工人委员会法》),到1953年1月以宪法形式将工人管理制度和工人自治制度确定下来,其中经历了不断"试试改改"的过程,也出现过极其混乱和矛盾的局面。这是由人们认识水平和管理能力上的差距,以及现有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影响造成的。改革措施变化无常,经济法令泛滥成灾,仅1952年夏天政府承认有效的经济法规、命令、条例、指示就有3 500种之多,而各级政府官员在执行中又大多任意加以解释,甚至自行其是。[①] 不过,这种在改造旧制度中必然发生的无序状态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而且总体说来,改革还是沿着不断实现经济分权化的方向发展的。

所谓经济分权化,实质就是对所有制进行改造,其表现形式则是工人参加管理和工人自治。铁托在通过《工人委员会法》时宣告:"从今以后,(南斯拉夫)对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就要逐步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所有制。国家所有制是社会所有制的最低形式,而不是像苏联领导者认为的那样是其最高形式。"[②]《工人委员会法》是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具有革命意义的第一项措施,归根结底,也是此后在南斯拉夫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思想体系和政治结构的基石。该法第一条就规定把一切经济组织的经营和管理移交给各个企业的工人:"工厂、矿场、交通、运输、贸易、农业、林业、公用事业和其他国家经济企业,作为全民的财产,由工人集体代表整个社会,在国家经济计划范围内加以管理。各工人集体通过本企业的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来管理各该企业。"各个企业的工人委员会由该企业的全体工人和职员按照普遍、平等、直接的原则以秘密投票选举产生,任期一年。工人委员会作为权力机构,决定企业的大政方针,选举和罢免企业的管理人员,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督和质询,并定期审核账目和生产计划。作为企业的管理机构,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在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中选举产生,其中直接参加生产的人员必须达到四分之三。为了避免企业管理阶层的官僚化,规定管理委员会委员只有三分之一可以连任,而且任期不得连续两次以上。企业经理是管理委员会的当然委员,但不得担

① 《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68~69页。

② 铁托:《在南斯拉夫工人管理工厂》,载《南斯拉夫新闻》,1950年贝尔格莱德版,41页。转引自《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68页。

任主席。由于各企业内部的党组织不肯轻易放弃其管理特权，直到 1951 年中，才采取了把全部企业转交给工人管理的实际行动。甚至在当时，《工人委员会法》所规定的新制度的实施仍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经常需要规定各种规章条例来充实和改进这一制度。由中央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到由工人管理制度体现的间接控制的过渡大致上在 1954 年春天才顺利完成。到 1954 年底，参加经济和行政组织基层自治机构的已达 60 多万人，在工人管理的企业中，每七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直接参加本企业的管理机构。①

工人自治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当然也带来不少问题。如按照工人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导致的通货膨胀，由于管理人员缺乏训练和经营能力给企业造成的巨大浪费，调整企业结构和追求经济效益带来的失业现象，以及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经济犯罪案件的猛增，等等。然而，与经济变革俱生的弊病无法抹杀改革的成就：生产组织得更加合理，劳动生产率和工人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工人委员会通过撤换不称职的管理人员而铲除了企业管理的无效率现象。与《工人委员会法》相配套，1951 年 12 月又通过了《国民经济管理法》、《预算法》，以及关于社会捐款和税收的基本法。1952 年底取消了五年计划制，1953 年初解散了权力最大的经济机构——联邦计划委员会，而代之以只起指导和检查作用的联邦经济计划研究所。所有这些，标志着改革正在不断深化的举措不仅为当时绝大部分西方观察家所承认，而且为 1953 年以后工业生产的高速度增长奠定了基础。②

总之，不断扩大各种形式的工人管理是铁托进行经济改革的核心支柱，也是南斯拉夫摆脱苏联集中化、官僚化经济模式桎梏，开辟独立发展道路的第一步。用一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话来说，《工人委员会法》宣布以后，“已经在 1948 年割断了同苏联的政治联系的南斯拉夫……现在也割断了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联系，并且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

---

① 参见《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68～75 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104～113 页。

② 参见《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75～82 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113～126 页、180～182 页。

的道路”。[①] 卡德尔 1954 年秋天在奥斯陆发表的演说，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做出了深刻的说明。他认为，南斯拉夫的经济民主自治体制是以两个根本前提为基础的：第一个是，任何中央政府，不论它如何英明，都无法控制一个国家的全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个是，个人能否发挥最大限度的能力和主动性，与其说取决于指示和控制，不如说取决于在自由中进行劳动和创造的工人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物质的利益。如果无视这两个根本前提，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官僚专制。[②] 这段精辟的论述，一方面肯定了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目的和根本出路在于解放生产力，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这种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是进行政治和行政改革——铲除官僚专制体制。因为从根本上讲，为赋予工人管理和工人自治制度以最大限度的实际内容，就必须对政治和行政机构进行广泛的分权化改革。

南共主要理论家之一皮雅杰曾说过，分权化是“走向民主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③] 这无疑涉及了政治体制问题。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是从处于政权领导地位的南共自身开始的。1950 年 10 月，南共中央号召取消作为南斯拉夫惟一政党——共产党党员的特权，宣布党员和非党员的法律地位是完全一样的，不允许任何人依靠党员身份而享受特殊待遇。为此，取消了发给党员的特别配给品和住房特权。尽管这一行动在国内外受到普遍赞许，但还没有触及根本问题。随着经济改革分权化的发展，高度集中的党的组织形式及其庞大而专横的官僚机构与之显得越来越不相称。更严重的问题是许多党的干部不理解新路线，不愿意放弃已经习惯了的权势。[④] 显然，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前进，迫切需要对党的机体本身进行清理和整顿。1952 年 6 月南共中央全会做出指示，根据在全党实行分权化的原则，限制党在地方政府和经济事务中的直接作用，禁止党的干部干预企业的工人管理。中央命令各级党的领导人立即放弃

---

① 格什科维奇：《新的联邦国民议会的任务》，载《南斯拉夫评论》，1953 年 12 月第 2 号。转引自《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42 页。

② 卡德尔：《社会民主在南斯拉夫的实践》，载《战斗报》，1955 年 1 月 1 日。转引自《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64 页。

③ 转引自弗雷德·华纳·尼尔：《铁托主义的实践》，14 页，商务印书馆，1963。

④ 《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28 页。

他们在政府机构中担任的领导职务，彻底改变那种象征着苏联“官僚等级制度”的状况。为了扩大“党内民主和消灭官僚主义”，6月指示赋予党的地方组织以更大的自决权，在遵守党的总路线的前提下，地方党组织可以自行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做。11月召开的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不仅将党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党的新理论。根据新的理论，党的领导作用不是体现在把自己的决定和意志强加于各级政府机构，而主要表现在“政治和思想教育”方面。按照卡德尔的说法，党要使自己的政策起到领导作用，就必须“依靠做好工作，认识社会规律，而不能依靠一纸法令，规定自己就是政治领导力量”。①

对政府行政体制的真正改革始于1952年4月1日通过的关于人民委员会的一般法。人民委员会法彻底改组了整个地方自治系统，使它在情理上更加适合于经济分权化的改革。根据这一法律，在联邦和共和国的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特别市、区、市、乡的人民委员会都有相对独立的权力，他们可以制定自己的社会计划和预算，筹集自己的财政收入。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在特别市、区和市设立了作为人民委员会下院的生产者院。生产者院的代表是从基层生产部门选举出来的，体现了铁托主张的工人管理国家的原则。它与上院，即人民院在制定地方法规以及处理一切地方经济事务方面，具有同等的职责。1952年的法律还规定设立选民会议，以保证公民尽可能广泛地参与地方事务，并使他们更易于直接监督和控制人民委员会。1953年1月13日国民议会通过的宪法改革法，全面修改——在很大程度可以说是废除了1946年的宪法，而肯定了1950年以来各项改革的原则，这包括直接民主的原则，以议会治理实现权力统一的原则，把经济工作摆在政治工作之前的原则，等等。②

至此，南斯拉夫的国内外政策调整已经初步完成，虽然其中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也含有不少离现实相距甚远的理想化成分，但无论如何，到1953年初，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和国内经济政治体制都已经彻底背离莫斯科路线，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一结果无疑激起了斯大

① 《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29～31页。

② 《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139～148页。

林更大的仇恨和恼怒。尽管深藏克里姆林宫之中的斯大林此时已经进入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没有忘记给贝尔格莱德的叛教者以致命的一击。据说，斯大林去世前接见的最后一个人就是执行暗杀铁托计划的克格勃特工——“马科斯”。①

① 马斯特尼前引书，167 页。

结语：
一个暗杀铁托的未遂计划

正当铁托在南斯拉夫踌躇满志进行他的社会经济变革时，斯大林已经步入古稀之年了。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曾经提到，斯大林这位苏联军队的大元帅经常在讨论一些重要问题时提前退场，把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撂在那里。① 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斯大林晚年经常神志不清，甚至丧失记忆力，这使他感到气馁和恼火。② 斯大林的医生米亚斯尼科夫教授则认为，斯大林是患了一种脑病，这种病使他丧失了准确判断事物的能力。按照医生的解释，疾病缠身的斯大林根本无法准确地判断事情的对错和利弊，从而也就不明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了。③ 然而，斯大林并没有忘记铁托——他一生中最后一个，也是最强硬的一个政敌。他需要在有生之年除掉这一心腹之患。在苏联国内，斯大林于苏共十九大以后把老一辈领导人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排挤出了他的核心圈子，是为了让自己的年轻继承人按照预定方针路线顺利接掌政权扫清道路。出于同样的考虑，在东方集团内部，斯大林为了身后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和发展，一方面积极

---

① 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全宗 5，目录 30，卷宗 4，转引自马斯特尼前引书，140 页。

② 《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文版，442～443 页，东方出版社，1988。

③ 马斯特尼前引书，140 页。

组织以铲除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为中心的第二轮大清洗,[①] 另一方面,还必须清除那些资深望重的国外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已经在莫斯科的病床上去世,[②] 剩下的只有铁托了。

1951 年 7 月 21 日莫洛托夫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集会上发表的演说,已经预示了斯大林最后解决南斯拉夫和铁托问题的决心及可能采取的手段。莫洛托夫说:"南斯拉夫的命运已落入了间谍和奸细的手中,通过种种欺骗手法,这些人背叛了人民,并把人民出卖给英美帝国主义者。现在大家都看到,铁托、卡德尔和兰科维奇一伙在南斯拉夫重新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从人民手中剥夺了革命的胜利成果,并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工具。这伙受人雇佣窃取了政权的罪犯,意识到南斯拉夫人民憎恨他们,用血腥恐怖和法西斯的统治方法,保住自己的政权。这种情况是不可能长久继续下去的。南斯拉夫人民将会找到获得自由和清除铁托法西斯政权的方法。"[③] 然而,政治围攻未能奏效,经济封锁也被打破,武装干涉的条件又不成熟,斯大林只好把除去铁托这项任务交给了克格勃。

关于斯大林暗杀铁托的计划,过去只是传闻,俄国档案解密以后,人们终于发现了可以提供证明的历史文献。几年前,俄国著名军事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格诺夫利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的档案文献撰写了一篇

---

① 关于 1952 年 11 月审讯斯兰斯基的情况,详见《苏南冲突经历》,319 ~ 320 页;马斯特尼前引书,130 ~ 132 页。1952 年底再次开展的大清洗,由于斯大林的去世而中止。据说在战后第一轮清洗中,即 1948 ~ 1952 年间,东欧各国共产党人数减少了 250 万,其中 12.5 万 ~ 25 万遭到监禁,被处决的人数不得而知(克劳丁前引书,244 ~ 245 页)。如果第二次清洗真的开展起来,东欧各国共产党及其党员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不过,这是另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了。

② 季米特洛夫 1949 年 1 月秘密前往苏联接受治疗,7 月便因医治无效死于莫斯科。关于季米特洛夫的死因,有不少人提出怀疑,认为斯大林从中做了手脚。参见马斯特尼前引书,68 ~ 69 页。

③ 《南苏关系》,437 页。

文章。该文主要利用的是一份国家安全部呈送给斯大林个人的请示报告。[①] 文章没有表明报告呈报的日期,但根据报告内容判断,这份被列为绝密等级的文件是1953年2月,即斯大林去世前一个月之内起草并递交的。

报告的主要目的是"苏联国家安全部请求批准由非正式特工马科斯着手准备一次对铁托的恐怖行动"。所谓"非正式"特工,一般的理解是,无论事情成功与否,都不需要苏联政府为其行为承担责任的"编制外"特工人员。这位化名"马科斯"的苏联公民,真实姓名叫约瑟夫·罗姆阿利多维奇·格里古力耶维奇。尽管他是1950年才入党的苏共新党员,但却是一名早年曾经参与刺杀托洛茨基行动的苏联老特工。文章介绍说,格里古力耶维奇后来成了苏联科学院的一位历史学家。[②] 这样一个人物,竟把对斯大林政治生活中两个最重要的对手——托洛茨基和铁托的暗杀行动联系了起来,实在令人感兴趣,细细回味,恐怕也不是偶然的。

根据国家安全部的这份报告,马科斯是持哥斯达黎加护照被派往意大利的。在那里,马科斯取得了人们的信任,并得以进入在意大利的南美外交人员以及知名的哥斯达黎加政客和商人的圈子。正是利用了这些关系,按照神通广大的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安排,马科斯被任命为哥斯达黎加驻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特命全权大使。在他任职期间,1952年下半年,马科斯已经两次前往南斯拉夫。他在那里完全被南斯拉夫领导人接受了,因为他已经与铁托周围最亲密的战友打得火热,他甚至被允许对铁托进行私人拜访。

马科斯的上司认为,他目前所处的地位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铁

---

① 沃尔科格诺夫教授的文章最初发表在1993年6月11日《消息报》上,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在1998年3月出版的《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上刊登了英文本,并将其送上了国际互联网。本文以下的论述均出自这个英文本。

② 笔者1997年赴莫斯科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在与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涅仁斯基先生交谈时,我偶然提到了关于暗杀铁托的问题。涅仁斯基回答说:确有此事,而且当年执行暗杀铁托计划的国家安全部特工,后来就被分配到这个研究所工作。涅仁斯基还亲耳听他谈起过这件事。可惜,当我迫不及待地要求为我引见这位前特工时,却遗憾地得知,他在几年前已经去世了。

托采取有效手段的机会”。于是,1953 年 2 月初,苏联安全部门有关负责人把马科斯召到维也纳,与他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在讨论应该如何采取行动时,马科斯被问及以他在南斯拉夫的地位,他认为怎样做效果最佳。马科斯提供了几种对铁托个人采取行动的有效手段,他们还讨论了采取行动的所有细节和可能出现的情况。随后,作为讨论的结果,国家安全部归纳了对铁托采取一次恐怖行动的几种选择方案,呈报斯大林批准。这几种方案是:

一、命令马科斯安排一次与铁托的私人会面,会见期间,通过藏在马科斯衣服中的一种无声装置,释放出大剂量的可以引起肺部感染的细菌。安全部认为,这样做保证能够使铁托和所有在场的人致死。安全部还报告说,“至于这种细菌的效能将不告知马科斯本人,但为了挽救他的生命,他可以得到一种先进的抗感染血清”。

二、在铁托安排的近期对伦敦进行的访问期间,派马科斯到那里去,利用他的官方身份以及与南斯拉夫驻英国大使弗拉基米尔·维列彼特良好的私人关系,弄到一张南斯拉夫大使馆以铁托名义举行的招待会的请柬。然后,在招待会上用无声手枪完成暗杀行动,与此同时释放催泪瓦斯,在人群中引起混乱,以便马科斯消灭一切痕迹并逃离现场。

三、利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一次邀请外交使团出席的正式招待会。这次恐怖行动可以采取与第二项计划相同的方法,并由马科斯来执行——他作为一名受南斯拉夫政府信任的外交官,肯定将被邀请出席这样的招待会。

此外,安全部负责人还指示马科斯设计另一次行动,在这次行动中,将有一名哥斯达黎加代表送给铁托一个装满珠宝的盒子,当珠宝盒打开时,会释放出一种即时生效的有毒气体。

参加秘密会晤的安全部人员要求马科斯再次对这次行动进行全面考虑,提出一种他能够实施的最有效的行动方式。最后他们规定了今后进行联系的办法,并表示将给马科斯发出进一步行动的指令。

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国家安全部最后表示,马科斯是执行这次对铁托的恐怖行动的适当人选,因为“马科斯的个人品质和间谍经验使他适合

于完成这样的任务”,并请求得到斯大林的批准。

然而,安全部的报告呈上不足一个月,斯大林便去世了,这一行动随即终止。没有证据显示斯大林确实批准了这一报告和授权执行这次行动,但沃尔科格诺夫的文章认为,斯大林很可能是赞成这个计划的,因为初步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为此,格里古力耶维奇不得不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诀别信”,以备一旦暗杀行动失败而避免把苏联政府卷入其中。

就苏联国家安全部的精心策划和苦心安排而言,这次暗杀行动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斯大林首肯了。如果不是由于一个意外的原因——斯大林突然去世,苏联历史上很可能会再次出现一件令世界震惊、世人迷惑的暗杀事件,而南斯拉夫的历史大概也需要改写了。

关于苏南冲突的档案文献

（1944年4月至1952年11月）

这里刊登的档案文献，大部分是近年来俄国和南斯拉夫档案馆解密的历史档案。其来源，一是1992～1998年俄国的《历史问题》、《历史档案》等专业杂志和有关档案专集；一是笔者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的俄国档案馆原始档案的复印件。此外，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也补充了少量苏联和南斯拉夫政府当时公布的文件（这里除南斯拉夫自己保存的档案外，还有1950年代苏联归还南斯拉夫的档案），这些材料主要取自斯蒂芬·克利索德编《南苏关系（1939～1972）：文件与评注》（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0）。这70多份档案文献包括从苏南两党领导人的战时接触直至斯大林去世前苏南两党和两国领导人以及有关部门之间的往来电函、照会和会谈记录，比较清楚地勾勒出这一时期苏南关系的发展脉络。当然，对于全面深入地研究这段历史来说，这还是不够的。譬如，关于1944年9月和1945年4月铁托与斯大林会谈的文件，关于冲突期间苏南双方各自内部讨论的文件等，都还没有公布于世。不过，这里刊登的文献，已经可以为重新认识苏南冲突的历史真相，重新评价苏南冲突的真正原因、性质和结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本组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参加翻译的有张木生、陈新华、岳书璠、吕允连、高增训、孙士明、陈玺、方琼等）

1　莫洛托夫与吉拉斯关于南斯拉夫形势和政策的谈话记录[①]

(1944年4月24日)

摘自维·米·莫洛托夫的日记　　绝密

双方相互问候后,莫洛托夫[②] 说,现在南斯拉夫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来说大概是困难的。

吉拉斯[③] 承认形势是困难的,又说,不过形势毕竟有好转。主要是政治形势有好转。

吉拉斯接着说,铁托元帅指示他们在莫斯科会见莫洛托夫,并就盟国和苏联承认南斯拉夫解放委员会[④] 问题得到说明。为此会采取哪些步

---

① 1944年4月,以米洛凡·吉拉斯为首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这次会谈于4月24日17时开始。

②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1890—1986),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

③ 米洛凡·吉拉斯(1911—),当时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成员,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战后任南共中央书记兼宣传部长。1953年任联邦共和国副总统、人民议会主席。1954年被撤销一切职务。

④ 1942年11月26~27日在比哈齐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宣告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并作为领导南斯拉夫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全国性政治代表机构,在1945年8月7~10日的第三次会议上,被宣布成为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国民议会。1943年11月29~30日,在亚伊特召开的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成立并选举了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作为具有人民政府职能的执行机构,直到1945年3月7日临时政府成立。

骤？

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应当根据自己与盟国的关系解决这一问题。

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还继续与在开罗的南斯拉夫政府保持关系，但是，这是纯粹形式上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正在进行与在开罗的政府[①]断绝关系的有关准备工作。譬如，我们让西米奇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他的信[②]，我们与在伦敦的比查尼奇[③] 保持着关系，苏联报刊经常解释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关于各种问题的立场。由此可见，正在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莫洛托夫说，前不久丘吉尔曾经致函莫洛托夫，并附上了他致铁托元帅的两封信的副件。丘吉尔在信中请求支持他对南斯拉夫的立场，以便找到国王与铁托和解的途径。苏联政府答复丘吉尔说，与国王的谈判未必有益。我们认为，必须与铁托达成协议，这对盟国有益。

苏联政府在承认铁托问题上的立场，并不取决于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场，不过，不考虑这些国家的立场是不对的。大概吉拉斯和特尔季奇[④] 知道，英国人不止一次建议苏联政府和米哈伊洛维奇[⑤] 建立联系，但是，苏联政府拒绝了这一建议。不仅如此，苏联政府还向南斯拉夫派遣了使团[⑥]，援助人民解放军，诚然，使用空军援助还不够。

目前还没法说什么时间和采取什么步骤承认铁托。

吉拉斯说他完全明白莫洛托夫的答复，认为这一答复是正确的。

吉拉斯称，委员会不能与国王和解，因为和解就意味着人民解放运动受制于国王。

---

① 指当时驻开罗的南斯拉夫王国流亡政府。

② 塔诺耶·西米奇是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政治人物，曾任南斯拉夫流亡政府驻莫斯科大使，1943 年 11 月宣布与流亡政府决裂，拥护铁托。但他的声明是 1944 年 3 月才刊登在莫斯科报纸上的。战后初期，西米奇曾出任南斯拉夫外交部长。

③ 身份不详。

④ 随同吉拉斯访苏的代表团负责人之一。

⑤ 米哈伊洛维奇·德拉扎(1893—1946)，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大臣、军队参谋长，1941 年投靠德国占领当局，与南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作战。1946 年被判处死刑。

⑥ 苏联军事使团于 1944 年 2 月 23 日抵达南斯拉夫，与西方国家的使团不同，苏联军事使团不是派驻最高司令部，而是派驻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的。

莫洛托夫问,国王在南斯拉夫还有没有威望。

吉拉斯回答说,国王在塞尔维亚多少还有些威望。对克罗地亚来说,国王是中央集权的象征。在塞尔维亚境外的塞尔维亚人对国王态度不好。不知道马其顿人的态度如何。总之,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认为,高喊共和国的口号还为时尚早。

莫洛托夫问,人民解放运动在塞尔维亚的根基是否牢固。

吉拉斯回答说,人民解放运动在那里的影响很大,但是从组织上巩固得不够。米哈伊洛维奇在那里的影响很小。

莫洛托夫问吉拉斯是否低估了米哈伊洛维奇在塞尔维亚的影响。

吉拉斯承认说有可能低估了,他说,奈迪奇① 的军队是由米哈伊洛维奇的军官指挥的。奈迪奇内务部的多数警官是米哈伊洛维奇的拥护者。米哈伊洛维奇有一个名单,上名单的人在把德国人赶出南斯拉夫后要被杀头。这个名单上有利奥蒂奇② 等人,但是名单上没有奈迪奇。米哈伊洛维奇在宣传中自称拥戴英国人。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③ 有1.5万人,但是不能打仗。他们首先是士气低落。至于说巴维利奇的乌斯塔什分子④,他们一直很能打仗,是"大克罗地亚"思想的狂热斗士。他们大都已被人民解放军消灭。他们起初有7万人,现在大约还剩2.5万人。

莫洛托夫问,德国人是不是正在从南斯拉夫撤军。

吉拉斯回答说,德国人从南斯拉夫撤出了两三个师,但同时又从意大利开来一个师。因此,在这方面没有很大的变化。

莫洛托夫问,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哪些地方。

吉拉斯和特尔季奇在地图上给莫洛托夫指出了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地

---

① 奈迪奇·米兰(1878—1945),战前曾任南斯拉夫陆海军大臣、总参谋长,德国占领时期率军投降,出任塞尔维亚吉斯林政府的首脑。

② 身份不详。

③ 原意是"参加队伍的人",最初是南斯拉夫反对土耳其奴役的民间武装人员,后为王室所利用。二战期间站在德国占领当局一边,成为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反共民团武装组织。

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罗地亚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战前在意大利组织的以克罗地亚脱离南斯拉夫为宗旨的乌斯塔什运动成员,于1941年4月回到南斯拉夫,建立了单独的克罗地亚国家,配合德国法西斯镇压南斯拉夫人民的抵抗运动。

区。

莫洛托夫问,铁托的部队有没有出海的路。

吉拉斯回答说,现在没有出海的路,不过以前有过。如果巴尔干各国有像红军那样的军队,这种出海的路早就会有了。

莫洛托夫问,萨洛尼卡的居民属于哪个民族。

吉拉斯回答说,萨洛尼卡的居民大都是希腊人,但萨洛尼卡周围农村住的是马其顿人。

吉拉斯说,铁托运动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巩固它在塞尔维亚的阵地,因为这对争取国际承认来说意义重大。

莫洛托夫同意这一看法,他说,人民解放运动的敌人大概认为,塞尔维亚的局势将对承认一事造成困难。

吉拉斯说,铁托没有向各大国发正式照会,要求给予承认,因为他认为目前这样做不适宜。

莫洛托夫说,当然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他又问吉拉斯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吉拉斯称,他们很想尽快得到承认,特别是得到苏联方面的承认。苏联在南斯拉夫的影响很大,倘若苏联给予承认,它的影响还会扩大。

莫洛托夫说,我们已经为这一步采取了准备措施。

吉拉斯称,要丘吉尔承认难,不过,他不承认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也难。

莫洛托夫回答说,关于承认一事我们正在研究。在这一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不过,正式的行动只能在适宜的时机才能采取。不仅要考虑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形势,还要考虑我们两国以外的形势,在我们两国以外,我们的敌人和半敌人要比朋友多。因此,必须选择既对苏联最有利,也对南斯拉夫本国人民最有利的时机给予承认。至于说支援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我们保证给予支援。这种援助从技术上至今组织得不力。很长时间我们不能给予大力援助,不过,现在我们战场上的形势有了改善,我们能够增加我们的援助。

目前,对德战场上的形势是盟国将更加活跃,对我们来说,在这一时期

和盟国保持良好关系至关重要。

莫洛托夫说,关于意大利,我们的立场是支持那里进行联合的一切努力。联合一切力量打击希特勒是主要任务。在莫斯科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强调了苏联旨在意大利争取建立民主政府和反对法西斯残余的意向。但是,盟国现在不急于落实莫斯科会议的决定①。前不久,意大利政府进行了改组,它将会有助于团结广大群众反对希特勒德国。意大利人民的主要意向就是要和平。要想得到和平,必须打倒希特勒和墨索里尼。

我们准备与任何人结盟,只要他准备打败德国。

莫洛托夫接着说,对于铁托来说,巩固自己在塞尔维亚的地位至关重要。

吉拉斯回答说,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没有轻视自己在塞尔维亚的地位,如果不能保证在塞尔维亚的影响,那将一事无成。目前,在塞尔维亚的游击队不多。组织游击队需要武器援助。

莫洛托夫说,大概盟国给了一些援助。

吉拉斯说,这些援助不够。他们计算过,英国人给予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只够装备一个营。吉拉斯指出,英国人向南斯拉夫运送武器没有任何困难,因为他们在意大利有大量武器。

吉拉斯又说,英国人对空投武器组织不力。空投的弹药没有包装,都散落了,向没有铁路的山区空投硝化甘油炸药,而有铁路而且需要炸药的地方,英国人不向那里空投。英国人用降落伞空投无线电台,可是降落伞打不开,无线电台给摔坏了。这是意外还是组织不力?难以说清。

吉拉斯说,如果苏联飞行员能帮助人民解放军那就好了。

莫洛托夫回答说,我们已向盟国提出在巴里② 和布林迪西③ 地区为苏联飞机安排基地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答复。

莫洛托夫问人民解放军和英国人的关系怎么样。

---

① 1943年10月19~30日,苏美英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加速打败德国及战后欧洲安排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意大利的宣言》等文件。

② 意大利东部的港口城市。

③ 意大利东南部的城市。

吉拉斯回答说,从表面看关系还好。

莫洛托夫推测说,英国人正在南斯拉夫建立自己的情报网。

吉拉斯回答:英国人在这方面会一事无成的。

莫洛托夫提醒吉拉斯说,英国人能够在南斯拉夫找到他们需要的关系。他们是些狡猾的人,腐蚀了我们许多人。

例如前不久,在美国的苏联采购团的一个工作人员发表了仇视苏联的声明。我们使馆已经声明,他是个不想归队的红军逃兵。原来是有人收买了他,做了他的工作。莫洛托夫指出,他不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的。

莫洛托夫询问科尔涅耶夫将军① 在南斯拉夫表现怎么样,而且要求坦率地讲,南斯拉夫人是否对科尔涅耶夫不满意。

吉拉斯回答说,科尔涅耶夫是个聪明正直的人。南斯拉夫对他是满意的。总的来说,使团的人都很好。

莫洛托夫询问戈尔什科夫② 在那里干得怎么样。

吉拉斯回答说,戈尔什科夫很好,那里对他是满意的。

吉拉斯又说,现在盼着苏联军官去希腊和阿尔巴尼亚。

莫洛托夫回答说,我们正在物色我们这方面的人。

吉拉斯说,希腊问题是个非同寻常的问题。

莫洛托夫回答说,前不久,丘吉尔给我们发来一封语气恼怒的信,他在信中抱怨塔斯社发表了在埃及的希腊武装力量发生哗变的报道。我们答复说,塔斯社播发的是它掌握的消息。我们允诺,塔斯社将对自己的新闻报道进行更加认真的检查。丘吉尔请求我们支持他在希腊问题上的立场,但是我们回避了这个问题。

吉拉斯说,希腊的形势与南斯拉夫的形势有本质的区别。

莫洛托夫问这种区别是什么,吉拉斯回答说,英国人在希腊阻挠人民力量联合。

莫洛托夫问,铁托和希腊有没有联系。

吉拉斯回答,只有无线电联系。

---

① H.B.科尔涅耶夫中将是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团长。

② 戈尔什科夫也是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成员。

莫洛托夫问,希腊有没有铁托的人。

吉拉斯加答,那里暂时没有铁托的人,不过会有的。

莫洛托夫问,全国解放委员会与保加利亚人的关系怎么样。

吉拉斯回答,保加利亚问题是个棘手的问题。吉拉斯说保加利亚人犯了错误。他说他指的是进步人士,而不是保加利亚政府。保加利亚人没有做武装斗争的准备,没有把自己的干部派到农村和山区,而是把他们留在城市,结果很大一部分干部在城市牺牲了。

莫洛托夫问,斯大林和铁托关于保加利亚问题的电报有没有通报吉拉斯和特尔季奇。当得到否定的回答后,莫洛托夫说,我们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名义,对铁托关于保加利亚问题的电报作了答复,复电指出,南斯拉夫是苏联的盟友,而保加利亚是苏联敌人的朋友。关于马其顿问题,这份电报说,没有铁托,这个问题是不会解决的。

莫洛托夫接着讲道,一周前,他向保加利亚公使斯塔梅诺夫递交了照会,要求保加利亚政府停止帮助德国人,在保加利亚为他们提供反苏基地。

莫洛托夫同时指出,共产党人不能代保加利亚政府受过。

吉拉斯说,如果马其顿人民开展反对德国人的斗争,这样就能解决马其顿问题。马其顿人就会明白,他们应当跟谁一块儿走,是跟反对德国人的塞尔维亚民族和克罗地亚民族一块儿走,还是跟其他民族一块儿走。

莫洛托夫问两位代表有什么实际问题要提出来。

吉拉斯回答说,最为迫切的是武器问题。他答应提交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所需武器的清单。

吉拉斯接着说,他们想拜见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答应征求斯大林同志的意见。

莫洛托夫问两位代表是否见过西米奇。

吉拉斯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说,西米奇有些过分浓厚的塞尔维亚情绪。另外,西米奇在与南斯拉夫军事使团谈话时,主张在南斯拉夫建立苏维埃政权。

莫洛托夫说,他刚才讲的给铁托的那封电报指出,我们反对南斯拉夫苏维埃化。

吉拉斯说他也是这么想的，他认为南斯拉夫应当是民主共和国，但不是法国那样的共和国，而是蒙古那样的共和国。必须没收背叛了人民的那些人的工厂。

莫洛托夫说，贝奈斯[①] 也赞成把大型工厂移交给国家。贝奈斯表现不错。譬如，今天《真理报》转载的他的那篇文章有一定价值。

吉拉斯指出这篇文章有自由派思想。

莫洛托夫说，我们和贝奈斯签署条约时，我们没有对波兰加入条约关上大门。当时贝奈斯说，和波兰反动人士打交道会一事无成，必须砍掉这些人的脑袋。

吉拉斯讲，南斯拉夫国内建立苏维埃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建立苏维埃在目前来说是冒险。

南斯拉夫作为一个自主的国家也许得存在 2～3 年，甚至 5 年。不过应当考虑到，南斯拉夫人民对苏联无比热爱，人民愿意和苏联一起生活。

莫洛托夫问吉拉斯和特尔季奇对梅西奇有什么看法。

特尔季奇回答说，必须在战斗中观察他。他也许是个好指挥员，但是政治上不成熟。特尔季奇说，在苏联的南斯拉夫部队最好设政治委员职位，这样能加强部队的政治纪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委员都是共产党员。

莫洛托夫回答，在苏联的南斯拉夫部队的组织形式应当和人民解放军一致。

会谈结束时，吉拉斯和特尔季奇请求莫洛托夫同志促成他们拜会斯大林同志。

会谈进行了 1 小时 25 分。

（波采罗布记录）

---

① 爱德华·贝奈斯（1884—1948），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其时流亡国外。

2　斯大林与赫布朗关于南斯拉夫军队和外交问题的会谈记录

(1945 年 1 月 9 日)

绝密

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维·米·莫洛托夫、A.Φ.基谢廖夫和 B.M.萨哈罗夫。

南斯拉夫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南斯拉夫军队最高司令部参谋长阿·约万诺维奇。

代表团成员向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问候后,斯大林同志问代表团是否一路顺利,赫布朗① 用俄语回答:"非常顺利。"赫布朗口头转达了铁托元帅对斯大林同志的问候。

斯大林同志问代表团带来了什么问题。

赫布朗回答,有三类问题:一、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援助问题;二、南斯拉夫的外交要求;三、南斯拉夫军队的装备和组织问题。

赫布朗在谈到需要苏联经济援助时说,首先需要粮食援助,不过,除粮食外,南斯拉夫还想从苏联得到南斯拉夫一些工厂必需的原料、军用和民

---

① 安德利亚·赫布朗(1899—1951),1919 年加入南共,战后任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斯拉夫经济委员会和计划委员会主席,兼工业部长。赫布朗是当时访问苏联的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代表团团长。1946 年 6 月被贬职,1948 年因赞成苏联立场被逮捕,1951 年 6 月在狱中自杀。

用服装及靴子、卫生物资、大学和中小学用的设备、宣传物资(新闻纸、书籍、油墨,等等)。

斯大林同志问,南斯拉夫是否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得到过什么援助。赫布朗作了否定的回答,并补充说,根据租借法案从盟国得到过某些援助。斯大林同志指出,也要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获得援助;接着又问,南斯拉夫是否打算作为战争赔款从匈牙利得到什么赔偿。

赫布朗回答说,匈牙利人给南斯拉夫造成了大约9亿美元的严重物质损失,因此,南斯拉夫要求赔偿损失。

斯大林同志又问,南斯拉夫是否打算作为战争赔款从德国得到什么赔偿。

赫布朗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补充说,他们还打算参加对德国某些地区的占领。

斯大林同志说,现在正就匈牙利媾和的条件与美国人和英国人进行谈判。看来,匈牙利的战争赔款额将为3亿美元,即与罗马尼亚和芬兰的赔款额一样多。美国人和英国人反对大量战争赔款,因为他们认为,大量战争赔款会削弱匈牙利,匈牙利的购买力会减弱。

赫布朗说,战争赔款额太小,并说他明白美国人和英国人为什么反对增加赔款额,因为他们害怕匈牙利太弱。

斯大林同志问南斯拉夫的煤炭生产如何。

赫布朗回答,过去南斯拉夫开采煤炭,但产量很低,现在的煤炭产量更低,储量减少了。南斯拉夫领导人打算从匈牙利获得煤炭,并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在谈到对南斯拉夫的全面经济援助时说,现在,在战争时期,苏联不可能给予南斯拉夫大量的经济援助;将根据可能给予援助,但是,现在战争正在进行,不可能给予大量援助。

斯大林同志接着问,南斯拉夫是否收到了粮食。赫布朗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补充说,但是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北部提供的粮食也算在了俄罗斯提供的粮食账上。照赫布朗的说法,这不是俄罗斯的粮食。

斯大林同志解释说,部分粮食可以算是红军缴获的战利品,这完全合

乎情理。斯大林同志接着补充说,南斯拉夫人对战利品问题总是有一种不正确的理解。南斯拉夫领导人,包括铁托,认为红军应当把在南斯拉夫缴获的一切留给南斯拉夫人,这是不对的。战利品属于缴获它的那支军队所有。如果军队知道缴获的东西必须送人,它就不会努力夺取战利品。军队不仅想在战斗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方面立功,而且想在夺取敌人的物资,即战利品方面立功。要求红军交出所有的战利品是不对的。

赫布朗说,把在南斯拉夫缴获的粮食运往匈牙利,这给居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许多南斯拉夫人对此不能正确地理解。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粮食是运给红军的,与红军驻扎在哪里根本没有关系;粮食运往匈牙利是给红军的,它没有稳定的粮食供应就不能作战。军队浴血奋战,却认为他们偷了东西,这是对红军的侮辱。斯大林同志提到了吉拉斯的言论,他曾经说,苏联军官的精神和政治面貌比英国军官的精神和政治面貌差。① 斯大林同志强调指出,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这是侮辱。不能根据个别情况概括一支军队,不能因一个丑恶的人就侮辱整个红军。必须理解一个战士的心,他奋战三千公里,从斯大林格勒打到布达佩斯。战士认为自己是英雄,他干什么都行,今天活着,明天可能被打死,人们会原谅他的一切。在长期艰苦的战争中,战士们累了,已经筋疲力尽。持"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观点是不正确的。英国军官在希腊彻头彻尾地表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会有个别情况给我们战士脸上抹黑,我们为此也枪毙了人。不过必须记住,他们筋疲力尽了,精神已经紧张到极点;他们认为自己是英雄,什么事都允许干,什么事都可以干。斯大林同志讲了最近的一件事。有个飞行员,一个很好的飞行员,在一个地方聚众畅饮,在那里打死了一个人。他被关进监狱,应当枪毙。调查了很长时间。原来他完全喝醉了,记不得自己干了什么事。斯大林同志说他保释了这名飞行员,因

① 1944年秋苏联红军进入南斯拉夫并解放贝尔格莱德以后,在红军战士中发生了多起强奸、杀人、抢劫等危害南斯拉夫公民的事件。为此,1944年10月南斯拉夫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与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科尔涅耶夫举行了一次会谈。会谈中,吉拉斯说:"我们的困难还在于我们的敌人利用这点攻击我们,他们把红军和英国军队加以比较,认为英国军队没有那类违法乱纪的行为。"(据吉拉斯所著《同斯大林的谈话》)科尔涅耶夫当即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认为吉拉斯把红军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相比,是对红军的侮辱。

为这是个很好的飞行员。现在已经将他释放,派到了前线。必须记住,战士随时都有危险,特别是飞行员,不仅在战斗中有危险,而且只要在天上随时都有危险。德国人不那么容易打,然后还要追击他们。筋疲力尽,人们失去了平衡,不能用通常的尺度去衡量他们。

接着,斯大林同志对给予南斯拉夫物质援助问题的讨论作了归纳,他说,会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会进行援助。

赫布朗把话题转到军事问题上,他说,在军事方面,南斯拉夫期望得到苏联的两种援助:军事装备和人员(教官和顾问),期望帮助南斯拉夫建立一支按现代化标准组织的军队。

约万诺维奇在对赫布朗的讲话作补充时强调,南斯拉夫已经有这样一支军队的骨干和基础,必须组建军队的中央领导机构,即总参谋部、集团军司令部、军司令部和其他较大的司令部。

斯大林同志问,现在南斯拉夫军队有多少个师。

约万诺维奇回答:现有 50 个师,51.8 万人。随着南斯拉夫全境的解放,将再动员 30 万人。50 个师中有小规模的游击队师,应当进行改编。这样一来,师的总数将减少到 40 个。打算将来组建 3 个集团军,另外组建 12 个军。每个集团军 5 个师,每个军 3 个师。

斯大林同志问,南斯拉夫的一个师现在有多少门火炮。基谢廖夫将军回答说,现在一个师有 72 门火炮,其中包括迫击炮;南斯拉夫人想把 1.25 万人的师的火炮数量增加到 84 门。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么多大型师不现实,建如此多的师,军官不够。斯大林同志举了波兰的例子。波兰曾经动员了 20 个师的兵力,但是军官不够,于是不得不把师的数量压缩到 10 个,其中 5 个师现在前线,另 5 个师最近也将调往前线。斯大林同志说,不过,这将是些优良师。师的编制为 8 000~9 000 人。如果南斯拉夫有 20 个师,但是优良师,这就很好了。问题不在数量。师可以很多,但是其价值却很小。必须培养军官,这一点至关重要。即使是 20 个师,这已经很多了,不应热衷于数量。斯大林同志又说,中国抗战持续了 8 年,但是那里学习抓得不紧。建了 400 个师,但是又不培养军官,因此,他们的军官不行。前不久,日本人从北进犯,8 个日本

师打败了43个中国师。考虑到南斯拉夫缺乏军官这一实际情况，斯大林同志谈了一个想法：应当用轻型火炮装备几个游击队师，把它们留在后方。师的编制应当少于1.3万人。斯大林同志说，对南斯拉夫来说，20个师就够了，这就很好了。以后每个师可以扩编成军，1个师就成了3个师。师多了供养很困难，它们打起仗来不会顽强的。斯大林同志提醒他们注意这件事情的困难，并说，目标必须提出来，但是现在达不到，师不过是纸上的师。

斯大林同志问，南斯拉夫军队怎么建设：是统一指挥，还是塞尔维亚军队、克罗地亚军队和其他军队分立。

约万诺维奇回答，将统一指挥。

斯大林同志问，语言怎么办，通用哪种语言。

约万诺维奇回答，将通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和马其顿语只在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使用，因为这两种语言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不同。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会帮助组建司令部：我们给人，给我们的条令，但是南斯拉夫必须有自己的军官，有好的连长、营长。南斯拉夫过去有这样的军官，因为南斯拉夫当年有一支很好的军队，南斯拉夫人主要是拜过法国人为师。

约万诺维奇说，现在南斯拉夫士兵的战斗力也很弱。基谢廖夫补充说这个军队毕竟还不顽强，并且举了一个实例：南斯拉夫第21师在敌人不大的压力下就溃退了，而且损失了一部分火炮。斯大林同志插话说，这种情况到处都有，德国人有，我们也有。

斯大林同志询问南斯拉夫军队将来采取什么样的编制。基谢廖夫将军回答说，军队有两种编制方案。按第一种方案，每个师都是正规的整编师；按第二种方案，一部分师为非满员师。这类师的司令部已经详细研究过。

斯大林同志说也可以采用旅的编制，并以红军的经验为例说明，1942年红军的编成中有100～120个旅，每个旅的编制为4 500－5 000人。这些旅英勇善战，后来变成了师。这样的旅非常容易指挥，当指挥员有了经验，

他们也能统率正规师。也许,南斯拉夫应当有 7～10 个 10,000 万人编制的师,其他师改编为旅,好让年轻的军官获得管理和指挥的经验。这种旅甚至可以叫作师。以后可以再把它们变成正规的现代化师,不过现在应当让军官成长。1942 年,红军就是这么做的,后来这些旅扩编成了师。斯大林同志说,游击队员必须训练,他们不适用于现代化的军队。当红军在游击区会合后,就把游击队撤到了后方,一部分游击队员留在部队或者送去学习,其他的都被遣散了。在后方他们是好样的,但是进行野战不行:他们不想进行野战,也不习惯军队的纪律。

约万诺维奇说,在南斯拉夫建 40 个师的干部是足够的。对此,斯大林同志指出:须知必须指挥他们,指挥这些师。斯大林同志在阐述这一想法时说,德国人是很会打仗的人,他们知道,没有军官就不可能有军队,因此,他们每到一个国家,就把所有的军官抓起来押往德国。他们在波兰、南斯拉夫和法国都搜捕军官。戴高乐在与斯大林同志谈话时就抱怨法国缺乏军官。

斯大林同志的话题回到南斯拉夫今年师的编制问题上。他谈了一个想法:也许应当建 7 000～8 000 人的师。斯大林同志接着说,对游击队员必须严格要求,严加约束,使他们适应现代化的军队。对这一点,他们往往不会心甘情愿;但是,为了现代化的军队,必须训练他们。

斯大林同志问,德国人是否正在从南斯拉夫撤离。约万诺维奇作了肯定的回答,并强调指出,与此同时,德国人正在一些方向上构筑工事。斯大林同志说,德国人将会争夺萨格勒布,争夺卢布尔雅那,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据点能掩护驻意大利德军集团的侧翼。斯大林同志问,南斯拉夫哪些地区解放了。

约万诺维奇回答: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几乎全境以及伏伊伏丁那已经解放。德国人在利卡和克罗地亚滨海地区防御得特别顽强。

斯大林同志的话题又回到南斯拉夫军队的编制问题上。他指出,先和我们的人商量一下,必须解决以下问题:编什么样的师,编多少师。用不着编大型师。日本人一个师以前是 2 万人,但是现在他们正在把一个师的兵力压缩到 1.7 万人或者更少。斯大林同志说,一个师的正规编制为 1.2 万

~1.3万人。指挥干部问题是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培养指挥员必须花数年的时间。

斯大林同志问,过去预定向南斯拉夫提供的装备,南斯拉夫已经收到了多少。

基谢廖夫将军回答说,已经收到近10个师的装备。

斯大林同志命令查清已经收到什么装备。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还得解决建什么样的师的问题。斯大林同志接着说,所有的问题将和布尔加宁① 同志和安东诺夫② 将军讨论。

约万诺维奇请求向南斯拉夫军队派遣教官,并说,已经规定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和义务。他们将享有相应部队副指挥员的权力,可以向上一级报告自己的意见。还规定苏联教官着南斯拉夫军装。

斯大林同志说,教官穿南斯拉夫军装的话应当懂南斯拉夫的语言,否则,穿南斯拉夫军装没有意义。波兰的经验表明,苏联军官穿了波兰军装,但不会说波兰话,化装没起到作用。这就像戴了个面具一样。教官应当只是教官、顾问。他无权取消指挥员的决定,也不能将决定强加于指挥员。斯大林同志说,教官我们暂且给。斯大林同志又说,南斯拉夫人的一个弱点就是靠顾问,南斯拉夫人什么时候明白顾问会离开,他就知道必须学习了。

斯大林同志谈了由于新的轻便火炮的生产我们炮兵编成的一些变化,并问,一个南斯拉夫师应当有多少门不小于72毫米口径的火炮。

基谢廖夫将军回答说,这样的火炮应当有36门。

斯大林同志问,南斯拉夫军队是否需要缴获的装备。

约万诺维奇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补充说,还需要弹药。斯大林同志说:"当然。"

斯大林同志说,南斯拉夫现在没有我们的部队。

基谢廖夫将军说,初步打算建几个兵种(炮兵部队、坦克部队、工程部

---

①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1895—1975),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和副国防人民委员。

② 阿列克谢·因诺肯季耶维奇·安东诺夫(1896—1962),时任苏军总参谋长,大将。

队),它们也需要装备和其他物资。还要给南斯拉夫军队建3个包括供应机关、指挥机关和后方机关在内的军队机构。

约万诺维奇特别强调了急需运输工具。由于缺乏运输工具,整个军队机构和后方服务机构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原有的公路和运输工具都毁坏了;国内马匹很少。

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同志说,汽车运输问题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不仅要提供一定数量的汽车,而且主要是汽车运输需要大量汽油,这个问题难得多。不过,将为较重型的火炮提供一定数量的汽车。所有的轻型火炮必须靠骡马拖运。

斯大林同志问,初步打算具体建什么样的坦克部队和工程部队。

约万诺维奇回答说,初步打算建4个坦克旅、9个工程兵营和2个高炮团。此外,预计在最近3年内培训好南斯拉夫的空军人员,并从苏联得到8~10个航空师的技术装备(约1 000架飞机)。

斯大林同志问,关于正在向南斯拉夫移交的2个航空师的装备,干部培训进行得怎么样。

约万诺维奇回答说,由于缺少足够数量的教练机,训练有困难。

斯大林同志问,从总的方面说,怎么为军队培养军官,有没有军事学院。

约万诺维奇说,有分别培训炮兵、机枪手和通讯人员的军官学校。炮兵干部的培训情况最好。南斯拉夫没有军事学院,不过初步打算建立联合军官学校,培训初级和中级军官,办高级指挥员进修班。

斯大林同志指出,除了为单个兵种,如机枪手、坦克兵和炮兵培养军官外,还必须培养诸兵种合成部队指挥员。斯大林同志指出,必须发扬南斯拉夫训练和培养军事专业人材的传统。

斯大林同志问代表团还有什么军事方面的问题。

约万诺维奇说,主要问题都谈过了,只有一个请求:为军事测绘研究所提供设备。贝尔格莱德原有的设备被德国人运走了,还有一部分给了保加利亚人。

军事问题的讨论到此结束。斯大林同志请南斯拉夫方面阐述实质性

的政治问题。

赫布朗首先阐述了南斯拉夫对匈牙利的要求。他说,匈牙利与南斯拉夫接壤的州及其首府佩奇市蕴藏的煤,对南斯拉夫的经济至关重要。该州居民基本上是匈牙利人,但是也有一定数量的斯拉夫人。该州连同佩奇的几个矿场必须并入南斯拉夫。另外,南斯拉夫对匈牙利的领土要求还包括,将所谓的包姚三角地,即首府为包亚[①] 市的匈牙利州并入南斯拉夫。该州是历史上巴兰尼亚省的一部分,有许多斯拉夫人。

斯大林同志插话:"匈牙利人同意吗?"

赫布朗回答说,匈牙利人当然不会同意。但是,拥有这些州对南斯拉夫至关重要。也许,可以用武力占领这些州。

斯大林同志说南斯拉夫人现在去占领晚了一些,又说他也不怜悯匈牙利,但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会强烈反对这样做。在解决领土问题上他们主要遵循的是民族原则。斯大林同志又说,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南斯拉夫人必须自己提出并入南斯拉夫的问题。必须做出决定,大声疾呼。必须为合并进行斗争。

斯大林同志接着问,南斯拉夫人是否知道德国人在伦蒂市地区每年开采 5 000 吨石油的消息。

赫布朗和约万诺维奇回答说不知道之后,斯大林同志在地图上给他们指出了这一石油产地。

赫布朗请求让南斯拉夫代表参加对匈牙利和谈问题的盟国管制委员会。

斯大林同志说,这要力争。我们方面不会反对。

接着,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就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和南斯拉夫代表参加该委员会问题交换了意见。

赫布朗又阐述了南斯拉夫对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要求。南斯拉夫人提出,将科鲁什州(现属奥地利卡林西亚省)斯洛文尼亚人居住的那一部分并入南斯拉夫。第一次大战后该州属南斯拉夫,但是那里举行全民投票后并

---

① 原文如此,应为包姚。

入了奥地利。

赫布朗又说，现属意大利的伊斯特拉半岛，连同的里雅斯特港、包拉[①]港和里耶卡（阜姆）港，也必须并入南斯拉夫。伊斯特拉半岛的居民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只有港口城市有一定比例的意大利人。赫布朗出示了标有南斯拉夫所要求边界的该地区的民族分布地图。

斯大林同志说，必须让这些州自己要求并入南斯拉夫。

赫布朗讲，去年，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反法西斯议会应这些州人民关于并入南斯拉夫的要求，做出了相应的合并决定。其后，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议会也批准了这些决定。

赫布朗接着说，从战争最初的日子至今，这些州就有广泛开展的南斯拉夫人游击运动。

约万诺维奇补充说，现在，南斯拉夫的两个军、一个师和几支游击队在这些州作战。这些州完全掌握在南斯拉夫人手中。

赫布朗继续说道，在的里雅斯特和里耶卡（阜姆）只有人数不多的几个自治分子团体，他们在英国人的保护下，要求给予该地区自治权。

斯大林同志询问了这些团体有多少人，当知道数量微不足道时，半开玩笑地说把他们淹死。接着，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讲了同丘吉尔的非正式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丘吉尔建议将伊斯特拉半岛划出，成为一个自治州，它能使未来的奥地利得到进入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

赫布朗把话题转到罗马尼亚问题上，阐述了南斯拉夫对罗马尼亚的领土要求，即将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地区的领土，包括蒂米什瓦尔市[②]，并入南斯拉夫。赫布朗对此提出的根据是，该地区有一个县的居民全是塞尔维亚人。蒂米什瓦尔市的居民以前主要是德国人，现在也可以交给南斯拉夫。

斯大林同志问报刊上有没有出现这方面的文章，当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说，必须让该地区的人民，即塞尔维亚人，自己提出并入南斯拉夫的问题。总之，这是将来和会讨论的问题。不过，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和会上，

---

① 原文如此，应为普拉，亚得里亚海港口城市。

② 原文如此，应为蒂米什瓦拉市。下同。

必须有众所周知的证据。

赫布朗还请求改变与罗马尼亚在雷希察市地区的边界，因为这座位于罗马尼亚领土上而离南斯拉夫边界只有20公里的城市，有几个南斯拉夫非常需要的制铁厂。如果不能将雷希察并入南斯拉夫，那么，就难以保证南斯拉夫通过其他途径从这些工厂获得钢铁，因此这对南斯拉夫来说非常重要。

然后，赫布朗说，他想向斯大林同志通报与保加利亚的关系。赫布朗称，事情进展非常艰难，过错在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人不接受南斯拉夫关于联邦的条约草案。

斯大林同志说，他看过条约草案，这个草案不合适，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是可以加入联邦的两个国家，而这个联邦的前景是在二元制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全联合这两个国家。根据南斯拉夫人现在建议的联邦条约，保加利亚人将获得与南斯拉夫各民族诸如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马其顿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平等的权利，保加利亚人认为，这个条约草案有吞并他们的意图。必须向完全联合努力，这将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但是必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朝这一目标走，先从联盟，从互相援助开始，然后逐步走向联合。这不是权宜的联盟，而是永久的联盟。这是自由的联盟，是自由结成联邦的两个国家的有机联盟。不能造成想吞并保加利亚人的印象。

赫布朗说，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保加利亚人希望签署友好互助条约，是力图缓解保加利亚解决马其顿问题的困难，摆脱它因站在德国一边参战陷入的那种孤立状态的困难。条约能使保加利亚人逃避战争期间所犯罪行的责任。从另一方面说，保加利亚可以保留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南斯拉夫领导人没有接受签署互助条约的建议，并于1月初通过了联邦条约的新方案，新方案的基础也不是二重原则，而是保加利亚加入联邦，享有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等各个民族将享有的同等权利。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这样的话，将来的联邦能够通过内部努力正确地影响保加利亚。联邦条约在南斯拉夫将很容易获得通过。按照规定，条约应当由南斯拉夫各联邦成员诸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等的最高

权力机关批准。南斯拉夫政府提出联邦条约的第一个方案时，认为条约应在 1944 年 12 月 31 日签署，1945 年 1 月 1 日宣布。初步打算 1 月 1 日隆重庆祝条约签署。所有的问题，乃至细节都作了规定：找好了举行庆祝活动的礼堂，指定了乐队，等等。但是，南斯拉夫的方案没有被接受，保加利亚同志通知说，来自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报劝阻了他们，他建议签署友好互助条约。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这样做不正确，遂于 1 月初提出了另一个联邦条约草案。

斯大林同志再次强调，必须逐步走向联合，保加利亚人要联盟，他们要建立两位一体的国家，这很好。最好签署 10 年或者 20 年的友好互助条约。现在应当把二元制原则作为联合的基础，按奥匈帝国模式建立两位一体的国家，但是又避免了旧奥匈帝国存在的许多弊端。

如果形势急剧转变，保加利亚人可能会倒向美国和英国，甚至倒向土耳其。必须准备基于二元制原则上的联邦制联合。

莫洛托夫同志强调，即使友好互助条约也会使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害怕，使罗马尼亚人害怕，欧洲会一片慌乱。这将是欧洲的一个大事件，大家都害怕，只有苏联一家不害怕。

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对捷克斯洛伐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交换了意见。捷克人不会害怕的，因为他们支持斯拉夫人团结的原则，但是，他们害怕这是左派斯拉夫人的联合。此外，这将影响捷克斯洛伐克的内部关系，斯洛伐克人可能要求在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类似的措施。

斯大林同志问对希腊有什么要求。

赫布朗回答说，南斯拉夫打算得到希腊的马其顿和萨洛尼卡。这些要求过去没有提，以免给希腊人民解放军造成困难，因为这样作会削弱希腊人民解放军在国内的地位，给它的地位造成困难。现在，要提出这个要求了。

莫洛托夫同志说，希腊的马其顿人自己可能提出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你们和罗马尼亚、匈牙利、希腊都是敌对关系，好像你们打算和全世界打仗；造成这种局面没有好处。

斯大林同志询问对希腊共产党人的看法。赫布朗回答说，过去，在被

占领时期，他们对希腊共产党人的看法很不好，不过，最近他们表现很好。

斯大林同志问赫布朗是否认为，希腊民族解放阵线退出帕潘德里欧政府[①] 是正确的。

赫布朗作了模棱两可的回答后，斯大林同志说，这是没有征求我们意见而迈出的不正确的一步。

斯大林同志询问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赫布朗回答说，阿尔巴尼亚人是南斯拉夫最好的朋友。赫布朗称，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运动中有各党派的代表，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共产党。索古国王在国内得不到支持。国内有不少的反动团体，但对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运动没有危险。

赫布朗继续讲道，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前不久访问贝尔格莱德时，签署了南阿友好互助条约，还签署了贸易条约。

斯大林同志说，既然南斯拉夫承担了条约义务，那么它就应当履行条约义务。一旦出了麻烦就不得不打仗，它能不能打英国，它有没有足够的力量，这还是个问题。对阿尔巴尼亚应当慎重。英国人只承认实力。贝尔格莱德解放了，这很好，这又创造了有利条件。英国人害怕红军向希腊开进，假如红军朝那里开进，那里的局面当然会是另外一个样，但是，在希腊没有海军就一事无成。英国人看到红军没有向希腊开进感到吃惊。他们无法理解不允许军队采取分散运动的战略。红军的战略是建立在集中运动基础之上的。

斯大林同志又询问阿尔巴尼亚军队的情况。

约万诺维奇回答，阿尔巴尼亚有三个军，由八个师组成。

斯大林同志说，不应当和英国人打仗。关于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必须等一等，斟酌一番。互助条约还没有批准，没有宣布，这很好。建议2月以前不公布条约。

斯大林同志接着问，阿尔巴尼亚现在是什么政府，是全国委员会还是临时政府。

---

① 1944年4月以希腊社会民主党领袖乔治·帕潘德里欧为首组成的新一届流亡政府。

赫布朗回答说,阿尔巴尼亚前不久成立了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已经向同盟国政府提出了承认的问题。但阿尔巴尼亚临时政府至今没有得到承认。

斯大林同志问,南斯拉夫人是否承认了阿尔巴尼亚临时政府。

赫布朗回答说还没有承认,在地拉那只有南斯拉夫的军事使团。

斯大林同志问,南斯拉夫是否承认了保加利亚政府,保加利亚政府是否承认了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

赫布朗回答说,保加利亚在贝尔格莱德有部长级公使托多罗夫,而在索菲亚有南斯拉夫的军事使团和贸易使团。

斯大林同志对莫洛托夫同志说,按照国际关系法,好像应当先建立外交关系,然后再签署条约和协定。接着,斯大林同志问赫布朗,南斯拉夫组建政府的事怎么样。

赫布朗回答说,舒巴希奇[①] 到达伦敦后收到丘吉尔的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赞成舒巴希奇与铁托签署再经修订的协议,并表示希望尽快组建南斯拉夫政府。但是可以看出,英国人故意拖延统一政府的组建(我们给舒巴希奇的期限是12月31日前),这对南斯拉夫的形势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

前不久,贝尔格莱德给在伦敦的舒巴希奇发了一封电报,电报指出,组建新政府的时间不能迟于1月下半月。

赫布朗称,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领导人所持的态度是:如果1月15日前不能组成统一政府,那么,就宣布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为南斯拉夫临时政府。

斯大林同志说,现在不应宣布全国解放委员会为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应当得到承认,英国人和美国人大概不会承认它,苏联政府倒是可以承认,但是现在它还受波兰事务的牵制。在波兰问题上,苏联政府不顾英国和美国的态度简单从事,承认了临时政府,丘吉尔吞下了这颗苦果,而罗斯福垂头丧气,现在还在生气。

---

① 伊万·舒巴希奇(1892—1955),战时南斯拉夫王国流亡政府首相。1945年3月参加南斯拉夫联合政府,出任外交部长,不久后提出辞职,住在萨格勒布。

斯大林同志建议,在2月份之前,当许多问题还没有明朗之时,暂缓宣布成立政府。①

斯大林同志谈了他的推测:丘吉尔由于在希腊得手非常得意,正在寻找借口在南斯拉夫故伎重演。不应在这件事上给丘吉尔帮忙。当然,希腊人民解放军被打败对南斯拉夫也是坏事。希腊反对派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武装进行抗衡。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代表退出了帕潘德里欧政府,他们做得不对。他们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让丘吉尔轻易得手了。在南斯拉夫不要发生争斗,不要让丘吉尔轻易得手。不能给他借口,而丘吉尔正在寻找这样的借口。丘吉尔在希腊很多方面已被搞得焦头烂额,故伎重演不会那么容易,何况还怕我们。

接着,斯大林同志对挑起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战事是否合适表示了怀疑。他又说,首先应当力求把政府的组成明确下来。丘吉尔认为,铁托-舒巴希奇政府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因为不论是铁托还是舒巴希奇,都是克罗地亚人。但是英国人失算了,这一点现在看得出来。

斯大林同志说,希望南斯拉夫方面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最好征求我们的意见,否则,我们会陷入尴尬的境地。

斯大林同志在谈话过程中说了一句:从族系上说,阿尔巴尼亚人也是斯拉夫人。他接着说,南斯拉夫领导人要想自信,必须有实力。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如果你不能进攻,那就以守为攻,积蓄力量,然后再进攻。对待资产阶级政客必须谨慎从事。他们资产阶级政客胸怀非常狭窄,报复心很强。要控制自己的感情,如果感情用事,一定会输的。列宁当年没有想过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所争取到的这种力量对比。列宁当时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将进攻我们,倘若某个很远的国家,譬如美国是中立国,那就很好了。而现在的结果是一些资产阶级反对我们,另一些资产阶级和我们站在一起。过去列宁没有想过可以与一派资产阶级结盟,和另一派资产阶级打仗。这一点我们做到了;左右我们的不是感情,而是理性、分析、权衡。

---

① 经维斯岛(南斯拉夫)谈判,铁托和舒巴希奇于1944年11月1日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商定成立统一政府。1945年3月7日,铁托组建了南斯拉夫民主联邦临时政府,在28名政府成员中,11人为共产党人。舒巴希奇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在会谈结束时，莫洛托夫同志建议分组讨论南斯拉夫代表团提出的问题，并允诺挑选权威人士参加讨论。

赫布朗在告别时转达了南斯拉夫代表团全体人员的请求：允许代表团在回国前会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对此表示同意。

会谈持续了 3 小时 15 分钟。

（记录：基谢廖夫少将，萨哈罗夫少校）

3　莫洛托夫与舒巴希奇关于南斯拉夫外交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5年4月6日）

绝密

4月6日17时，莫洛托夫同志会见了南斯拉夫外长舒巴希奇。会谈一开始，舒巴希奇就讲，南斯拉夫依然处在艰难的经济形势中。

莫洛托夫同志说，当南斯拉夫全境解放之后，南斯拉夫的经济形势将会好一些，当然，还会有不少困难，但是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南斯拉夫的经济生活还没有走上正轨，不过，从种种迹象看，它正在复苏。

莫洛托夫同志问舒巴希奇，南斯拉夫联合政府是否在齐心协力地工作。

舒巴希奇回答说，南斯拉夫政府是齐心协力工作的。每个政府成员都能畅所欲言。舒巴希奇本人对政府的情况完全满意，南斯拉夫政府中的气氛一天比一天好，不过舒巴希奇说，某些老政治家，尤其是来自侨民中的老政治家，有时候还不明白，生活不会止步不前，它在发展完善。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现在，各个民族的生活中都在出现许多新的因素，必须寻找和解的基础，寻找在这种新条件下齐心协力工作的基础。

莫洛托夫同志问，苏联政府同意任命弗拉迪米尔·波波维奇为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的答复，是否已经送达南斯拉夫政府。

舒巴希奇确认，南斯拉夫政府已经收到认可波波维奇的答复。

舒巴希奇问，苏联政府是否收到了南斯拉夫的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草案。莫洛托夫回答说，南斯拉夫的条约草案已经收到，和我方的草案没有实质性的差别，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南斯拉夫想的和苏联想的完全一样，因此，它们容易达成协议。

舒巴希奇问，莫洛托夫同志是否认为有必要确定条约的有效期。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最好确定一种期限，并依据苏联与英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类似条约的经验，建议将条约有效期规定为20年。

舒巴希奇问莫洛托夫同志，他认为应有几名南斯拉夫代表签署该条约，是一名还是两名。舒巴希奇接着补充说，如果认为该条约有必要由两名南斯拉夫代表签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概由铁托元帅和舒巴希奇签署；如果只需一人在条约上签名，那么，他主张由铁托元帅签署条约。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必须由一名还是两名南斯拉夫代表签署条约，以及具体由谁签署，这应当由南斯拉夫政府自己决定。

莫洛托夫同志问，南斯拉夫政府是否讨论过条约草案。舒巴希奇回答说，政府知道该草案。舒巴希奇通知说，南斯拉夫政府还打算与苏联开始经济谈判，也签署相应的经济条约，并且问，作为南斯拉夫代表团成员来的贸易和供应部长彼得罗维奇可以找谁谈这个问题。

莫洛托夫同志建议彼得罗维奇部长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会晤。

舒巴希奇请苏方考虑到他急于赴旧金山参加会议，因此，打算4月10～11日离开莫斯科。他想让彼得罗维奇能在他离开莫斯科前与米高扬会晤，因为舒巴希奇非常需要知道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大概的贸易额。他估计，美国人将向他提出美国和南斯拉夫间的经济联系问题，他不想犯某种无意的错误，因此，他想尽早知道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贸易的性质和总额，即使大概的情况也行。

舒巴希奇通知说，南斯拉夫的一些经济专家将赴美国，专门讨论根据租借方案向南斯拉夫供货的规模。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供货很重要，南斯拉夫已经与该组织的代表签署了相应的协定，不过，租借法案更为重要。

莫洛托夫同志说，租借法案主要是提供军用物资。

舒巴希奇说,南斯拉夫还是想通过租借法案获得工业设备。

舒巴希奇谈到南斯拉夫和美国间可能的经济联系时称,美国人对南斯拉夫的胃口非常大。

莫洛托夫同志只插了一句话:无限大。

莫洛托夫同志又问,南斯拉夫是否想向苏联政府提出赫布朗曾提过的那些经济问题。舒巴希奇回答时强调,将提出同样的问题。

舒巴希奇说,南斯拉夫政府想在勘探和开采南斯拉夫金属矿藏和油田方面使用苏联专家。舒巴希奇称,据最近的资料,南斯拉夫在萨瓦河和德拉瓦河间有非常大的石油储量。德国人在勘探石油储量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们甚至在南斯拉夫境内开始小批量开采石油。据舒巴希奇转告,南斯拉夫政府不想允许外国人勘探和开采南斯拉夫的自然资源。譬如,英国人和美国人知道南斯拉夫有石油,但远非什么都知道。过去,在这次战争前,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在普洛耶什蒂兴办石油开采工业和石油加工工业感兴趣,利用他们对政府的影响,企图阻挠南斯拉夫对石油产地的勘探和开发。1939 年,当南斯拉夫政府与一家德国公司签定了在南斯拉夫开采石油和矿产的合同后,美国大使专门拜会了舒巴希奇,建议他阻止落实这项交易。由于签署这项合同的政府第二天(1939 年 8 月 25 日)辞职,舒巴希奇利用他对克罗地亚银行的影响力,向摄政者保罗提出了抗议,反对与德国公司的交易,当然,他并非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愿望出发,而是从他本人的信念出发。

莫洛托夫同志问,南斯拉夫政府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关系发展得怎么样。

舒巴希奇回答说,他们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关系发展得很好;他本人正在尽一切努力,使这种关系将来依然很好。

舒巴希奇又说,他担心英国人和美国人可能仍对南斯拉夫政府不满,因为南斯拉夫政府没有把他莫斯科之行的目的通知他们。舒巴希奇曾预先通知英国人和美国人,说他要赴莫斯科,不过,他对莫斯科之行是这么说的:铁托元帅要去拜访斯大林元帅,舒巴希奇陪同他去。舒巴希奇在与英国和美国的代表谈话时,并没有提及将要签署苏南条约。

莫洛托夫同志说，这件事现在可以对英国人和美国人讲了，因为这件事已经不是秘密了。

舒巴希奇问，他可否与莫洛托夫同志谈一谈修改南斯拉夫边界的问题。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可以。他同时说，他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过，他们当然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并请舒巴希奇陈述南斯拉夫的要求。

舒巴希奇说，南斯拉夫的要求仅限于伊斯特拉半岛以及奥地利和匈牙利与南斯拉夫接壤的几个地区。关于这个问题，舒巴希奇通知说，丘吉尔在和他会谈时，对南斯拉夫的领土要求非常模糊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并建议南斯拉夫在备忘录中不要提出伊斯特拉半岛问题。据舒巴希奇讲，梵蒂冈正在大做文章，反对将伊斯特拉半岛移交给南斯拉夫，它炮制了类似建立伊斯特拉独立国家方案的各种方案，按照梵蒂冈的设想，这样的国家能在斯洛文尼亚的天主教徒中施加影响。舒巴希奇认为，如果在这次战争中南斯拉夫部队占领伊斯特拉半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解决修改它与意大利边界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考虑到各种反对意见和争执，舒巴希奇已经给南斯拉夫的一些教授布置了任务：对南斯拉夫的领土要求做出非常严谨而且客观的论证。

莫洛托夫同志说，客观的论据难以说服所有的人。

舒巴希奇强调，南斯拉夫政府的打算是：南斯拉夫的边界应在严格遵守民族和民族学原则的条件下加以修改。

舒巴希奇允诺将附有南斯拉夫领土要求详细说明和地图的备忘录寄给莫洛托夫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问，组建南斯拉夫联合政府的问题为什么在伦敦研究了那么长时间。

舒巴希奇相当详尽地讲述了他与英国人和彼得国王谈话的经过。艾登[①]，特别是丘吉尔，拖了很长时间不接见他，而且还要和国王进行谈判，仅仅这一原因就把事情拖延了。在一次会谈中，艾登甚至说了这样一个想

① 罗伯特·安东尼·艾登（1897—1977），1940～1945年出任英国陆军大臣和外交大臣，1945～1951年艾德礼工党执政时期仍留在下议院。1942年以后长期为英国保守党领袖。

法:如果国王不赞同铁托和舒巴希奇的协议,那么舒巴希奇就不得不辞职;舒巴希奇对此表示反对,说他将择善而从,在目前的情况下,他未必会辞职,由于国王的原因,南斯拉夫无论如何不会发生希腊或者波兰发生过的那种事情。国王千方百计地企图说服舒巴希奇辞职,并且援引了自己的特权。舒巴希奇明确地向国王声明,如果国王和人民一起走,他就和国王一起走,否则,他就离开国王。问题最后是这么解决的,国王希望保全自己的威信,在同一份命令中要舒巴希奇辞职,同时又委托他组建新内阁。

莫洛托夫同志问,这个问题最终是否解决了。

舒巴希奇回答说,雅尔塔会谈和莫洛托夫同志的电报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不是这封电报,英国人肯定还会拖延。

舒巴希奇问,铁托元帅能否拜访现在莫斯科的丘吉尔夫人。

莫洛托夫同志反问道:为什么不能。

莫洛托夫同志又问,南斯拉夫代表团有没有在莫斯科逗留期间的计划,它准备向苏联政府提出什么问题。舒巴希奇回答说,他们首先打算签署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然后签署经济协定,谈一谈修改南斯拉夫边界的问题,讨论某些内务和外交问题,了解即将召开的旧金山会议的情况。

莫洛托夫同志允诺让舒巴希奇阅读苏联政府掌握的有关旧金山会议的材料。

舒巴希奇请莫洛托夫同志同意专门与他会晤,以讨论条约草案,并请他确定这次会晤的日期。

莫洛托夫同志同意会晤,并说这次会晤可在4月7日举行。

会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会谈记录:拉夫里谢夫)

4 萨德奇科夫与保加利亚公使托多罗夫关于成立南斯拉夫联邦的谈话记录

(1945年10月23日)

摘自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И.В.萨德奇科夫的日记　　秘密

分送:维·莫洛托夫、В.杰卡诺佐夫、А.拉夫里舍夫。归档。

保加利亚人问我,由于舒巴希奇的辞职,盟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有什么新情况。我简要地向他通报了苏联与美国政府之间就南斯拉夫问题的信函往来。我同时还向他报告了美国政府关于承认阿尔巴尼亚的提案。保加利亚人发表意见说,英国人和美国人将放弃阻挠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原定选举的企图。他说,无论如何,他们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无计可施:不管在这个国家还是那个国家,各民族团结一致,任何干涉他们内部事务的企图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保加利亚人对当时(1945年1月)保加利亚未能与南斯拉夫统一深为遗憾。按照他的看法,当时的形势对此十分有利。据他说,维·米·莫洛托夫同志曾指示他们保加利亚人,如果他们希望与南斯拉夫统一,那就快些予以落实,但保加利亚政府却拖延了这件事,并且还提出一系列琐碎而无关紧要的问题进行讨论,结果就把时间耽误了。盟国知道了历次会谈的情况并予以反对。按照托多罗夫的看法,这就犯下了"命中注定的不可避免的错误"。公使指出,现在我们不得不长期等待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局面的出现。

托多罗夫找我商谈这一问题已经是第二次了，从他的谈话的口气判断，他似乎对此真的感到遗憾。

И.萨德奇科夫

5 萨德奇科夫与南斯拉夫人民农民党领袖关于选举失败原因的谈话记录

(1945年11月12日)

摘自И.В.萨德奇科夫日记　　秘密

分送:维·莫洛托夫、В.杰卡诺佐夫、А.拉夫里舍夫。归档。

约万诺维奇和日夫科维奇[①] 因昨天制宪会议选举结果心情沉重,且沮丧地找到了我,他们声称,获得席位的数量与他们在塞尔维亚农民中间的实际影响不相符。他们把从50名人民农民党候选人中只选了5~6人进入联邦议会的情况说成是"群众恐怖"、年轻人不负责任的行为,以及地方上的共产党人不想遵守与他们在选举中达成的精诚合作的条件。日夫科维奇抱怨贝尔格莱德没有给他机会,哪怕是召开一次选举会议。伏伊伏丁那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的地方委员会以各种借口取消他与选民的会见。

情绪激动、灰心丧气的约万诺维奇指出,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青年联盟"撕毁了所有号召投票赞成他的海报。当他来到自己选区皮罗特时,青年们从四面八方围住了他,并开始有节奏地高喊:"要战士,要战士"或"英雄铁托,英雄铁托",这一喊叫声持续了20~30分钟。这样一来,他根本无法与自己的选民们说上几句话。

① 德·约万诺维奇和日夫科维奇均为南斯拉夫人民农民党领袖。

他们对关于自己党的表决结果是这样解释的，即没有给他们在选民中开展独立工作的机会。在已经形成的局面中，他们则不知道该如何进一步行动：是继续留在人民阵线内还是转到反对派中去，留在人民阵线就会导致在人们当中影响的损失，但转到反对派则意味着要从自己党的重大政策——与依靠苏联的共产党人的合作上后退。他们本人都同意完全与共产党人打成一片，或参加到统一的工人农民党之中。这就是当前谈论的话题。但按照他们的看法，转到一党制还为时尚早——塞尔维亚农民目前对此还没有准备。在取消他们的党的过程中，部分跟他们走的农民将转向右倾并追随反动势力。因此，他们想听听我的意见，他们该如何进一步行动，同时想知道苏联希望见到一个什么样的南斯拉夫。

我回答他们说，他们提到的问题均属于南斯拉夫的内政问题，我们不能干涉这样的事务。苏联只是希望与南斯拉夫保持良好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目前还算不上好。至于涉及未来的国家制度，我曾指出，那就是你们自己在人民阵线纲领中确定的民主联邦共和国。我个人认为，这一决定是正确的。而为建造新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大厦，眼下显然需要参与人民阵线所有民主力量的合作。

约万诺维奇和日夫科维奇对此表示感谢，他们说，有了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最后，我建议他们与铁托元帅会晤，并与他坦率地谈谈所有这些问题。

临别时，约万诺维奇提醒说，他们已经落实了我在上次谈话中提出的有必要保护人民阵线统一的意见。

萨德奇科夫

6　萨德奇科夫关于南斯拉夫新宪法草案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5 年 12 月 17 日)

于贝尔格莱德市

秘密

分送:维·莫洛托夫、B.杰卡诺佐夫、A.拉夫里舍夫。归档。

关于南斯拉夫新宪法草案问题

致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今年 12 月 3 日南斯拉夫各报发表了供全民讨论用的南斯拉夫新宪法草案。它的基本原则有以下几方面:

南斯拉夫宣布为人民共和国,国名全称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并被认为是平等和自由结合的各民族的联邦。参加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成员有 6 个人民共和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马其顿及黑山。在塞尔维亚的构成中规定有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及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自治州。联邦国家与各独立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确定与苏联宪法差不多,但是也有本质区别,即各独立国家无权脱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铁托与卡德尔① 在与我的谈话中为这一区别提出论据说,在南斯拉夫没有像苏联那样存在着深刻的民族差别,因

① 爱德华·卡德尔(1910—1979),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二号领导人,南共中央书记,联邦副主席兼政府副总理。

为南斯拉夫各民族同系斯拉夫人，此外，他们的人数很少，不具备作为真正独立国家存在的条件。

宪法规定了人民政权的各项原则，其中第6条指出，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并属于人民，实现这一权利的形式是各级人民委员会。所有国家政权机关都要在普遍、平等和直接选举的基础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

国家总的经济结构的划分确立了国家三种经济关系形式——国有、集体和私人所有制经济的存在，宪法规定不准搞对外贸易垄断，而是要对它实行国家监督，同时还规定了经济发展将按照总的经济计划执行，而该计划则是依靠国有和集体经济，以及对私人经济的监督。

宪法保障私人所有制和个人的积极性，但需要保持在下列范畴内："任何人都不得利用私人所有制的权利损害民族的联合"、"私人所有制可能会受到限制或没收，如果整体利益要求这样做的话，但只能通过合法手段，并对私有者进行合法的赔偿。"

第19条则指出，土地属于耕种土地者所有，绝不容许出现私人大土地占用者。

综上所述，效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的南斯拉夫的草案是从"人民主权"的概念出发的，但是草案的其他各条均体现出对未来阶级分化政策的基本路线。例如，第19条指出，"国家特别保护和帮助中农和贫农"；第20条则规定，为了免遭经济奴役，国家帮助劳动者联合和组织起来，接着就把这种帮助的形式具体化了；第32条还宣布："每个公民必须各尽所能地工作；谁对社会无所贡献，谁就不能从社会取得任何东西。"

我曾问卡德尔，当存在剥削阶级——企业主、商人和地主的情况下，如何看待南斯拉夫当前条件下关于社会主义的提法，即如何认定这些人在目前发展阶段乃是社会的生产者和有益的成员，或者如何把他们从社会的平等成员中开除出去，亦即怎样使他们合法化或在今后消灭他们。

卡德尔回答说，他们在此基础上将要收拾资产阶级。卡德尔声称，我们现在就已经碰上了妨碍工业企业恢复的资本家的严重怠工事件，这类违抗在今后大概还会增强。因此，我们势必要走上暴力镇压他们反抗的道路。卡德尔这样说："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不是胜利就是灭亡，我们没有其

他路可走。”

草案的制定者依据我国宪法确定了每个公民的权利义务，但是，按照铁托的指示，凡列入现实保证公民权的一切条款都被删掉了。

宪法草案规定，由平等的两院——联邦院和民族院构成的人民议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在人民议会闭会期间，人民议会主席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联邦政府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最高执行和管理机关。政府由主席、副主席、各部部长、联邦计划委员会主席、联邦监察委员会主席、高等院校和科学事务委员会主席、卫生委员会主席和社会保障委员会主席等组成。草案的起草者依据我国宪法确定了人民议会主席团与联邦政府的权限和相互关系，但是在南斯拉夫的草案中，某种或多或少制约人民议会主席团的权利而偏袒联邦政府的倾向颇为引人注目。例如任命和罢免联邦委员会各部部长、主席、大使，以及授予荣誉称号和奖励，均得事先说明人民议会主席团是“遵照联邦政府的提议”行事的。

任命和罢免高级军事指挥员的权力归人民议会，而不是它的主席团。

铁托在与我谈话时指出，这些附加条件和修改是他提出的，其目的在于限制里巴尔① 的野心。

在制定宪法草案的过程中，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当中似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宪法的第一稿是由南斯拉夫法学家在卡德尔和莫萨·皮雅杰② 领导下制定的，用赫布朗的话说，这一最初草案几乎只是把苏联宪法简单地译成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而已。

例如，今后的南斯拉夫打算改称为“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联盟”，就政权的本质和起源问题而言，一切政权归城市、农村等方面的劳动者所有，铁托认为这一提法并不正确，同时提出了目前相应条款。就个人的意见，我

---

① И.里巴尔是民主党左翼领袖，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曾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

② 莫萨·皮雅杰(1889—?)，南斯拉夫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战后任南斯拉夫国民议会、联邦议会副主席。

支持现在通过的共和国国名。

然而,在我看来,铁托做出了一处不适宜的修改。在交报界发表前卡德尔给我的草案第二稿中,第73条写道,议会主席团在南斯拉夫遭到进攻或者在必须履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国际义务的条件下(第49条与苏联宪法如出一辙)可宣布为战争状态。在发表的草案全文中,对第二种情况就没有规定,它是依据铁托的提议去掉的,其理由是,与国际义务有关的紧急军事手段将由作为国防部长的他来实施,而战争状态则由人民议会宣布。

当卡德尔找我交换对宪法草案的意见时,我以自己个人的名义指出,最初的提法要好一些,因为它为落实苏联-南斯拉夫条约双方通过的义务规定了相同的条件。

卡德尔声称,做出这种改变并未征得他的同意,他甚至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卡德尔无法恢复在制宪会议宪法委员会讨论草案时的最初提法。

现在进行的草案讨论形式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

对草案的背后批评大都具有敌对的性质,发表的意见严重对立,并且以其当事人的社会和政党属性为转移。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人民阵线持敌视态度,并且声称草案是从苏联宪法那里抄袭过来的,是莫斯科授意的结果,甚至还是驻贝尔格莱德的苏联大使馆制定的。他们认为,这个草案的通过将会把南斯拉夫变为像改称人民国家的蒙古共和国一样纯粹是苏联的附庸。

另一组批评者认为,虽然南斯拉夫草案在保证个人自由和不受侵犯方面比苏联宪法走得远,但毕竟还不是民主的,因为它没有规定组织和政党活动的自由。他们断言,苏联宪法公开承认一党制,那样一来,作为南斯拉夫的草案也就暗中看好这一体制。

第三组代表从"左"的方面批评宪法草案。他们认为,草案与一般的资产阶级宪法没有多少区别,如果通过,就不会实现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它没有保护劳动者的起码权利。他们甚至还指出宪法草案侵犯了一些共和国的主权,因为它不承认它们有权脱离南斯拉夫联邦。

在制宪会议宪法委员会讨论草案的过程中，参加人民阵线的所有各党代表都对新宪法的基本原则持肯定态度，同时也都从个人角度提出了一系列修改，但人民农民党领袖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的发言却属例外。他以伪善的面目反对南斯拉夫未来经济和国家制度的基础本身。实际上，他的伪善讲话带有强烈的反苏色彩，并且把它与苏联的一党制混为一谈。在他看来，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想把这种制度以及法西斯主义和中世纪的野蛮制度强加给南斯拉夫。他认为，宪法草案过多地强调保证国家的统一而损害了一些民族、政党、个人等的自由，鉴于他的讲话大大超出了对宪法草案批评的范围，并进而转为对当今南斯拉夫对内对外政策的全面批评，因此，对其中的一些内容，我将在有关国家政治形势的信函中作进一步的详细介绍。①

12月14日，宪法草案提交宪法委员会投票表决，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其中也包括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都投票通过了作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未来宪法基础的草案。

尔后，委员会对其作了逐条审查。无庸置疑，制定出的宪法草案最终会获得通过。

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

萨德奇科夫

① 参见下面的文献7。

7　萨德奇科夫关于南斯拉夫政治局势给莫洛托夫的信

(1945 年 12 月 18 日)

于贝尔格莱德市

秘密

分送:维·莫洛托夫、B.杰卡诺佐夫、A.拉夫里舍夫。归档。

关于南斯拉夫制宪会议选举后的形势(情报)

致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制宪会议选举和共和国宣告成立巩固了南斯拉夫的国际和国内地位,充分显示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解放斗争中诞生的民主制度的威力和强大生命力。

一、南斯拉夫人在对外政策方面感觉自己更有信心了。他们正确地认为举行制宪会议选举和宣告共和国成立是在确立新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他们把这一胜利与苏联积极支持新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相联系。这一看法不仅存在于国家的统治集团,而且也存在于广大的民主知识分子阶层和人民当中。选举结束后,农业部长瓦索·丘布里洛维奇就马上拜会了我。他是农业党成员,而且一直持观望态度。选举后,他首先来到大使馆,其目的就像他说的那样,是为了谈一谈他对南斯拉夫外交形势的印象。他声称,直到不久前,在南斯拉夫领土上依然存在着苏联和西方盟国外交政策路线的对立,这种冲突在国内可以强烈地感

觉出来。但现在可以说,这种冲突以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胜利而告结束,而且对立的路线现在已经转移到了匈牙利、法国和罗马尼亚等国家。

在与大使馆参赞科热夫尼科夫同志的交谈中,米洛凡·吉拉斯声称,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南斯拉夫玩弄了一场反对苏联的大游戏。在这场游戏中,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格罗尔① 和南斯拉夫其他反动分子,然而他们却遭到了沉重的外交失败,没有能阻挠制宪会议的选举、召开和宣告联邦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吉拉斯说,英美人的这一失败是苏联毫不动摇地支持新南斯拉夫的坚定的外交政策的结果。

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南斯拉夫社会舆论对国内最新事态的总评价。

贝尔格莱德的气氛与全国各地一样,其特点是相当平静。而且还意识到,一直密布在南斯拉夫上空的阴霾有些已经移出它的边界。

从英美报界的基调及在这里的英美代表人物的所作所为判断,同盟国大概已决定容忍在南斯拉夫出现的政治变化。众所周知,对下议院提出的问题,即英国政府是否准备承认南斯拉夫,贝文② 借口官方没有得到这一问题的信息而回避做出回答。然而,英国,还有美国,与南斯拉夫官方的外交关系,在该国废除王位、宣布成立共和国之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路透社驻外工作人员在 11 月 30 日发出的一条信息说,伦敦正式认为,虽然宪法变了,但对铁托元帅政府的承认依然有效。

据现有情报表明,在贝尔格莱德的英国代表所要达到的目标只是使立宪会议任命的新政府承担起南斯拉夫的旧有义务。看来,与此相关的是英国人一方面对南斯拉夫国家制度的改变不急于做正式决定,而另一方面却开始了与南斯拉夫政府的经济谈判。

主要问题是英国人提出要求承认他们在特列普查矿山的租赁公司。

---

① 米朗·格罗尔(1876—1952),战时加入了南斯拉夫流亡政府,1945 年 3 月任联合政府副总理。1945 年 8 月提出辞职,并成为 1945 年秋天成立的公开反对党的领袖之一。1945 年 11 月议会选举失败后,格罗尔放弃政治活动,从事戏剧学研究。

② 欧内斯特·贝文(1881—1951),时任英国工党政府外交大臣。

据贸易和供应部部长彼得罗维奇声称,南斯拉夫政府不打算承认英国人对矿山的租赁权,但同意赔偿他们在特列普查投资上的损失。

很显然,英国人拖延正式承认南斯拉夫共和国的目的在于借此保护和巩固自己在南斯拉夫的经济地位。

二、人民阵线的胜利使反对派的活动陷于瘫痪。正如前摄政王曼迪奇在与我交谈时所说的那样,"反对派被轻易地消灭了"。它的全部计划都寄托于外来干涉,但这一点却没有发生。有些反对派代表就此对英国人进行了指责,并且声称后者背叛了他们。

据特别来源的情报称,格罗尔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灰心丧气的人。在一次谈话中,他认为英美与苏联之间在不久就会发生战争,而且无法避免。人们证实说,格罗尔本人就希望这场战争。因为他预料盟国会获胜,同时还希望这一胜利会使他重新上台。

今年 11 月底,在萨格勒布举行了前克罗地亚地区农民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共计 50 人。而作为会议的召集人和会务工作主持人的有舒巴希奇、舒特伊和扬奇科维奇。有关恢复舒巴希奇和舒特伊领导的克罗地亚农民党以及有关出版党报的问题是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与会者指出,党的纲领应当建立在忠诚现政府的进步反对党的原则之上。有些与会者则声称,他们认为舒巴希奇及其追随者没有在制宪会议上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是一个错误。按照他们的推测,这个名单会得到克罗地亚 25%～30%的选票。与会者似乎一致表示要参加下一次克罗地亚代议机关的选举。

三、早先从各种来源获得的消息说,人民农民党领袖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力图在人民阵线内部组建反对派,这一消息大概是可靠的,并且从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在 12 月 11 日宪法委员会会议的发言中得到了证实。他这种典型的耍两面手腕和伪善的讲话有以下几点内容。他首先声明,提出的宪法很好,符合人民阵线的纲领,然后他就转到大谈特谈自己的怀疑和批评意见,以及各种警告,等等。同时他还声称,一些老的"历史上的政党"在选举中遭到失败是因为共产党人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拙劣地利用了他们。在人民阵线中,这些党仅仅是"抬水的木棍"。在提出的宪法

草案中,甚至都没看到留给其他政党的位置。该草案是毫不声张地根据一党制原则制定的,在苏联坦率和公开通过的内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做起来却要躲躲闪闪。但是,德拉戈留布认定是"国家主义"的一党制却不符合南斯拉夫各民族,尤其是塞尔维亚农民的心愿和传统,他坚持要避开这种制度,进而避免新的国家制度与法西斯主义和中世纪野蛮政权的雷同。这样,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就以毫不含糊的口气将我们的国家制度与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迄今为止,格罗尔及其同伙还没有发表过如此公开的反苏声明。

谈及国家生活中自由与统一的关系问题,约万诺维奇也在国家主义、依靠自由——一些民族、政党及个人的自由、保证统一方面,对共产党人进行了指责。

在对外政策方面,约万诺维奇指控共产党人奉行有利于苏联的偏向政策。他认为这将会引起西方世界对南斯拉夫的敌视。在约万诺维奇看来,共产党人奉行的对内政策是无异于使南斯拉夫苏维埃化的路线,它也会受到西方盟国的敌视。

谈及国家的经济结构,约万诺维奇表示反对经济全面国有化的倾向。他同时认为这为资本主义世界对南斯拉夫的进攻打开了一个缺口。他还主张新宪法要保证全体公民的劳动权利。

约万诺维奇证实说,宪法草案的一部分将难以在南斯拉夫民族中通过,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他们历史上形成的特点以及他们的党政传统,这些民族将会感到自己被蒙骗。因为在亚伊策召开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他们得到民族自决权,包括从南斯拉夫分离出来的权利,宪法草案并没有为他们的这种权利做出规定。

谈及农民问题,约万诺维奇对目前对待农民立场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他表达的内容大致如下:农民从事的一切就是要开展独立运动,不仅是经济独立,而且还包括政治独立。他们没有被破坏统一的言词所迷惑,他们拥护与城市工人的联盟,但联盟就意味着平等。如果达不到这一点,那他们就会寻找其他方法和其他途径,以保证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特征。

卡德尔、皮雅杰以及克罗地亚共和国农民党主席、农民联盟执行委员

会瓦索·丘布里洛维奇等人都对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的言论进行了批评。

约万诺维奇针对批评指出，人们没有正确理解他，他并没有提出什么原则性分歧意见，他从总体上是拥护宪法草案的。但他同时指出，他引用的所有论据都是有效的，而且对自己的任何一个观点都不会放弃。

因此，德·约万诺维奇的发言实际上证明了人民阵线内部已经从思想上出现了新的反对派。这时，它的行动纲领实际上与格罗尔的纲领相一致，其基本路线也已确定了下来。正如从约万诺维奇的声明中看到的那样，新的反对派指望从外部得到西方盟国的支持，在内得到富农的支持。但目前事态仅限制在反对派思想、行动纲领的出现，还没有形成组织。德·约万诺维奇在没有得到支持和同情后，就决定后退，并投票赞成通过宪法草案。他正在进行积极有效的工作，成立广泛的反对派集团。他正在从事两方面工作，首先是实现农民联盟和由他领导的人民农民党的合并；其次，他开始致力于建立有农民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及民主激进党参加的所谓“民主联盟”。

会谈的结果目前尚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激进分子似乎已拒绝参加这一联盟。

新的反对派的前景如何呢？

当然，“农民反对派”将比“格罗尔反对派”有力，但是未必能在议会和国内产生大的影响。

议会两院中只有 10 名人民农民党选出的代表，但据卡德尔说，其中共产党员代表就占了 4 名。如果约万诺维奇转到反对派方面去，那么他也许会从自己党内拉走 4～5 人，从共和党拉走了 3～4 人，以及从其他政党拉走若干人。因此，在议会中他将成为无足轻重的少数派。

共产党采取措施的目的在于防止农民联盟与人民农民党的联合，同时还在于使人民农民党发生分裂，并且将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本人开除出党。共产党人这些努力的最终结果如何还难以评估，但这方面的一些成效已经显现出来。

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

И.萨德奇科夫

8 斯大林与铁托会谈的苏方记录

(1946年5月27日)[①]

机密

参加者

苏联方面有:维·米·莫洛托夫,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A.И.拉夫连季耶夫[②]

南斯拉夫方面有:内务部部长亚·兰科维奇[③],总参谋部参谋长科·波波维奇[④],塞尔维亚部长会议主席涅什科维奇[⑤],斯洛文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基德里奇[⑥],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弗·波波维奇

会议开始时斯大林同志问铁托,如果今后将的里雅斯特的法律地位

---

① 根据《斯大林接见人员登记册》的记载,会谈从1946年5月27日23时持续到5月28日0时30分。

② 此时,拉夫连季耶夫已接替萨德奇科夫出任大使。

③ 亚力山大·兰科维奇(1909—1983),时任南共中央执行局主管组织和干部工作的书记,南斯拉夫内务部长。

④ 科查·波波维奇(1908—?),1945~1953年任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长。

⑤ 布莱哥耶·涅什科维奇(1907—?),塞尔维亚共产党中央书记。

⑥ 鲍里斯·基德里奇(1919—1953),1946年6月出任南斯拉夫部长会议经济委员会和计划委员会主席。

确定为一个自由城市，① 那么所指的仅仅是市区呢，还是也包括了市郊地区，怎样一种法律地位好一些呢？是照梅梅尔模式，还是照但泽模式呢？②

铁托回答说，有一些斯拉夫人居住在市郊。所说的可以只限于市区。但他希望继续坚持把的里雅斯特列入到南斯拉夫的组成之中。随后，铁托以南斯拉夫政府的名义向维·米·莫洛托夫同志表达了谢意，感谢苏联代表团在巴黎外长会议审议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边界问题时所给予的支持。③

莫洛托夫同志询问了梅梅尔和但泽在法律地位上的区别；他指出，梅梅尔模式的法律地位比较好。

斯大林同志问铁托，南斯拉夫工农业的情况怎样。

铁托回答说，所有的土地都种上了，可以指望有一个中等的收成，并说，工业方面搞得是好的。

---

① 的里雅斯特是亚得里亚海沿岸城市，原属奥匈帝国，1918 年为意大利占领，其绝大部分居民是意大利人，后来，邻近地区的大部分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也迁居到此。1945 年 5 月初南斯拉夫军队突破德军在意大利的防线，与西方盟国军队在索查河会师，共同占领了的里雅斯特市，但双方关系日趋紧张。5 月 12 日和 15 日，杜鲁门以及英美政府接连照会南斯拉夫，要求南斯拉夫军队限期撤退。5 月 19 日铁托代表南政府声明："南斯拉夫有权留在自己解放的国土上。"5 月 22 日占领军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当时，苏联政府对此保持缄默。6 月 2 日英美政府再次发出照会，要求南斯拉夫撤军。6 月 9 日南斯拉夫被迫与英美达成撤军协议，但未放弃对的里雅斯特的主权要求。此后，苏联在国际会议上支持南斯拉夫的要求，建议的里雅斯特市在南斯拉夫联邦国家的范围内作为一个独立的联邦存在，而将的里雅斯特港口确定为自由港。西方大国反对将的里雅斯特及其附属地区划入南斯拉夫，提出将的里雅斯特及周围的地区作为"自由的城市"。稍后，在 1946 年 6 月底，这样的建议由法国提出来了。

② 梅梅尔为波罗的海港口城市，1525 年归属普鲁士公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凡尔赛和约规定，暂由国际联盟共管。后根据国联 1923 年决定归属立陶宛，有关公约规定，梅梅尔在实施内部管理方面享有立法等广泛的自主权，但不能超出立陶宛的宪法范围。1940 年立陶宛加入苏联后，改名为克莱佩达。但泽原称格但斯克，1793 年起被普鲁士占领，改名但泽。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根据凡尔赛和约，但泽成为由国际联盟托管的拥有自己的立法和权力机构的非军事自由城市，但波兰享有其对外联系和经过其领土的铁路和水路交通线的监控权。

③ 在 1946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16 日的巴黎外长会议上，的里雅斯特及周围地区的归属问题是审议对意大利的和约时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以莫洛托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积极地支持了南斯拉夫的领土要求。但在 7 月举行的巴黎和会上，莫洛托夫在没有满足南斯拉夫提出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单方面同意了法国提出的自由区方案，引起南斯拉夫的强烈不满。

随后,斯大林同志建议铁托谈一下南斯拉夫代表团今晚想讨论的问题的范围。

铁托提出了以下一些问题: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经济合作、军事合作,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关于经济合作问题,铁托说,南斯拉夫不愿意向美国借债。如果美国同意提供借款,那么就会同时要求南斯拉夫在政治上作出让步。要进一步发展工业,南斯拉夫没有钱。南斯拉夫很希望从苏联方面得到援助,特别是通过建立苏南混合公司。南斯拉夫有各种丰富的矿藏,但它无法组织生产,因为没有所需的各种机器。其中,南斯拉夫也有石油,但是没有钻探机。

斯大林同志说道:"我们来帮助。"

对斯大林同志关于南斯拉夫是否出产铝、铜和铅的问题,铁托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南斯拉夫有很多铝土矿和各种矿石,可供生产这些金属。

斯大林同志说,外贸部曾多次向南斯拉夫人提出,他们准备就组织合营公司问题进行谈判,但没有从南斯拉夫人方面得到肯定的回答。因此,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南斯拉夫不愿意成立这些公司。①

铁托表示异议。他说,与此相反,他曾不止一次地向萨德奇科夫大使谈到,南斯拉夫政府希望建立苏南合营公司。

斯大林说,在建立苏南合营公司之后,是否有必要准许其他大国也加入南斯拉夫的经济。对此,铁托回答说,南斯拉夫政府不打算让其他大国的资本进入自己的经济。

随后,作为简明的归纳,斯大林同志说道,就这样吧,就在建立合营公司的基础上来考虑苏南经济合作的问题吧。

铁托对此表示确认,说道,他打算在明天就这一问题以书面的形式提

---

① 1945年春,南斯拉夫提出采取租让形式请苏联参与开发南斯拉夫的自然资源。苏联方面同意参与开发,但要求采取合营公司的方式。不久,南斯拉夫表示同意。1946年4月新任大使拉夫连季耶夫到贝尔格莱德后,苏南双方开始谈判,但在谈到第一个合营公司——航空公司时,就出现了分歧。南斯拉夫的代表拒绝接受苏联的草案。铁托表示,这个问题将推迟到在莫斯科进行讨论。

出自己的建议。①

关于军事合作问题，铁托说道，南斯拉夫政府希望为南斯拉夫军事需要而得到的苏联的供应，不是采取相互贸易的结算方式，而是以贷款的方式进行。南斯拉夫的军事工业不大，它能够生产一些迫击炮、地雷。在很多地方干部是有的，但是没有相应的设备，因为这些设备都被德国人运走了。南斯拉夫政府希望作为赔款，从德国得到一些机器，以便恢复一些军工厂。但南斯拉夫本身毕竟无法满足军工的需求，因此，在这方面南斯拉夫政府寄希望于苏联的援助。

斯大林同志说，南斯拉夫理应有一些军工厂，例如有一些飞机厂，因为南斯拉夫人在拥有丰富的铝土矿的条件下，是有能力生产铝的。同时，也需要有一些生产炮兵武器的工厂。

铁托说，要是能够在苏联铸造炮筒，而在南斯拉夫进行加工，那就好了。

在涉及领海疆界问题时，斯大林同志说，要保卫领海疆界，就需要有一支优良的海军。要有鱼雷艇、护卫舰和装甲舰。尽管苏联在这方面也还薄弱，但是，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我们给以帮助。"②

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斯大林同志指出，阿尔巴尼亚内部的政治局势现在还不明朗，有消息说，那里在共产党政治局和恩维尔·霍查之间出了一些什么问题。传来的消息说，科奇·佐泽希望在党代表大会之前来莫斯科，以便观察、分析、研究某些问题。恩维尔·霍查也表示希望与佐泽一道来莫

---

① 第二天，南斯拉夫代表团提交了以苏联对外贸易部的协定草案为基础的修改草案。6月8日苏南签署了经济合作协定。协定规定将在南斯拉夫建立八个合营股份公司，但成立公司还需要单独签订具体的协定。后来由于苏南谈判中的分歧，到1947年2月只签订了建立两个合营公司——航空公司和多瑙河航运公司的协定。

② 苏联报纸对访问结果是这样报道的："苏联政府同意在长期贷款的条件下供给南斯拉夫军队武器、弹药等，以及协助恢复南斯拉夫的军事工业。"但实际上签署具体协定还要进行专门的谈判。

斯科。①

斯大林同志问铁托,他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情况是否知道些什么。

铁托在这些问题上显得好像消息不很灵通,他回答说,霍查打算在近期内到贝尔格莱德。因此,铁托认为,应该这样答复阿尔巴尼亚人:关于佐泽和霍查前往莫斯科的问题,待霍查去贝尔格莱德之后再加以研究。

莫洛托夫同志说,我们曾经多次制止阿尔巴尼亚人前来莫斯科的意向,但阿尔巴尼亚人始终坚持这一点。

斯大林同志指出,阿尔巴尼亚人前来莫斯科,在英美方面可能引起不良的反应,而且这将加剧阿尔巴尼亚外交局势的复杂化。

接着,斯大林同志问铁托,恩维尔·霍查是否同意阿尔巴尼亚作为联邦成员加入南斯拉夫。

铁托作了肯定的回答。②

斯大林同志说,目前要同时解决这样两个问题,即阿尔巴尼亚加入南斯拉夫联邦的问题和的里雅斯特的问题,对南斯拉夫来说将是困难的。

铁托对这一意见表示同意。

因此,斯大林同志进一步说,最好首先讨论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友好互助问题。

铁托说,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应该对保卫阿尔巴尼亚的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预先作出规定。

斯大林同志说,应该为这一条约找到一种形式,以便使阿尔巴尼亚更

---

① 恩维尔·霍查(1908—1985),阿共中央第一书记,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科奇·佐泽(?—1949),阿共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书记,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当时,霍查与佐泽之间矛盾很深。阿共中央原定1946年5月25日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但一直没有召开。1948年11月阿共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佐泽作为铁托分子被清除出党,并于1949年被判处死刑。

② 早在战时,南共便对阿共有着重要影响。战后,两国领导人均有结成联邦的想法。1946年3~4月双方商定霍查将访南,并签订南阿友好条约,其中包括经济合作协定和简化边界制度的协定,同时还签署一个秘密军事协定。4月22日铁托将这一情况通报给苏联大使,并透露了南阿结成联邦的意向。苏联方面研究后认为,阿加入南联邦的事情应推迟,简化边界制度的协定和秘密军事协定也不宜签订。5月7日拉夫连季耶夫通知铁托,苏联希望他提前访苏,并在莫斯科专门讨论南阿条约的问题。

接近南斯拉夫。①

斯大林同志提到了保加利亚加入联邦的问题。

铁托说,搞联邦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斯大林同志随即甩出一句反驳的话:“这件事应该做。”

铁托声称:搞联邦之所以不会有结果,因为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除此之外,在保加利亚,其他一些政党的势力是很大的,可是在南斯拉夫,尽管存在着其他一些政党,但全部政权实际上都在共产党的掌握之中。

斯大林同志说,对这个问题不必担心。起初可以局限在友好和互助条约的问题上,而实质上应该做得更多一些。

铁托对此表示同意。

莫洛托夫同志说,目前可能会发生一些困难,因为同保加利亚还没有缔结和约。保加利亚可以被视为前敌对国。②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不应该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大家知道,苏联已经与波兰订立了友好条约,但当时波兰还没有被其他国家所承认。③

随后,斯大林同志对会谈是这样归纳的:他说,南斯拉夫政府在经济问题和军事问题方面所考虑的那些事情,都是可以办成的,现在有必要成立一个委员会,以便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

铁托向斯大林同志通报了南斯拉夫与匈牙利的关系问题,并通报了

---

① 莫斯科会谈的结果体现了苏联的意图,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联合的问题被暂时推迟了。与此同时,苏联准许南阿签署友好互助条约和经济合作协定,赞成阿尔巴尼亚接近南斯拉夫的方针。1946年6月底霍查访问莫斯科,7月初南阿签署了有关文件。

② 自1944年底以来,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共产党领导人就开始进行了有关两国结成联邦的谈判。这些谈判是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或经斯大林批准而进行的,当时斯大林表示必须加快成立联邦。但是,西方盟国对此坚决反对。1946年初,保加利亚重新提出关于成立联邦的问题,对此,苏联和南斯拉夫都强调应在缔结对保和约以后进行。铁托访苏期间,苏、南、保三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确定南保之间将真正实现最密切的合作,但友好条约应在对保和平条约之后签署。

③ 苏联军队1944年7月进入波兰后,扶持波兰工人党等抵抗组织建立了临时政府。在1945年4月苏联与该政府签署友好条约时,西方各国支持的是波兰在国外的流亡政府。

拉科西[①] 贝尔格莱德之行的情况。铁托说，南斯拉夫政府决定不在外长会议上提出南斯拉夫对匈牙利的领土要求问题（对班斯克三角地区的要求）。[②] 铁托对南斯拉夫与匈牙利签订了关于赔款支付问题的协议表示满意。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匈牙利希望与南斯拉夫保持和平关系，那么，南斯拉夫应该支持这种愿望，因为他注意到，对南斯拉夫来说，所存在的基本困难是在与希腊和意大利的关系问题上。

（拉夫连季耶夫记录）

---

① 马加什·拉科西（1892—1971），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匈牙利政府副总理。

② 战争后期，南斯拉夫曾向苏联提出南斯拉夫对匈牙利的领土要求问题。1946年4月底拉科西访问贝尔格莱德，并与铁托讨论了这一问题。铁托表示，如果给予在匈牙利的少数民族以民族权利，并保证南斯拉夫在边界地区的经济利益，他们不准备在外长会议和巴黎和会上提出对匈牙利的领土要求。拉科西对此表示同意。

9　斯大林与铁托会谈的南方记录

(1946年5月27日)

于克里姆林宫

〔参加者:〕

斯大林、莫洛托夫、拉夫连季耶夫

铁托、马尔科①、科查②、弗拉多③、基德里奇、涅什维奇。

斯大林:“都是漂亮的人,强壮的人。”

〔斯大林:〕“坚强的人民。”

莫洛托夫:点头表示同意。

斯大林:他问,我们一路上怎样。

铁托(说),很好……

斯大林(微笑着,讥讽地说):“我的‘朋友’舒巴希奇怎样啊?”

铁托(也同样微笑、讥讽地)〔说道〕,他呆在萨格勒布。还有格罗尔。

斯大林(以同样的表情):“那么我的‘朋友’格罗尔的情况怎样呢?”

铁托(以同样的表情):“他在贝尔格莱德……”

〔铁托:〕要随时制服他们,我们是有办法的。那些政党只是形式上存在,而事实上并不存在。事实上存在的只有共产党。斯大林对这一说法愉

---

① 马尔科是兰科维奇的化名。

② 即科查·波波维奇。

③ 即弗拉迪米尔·波波维奇。

快地笑了。

斯大林:“收成怎么样?”

铁托:“会非常好。地种得很好。在那些缺粮地区也不错。不需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帮助。水果会有很多的。”

斯大林:“你们全都种上了吗?”

铁托:“全都种上了。”

斯大林:“你们的计划怎样呢?你们打算提出什么问题〔来讨论呢〕?”

铁托说有经〔济〕和军事问题。

斯大林在整个过程中都说:“我们给予帮助!”

〔斯大林:〕“卡德尔和吉拉斯的情况怎么样?”

铁〔托〕:“很好。我们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来,即使这样,已经半个政府在这里了。”

斯〔大林〕:“英国人和美国人是不愿意把的里雅斯特让给你们的!”(微笑着说)

铁〔托〕:他对支持表示了感谢,〔说道〕,人民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致敬,〔他谈到〕〔苏联的支持〕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莫洛托夫:“但是的里雅斯特你们还没有……”

铁〔托〕:尽管如此,〔苏联的支持〕仍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在铁托……的过程中。

1946 年 5 月 27 日 23 时

10　斯大林与铁托会谈的南方记录

(1946年6月9日)

续(8~9日夜晚,1~3时之间记录)。①

(1)　斯〔大林〕:“我们方面曾经向你们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提出过一个建议,但既然你们不同意成立合营公司,既然你们不愿意,对此我们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比〔如〕,波兰人也不愿意,是因为美国方面没有提出成立合营公司的问题。”

铁〔托〕:“不,这既不是我的意见,也不是其他领导人的意见,〔相反,我们认为〕,这是应该的。”

(2)　斯〔大林〕:“……我同意建立这些公司,正如你们……”(莫〔洛托夫〕:“就在那些对你们和我们都最有利的部门……”)

斯〔大林〕想知道,我们这里石油、铝矾土的产地在什么地方。“你们有优质的铝矾土。”铁托解释说,产地很多,如博尔、特列普奇、拉沙,并说,我们有很好的煤,但不是供高炉用的焦炭。

(3)　莫〔洛托夫说〕,为了得到拉沙,意大利有一个经济上的理由,即如果没有拉沙,意大利只能满足自己需求的20%。

---

①　这里当指6月8日至9日夜间。铁托是在6月10日结束访问的。据当时的报道,斯大林6月8日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南斯拉夫代表团全体成员。根据习惯,斯大林会在当天夜晚举行小范围的宴会。过去,据参加会谈的科查·波波维奇回忆,以为这次谈话是在5月27日夜间进行的,显然是有误了。

(4) 军队。

斯〔大林〕:“这是对的,如果发生战争,由于供应困难,在国内的军事工业应尽可能多一点。最好是发展航空工业,并重视铝矾土的产地,而对于炮兵部队来说,要在国内加工锻件。”

斯〔大林〕:“为了保卫沿岸一带,必须建立快速、轻便和灵活机动的舰队,因为意大利有相当强大的海军(大概有两个分舰队)。”

铁〔托〕:“……在科托尔湾①,可以部署 30 000 吨的战舰。”

斯〔大林〕:“现在都在生产 60 000 吨的战舰了。可是,我们目前在建设舰队方面困难很大,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帮助你们。

“我同意,我们帮助你们,为弹药工厂和轻射击武器工厂提供设备。同时,我们要派干部帮助你们,他们将帮助建立军官进修学校,这种学校过一两〔年〕可以成为学院(就像伏龙芝军事〔学院〕的级别)。

“对南〔斯拉夫〕军〔队〕的供应,将在贸易条约之外,也就是说,以直接提供贷款的方式给予。

“希望你们有一支海军,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将帮助你们建设造船厂和基地,以及培训相应的海〔军〕干部。

“我们将帮助开采石油。

“建弹药工厂的同时,重建军火库很重要。在这方面我们同样给予帮助。应该研究一下建设飞机发动机工厂的可能性。”

(5) 阿尔巴尼亚。

铁〔托〕(谈到海军问题):“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与阿尔巴尼亚及沿岸一带地方是否存在边界问题。”

斯〔大林〕:“您的具体建议是什么呢?”

铁〔托〕:“应该缔结一个较好的协定,以此来帮助阿尔巴尼亚人维护独立,这在有来自海军方面威胁的具〔体〕情况下,是会有帮助的。”

斯〔大林〕:“这是一个新的形式,不过需要考虑一下,并对此进行仔细的研究。你们与捷克签订了一个很好的协议,而且找到了一种很好的表达

---

① 南斯拉夫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海湾。

方式,即不仅反对战时的德国及其盟国,同时也反对其未来的盟国。[①] 因此需要再考虑一下,以便找到一个相应的表达方式。

"对于联邦问题,现在不是时候(即使是与保加利亚)。现在主要的是关于的里雅斯特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应该首先解决。但是,既然你们希望现在就签订协议,那么可以两件事情(的里雅斯特和阿尔巴尼亚)同时办。"(这时他微笑了)[②]

铁〔托〕:"我们已经三次推迟了恩维尔·霍查的贝〔尔格莱德〕之行,因为我们考虑到同您的这次会见。总的来说,我们打算与阿尔巴尼亚缔结一项保障'主权'的协议。"

斯〔大林〕:"您是否了解恩维尔?他是怎样一个人?他是共产党员吗?他们内部是否也有一些问题?你们得到了什么情报?"

铁〔托〕:"我没有见过恩维尔·霍查。他是个年轻人,但在战争中已经开始出名了……

"我们要签订一个协议,并为进一步完全的接近创造条件。"

斯〔大林〕:"我同意。"

铁〔托〕:"……总的说来,领导层中都是一些年轻人。据我们所知道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斯〔大林〕:"他们曾极力设法要到这里来,但不愿意让恩维尔一个人来,还有科奇·佐泽想跟他一道来,像是监督人员一样。对此你们知道些什么情况吗?"

铁〔托〕:"〔无论是这个问题〕,还是存在什么分歧的问题,我们的消息都不灵通。"

斯〔大林〕:"我们一再推迟他们来访的事。你们是怎么看的呢,是否有必要由我们来接待他们?我们觉得,没有必要。"

---

① 1946年5月9日南斯拉夫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友好互助合作条约,但没有提及德国战时的同盟者。条约中写的是:缔约国的双方,"如果其中一方由于德国试图恢复自己的侵略政策而处于与其的敌对状态,或者与其他在侵略活动中与德国相勾结的国家处于敌对状态,那么,另一方将尽全力给予军事的和其他的援助"。

② 档案原件在这里有一个问号。

铁〔托〕:“是啊,我们是能够同他们一起解决各种事情的。”

斯〔大林〕:“现在,无论是对他们,还是对我们,都是不方便的。我们最好是通过你们来帮助他们。”

斯〔大林〕:随后他表示怀疑说,在阿〔尔巴尼亚〕政治局里好像有一些不正常。

马尔科:“政治局里有一些同志认为恩〔维尔〕·霍查不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党员,因为他经常坚持要科奇·佐泽作为政治局里最老的一名党员跟他一道外出。在4月全会上,他们讨论了路线问题,特别是南斯拉夫和苏联关系方面的问题,并查明了一些明显的错误,作为这些错误的代表者,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被开除出了政治局。① 从此,领导人之间就比较紧密了。”

铁〔托〕:“这个问题我们是能够和他们一起解决的。”

斯〔大林〕:“好。”

(6) 保加利亚。

斯〔大林〕:“现在你们是否值得同保加利亚搞联邦?”

铁〔托〕:“不,现在不是时候。因为有不少事情,他们做得还不是很彻底。比如,军队,一些资〔产阶级的〕政党,君主政体,还有签订和约之前的保加利亚的一些情况。”

斯〔大林〕:“对,不过应该帮助他们。”

(7) 匈牙利。

铁〔托〕:“我们没有任何领〔土〕的要求。自从那里内〔部〕的政〔治〕形势改善之后,我们放弃了领〔土〕的要求,这也是遵照了您的建议。”

斯〔大林〕:“对呀。如果你们与北〔方〕邻居关系良好,那么,即使希腊会对你们另眼相看……可是,希腊在与南斯拉夫关系方面是否提出了什么要求吗?”

铁〔托〕:“在与我们的关系方面,曾经发生过多次挑衅行为,但近来没有。”

---

① 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1900—?),阿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领导经济工作。

斯〔大林〕:“英〔国人〕在那里保持着军队,目的在于巩固反动势力。是啊,可能,还有其他目的。”

铁〔托〕:(笑了起来)“在对他们的关系方面,我们有一些要求,即爱琴马〔其顿〕和萨洛尼卡。”①

莫〔洛托夫〕:“对,萨洛尼卡,一个古老的斯拉夫城市。应该出现在爱琴海。”

斯〔大林〕:“真见鬼。有好多同志都到保〔加利亚〕去了,可是在那里应该进行的没有进行,应该发展的没有发展。共〔产党员〕是有影响的,但是在国〔家〕机关中,他们没有相应的地位。

“由此,我们应该向他们指出,希望他们把斯塔伊诺夫② 撤了。现在,我们在那里的外交部只有一位秘〔书〕。”

铁〔托〕:“以后我将向拉科西说明一下,由于战略的原因,我们需要佩奇③,同时要帮助匈〔牙利〕的共产党人,因为反动势力正在开始抬头。”

斯〔大林〕:“难道他们会相信你们吗? ……”斯〔大林〕:“那么,今天晚上你们还有什么进一步的计划吗?”

铁〔托〕:“我们没有〔计划〕了。”

斯〔大林〕(笑):“一个没有国家计划的政府!”(笑)

弗拉多:“同您会面,我们就听从您的安排了。”

斯〔大林〕:“那么我们可以吃点东西了。”

莫〔洛托夫〕:“既然您邀请我们,那太高兴啦。”

在别墅里。

斯〔大林〕:关于陶里亚蒂④,是个理论家,新闻记者,会写一手好文章,是个好同志,但是要把人们团结起来,并为他们“指明方向”,这却不

---

① 马其顿地区位于巴尔干半岛中南部,南临爱琴海。1913年巴尔干战争后分属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希腊三国,分别称瓦尔达尔马其顿、皮林马其顿和爱琴马其顿。萨洛尼卡,即塞萨洛尼基,希腊爱琴马其顿境内的爱琴海港口城市。

② 斯塔伊诺夫(1890—1972),1944~1946年任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政府外交部长。

③ 指匈牙利南部临近南斯拉夫的佩奇市。

④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1893—1964),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行,那里的条件很困难。

多列士和杜克洛[①]都是好同志。

何塞(迪亚斯)[②] 是个好人,是个聪明人。

帕西奥纳丽娅[③] 就不是这样,她不能团结和指挥别人,在当前困难的情况下,她也没有领导能力。

罗马尼亚有一些很好的年轻的同志。

在联邦德国,皮克[④] 是一位好领导,是一位“老大爷”,他把人们团结起来,解决各种问题。……没有命令,德国人就不算什么了。

共产国际——没什么好说的。[⑤]

全民投票——“也不值一提。”[⑥]

战斗的各族人民,应该把希腊人吸引过来。[⑦]

“你们是否希望再来一次战争,再次落到你们的身上,叫斯拉夫人再丧失千百万人呢? 如果你们不希望的话,那么,斯拉夫人就应该同苏联结成统一战线。”

意大利有复仇的想法。

贝奈斯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当你向他显示出力量的时候,他是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他自我觉得是个强者时,他便是个理想主义者(这

---

① 莫里斯·多列士(1900—1964),法国共产党总书记。雅克·杜克洛(1896—1975),法共中央书记,是当时领导层中的第二号人物。根据参加会谈的科查·波波维奇回忆,斯大林谈到这里时还说:“多列士有一个很大的缺点:甚至一条不咬人的狗,在想吓唬人的时候也会露出牙齿,而多列士连这一点都不会。”

② 何塞·迪亚斯(1895—1942),1932年起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后在苏联去世。

③ 即多洛雷斯·伊巴露丽(1895—1990),在何塞·迪亚斯去世后成为西班牙共产党的总书记。

④ 威廉·皮克(1876—1960),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1946年4月,苏联占领区的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成德国统一社会党,他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两位主席之一。

⑤ 斯大林曾对保加利亚人说过:“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恢复旧形式的共产国际。”在同铁托的谈话中,斯大林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问题。

⑥ 1946年9月1日希腊将举行是否实行君主立宪制问题的全民公决。

⑦ 当时希腊国内政治斗争非常尖锐,1946年下半年,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支持和援助下,希腊共产党组织了反对希腊政府的武装起义。

是对铁托〔意见〕的回答:贝奈斯是英国的奴仆,但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费林格① 是会跟共产党人走的。"

捷克-波兰关系:捷申问题作为选举前的一种策略,已经证明,在此之后他们并未采取任何外〔交〕的措施。②

南〔斯拉夫〕的民主是一种特殊形式(非苏联形式),这一形式有别于其他所有的形式。

"我们是塞尔维亚人,我和莫洛托夫……我们是两个塞尔维亚人……"

"出卖灵魂的斯洛文尼亚知识分子。"

桉树。③

"但愿铁托多加保重,希望他不会有什么三长两短,……因为我将不久于世了……生理的规律……可是你将为欧洲活下去……"④

丘吉尔向他进述了有关铁托的情况……说他"是一个好人"。斯〔大林〕说:"我对他不了解,但既然您说了,那就是说,他应该是一个好人。我尽力去了解他吧。"⑤

---

① 兹德尼古·费林格(1891—1976),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出任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政府副总理、总理。

② 1946年4月24日,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向各大国提交声明,正式提出了对波兰边界地区,即捷申的西里西亚的领土要求。由于捷申所引起的捷波争端到1946年4~5月,即捷克斯洛伐克战后第一次选举的前夕,已经达到了顶峰。选举是在5月26日,即斯大林会见铁托的前一天进行的。在苏南会谈中,捷申问题显然是南斯拉夫客人提出的,因为在铁托赴苏前,波兰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曾请求他劝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放弃它所提出的领土要求。

③ 斯大林劝告南斯拉夫人种植桉树,因为这是造船用的最好材料。斯大林还答应送给南斯拉夫一些桉树苗。

④ 根据参加会谈的科查·波波维奇回忆,在午夜会餐时,斯大林站起来走到唱机前,开始一张盘接一张盘往里放,都是俄罗斯民歌。听到其中的一首歌,斯大林开始边舞边唱起来。莫洛夫托等人都用喊声迎合,并说斯大林身体的强壮。斯大林回答说,这是生理发展的规律,他将不久于人世。斯大林又补充说,铁托应该爱惜自己,他将为欧洲而活下去。

⑤ 这是斯大林在回忆1944年10月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访问莫斯科时的谈话内容。1944年8月丘吉尔曾与铁托见过面。实际上,斯大林在与丘吉尔谈话之前已经与铁托认识了,铁托曾于9月底秘密访问过莫斯科。

让德日多来吧，希望他来休息，他有……“我会医好他的头痛病的”。①

“贝文是英国的诺斯克。”②

弗拉多询问马尔科的情况，随后马尔科又询问弗拉多的情况。……

“贝利亚③ 和马尔科——谁将招募谁呀？”

① 德日多是吉拉斯的化名。斯大林从铁托那里知道吉拉斯有头痛病。

② 欧内斯特·贝文(1881—1951)，英国工党和工会领袖之一，1945～1951 年任外交大臣。古斯塔夫·诺斯克(1868—1946)，德国右翼社会党领袖，1919 年 1 月率军镇压基尔水兵起义和革命运动，并秘密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后任政府国防部长。

③ 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1899—1953)，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斯大林在孔策沃的餐桌上拿贝利亚和兰科维奇开玩笑，因为他们两人在国内都是主管安全机构的。苏联方面出席午夜宴会的，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以外，还有日丹诺夫、贝利亚、布尔加宁。

11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菲京关于南斯拉夫人民阵线内反对派活动给苏斯洛夫的报告

(1946年6月30日)

分送:安·维辛斯基　　绝密

致苏斯洛夫同志[①]

现将我们得到的关于南斯拉夫人民阵线内反对派分子活动问题的材料报告如下。

今年4~5月份,南斯拉夫人民阵线内反对派分子的活动进一步活跃。根据现有的材料,领导这一活动的是人民农民党领袖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他企图在人民阵线内建立一个由不满铁托政府政治路线的所有分子组成的集团。最近,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把除了本党右翼以外的克罗地亚共和国农民党和农业党的某些活动家拉到自己这一边。

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及其追随者认为,利用议会作为其派别活动的合法舞台是他们活动的任务之一。作为在这方面的活动之一,约万诺维奇在今年5月同克罗地亚共和国农民党和农业党中有敌对情绪的代表达成了关于在议会成立一个名叫"农民党代表俱乐部"的集团的协议。1946年5月23日,举行了该集团纲领的签字仪式。纲领的内容如下:

---

①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1902—1982),时任联共(布)中央书记。

一、我们建立农民党代表俱乐部是为了在整个联邦和每一个单独的共和国中保持和发展人民斗争的成果，保护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制定出建立在社会公正、自由和人道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农民意识形态。

二、参加我们俱乐部的只能是接受这一纲领的代表。

三、我们打算尽一切努力建立一个有统一领导的南斯拉夫统一农民党。

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及其支持者代表人民农民党，图纳·巴比奇代表克罗地亚共和国农民党，斯帕索斯·德米特罗维奇代表农业党，以代表小组的名义在纲领上签了字。

Π. 菲京

1946 年 6 月 31 日①

① 档案文献原文如此，根据文献排列位置，疑为 30 日之笔误。

12　拉夫连季耶夫与铁托关于反对派活动等问题的谈话(摘录)

(1947年4月2日)

摘自А.И.拉夫连季耶夫日记　　秘密

分送:维·莫洛托夫、安·维辛斯基、费·古谢夫、A.拉夫里舍夫。归档。

一、我提及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波波维奇、菲拉科维奇和托多罗维奇在3月29日南斯拉夫人民议会会议上的发言,指出反对派是在公开地使乡村与城市相对立。铁托说,他确信,这个发言恰恰满足了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要求。据他新掌握的情报,约万诺维奇本来并没有打算发言,只是到了3月29日,即发言的当天,才决定发言的。

按照铁托的话说,容许约万诺维奇集团进行活动,在当前可能会招致科舒季奇、舒巴希奇等集团更加积极起来活动。此外,铁托推测,美国人和英国人将努力促使各反动集团积极活动起来。因此,铁托打算逮捕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及其亲近的同谋者,因为现在有足够的理由把他们关起来。人民支持逮捕约万诺维奇并把他交法庭审判。通过国内现有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两个农民政党(统一农民党和克罗地亚共和国农民党)将可使农村把握住应有的方向。

今年由于粮食征购,富农的抗拒行为大为增加。有意思的是曾经发生了一些富农为抗议粮食征购而自杀的事件。本来还需要征购15万吨,不过这里包括一定的储备。全国食用将需要7万~8万吨。据铁托断言,国

家能够勉强度日。他再次强调说，塞尔维亚政府去年夏天和秋天曾试图证明按原定计划完成收购任务是不可能的，从而犯了严重的错误。而现在，在经过严肃的批评之后，塞尔维亚的领导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开始从那些已经无力再上缴粮食的人那里征购粮食，从而又发生了严重的过火行为。铁托已经指示要更加谨慎地执行粮食征购政策和必须确实是向没有完成缴售任务的富农户征购谷物。铁托已下令把富农们没有完成的缴售任务视为必须从今年的收成中清偿的欠缴税款。

铁托强调说，现在对春播秋种十分重视。各地都成立了机构，不仅负责监督所有耕地全部犁过一遍，而且要确保其深耕细作和精心播种。他不排除富农们有可能进行怠工和故意不好好播种。燕麦和马铃薯的种子供应将遇到困难。马铃薯已经向捷克斯洛伐克订购，预计近日内应当运抵南斯拉夫。玉米种子足够播种所需。

二、铁托告知我说，美国人提出要把监督勘定意大利－南斯拉夫临时边界四方委员会的工作也扩展到临时勘定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的疆界。按照同意大利签署的和平条约第5条，是有正式理由可以拒绝这一建议的。我问铁托，南斯拉夫政府对美国的上述建议意见如何。

铁托回答说，按照他的初步意见，把四方委员会的工作扩展到勘定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的临时疆界是不适宜的，因为现在尚不存在一个该区域的政府。他想先弄清楚需要移交的伊斯特拉西北部的情况，然后再给予确切的答复。

说到这里，铁托指出，南斯拉夫当局已着手拆卸沉没的意大利船只“列克斯”号。南斯拉夫可以拆下该船全部有价值的设备，但却未必能对船体本身有所作为，因为它深深地埋在淤泥之中。……

四、在谈到斯大林同志对拉津的信的答复[①] 时我提到了哈莫维奇在驻萨拉热窝第6集团军的一次图上作战演习期间所发表的意见。我指出，哈莫维奇把苏联军事条令说成是公式化的，并强调说，在采用红军的条令

① 指1946年2月25日斯大林对拉津上校和教授1946年1月30日来信的答复。拉津在信中提出了列宁的现实主义原理的问题，并建议用提纲的形式表达自己对战争和战争艺术的思想。

时倘若不加以正确的指导,将会全军覆没。哈莫维奇宣称,南斯拉夫军队应当研究其他外国军队的作战艺术,但他却只字不提研究苏联军队经验的必要性。对苏联军事条令的批评引起一些南斯拉夫军官对苏联军事学说的批评。例如,在1月份举行的一次军队会议上就已经提出,南斯拉夫应当有自己的军事条令,应当创立自己的军事学说。

铁托回答说,有人告诉他说,我们的军事顾问们对哈莫维奇的讲话很关心。他本人没有同哈莫维奇交谈过,但打算跟他谈谈。铁托认为哈莫维奇批评的不是苏军的条令,而是批评公式化地运用条令规定而不考虑山地作战环境特点的那些人。铁托评价哈莫维奇是一位谦虚的将军和热爱苏军的人。

铁托接着说,南斯拉夫军队只能向苏军学习。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自己的军事学说。德国人倒是有过,但是南斯拉夫人不能借鉴这一学说。南斯拉夫军队研究过并且将继续研究苏军的经验。不言而喻,南斯拉夫人同样也应当研究自己山地作战的经验。说要创立南斯拉夫军事学说的那位军人自己也未必懂得这句话的意义和内容。铁托认为,从内部组织结构的角度来看,南斯拉夫军队有某些特点。军队中有政治委员,因为军官们没有受到过做政治工作的培训。党组织在维护军纪和掌握作战艺术的工作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当时就对哈莫维奇讲话的看法问题同铁托进行争论是不适宜的(显然,铁托是根据总参谋长波波维奇向他提供的报告做出自己的评价的)。重要的是南斯拉夫人已经给自己做出了相应的结论。虽然如此,但我还是指出,党的组织在苏联军队中过去起过,现在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已为我们红军的历史所证明。我们现在没有设政治委员,但是设有政治副职,这是符合一长制原则的。

铁托抱怨说南斯拉夫总参谋部想尽办法也未能从苏联得到《军事思想》杂志。铁托曾两次重提此事并要求能给他本人寄一份这种杂志来。他特别希望一读的就是这份探讨军事战略方面极其重要的问题的杂志。我答应把他的要求报告莫斯科。

五、我问铁托,据他看,已开始播音的南斯拉夫秘密广播电台位于何

处。他回答说,最大的可能是在意大利,也可能在英国。按照铁托的说法,南斯拉夫的居民并不收听该台的广播……

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

A.拉夫连季耶夫

13　拉夫连季耶夫与卡德尔关于参加马歇尔计划问题的电话记录

(1947年7月4日)

摘自A.И.拉夫连季耶夫日记　　秘密

分送:维·莫洛托夫、安·维辛斯基、A.拉夫里舍夫。归档。

卡德尔给我打来电话说,鉴于各方面的新闻记者和外交官纷纷询问南斯拉夫在详细拟定美国向西欧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措施方面今后的立场,南斯拉夫政府打算发表一项声明。在此项声明中南斯拉夫政府打算指出:南斯拉夫不能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参加拟定这样的计划,因为英国和法国政府的建议是试图允许某些大国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并使小国的经济依附于这些大国,进而使小国丧失民族独立。卡德尔请求把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政府准备发表的上述声明的意见告知他。卡德尔同时指出,最好能在今天晚上就得到答复,因为南斯拉夫政府打算在明天发表这一声明。

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

A.拉夫连季耶夫

14 拉夫连季耶夫与卡德尔关于南斯拉夫干部政策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7年7月6~7日)

摘自 А.И.拉夫连季耶夫日记　　秘密

分送:维·莫洛托夫、安·维辛斯基、A.拉夫里舍夫。归档。

我在前往会见铁托的途中同卡德尔进行了交谈。

在谈及各人民共和国议会目前的人员组成情况时,我问卡德尔,在议会中有多少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代表。卡德尔回答说,这样的代表数量不多。他认为,按选举法编制的议会组成人员很少,这是一个错误。在通过各共和国选举法的时候,他(卡德尔)当时不在南斯拉夫国内,因而没能以某种方式就这个问题及时同铁托商讨并取得一致意见。因此当时开始实际草拟本届人民议会代表候选人名单的时候,就发现留给一线工人的代表名额太少了,因为当时需要把必要数量的席位提供给政府成员、党的领导人员、军队的代表以及其他党派。卡德尔认为,在下一次选举中此情况将得到纠正。

卡德尔认为今年秋季或者冬季将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将选出一个党纲党章起草委员会。卡德尔说,当前共有党员40万人左右。现在主要是通过接纳工人入党来壮大党的队伍。从前的情况曾经是:在拥有1 500~2 000名基本工人的工厂里党支部只有20~30人。现在情况正在改善。

据卡德尔称，正在认真采取措施以大力加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和各地方党委会机关。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没有增添。但是在审议重要问题时可以邀请将来有可能被吸收进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参加。茹约维奇只是中央委员，但不是政治局委员；乔拉科维奇不是中央委员；米霍·马林科是中央委员；巴卡里奇不是中央委员；涅什科维奇不是中央委员；莫萨·皮雅杰是中央委员。

卡德尔负责对外政策问题，同时也主管国家机关的建设问题；兰科维奇主管党的干部和党的机关的组织工作问题；吉拉斯负责宣传鼓动以及文化、教育问题。在基德里奇被任命为经济委员会主席之前，卡德尔曾用很多精力处理经济问题。现在负责此项工作的主要是基德里奇。

卡德尔预计，今年秋天将对政府各部进行某些改组。例如，矿产工业部将分为燃料工业部和冶金工业部。巴涅·安德烈耶夫将留任燃料部部长，而基德里奇有可能在继续担任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情况下同时又被任命为冶金工业部部长。将组建电气化部。彼得罗维奇将被任命为该部部长，他在从莫斯科返回后将被免去对外贸易部部长职务。据卡德尔说，彼得罗维奇没能确保对外贸易的必要开展，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仅完成了外贸计划的40%。该部的部长助理斯尔曾蒂奇也将被撤换。塞尔维亚监察委员会现任主席米伦杰·波波维奇将被任命为对外贸易部长。

卡德尔接着说，外交部仍然是一个工作很不得力的部门。西米奇无力对该部实施必要的领导。他是一名忠诚可靠的外交官，但是缺乏治国方面的领导经验。现任克罗地亚总理巴卡里奇本来是这一职务的合适人选，但是他的健康状况使他难以胜任此职。其他具备条件的现成人选眼下还没有。我指出，我头脑里形成的印象是西米奇工作干了很多，而且尽心竭力，忠于职守。卡德尔同意我的看法并补充说，实际上由于尚无合适的人选，近期内也未必会实施这样的撤换。

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
拉夫连季耶夫

15 拉夫连季耶夫与铁托关于阿—南争论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7年8月14～15日)

摘自А.И.拉夫连季耶夫日记　　秘密

分送:维·莫洛托夫、安·维辛斯基、A.拉夫里舍夫。归档。

一、在我同铁托在布尔多进行的交谈中,铁托对我说,在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的莫斯科之行之后,某些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开始对南斯拉夫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并且错误地评价南斯拉夫对阿奉行的友好政策。某些人说,南斯拉夫企图以低廉的代价染指阿尔巴尼亚,说南斯拉夫许诺的非常多,但是实际上却任何东西都不给。其实南斯拉夫之所以对阿尔巴尼亚表现出关注之情,也是从阿尔巴尼亚人民本身的利益出发,力求维护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南斯拉夫视阿尔巴尼亚为地理上和军事战略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地方,曾经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其中有货物,也有粮食,尽管南斯拉夫的反动势力积极利用这些措施来反对南斯拉夫政府。

铁托对纳科·斯皮鲁的立场表示特别不满,他认为此人在奉行使阿尔巴尼亚疏远南斯拉夫的政策。去年,纳科·斯皮鲁在南斯拉夫逗留期间曾经诋毁过恩维尔·霍查。可是现在他却又同恩维尔·霍查紧紧地搞在一起。去年,铁托曾对阿尔巴尼亚人说,恩维尔·霍查作为党的总书记,应当有与之相应的地位,也就是说,铁托曾帮助加强他的地位。铁托并不认为恩维尔·霍查是个耍两面手腕的人,但是据他的印象,霍查很容易受他人的各种

影响。铁托认为最坚定的和始终如一的领导人是佐泽。据铁托掌握的情报,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之间,工作中缺乏必要的步调一致。

铁托认为不可以让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两国之间产生不和。因此他认为非正式地邀请恩维尔·霍查和佐泽来南斯拉夫并同他们就此事进行交谈是适宜的。依照铁托的意见,应当向恩维尔·霍查和佐泽指出,不能把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看成是苏联希望阿尔巴尼亚疏远南斯拉夫的表现,而是恰恰相反,应当将其视为是对两个邻国之间亲密关系的促进。在这次会晤期间,铁托打算向阿尔巴尼亚人建议解除斯皮鲁的职务。毫无疑问,由于一些领导人对南斯拉夫采取的不友善政策,对南斯拉夫的不满情绪也将在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某些阶层中表现出来。关于这一点,铁托那里有一份由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代表提供的书面报告。

铁托请求告知他,苏联政府对拟议中的他同恩维尔·霍查和佐泽的非正式会晤一事的意见。

我答应将这一请求转告莫斯科。

二、我问铁托,粮食收购工作进展如何。铁托回答说,粮食收购计划虽然现在即将完成,但是富农阶级已经开始表现出政治性的抗拒。在伏伊伏丁那目前不得不采取行政措施——逮捕某些富农分子并处以罚金。

交谈时在座的斯洛文尼亚总理马林科说,在斯洛文尼亚,富农分子的抗拒表现为富农们不是一次缴清规定缴售的粮食,而是竭力拖延,尽管在数量上他们的缴售额并不很大。为了显示自己的抗议,某些富农故意少缴售二三千克,甚至是一千克。

三、据铁托告称:在克罗地亚,有四名天主教神父因为参加恐怖组织而被判罪。其中有两人被枪决。

四、10月2日将召开南斯拉夫民族阵线代表大会。铁托正在准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他打算申明:考虑到南斯拉夫当前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在民族阵线之外不能存在其他政治性党派。

民族阵线代表大会之后,在冬季,将召开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大会。

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

A.拉夫连季耶夫

16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整理的关于南斯拉夫现状的备忘录(摘录)[①]

(1947 年 9 月)

……南斯拉夫共产党组织上的建立,是在 1919 年 4 月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前社会—民主组织联合代表大会上。到 1920 年底,共产党已经拥有约 8 万名党员,并且拥有联合了近 20 万人的、在其影响下的革命工会组织。在 1920 年的立宪议会选举中,共产党得到了 59 个议员席位。

同年 12 月政府颁布命令取缔共产党和革命工会。自那时起至 1941 年,共产党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其成员均被罚以 20 年的苦役。由于党的领导层内渗入了工人阶级的敌人,在很长的时间里党内不断发生派别斗争。

1937 年底,以铁托同志为首的一批新人走上了党的领导岗位,从而使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工作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党的新领导人成功地消除了派别斗争,在民族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路线,防止了党的崩溃。进行了清党,清党后到 1938 年底党员总共仅剩下 3 500 人。在随后的数年中,党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大大加强了。

到民族 - 解放战争前夕,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已经更加巩固壮大,在

---

① 该报告是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为日丹诺夫在九国共产党波兰会议,即第一次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发言而准备的备忘录的一部分,标题为:《南斯拉夫经济与政治现状》。类似的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材料还有一些。在这些材料中,对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提出了批评意见,但是日丹诺夫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没有出现对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党的批评。

自己的队伍中已经有近1.2万党员。尽管人数不多,但共产党却是直至国家被德国人占领之前,一直在组织上保持为统一整体的惟一政党。

共产党同占领者和本国叛徒进行的英勇、忘我的斗争,它的反映劳动者利益的正确路线,确保了它在民族阵线中的绝对领导和在南斯拉夫人民广大阶层中的无可争议的威望。共产党乃是南斯拉夫人民公认的领导者。

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国家中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它在对待参加民族阵线的各党态度方面采取了独特的策略方针。它努力使民族阵线成为这样一种组织形式,使党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影响来掌握居民的广大阶层。所有关于管理国家的原则性指示均按民族阵线的组织系统下达执行。在整个战争时期以及在战争结束之后,在领导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方面,没有发布任何一项共产党的决定。

在南斯拉夫未公布过有关南斯拉夫人民议会和南斯拉夫政府中党员所占比例的材料。根据非正式的材料,在南斯拉夫议会中议员席位的70%以上是属于共产党员的。各共和国议会的绝大多数席位也同样为共产党员所占据。

南斯拉夫共产党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把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以及南斯拉夫军队中的所有重要岗位均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南斯拉夫政府中,共产党人领导着以下各部:总理兼国防部长——共产党总书记铁托;第一副总理兼监察委员会主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爱德华·卡德尔;内务部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书记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工业部长兼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鲍里斯·基德里奇;财政部长——中央委员会委员斯雷滕·茹约维奇[①];还有许多重要的部也是由共产党人出任部长的。非共产党人部长通常都配有一位共产党人做第一副部长,此人为自己所在部的活动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负全责。

---

① 斯雷滕·茹约维奇(1899—1976),1922年加入南共,战后任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斯拉夫财政部长。1948年因赞成苏联立场被逮捕入狱。1950年1月,茹约维奇表示悔改后被释放,并任南斯拉夫经济研究所所长、《战斗报》新闻出版社经理。

在所有共和国(没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除外),共产党的第一书记都是该共和国政府的总理。在州、区、乡镇各级政权机关和民族阵线委员会中的领导岗位也均为共产党人所占据。统一的南斯拉夫工会组织、南斯拉夫青年和南斯拉夫妇女反法西斯联盟等组织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

这样,南斯拉夫共产党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党员实行对国家的全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领导。南斯拉夫政府的政策也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策。

目前共产党总共拥有约 30 万党员。这种党员数量较少的情况,其原因是由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接纳新党员入党非常谨慎,严格执行个别挑选的原因。考虑到在共产党的社会成分方面目前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占据多数,故现在特别注重吸收工人入党。

在战争年代,共产党遭受了巨大损失。在同占领者及其帮凶的战斗中牺牲了 2 名政治局委员,5 名中央委员和近 2.5 万名共产党员。

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建设的,党的组织遍及整个国土。党在组织中是按以下序列构建的:在村镇、机关和企业有基层组织,然后是市、区、州或省级组织。

除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设有省委员会之外,在每一个共和国均有共和国一级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有的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和波斯尼亚省委员会均隶属于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最高权力机构是党的代表大会。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共产党的活动同政府的活动交织在一起,故在党的组织中缺乏旨在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充满生机的党的工作。

组成人员数量极其有限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目前只有不超过 13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不举行定期的会议,也不做出书面的决议。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情况也是如此。领导国家方面的所有重大原则问题均在很窄的圈子内决定(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和吉拉斯)。

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并组成党的领导机构已经十分必要,但是南斯拉

夫同志不顾战争结束后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仍然未能采取这一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加强党的重要措施。

共产党拥有大量的在所有人民共和国出版发行的报纸和杂志。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战斗报》在贝尔格莱德出版,是南斯拉夫最大的和最普及的一家报纸。各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全都出版自己的报纸。此外,各共和国民族阵线委员会也都有自己的报纸。所有出版发行的报纸以及南斯拉夫所有的定期刊物,统统处于共产党的监督之下。

考虑到党员的几乎绝大多数都是在战争年代入党的,因而没有受到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在进行大量的工作,以提高他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在国内开设有中央党校,目前在学人员有120人,基本上都是州、区级党委会的领导工作人员。学习期限为1年。在下一个学年学习期限将改为2年。

每一个共和国的党中央委员会都下设一个党校,其学习期限为6个月。这些学校还设有函授部,它们均有大量的学员。

在各地区中心和大城市还开办有学习期限为3个月的党的夜校。在这些夜校里学习的是来自各地区组织的党员骨干分子。其他所有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均参加了各种小组和学习班的学习,同时也通过自学来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

但是直到目前,南斯拉夫共产党工作中的主要困难依然是共产党人的理论修养不够。某些政权机关和经济机关所犯错误中,大部分首先是由于负责领导工作的党员政治修养不足。在国家的政治发展与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当中的思想工作水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脱节现象。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应是加强在南斯拉夫人民,首先是在知识分子中间的思想工作。

* * *

在谈到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巩固国家民主制度方面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不能不指出共产党领导人的某些过高评价自己成就的倾向和把南斯拉夫共产党摆在巴尔干地区某种"领导"党地位的意向。

在解决涉及对外政策执行方面的一些问题时,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某

些领导人有时不顾及其他国家和兄弟党的利益，表现出民族的狭隘性。

为了证明这些结论，可以指出如下一些事实：

例如，南斯拉夫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采取错误的立场，而无视民主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同英美两国进行斗争的共同利益。在这方面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南斯拉夫报刊上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活动及其领导人陶里亚蒂同志进行令人不能容忍的尖刻批评。

1946 年 11 月保加利亚宪法草案公布之后，南斯拉夫报纸（有理由认为这是按照共产党的指示进行的）对保加利亚的宪法草案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卡德尔的助手、共产党人格尔什科维奇在 1946 年 11 月 14 日《战斗报》上指责保加利亚政府侵害了马其顿民族的民族权利，他写道：

“很明显，这样一种安排……与真正以民主方式解决民族问题，与任何民族都享有的自决权和民族统一的权利毫无共同之处。”

南斯拉夫报刊的这一批评被保加利亚社会舆论看作是企图干涉保加利亚的内政。

去年 12 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谈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卡德尔同志和兰科维奇同志曾对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契尔文科夫说，他们不相信保加利亚工人党（共），并且认为该党在马其顿问题上的方针是错误的。他们（南斯拉夫领导人）把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中央委员会的这种行为看作是追求在巴尔干地区发挥领导作用。

南斯拉夫政府尽管已经同阿尔巴尼亚签署了友好互助条约，但是在整整一年的过程中一直没有履行该条约的条款，没有向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提供经济援助。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对阿尔巴尼亚渴求同苏联建立直接联系十分妒忌，他们认为，阿尔巴尼亚只能通过南斯拉夫政府同苏联保持联系。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对待苏联的不友善态度的实例是：南斯拉夫政府拒绝在 1946 年 12 月接待苏联军队歌舞团——尽管派歌舞团去南斯拉夫当初是应他们邀请的。

上述这些以及其他一些事实证明南斯拉夫共产党某些领导人存在着

不健康的倾向。

* * *

南斯拉夫共产党在苏联的多方面援助下,克服了内外困难,在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国家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评价南斯拉夫共产党所走过的道路和该党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时,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计划委员会主席赫布朗同志说:

"我应该说,我们的成就并不仅仅是我们党的功劳。我们取得这些成就也要归功于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直接帮助我们把党提高到了它现在所处的水平,赢得了它现在所处的地位。他直接帮助我们粉碎了我们党内的帮派,帮助我们达到了党的队伍的团结统一。他帮助我们从党内清除了孟什维克分子。他帮助了我们,我们为我们党实现了布尔什维克化而感谢他。"

南斯拉夫共产党依靠苏联的强有力支持,正在勇敢地、满怀信心地领导自己的人民沿着使国家进一步民主化、维护自己的人民民主国家的独立和加强其防御能力的道路向前迈进。

1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同东欧各国签订互助条约问题给外交部的指示

(1947 年 10 月 14 日)

秘密

批准关于同东欧各国签订互助条约问题给外交部的如下指示：

一、首先应确保在东欧小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之间签订互助条约，在此之后再签订苏联与上述国家中那些尚未与苏联签订此类条约的国家之间的互助条约。

二、支持这样的建议，即拟议中的东欧小国之间的互助条约出发点应当是互相支援，以反对来自任何国家的侵略的义务，而不仅仅是反对来自德国及与之共同推行侵略政策的国家的侵略。

三、如果在上述国家中的这些或者那些国家之间不能就签订符合第二项内容的互助条约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则应另行研究签订互相支援条约的问题，该条约旨在反对德国及其他直接或以任何别的形式与之共同推行侵略政策的国家的侵略。

18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情报局会议后南斯拉夫反应的调查报告

(1948 年 1 月 28 日)

1948 年 1 月 28 日 19 时 30 分收到　　秘密

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决议
对南斯拉夫加强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影响

莫斯科

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的文件在中央的各刊物,首先在共产党机关报《战斗报》发表(1947 年 10 月 5 日)了,从 10 月 6 日到 11 日又发表在所有南斯拉夫的刊物上。

这个时期所有南斯拉夫的刊物都在共产党员的影响之下,广泛阐述国外刊物对协商会议决议的反应。

1947 年 10 月 8 日《战斗报》报刊登了米罗凡·吉拉斯题为《关于一些国家共产党的情报协商会议》的社论。在这篇文章中,吉拉斯阐述了在日丹诺夫的报告① 中涉及的所有重要问题,以及协商会议文件中所反映的问题。吉拉斯在文章的结尾指出:“南斯拉夫人民可以引以自豪的是,他们的首都将成为各国共产党进行反对新的战争挑唆者和他们走卒斗争的协商和决议的地方。”这篇文章曾在南斯拉夫大多数报纸上转载。

---

①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1896—1948),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在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上,日丹诺夫代表联共(布)做主题报告。

1947 年 10 月 22 日《战斗报》发表了日丹诺夫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随后南斯拉夫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日丹诺夫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

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的决议受到南斯拉夫人民的热烈欢迎。所有的南斯拉夫报纸和杂志，以及南斯拉夫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们，都发表文章和演说，高度评价决议是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重要文献。

比如，在今年 1 月 9～10 日召开的南斯拉夫统一工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案中写道："南斯拉夫统一工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欢迎成立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和情报局，它的决议表明全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向联合的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是对帝国主义新战争挑唆者的重大打击。"

1947 年 10 月 11 日，属于人民阵线的农业联盟党召开的全体会议通过宣言，表示欢迎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并完全赞同它的决议。宣言中写道："我们的人民站在以苏联为首的所有热爱自由的民族一边，与世界进步力量一起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挑唆者的斗争。"

所有加入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的政治团体和社会组织都表示完全赞同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决议。现在这些决议是南斯拉夫主要的外交政策。

1947 年 11 月底召开的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它完全符合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的决议。决议中强调，南斯拉夫人民一致支持在联合国会议中加强苏联代表团的力量，加强南斯拉夫和其他代表团，维护和平事业和大、小国家的民族主权，反对战争挑衅的活动。

通过宣传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决议，促进了南斯拉夫人民的统一，加强了南斯拉夫人民在人民阵线和共产党周围的团结。现在南斯拉夫人民已将全部精神和物质力量，投入到完成南斯拉夫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之中。对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总结表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南斯拉夫工业五年计划第一年的计划完成了 106%。

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了南斯拉夫人民对苏联的好感。南斯拉夫人民一致欢迎和赞同苏联代表在国际会议上的工作。南斯拉夫报刊广泛评述了

苏联实行的财政改革和废除票证供应的办法,强调苏联人民所取得的重大经济成就。

在南斯拉夫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30周年纪念活动。在评述莫洛托夫去年11月6日庆祝大会上的报告时,《政治报》写道:"莫洛托夫的朴实而具有极大说服力的报告表明了十月革命巨大的历史意义……描述了苏联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指出了以列宁和斯大林所在国家为领导地位的当今国际形势的各主要方面。"

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对外政策完全符合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宣言的原则。为补充以前签定的协议,南斯拉夫政府最近又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签订了友好相互条约。由于签署这些协议,南斯拉夫现在已与欧洲中部和东南部的所有新民主国家正式确定了人民之间紧密的友好关系。

南斯拉夫这些民主的对外政策引起美国和英国方面的极端仇视。他们采取一切措施对南斯拉夫的政治和经济施加影响。在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和贝尔格莱德成立情报局以后,英美在对南关系政策上非常无礼和敌视。

政治上没有可能影响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英美分子便极力给南斯拉夫造成经济上的损害。为此,美国政府至今未取消对存放在美国的价值5 600万美元南斯拉夫黄金的管制。

英美统治集团向地中海派出了海军陆战队和战舰,企图恐吓南斯拉夫政府。

为了不让南斯拉夫承认马科斯将军的政府①,英美政府愚蠢地警告南斯拉夫,说"承认马尔科斯政府将引起严重的后果"。

英美分子力图进一步控制的里雅斯特,保存自己在那里的驻军,以便以此影响南斯拉夫政府。

为此他们拖延委派的里雅斯特的省长,因为委派了省长就意味着的里雅斯特作为自由区政府委员会的成立,英美部队就将从与南斯拉夫接

---

① 1946年初,希腊共产党决定组织新的武装斗争。1947年12月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军宣布正式成立希腊临时民主政府,民主军总司令马科斯任总理兼军事部长。

壤的的里雅斯特地区撤出。

对于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干预他国对外政策的企图，南斯拉夫政府做出了勇敢而自信的反应。

运用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资料，南斯拉夫政府坚决地揭露了“马歇尔计划”的卑鄙企图，集中力量带领南斯拉夫人民完成五年计划，尽可能地增强国防力量和国家的独立自主能力。

B.列萨科夫[①]

① B.И.列萨科夫(1909—?)，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工作人员。

19 科拉罗夫[①]关于苏、保、南领导人会谈的笔记(摘录)[②]

(1948年2月10日)

莫洛托夫:在三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条约;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同记者的谈话;南斯拉夫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

(1)错误在于同保加利亚的和平条约生效之前签订了保-南条约,而且是无期限的。

保、南两国政府以自己的匆忙行动帮助了英、美国内的反动分子,给他们提供了为反对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而加紧入侵希腊的借口。苏联政府应该提出警告的是,苏联不可能对没有同苏联协商就签订如此重大的条约承担责任。

你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而行动却相反,没有预先告知我们。这样的态度是错误的和不能允许的。

(2)我们觉得,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同志迷恋于记者招待会和发表谈话,这样就为记者关于某些不该谈论的问题向他挑衅提供了借口。谈话中阐述了走得太远并没有打算同任何人协商的计划,还提出联邦或邦联的问题,关税同盟问题,而且把波兰和希腊也包括进去了。格奥尔基·季米特

---

① 瓦西尔·彼得罗夫·科拉罗夫(1877—1950),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人,自1945年起历任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临时总统、部长会议主席等职。

② 该文件是科拉罗夫用俄文记录的,保存在保加利亚中央档案馆。根据记录,会议时间为1948年2月10日21时10分至2月11日0时10分。

洛夫同志在没有任何人授权的情况下谈论了上述各种问题。这在实质上是不正确的，在策略上也是错误的。这就使得西方集团建立者的事情变得容易了。所以，根据党的政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应该受到警告处分。

您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建立联邦或邦联的讲话看来是有害的，给新的民主国家造成了损害，而使英国人和美国人感到轻松。最有害的和不能容忍的是关于关税同盟的讲话，因为这可以理解为它包括了很快就将同这些国家签订互助条约的苏联。[①] 很难理解的是，什么东西促使您在记者招待会上作如此不加考虑的声明。

我们和波兰的同志谈话时，他们说："我们想，这是莫斯科的意见。"大家都这样认为，既然季米特洛夫和铁托提到了一系列国家，这肯定是根据苏联的意见谈的。实际上，波兰的同志说，他们反对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观点，并认为他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因为大家都认为——无论朋友，还是敌人——这是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这绝对是不正确的，以后也是不能允许的。

季米特洛夫的解释无济于事，甚至会使问题更加混乱。[②] 从他那里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从前干涉同塞尔维亚的关税统一的是德国，而现在是苏联。

季米特洛夫：我们不是这么想的。

斯大林：您作为政治活动家，不应该只考虑自己的想法，而应该想到别人会从您的讲话中得到什么。（科拉罗夫：我们想，您甚至反对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税同盟。）我们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关税同盟不仅不会反对，而且恰恰相反。

莫洛托夫：贝奈斯的报纸迫不及待地写道："季米特洛夫提出了共产主

---

① 1948年2月4日、2月18日、3月18日，苏联分别同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签订了同盟条约。

② 1月28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述评，表示绝不赞同季米特洛夫在联邦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并认为这种联邦是"不可靠的和凭空虚构的"。对此，季米特洛夫首先以保通社1月29日声明的形式，然后又在2月2日祖国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公开表示接受批评。他还把保通社的声明寄给了苏斯洛夫，让他转告斯大林，相信他与苏联立场将保持完全一致。

义计划,现在就让捷克共产党人来回答。”另一方面,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这种立场是与九国共产党宣言相矛盾的。

斯大林:您对记者的谈话离开了内部问题,谈的不是九国共产党会议上所谈的内容。

莫洛托夫:我们认为所有这一切以后都是不能允许的。

(3)我们意外地得知,你们想在1月底将一个南斯拉夫师开往阿尔巴尼亚,以共同保卫边界。阿尔巴尼亚人说,他们确信,这件事是征得我们的同意后才干的。

据此应该得出结论,我们对阿尔巴尼亚局势的评价是不同的。不应该对这类分歧保持沉默。我们应该就此问题公开商谈,以便让人看出你们是如何评价局势的。我们认为,将来对此类问题也不应该忽视。有分歧就需要搞清楚,如果有不同的观点,就应该说出来并加以讨论。如果对这类问题没有进行协商,就不应该采取行动。这是为了事业和我们相互间的协议。

将来,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应该使自己和我们避免这类声明的危险。

季米特洛夫:我承认自己对布莱德谈判① 所犯的错误,对记者的谈话也同样是错误的。为了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和防御能力,我们必须同其他新的和民主的友好国家合作。

斯大林:您是想标新立异。波兰人和捷克人在嘲笑您的联邦。请您问问他们,他们是否喜欢这个联邦?

季米特洛夫:这是有害的,实质上是错误的。这种说法是旨在反对想利用声明来反对我们和苏联的那些人。这是一种情绪。这样的宣言将来不会再有了。

斯大林:我们相互之间不理解,而你们竭力在隐瞒这一点。

莫洛托夫:这是严重的分歧,不是小事情。

斯大林:您是一位老政治家,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也可能您有另外

---

① 1947年7月底季米特洛夫访问南斯拉夫,8月1日南保在布莱德签订了包括边界、贸易、战争赔款等一系列问题的条约。会谈后季米特洛夫声称,建立南斯拉夫联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的看法,但您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需要如此频繁地与记者谈话。您总是想标新立异,想惊动全世界。您之所以这样做,好像您还是共产国际总书记,能向共产党的报纸发表谈话。您助长了美国的反动派,目的是使社会舆论相信,如果成立西方集团,美国也不会有什么作为,因为在巴尔干存在的不只是那一个集团,还有一个关税联盟。当前美国正在进行大选前的斗争。对我们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那里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因为,美国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强国。美国政府的首脑不是一些知识分子,而是一些真正的金融寡头,他们仇恨我们到了可怕的程度,一直在寻找对我们进行破坏的借口。如果我们以自己的行动为进步势力提供论据的话,那些大财团就会在大选中失败。如果我们为反动派提供精神食粮,那我们就帮助了大财团。美国政府处在大选前夕,正在担心选举结果。而如果这些大财团重新进入政府,那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和我们的行动过错造成的。他们将会说:"你们建立的不仅是一个集团,而且是将许多国家联合在一起——反对谁?"您为什么需要这么一个集团?最后,如果是你们自己想联合在一起,那何必就此问题掀起这样一场喧嚷?您或者属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或者是像飞蛾投火的共青团员那样被蒙蔽了。您这样干究竟为了什么?您为什么要减轻您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敌人的负担呢?

再来谈谈阿尔巴尼亚问题。南斯拉夫同志多么容易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战争期间,三个同盟大国宣布阿尔巴尼亚独立,并说它们将支持独立。[①] 在反动派和民主力量斗争的所有环节中,阿尔巴尼亚这个环节是我们最薄弱的地方。阿尔巴尼亚还没有被接纳加入联合国,英国人和美国人不承认它。[②] 那里的问题是明摆着的。再没有像这样薄弱的地方了。只有阿尔巴尼亚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法律保护。如果铁托向那里派去一个师,或仅仅一个团的话,这不可能瞒住美国和英国。它们就会开始喊叫说,阿尔巴尼亚被占领了。难道阿尔巴尼亚公开请求南斯拉夫予以帮助?那时,

---

① 1942年12月17~18日,美国国务卿赫尔、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达成协议,宣布不承认意大利对阿尔巴尼亚的占领,并支持阿尔巴尼亚恢复独立。

② 尽管美国和英国在1945年11月10日与苏联同时发表声明,承认了在阿尔巴尼亚建立的新政权,但是他们不同意接纳阿进入联合国,也没有与阿建立外交关系。

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坏蛋就会充当阿尔巴尼亚独立的保护者的角色。除了无知的人以外,还有谁能够坐视形成一个明显靠不住的阵线呢?现在需要的是加强组织阿尔巴尼亚的军队,为其派去教官,提供武器装备。在此之后,如果阿尔巴尼遭到进攻,它应该向南斯拉夫请求援助。否则,南斯拉夫就像是占领另一个独立国家的国家。那时完全可能出现武装干涉,也会出现美国的舰艇和基地。这对美国来说将是最方便和最有力的借口。当投入战斗的时候,应该建立对于自己有利的战线,而在这里简直就是亮出自己的后背让美国人打击。

看看在中国发生的战争吧。那里没有我们的一卒一兵。难道阿尔巴尼亚人不如中国人?训练他们吧,武装他们吧,他们自己会保护自己的。最好是让他们自己保卫自己的独立。这样,美国人自己很难发动进攻,否则他们的事情就容易办了。你们这样解决问题过于简单了,而实际上问题是复杂的。

如果希腊游击队将被消灭的话,你们能否发动战争?

卡德尔(当时的南共政治局委员):不能。

斯大林:我是以对游击队现有兵力和他们的敌人进行分析为出发点的。近来我开始怀疑游击队是否能取得胜利。如果你不相信游击队会取得胜利的话,就需要收缩游击运动。美国人和英国人对地中海并不十分感兴趣。他们想在希腊建立基地,而且不吝啬资金,目的是在那里保住一个听话的政府。这是一个国际大问题。

如果收缩游击运动,他们就没有理由进攻你们。如今不是那么容易发动战争的。如果你们坚信游击队有可能取得胜利,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我对此多少有点怀疑。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我们很少得到那里的信息。

斯大林:您有权向我们要,我们向你们通报。让我们签订一个我们之间就所有重要问题必须进行协商的议定书。

季米特洛夫:我们将遵守它。

斯大林:同保加利亚的条约无须拖延。

本月 15 日匈牙利人来这里。在这之后,我们要请芬兰人,此后再请你

们。

莫洛托夫:在某个条约中谈到关于消灭所有的侵略策源地的问题。[①] 这只是些漂亮的词句。这些词句只能为我们的敌人提供额外的武器。你们为什么要说得比其他条约多?你们将要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吗?

斯大林:这是"左"派的热情。

莫洛托夫:任何倡议都可能得不到支持,联合国反对侵略,他们可能使联合国走到反对我们的地步。难道国联没有借口我们同芬兰的争执[②] 宣布我们为侵略者吗?

南斯拉夫的同志们不允许阿尔巴尼亚购买我们的 5 000 吨燕麦,而是要它去阿根廷购买燕麦。[③]

斯大林:看来,南斯拉夫人害怕我们向他们夺取阿尔巴尼亚。你们应该吞并阿尔巴尼亚,但要聪明一点。

(科拉罗夫提请注意,同罗马尼亚的条约已经同莫斯科协商过了。[④])

你们关于统一经济计划的决定限制了你们自己的主权和罗马尼亚的主权。

只有三个联邦是可能的和自然的:1)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2)罗马尼亚和匈牙利;3)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联邦是可能的和现实的。它们之间的邦联则是……[⑤]

---

① 指 1947 年 11 月 27 日签署的南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 7 款中的内容。

② 1939 年 10 月和 11 月,苏联为了保证其西北边界和列宁格勒的安全,要求与芬兰缔结交换领土的条约,遭到拒绝后,苏联对芬兰发动了战争。

③ 1947 年 12 月 13 日,拉夫连季耶夫根据莫斯科的委托,通知铁托,阿尔巴尼亚要求苏联政府提供 5 000 吨燕麦,并询问南斯拉夫的意见。两天以后铁托答复,不需要从苏联运货,因为阿尔巴尼亚将收到南斯拉夫运去的燕麦。但南斯拉夫的燕麦一直没有到货,当阿尔巴尼亚人询问此事时,南斯拉夫人劝告他们到阿根廷去购买。后来卡德尔解释说,这是因为南斯拉夫主管部门之间的误会造成的。

④ 指 1948 年 1 月 16 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签署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其内容表明两国准备实现关税统一。苏联对此表示反对。

⑤ 此处复印件字迹不清。

特赖乔·科斯托夫[①]:是否可以认为,我们可以采取加速实现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联邦的方针?

斯大林:建立联邦吧,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明天就可以建立。这很自然,我们没有任何反对意见。我们只反对共青团式的联合方法。联邦应该是经过筹备的,以便它能够被两国内部社会舆论和外部世界所接受。

卡德尔:我们认为,就是同保加利亚的联邦,也无须匆忙行事,基本上按国际原则进行,因为匆忙可能使我们处于困境。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你错了。你们不应该拖延三国——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联合。但必须由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并授权政府开始就联合问题进行谈判。最好从政治联合开始,这样就可以向阿尔巴尼亚派出军队,这样做不会成为外国进攻的借口。

在同保加利亚签订和约之前,建立联邦为时过早。但现在保加利亚已经是一个正式的主权国家了。现在,依我看,你们不应该拖延这个问题,最好尽快解决。如果你们通过各自国家的国民议会进行联合的话,那一切将很顺利。联邦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在种族关系上很接近,在生活习惯和风俗习惯上更接近,每一个人都会理解这种联合。阿尔巴尼亚人在联邦条件下也会得到好处,因为将建立一个几乎多一倍人口的统一的阿尔巴尼亚。

需要做的是,将所有的力量团结在这个自然的联邦周围,以发展联邦的经济和民族文化,加强其军队。否则,波兰将对你们抱以希望,而你们对波兰也会寄予希望,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好处。你们没有任何必要偏离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决议。

莫洛托夫:如果需要消除季米特洛夫所说的那种侵略的策源地,就这样去做吧,有什么必要大声呼喊,故意声张呢?现在每一句话都被他们揪住不放了。

特赖乔·科斯托夫:我们认为,希腊的游击运动的失败将会给其他巴尔干国家造成非常困难的局面。

---

① 特赖乔·科斯托夫(1897—1949),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

斯大林:自然,游击队应该予以支持。但如果游击运动的前景无望的话,最好将斗争推移至最佳时间。即使在力量对比上有什么差距,那也不能喊叫。必须理智地计算力量。如果计算表明,当时工作不可能有进展,那也无须羞于承认这一点。如果局势不利的话,可以收缩游击运动。即使今天不可能,明天也会是可能的。你们害怕提出尖锐的问题。你们总是处于"道义责任"的影响下。如果你们对所承担的责任力不胜任的话,那就应该承认这一点。你们不应该担心在"道义责任"方面的绝对命令。我们这里没有这种绝对命令。整个问题在于力量的权衡。如果你们能够打的话就打,如果不能够打的话,就别去战斗。我们不能在敌人想战斗的时候去战斗,而是当我们的利益需要战斗时再去战斗。

卡德尔:有一个问题需要明确,即游击队在数个月内成功的希望如何。

斯大林:好,请稍等。或许,你是正确的。我也曾怀疑中国人是否能够胜利,我建议他们同蒋介石达成临时协议。他们形式上同意我们的建议,而实际上继续干自己的——动员中国人民的力量。之后,他们公开提出问题:我们将继续战斗,人民支持我们。我们对他们讲:好吧,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显然,他们那里基础非常好。他们是正确的,而我们是不正确的。或许,在这里,我们也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我们认为,你们一定要有把握再行动。

科拉罗夫:那么美国人能允许游击队胜利吗?

斯大林:不要问他们。如果有能够取得胜利的力量,如果能够利用人民力量,就应该继续斗争。但也不应该这么想,以为在希腊没有成功的希望,其他一切就都完了。

与希腊相距较远的国家应首先承认马科斯政府①,而周边国家应该最后承认。

莫洛托夫:季米特洛夫同志反对鲁尔切夫的讲话也是错误的,如今被

---

① 1947年12月25日,以希腊游击队领导人马科斯为首的希腊临时民主政府宣布成立。

敌人广泛利用了。[①] 有什么必要这样干?

季米特洛夫:这主要是迫于国内的需要,目的是不让他们再抬起头来。

斯大林:让尤戈夫[②] 去同反对派交谈吧,他最善于做这项工作。

卡德尔:我们认为,在实质上,我们之间是没有分歧的,只是存在着个别错误。

斯大林:这不是错误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

① 鲁尔切夫·科斯塔(1882—1965),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人党总书记。该党反对共产主义制度。1948年1月10日,在保加利亚召开的国民大会上,在回答社会民主工人党代表对政府预算草案的批评时,季米特洛夫指责他们是阴谋者,是祖国的敌人。季米特洛夫的讲话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认为这是要镇压反对派,挑起反对西方的行动。

② 安东·尤戈夫(1904—1991),保加利亚内务部长,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20 吉拉斯关于苏、保、南代表会谈给南共中央的报告

(1948 年 2 月 10 日)

卡德尔和巴卡里奇于 2 月 8 日(星期天)抵达莫斯科,直至 2 月 10 日(星期二)之前,他们两人谁也没有说什么。星期二上午,巴拉诺夫[①] 打电话要卡德尔和其余的人不要去任何地方,因为晚上 9 点钟,要请我们去克里姆林宫。列萨科夫告诉我们,星期一来了保加利亚人,同时强调说,保加利亚来的是"主要人物"——季米特洛夫、科拉罗夫、特赖乔·科斯托夫。

果然,我们于晚上 9 点钟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我们准时抵达,但保加利亚人迟到了一会儿,我们在斯大林的接见厅坐了 10 ~ 15 分钟,待他们都到齐后,我们进到了里面。

会见在 2 月 10 日,星期二,莫斯科时间 21 时 15 分开始,持续了约 3 个小时。当我们进去的时候,已有苏联代表在那里。出席会晤的有:斯大林(主持者)、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日丹诺夫、苏斯洛夫和佐林[②](在斯大林右侧依次而坐),和季米特洛夫、科拉罗夫、科斯托夫、卡德尔、吉拉斯、巴卡里奇(在斯大林左侧依次而坐)。

莫洛托夫首先发言。他直接强调说,他们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之间的问题已经到了严重分歧的地步。这些分歧无论从党的观点出发,还是从国家的观点出发,都是不能允许的。他列举了三个严重分歧的例子:第一,

---

① Л.С.巴拉诺夫(1909—1954),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副部长。

② 瓦列里安·亚历山德罗维奇·佐林(1902—?),1947 ~ 1955 年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签订的同盟条约，与苏联分别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条约不一致；第二，季米特洛夫关于东欧国家和巴尔干国家，包括希腊成立联邦的声明，与苏联分别同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签订的条约不一致；第三，南斯拉夫一个师进入阿尔巴尼亚南部（科尔察），同苏联分别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之间的条约不一致。关于第一点，他强调说，苏联政府已经通报过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两国的政府，他们同意了这一点，即同保加利亚签订和平条约之后，在其规定期满以前，不得同保加利亚签订条约。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两国政府却签订了条约，苏联政府是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一情况的。关于第二点，莫洛托夫强调说，季米特洛夫同志太迷恋于记者招待会。同时，如果季米特洛夫或者铁托向报刊发表声明的话，整个世界都会想，这是苏联的观点。这时斯大林打断莫洛托夫的话说，记得那些日子里在莫斯科的波兰人表示反对。倒是苏联代表首先问他们的，问他们对季米特洛夫的声明有何想法。波兰人说，他们同意，当斯大林告诉他们说苏联反对时，他们就说他们也反对，但他们以为这是莫斯科的立场和指示。斯大林补充说，季米特洛夫的逐步联合（大概他指的是保加利亚通讯社的声明①）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斯大林援引声明中的话说，在这个声明中说，奥匈帝国阻止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签订关税同盟。斯大林并补充说，这意味着从前德国人阻止，而现在我们（即苏联）阻止关税同盟。斯大林还补充说，季米特洛夫将注意力从国内问题转移到国外问题，即转移到联邦等问题上。然后莫洛托夫转向谈第三个分歧点，他一开始就强调说，他们意外地得知南斯拉夫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人告诉俄国人说，他们以为南斯拉夫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是得到苏联同意的，其实并非如此。这时莫洛托夫开始援引紧急报告。斯大林对他说，要他读。莫洛托夫问斯大林读哪个紧急报告，斯大林倾斜着身子向他指点。莫洛托夫读着拉夫连季耶夫关于会见铁托的紧急报告。从所读的紧急报告中可以知道，这份紧急报告是对关于是否真的存在南斯拉夫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的决定这一问题的回答。紧急报告中说，这样的决定是征得霍查同意

① 见第158页注②。

的,是确实存在的,报告的主题是通报可能的对阿尔巴尼亚的进攻。紧急报告中铁托接着指出,他不同意莫斯科关于在南斯拉夫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的情况下,美英除掀起报刊宣传运动外还会进行干涉的说法。根据紧急报告,铁托还说如果事情真的到了那种地步的话,南斯拉夫和苏联一起收拾局面。但是,在苏联就此问题采取外交行动之后,他不会再派出部队了。莫洛托夫最后指出,铁托并没有通报莫斯科说他不同意。他强调指出,无论从党的观点看,还是从国家的观点看,分歧是不能允许的,分歧要提出来加以讨论,不能隐瞒分歧,应该通报和协商。对记者招待会要谨慎。

莫洛托夫之后,季米特洛夫发言。他就像其余的保加利亚人和卡德尔(代表南斯拉夫人说话的只有他)一样,没有能够有条理地和连贯地说明自己的想法,因为斯大林不断地打断他的话。他说,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在布莱德发表的不是条约,而仅仅是就未来的条约达成一致的通报。苏联代表证实他们从报纸上了解到了这一情况。季米特洛夫强调说,保加利亚经受着如此的经济困难,以致没有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就不可能得到发展。这的确就像他在记者招会上所讲的那样。斯大林打断他的发言并对他说,他的脑海里忽然闪现出一个新词,这是错误的,错误是因为这样的联邦是不可能实现的。季米特洛夫说,事实证明奥匈帝国干涉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关税同盟,他并没有暗指苏联。他最后强调指出,保加利亚和苏联的对外政策之间没有实质上的分歧。斯大林打断他的话并肯定地说,有着很大的分歧,列宁主义者的做法应该是正视分歧和错误,并予以消除。季米特洛夫说,他们犯有错误,还要学习对外政策。接着斯大林向他瞥了一眼又说,他是个老政治家,从事政治 40 多年,他那里谈的不是关于错误的问题,而是另一种概念(他在会晤期间就此向季米特洛夫重复了两三次)。鉴于季米特洛夫反复强调保加利亚由于经济原因应该同其他国家接近,斯大林说他同意,如果涉及的是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税同盟的话。但如果涉及罗马尼亚问题,他将反对这一点。总之,如果话题涉及保加利亚与苏联不同意的国家——大多数情况下是拿罗马尼亚作例子——建立联系的话,斯大林都表示反对。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保加利亚 - 罗马尼亚条约中有关于关税同盟的条款,我想,保加利亚 - 罗马尼亚

联合公报中谈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协调计划的问题也是一个原因。苏联代表会晤时多次发言都提到了所谈到的上述问题,它指的是即将签订的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条约问题。总之,苏联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关系的批评涉及可能出现的保加利亚－匈牙利关系,明显的,还有南斯拉夫同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关系。

接着,科拉罗夫发言。他说,由保加利亚通报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之间的关税同盟中没有暗示苏联的地方,至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关税同盟,罗马尼亚人是赞成的。此外,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条约首先寄给了苏联政府,苏联政府提出的意见只是用反对德国或其同盟国的条款代替反对任何侵略者的条款,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关税同盟问题没有提出任何意见。莫洛托夫对斯大林做了简短的解释。莫洛托夫肯定了科拉罗夫的上述发言。斯大林再一次强调说,他反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关税同盟,尽管保加利亚人根据紧急报告有权认为苏联是不反对的。他强调说,他不知道在此之前寄给苏联政府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条约中有关税同盟的条款。季米特洛夫说,正因为如此,这一点成为他在声明中所说的话过火的原因。斯大林对他说,他想震惊全世界,并补充说,这好像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在认真而详细地解释需要什么和怎样去做。他说,正是这一点为美国反动势力提供了精神食粮。然后他谈了关于美国大选的意义,关于为了不向美国反动势力提供任何使其能够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的论据而需要注意的问题。他认为,不应该为反动派提供任何借口。现在的美国政府还能够克制自己,但大财团和凶恶的资本家可能执掌政权,美国的反动势力听到这样的声明就会说,在东欧不仅要建立集团,而且将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他对季米特洛夫和其他一些人说,他们就像共青团员一样不知分寸,事后又像女人一样满街喧嚷。他将这一点同阿尔巴尼亚问题联系在一起。三个世界大国——苏联、英国和美国以特别条约的形式保证了阿尔巴尼亚的独立。阿尔巴尼亚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因为其他国家或是联合国的成员国,或是被承认的国家,而阿尔巴尼亚都不是。如果南斯拉夫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美国和英国的反动势力就会利用这一点来充当阿尔巴尼亚独立的保护者。不需要派出军队,需要的是在加强阿尔巴尼

亚军队的问题上加紧做工作，需要对阿尔巴尼亚人进行训练。然后，如果阿尔巴尼亚人遭到进攻，让阿尔巴尼亚议会呼吁南斯拉夫给予援助。他列举了中国的例子。他说，在这方面，任何人都不能对苏联提出指责。中国人善于斗争，他们在前进。他补充说，阿尔巴尼亚人不比中国人差，需要对他们进行训练。然后他说，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什么也没有向他通报，通常是在既成事实、不可挽回之前才报告的，苏联领导都是从外部了解情况的。

接着科斯托夫开始发言，他抱怨说困难的总是小国和不发达国家。他想提出一些经济问题。斯大林打断他的发言并说，对于这些有一些部门主管。现在讨论的是分歧问题。

卡德尔发言。关于第一点他说，公布的不是条约，仅仅是关于条约达成一致的通报，并补充说，我们过于匆忙了。他开始进行解释，如同季米特洛夫在上面已经证实的一样，日丹诺夫插话证实他们是从报刊上知道这件事的。关于阿尔巴尼亚的事，他说，情况很严重，我们没有向他们通报。斯大林插话并说，我们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实际上它是很复杂的。卡德尔接着谈到希腊的不断挑衅，阿尔巴尼亚军队的软弱，还说到我们如何在经济上同阿尔巴尼亚的联系，如何扶持其军队的问题。斯大林两三次打断他的发言。至于希腊入侵阿尔巴尼亚，斯大林说这是可能的。但他立刻提出一个问题，这种状况是否真实。阿尔巴尼亚的军队是没有任何指望的，他补充说，需要对阿尔巴尼亚人进行训练，为他们建立军队。莫洛托夫说，他们没得到什么进攻阿尔巴尼亚的情报，并提出一个问题，即我们不给他们提供任何情报。卡德尔解释说，最近一家希腊公司对待阿尔巴尼亚的态度变得特别尖锐，斯大林提出一个问题，即我们能否相信希腊游击队会取得胜利。卡德尔回答说相信。斯大林说，他和他的同事一样，最近对此深表怀疑。他说，如果有胜利希望的话，就应该帮助希腊，如果没有这种希望，则应考虑结束游击运动。英国人和美国人为保护希腊是不惜代价的，对他们来说惟一的难题就是我们帮助游击队。莫洛托夫补充说，他们经常指责我们，说我们帮助了游击队。斯大林说，如果没有取得胜利的条件，也不必害怕承认这一点。这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了，如果目前没有条件，那

么晚些时候将会有条件。接着科拉罗夫开始发言并叙述说,美、英、法政府是如何对待他们的,警告他们不得承认马科斯政府。科拉罗夫说,美国大使举止适当,有礼貌,英国大使厚颜无耻,蛮横无礼。斯大林插话说,这就是说,美国人最坏,他们经常变换角色。斯大林还说,不要把自己国家的命运同希腊游击队的胜利联系在一起,根据季米特洛夫的观点,一旦保皇派—法西斯分子取得胜利,巴尔干地区的局势就会变得艰难而严重。斯大林说,这一点还没有得到证实。

接着季米特洛夫和科拉罗夫讲述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与会晤时提出的问题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其间,莫洛托夫援引了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条约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说,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将根据联合国的精神行动,支持所有旨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反对所有侵略策源地的倡议。莫洛托夫用引自条约中的这段话批驳季米特洛夫企图把反对"侵略的策源地"的斗争同联合国的行动联系在一起。斯大林补充说,这意味着先发制人的战争,其本身就是共青团式的抨击,是大吹大擂、大肆叫嚣的词句,只能为敌人提供材料。斯大林接着说——还是讲共青团的表现,当在列宁格勒革命刚一胜利时,他们那里有一位水兵通过广播骂了全世界,并对全世界进行威胁。莫洛托夫接着谈到了阿尔巴尼亚向苏联购买燕麦的问题,说铁托告诉拉夫连季耶夫,南斯拉夫将提供燕麦。但这之后南斯拉夫人却让阿尔巴尼亚人向阿根廷购买燕麦。斯大林半开玩笑地说,南斯拉夫人怕在阿尔巴尼亚的俄国人,因此才匆忙地向那里派军队。他还说,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想的是,苏联反对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联合,但又不想讲出来。莫洛托夫谈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关于协调计划公报中的一条原则时说,这实际上是这两个国家的联合。斯大林坚决认为,这是不能实现的。季米特洛夫很快证实说,这是毫无意义的事,这不是合作,而是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造成争执。因此,相互关系中应该仅限于贸易条约。

斯大林接着阐述了苏联关于在东欧建立三个联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罗马尼亚—匈牙利联邦、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联邦的观点。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如果它们愿意的话,可以在明天就联合起来,这样的关系中不存在任何干扰,因为保加利亚今天是个主权国家。

卡德尔说,我们不急于同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联合,因为还有一些国际和国内的问题。斯大林对此说,不应该推迟,这件事已经成熟了。首先需要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联合起来,然后阿尔巴尼亚加入其联合。这需要通过各自国家的国民议会,以人民的意志达成协议。斯大林想首先从政治联合开始,这样别的国家就将很难进攻阿尔巴尼亚。斯大林对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联合多次强调指出,这个问题已经成熟。事情已经到了商议国名的地步。

卡德尔接着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上,即对阿尔巴尼亚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开的,但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转到了斯大林以前说过的话,即需要对阿尔巴尼亚的军队进行训练,阿尔巴尼亚在遭到进攻时再请求援助。

至于燕麦问题,卡德尔说,不排除敌人在这个问题上插手的可能性,目的在于破坏南斯拉夫 – 苏联关系(莫洛托夫对此沉默)。卡德尔接着说,看不出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在对外政策上有什么重大的分歧。斯大林打断卡德尔的话说,这不准确,分歧是存在的,隐瞒分歧就意味着机会主义。不要怕承认分歧。斯大林强调说,就是在他们——列宁的学生们之间也多次出现分歧,就某个问题进行争吵,讨论,然后端正立场,继续前进。他还认为,需要大胆地提出希腊游击队的问题。接着他又提到中国的事情,但现在他说到了另外一个情况,那就是,按照他的话说,他们把中国同志叫来,并告诉他们,在中国没有发动起义的条件,需要寻找某种"临时措施"。根据斯大林的说法,中国同志在所有问题上都赞同苏联同志的意见,而实际上他们是在积蓄力量。俄国人曾两次向他们提供武器援助。显然,正如斯大林所说的,中国人,而不是苏联同志,是正确的。但他不相信希腊游队也是这种情况。关于中国,他说道,除根据同中国政府的条约作为中立区的旅顺港外,他们在中国没有自己的人。他谈到了中国人在没有集中足够的力量之前避免进攻城市的战术。

卡德尔再次发言并说,我们没有向他们通报这些情况是个错误。斯大林打断他的话说,这不是错误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我们不向他们通报任何情况。

接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建议签订相互协调对外政策的议定书,卡德

尔对此表示同意。这时斯大林补充说,让我们就我们所感兴趣的所有问题询问他们,而他们将向我们通报一切。

接着季米特洛夫转换话题谈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当季米特洛夫说有一些重要的经济问题时,斯大林随口打断他的话说,要他与统一的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政府谈上述问题。在继续会谈的过程中,斯大林提出一个问题,即阿尔巴尼亚人如何接受联合的问题。卡德尔和吉拉斯向他解释说,如果阿尔巴尼亚人接受了联合,这样很好,因为这是他们的民族利益范围内的事,值得注意的是,有 80 万阿尔巴尼亚人生活在南斯拉夫。斯大林联系阿尔巴尼亚的情况说,我们有一个人已经自杀了,① 我们想甩掉霍查,但不应该匆忙粗暴地"强制"干这件事,而是要逐渐地来,不要一下子来。斯大林又一次说,首先需要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联合起来,然后让阿尔巴尼亚加入,需要由阿尔巴尼亚自己声明加入的愿望。接着,科斯托夫提出,关于同苏联的有关专利权、许可证、著作权的技术援助协议对保加利亚人不利,但他没有说该协议是否已经签订。莫洛托夫对此说,问题还需再研究一下,斯大林希望科斯托夫提交一个"简短的报告"。然后转入研究苏联新闻局为回答美国人的诽谤而发表的苏联－阿尔巴尼亚关系文件。卡德尔对《真理报》发表的文件表示了肯定意见。季米特洛夫说,西方大国企图联合德国反对苏联。斯大林反驳季米特洛夫说,他总是把一切都暴露出来,西方大国并没有公开这样说,他们的说法是没有俄罗斯的欧洲,但如果没有,这就意味着反对。莫洛托夫在会谈中表达自己的意见说,保加利亚人对其军队人数保密较差,它的军队人数超过了和平条约的规定,他们在这一点上可能会受到指责。季米特洛夫对此说,相反,现在的人数还低于和平条约的规定,莫洛托夫对此表示满意,后来再没有提及这件事。季米特洛夫提出了签订苏联和保加利亚之间互助条约的问题,并强调说这

---

① 指阿共亲苏派领导人纳科·斯皮鲁。1947 年 11 月,南共认为不能再容忍阿党内的反南派行为,铁托发出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要求阿共中央政治局对斯皮鲁的问题弄清事实,做出解释。鉴于铁托和南共的威望和影响,霍查只得召开中央全会,讨论铁托的信件和斯皮鲁事件。斯皮鲁感到失望而开枪自杀。关于斯皮鲁的死,霍查含糊其词地向莫斯科解释说,斯皮鲁有反苏情绪,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对此,苏联驻阿领事丘瓦金呈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份长篇报告,认为这种说法没有证据。据说,斯大林为此大发雷霆。

对保加利亚具有重大意义。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但又补充说，前希特勒德国的欧洲同盟国应该首先与其邻国签订条约：同罗马尼亚的——该条约已准备就绪，同匈牙利的，同芬兰的。

斯大林接着强调说，我们（即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应该加强经济、文化、军队之间的联系，而联邦则是个抽象的东西。

斯大林突然问到关于“我们的朋友皮雅杰”的情况，卡德尔回答说，他在从事我们的立法工作。

卡德尔就需要答复意大利政府请求南斯拉夫政府支持它取得对前殖民地控制权的问题征求了他们的意见。斯大林说，需要支持这一要求，并问莫洛托夫，他们可曾答复。莫洛托夫说，他们还没有答复，他考虑需要再等一等。斯大林对他说，没有什么可等的，应该立即予以答复。……

会谈到此基本结束。

我还要提醒一句，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的批评虽说在形式上是粗暴的，但说话的口气友好。

这个报告根据会见时所作的记录和回忆写成。

21 卡德尔等人关于2月10日会谈情况的电报

(1948年2月11日)[①]

昨天晚上21时,我们应邀到了克里姆林宫。出席会见的除我们三人外,有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和莫洛托夫的一位副手;保加利亚方面有季米特洛夫、科拉罗夫、科斯托夫。会见持续了3个小时。莫洛托夫提出了他们同保加利亚以及同南斯拉夫之间分歧的三个问题。

1.签订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无限期条约没有预先同他们协商。

2.季米特洛夫对记者的谈话。

3.向科尔察派一个师。

他们的主要结论是,就对外政策的所有主要问题经常协商的必要性。他们建议就这个方针签订一项负有协商义务的议定书。我们同意了这一点。关于会谈提出的所有问题和讨论中得出的结论,我们将口头报告。我们注意到,季米特洛夫因保加利亚分别与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之间需要建立关税同盟和协调计划而受到批评。俄国人坚决反对这样做,因为这涉及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讨论的结果是,我们没能提出任何一个我们的经济问题。为此,卡德尔想拜会莫洛托夫。我们将尽快回国。

卡德尔、巴卡里奇、吉拉斯

---

① 原档表明的日期是2月12日,但根据电报内容判断,发出电报的时间应为2月11日。

22 莫洛托夫接见卡德尔会谈纪要

(1948年2月11日)

摘自莫洛托夫日记　　2月11日24时

绝密

会谈中卡德尔同志谈及的问题有三个。

1.卡德尔同志通报说,铁托同志想在3月或4月非正式地前来莫斯科。他解释说,铁托打算讨论的问题,大概也就是他,卡德尔来莫斯科讨论的那些问题(有关阿尔巴尼亚问题等),以便消除同苏联政府相互关系中的各种误会。卡德尔同志补充说,铁托认为,鉴于阿尔巴尼亚面临的危险,届时也可能离不开南斯拉夫。

我回答说,我向斯大林报告这件事并将给予答复。

2.卡德尔同志要求,如果可能的话,尽快解决军事援助问题,以及为南斯拉夫的军事工业提供设备的问题。现在莫斯科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已就这些问题工作了数星期。① 南斯拉夫政府希望尽快解决上述问题。

我回答说,我不了解上述问题,答应查明情况,尽力而为。

3.卡德尔同志表示,今年南斯拉夫的出口能力不够抵补南斯拉夫为完成其五年计划而必须的某些货物(电力设备等)的进口。鉴于这种情况,南斯拉夫政府希望从苏联得到价值金币6 000万美元的借款,借款从五年计

① 吉拉斯率领的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于1948年1月初到达莫斯科,在1月15~16日与斯大林和布尔加宁的会谈中,苏联答应给予军事援助,但一直未办理有关事宜。

划结束时开始偿还，还清借款的最终期限根据协议决定。

我告诉卡德尔说，我无法说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答应将他的上述请求通报苏联政府，然后把结果向他通报。

……

会谈开始之前卡德尔和我签署了关于协商的议定书，现将其副本附上。

1948 年 2 月 12 日

文本确认：(波德采罗布签字①)

分送：

斯大林

贝利亚

日丹诺夫

马林科夫

米高扬

沃兹涅先斯基

维辛斯基

佐林

① 波德采罗布是苏联外交部长的高级助手。

23 关于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的议定书

（1948年2月11日）

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南斯拉夫按照它们之间于1945年4月11日签订的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所承担的义务，苏联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商定，它们有义务就涉及两国利益的所有重要国际问题进行相互协商。

本议定书从签字之日起生效，并将在上述条约的整个期限内有效。

本议定书一式两份，每份文本均以俄文和塞尔维亚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1948年2月11日于莫斯科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全权代表　莫洛托夫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全权代表　卡德尔

24 卡德尔关于同莫洛托夫会谈情况给铁托的电报

(1948 年 2 月 13 日)

铁托元帅：

昨天我在莫洛托夫那里。我签署了下述内容的议定书："苏联和南斯拉夫将就涉及两国的所有重要国际问题相互协商承担义务。"签署此议定书的还有保加利亚。之后，我谈了加快军事供应谈判和尽快签订条约的谈判问题。他回答说，他将同斯大林商量并将答复通知我们。最后我提到你想在晚些时候非正式访问莫斯科。他问什么时候，我回答说过一两个月。我们考虑到，我们继续留在这里并无益处，所以我们将于星期六返回。

卡德尔

1948 年 2 月 13 日

25 莫洛托夫召见卡德尔会谈纪要

(1948年2月13日)

摘自莫洛托夫日记　　1948年2月13日18时05分

绝密

今天我召见了卡德尔同志,对他同我2月11日会谈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回答。

1.关于铁托同志来莫斯科的问题。

我通知说,斯大林同志和其他同志当然高兴同铁托同志会见,时间如卡德尔所说,在3月或4月。

我们商定,来访日期待日后确定。

2.关于南斯拉夫申请军事援助和为南斯拉夫军事工业供应设备的问题。

我通知说,苏联政府将于最近研究这一问题,并对南斯拉夫政府作出相应的回答。

3.关于为南斯拉夫提供价值金币6 000万美元的借款问题。

我通知说,苏联政府仔细研究了南斯拉夫的请求并一致表示,这一请求不可能得到满足。这时我向卡德尔指出,1948年是我国财政困难的一年,由于财政改革,国家预算仅降低国家物价一项就每年少收入570亿卢布,其他收入也会减少。我还指出,今年我们限制了资本投入,采取了限制国家开支的严厉措施。我补充说,两年前,我们还有较大的能力为南斯拉夫提供以金币计算的贷款,但今年由于国家预算紧张,我们没有这种能力。

卡德尔同志对我的说明没作任何评论,但总的看对我的说明反应平静,表示理解苏联的财政状况。

莫洛托夫

1948 年 2 月 13 日

文本确认:(波德采罗布签字)

分送:

斯大林

贝利亚

日丹诺夫

马林科夫

米高扬

沃兹涅先斯基

维辛斯基

佐林

26 铁托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给吉拉斯和卡德尔的电报

(1948年2月13日)

吉拉斯和卡德尔：

从你们的紧急报告中看出，你们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结果。现告知你们下述情况，以供在可能的谈判中使用：我们的军事代表团团长库普列沙宁将军昨天从阿尔巴尼亚回来，他说阿尔巴尼亚军队各方面的状况都很糟糕。这支军队毫无战斗准备。没有粮食。阿尔巴尼亚北方与南方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通信联络。供给因只有一条道路和桥梁损坏而处于困境。各级司令部都很差劲。没有动员计划，可以说连最低程度的战役计划也没有。总之，一切重担都落在我们肩上，如果我们想从战斗准备的观点使这支军队多少有点用处的话。我们认为，苏联的军事教官应该处于贝尔格莱德军事教官的领导之下，并应该将他们看作是我国军队的教官。总的来说，他们对于阿尔巴尼亚军队的这种处境应负有责任。我们认为，你们应该在如果阿尔巴尼亚遭到进攻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这个问题上得到具体的答复。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种进攻一旦得逞，我们的南马其顿就将处于艰难的战略态势。如果他们那里不同意让我们在阿尔巴尼亚放开手脚的话，那么，无论是解决这支军队的供应问题，还是解决我们自己的经济问题，我们都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决定。由于当前这种状况，在为我们的边境防御采取有效措施方面，我们的双手被束缚住了。

27 莫洛托夫与卡德尔关于铁托访苏和贷款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8年2月13日)

摘自维·米·莫洛托夫日记　　绝密

发送:约·斯大林、拉·贝利亚、安·日丹诺夫、格·马林科夫、阿·米高扬、尼·沃兹涅先斯基、安·维辛斯基、瓦·佐林。

今天我叫来卡德尔同志,通知他对一些问题的答复,这些问题是他2月11日与我谈话时提出来的。

一、关于铁托的莫斯科之行。

我告诉他,斯大林同志和其他同志都很高兴与铁托同志会面,时间按卡德尔讲的在3月或4月。

我们讲好,来访的具体时间以后再定。

二、关于南斯拉夫申请军需品供应和南斯拉夫军事工业的供应品。

我告诉他,苏联政府将在近期讨论这个问题,并给南斯拉夫政府相应的回答。

三、给南斯拉夫贷款6 000万美元的问题。

我告诉他,苏联政府研究了南斯拉夫的请求,一致认为不可能满足这个要求。同时我也告诉卡德尔,1948年是我们财政困难的一年,由于财政改革,仅降低国家价格一项,国家预算收入一年就减少了570亿卢布,还有一些其他的收入也减少了。我还说,今年我们限制了投资额,并采取硬性

措施限制国家支出。我补充说，半年前我们还可能向南斯拉夫提供美元贷款，但今年由于国家预算紧张，已经没有这种可能性了。

卡德尔同志对我的说明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好像能理解苏联财政的情况，对这个说明的反应很平静。

维·莫洛托夫

28 拉夫连季耶夫与铁托关于苏南经济关系问题的谈话记录(摘录)

(1948年3月10日)

摘自 А.И.拉夫连季耶夫日记　　秘密

我拜访了铁托。卡德尔在铁托办公室,整个谈话他都在场。

一、我对铁托说,明天要飞往莫斯科,因为已有两年没有回苏联了。计划在苏联不多待,暂时把工作托付给阿尔米亚尼诺夫同志[①]。……

布·铁托显然有些激动,问我知道不知道克鲁季科夫[②] 在外贸部对南斯拉夫贸易代表团说,苏联今年不可能与南斯拉夫签订贸易协议的事,这样做有什么理由。

我回答,正式的消息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然后铁托表示,南斯拉夫政府不明白,为什么苏联拒绝和南斯拉夫签订贸易协议,而同时正在和其他国家签订这样的协议。铁托接着说,众所周知,南斯拉夫在战争时期是苏联的忠实盟友,并且南斯拉夫的民主制度比其他东欧国家更巩固。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没有贸易协议,这个问题不能像在外贸部里的声明那样向南斯拉夫人民解释,而这一点又不能向人民隐瞒。此外,停止南苏贸易会严重地影响南斯拉夫五年计划的完成,尽管南斯拉夫无论如何也要努力完成五年计划。南斯拉夫政府最不能理解

① Д.М.阿尔米亚尼诺夫,时任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代办。

② А.Д.克鲁季科夫,时任苏联外贸部第一副部长。

的是,这个决定是在南斯拉夫代表团到达苏联两个月之后才通知它的。南斯拉夫在此期间一直期望会签订这个协议。不然,南斯拉夫可以在此期间采取相应的步骤,扩展与其他国家的贸易。

铁托此时表示,没有贸易业务,无疑将加重南斯拉夫非贸易支出的困难。南斯拉夫将没有能力支付正在苏联学习的学生的膳宿费用,因为国家没有这部分外汇。南斯拉夫不得不减少自己在苏联的学生。这个关于不签协议的决定还牵涉到军事供给,因为根据贸易协议,应向军队提供装甲车和原油。

铁托重复了几次说,莫斯科的这个决定让人不能理解。接着他表示,这个决定与两国的友好关系是不相容的,“可以这样说,这样对待南斯拉夫,我们感到委屈”。铁托说,也许,苏联对南斯拉夫有些不满意,但即使在一个家庭中也有兄弟间的不和。“如果问及此事”,铁托请求把这一切转达给苏联政府。当我自言自语地说“如果只是问起”时,铁托改正说,那么,他是作为部长会议主席,并且是在自己的第一副主席在场的情况下,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

我回答,我将把铁托关于此事的声明通报给我的政府。

后来,铁托提出卢布和第纳尔的换算问题。按他的意见,现行的汇率实在对南斯拉夫太不利了,虽然南斯拉夫政府不止一次地提出这个问题。我问,是谁,什么时候在莫斯科提出过这个问题。铁托回答,波波维奇大使不止一次地讲过此事。卡德尔补充说,在去年参加外长会议例会期间,他本人与米高扬同志谈过这事。铁托接着说,南斯拉夫政府的这个请求,苏联没有给予满足。相反,按不久前收到通知,对用于外交需要的卢布和第纳尔又制定了新的比价:现在莫斯科要求 6 个第纳尔兑换 1 卢布,取代了过去确定的 4.2 第纳尔兑换 1 卢布的比价。①

---

① 战后,南斯拉夫人民银行接受了苏联国家银行所建议的卢布与第纳尔的比价,这个根据双方各自的外汇牌价确定的比价表面上是平等的,但实际上,由于南斯拉夫只能根据自己实际的外汇购买能力确定第纳尔对美元的比价,而苏联可以随意提高卢布对美元的比价,从而也就提高了卢布对第纳尔的比价。1945 年 8 月 28 日,南斯拉夫要求进行谈判,重新审议所规定的比价。10 月份又重复了这个要求。1945 年 12 月 4 日,苏方回绝了南斯拉夫的建议。此后,南斯拉夫提出了几种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具体结算方式。

铁托表示,组建海军舰队的问题,也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苏联军事代表对南斯拉夫的代表们说,组建海军舰队的计划实在太庞大。建议缩减这个计划,而着重于建设海防舰队。当南斯拉夫代表询问,如果缩减计划,南斯拉夫可以指望苏联方面的哪些帮助时,苏联军事代表没有给予任何答复。

铁托接着说明,关于缩减组建海军舰队计划的问题,南斯拉夫政府还没有研究。政府可以缩减计划,但希望知道,如果这样做,他们可否指望苏联在这方面的帮助。铁托还指出,苏联代表没有给予任何回答,甚至对南斯拉夫要求提供相应图纸的询问也不作回答。

卡德尔声称,这个计划里的内容,在莫斯科都已说过,而关于组建军事工业中这个计划过于庞大的问题,没有得到苏联方面给予帮助的任何具体答复。

我回答,我在莫斯科将通报这些问题。

29 莫洛托夫就苏南关系一些问题致铁托电

(1948 年 3 月 13 日)

拉夫连季耶夫前来通报了一些情况。①

一、关于加加里诺夫在阿尔巴尼亚举杯祝酒一事已按照我的指示进行了调查。业已查明,卡德尔所获得的消息是不正确的,因为加加里诺夫没有说过任何侮辱性的话。显然,我们或者被误会了,或者受到了诽谤。②

二、关于苏联代表克鲁季科夫拒绝与南斯拉夫签订 1948 年贸易协定的报道不符合事实。众所周知,现在有一个苏南 1947 ~ 1948 年贸易协定。这个协定到今年 5 月 31 日期满。显然,在此之前肯定要签订 1948 ~ 1949 年的新协定。看来,在这方面我们也被误会了,或者受到了诽谤。③

---

① 拉夫连季耶夫大使于 1948 年 3 月 11 日离开贝尔格莱德回到了莫斯科。

② 1948 年 2 月 22 ~ 23 日在地拉那庆祝苏联建军节的招待会上,苏联驻阿尔巴尼亚代办加加里诺夫在回答南斯拉夫公使约瑟夫·杰尔贾为斯大林和铁托祝酒的建议时说:"如果铁托赞成民主联盟的团结,我就为他干杯。"杰尔贾当即进行了驳斥,并将此事报告本国政府。1948 年 2 月 28 日,卡德尔向拉夫连季耶夫提出了这个问题。

③ 1947 年 7 月 5 日苏联和南斯拉夫签订了一个为期两年的换货和支付协定,同时还签订了截止于 1948 年 5 月 31 日的换货议定书(不是贸易协定)。1947 年 12 月南斯拉夫贸易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希望扩大与苏联的贸易。1948 年 1 月 20 日苏联外贸部长米高扬会见南斯拉夫代表时说,苏联政府同意南斯拉夫贸易代表团于 2 月 10 日左右来莫斯科,进行谈判签订新的换货议定书。但 2 月 22 日苏联外贸部表示无意进行签订新的议定书的谈判。2 月 26 日克鲁季科夫以苏联政府名义正式宣布了这一意见,并要求南贸易代表团不要来莫斯科了。其理由是,南斯拉夫向苏联供货的速度很慢,前一个议定书规定的供货要拖延到 1948 年 5 月 31 日以后才能完成,因此,要做的只是到 1948 年底再开始谈判签订 1949 年的议定书。

三、众所周知，卢布对第纳尔的汇率问题如同对所有其他外国货币的汇率问题一样，已经在卢布与美元比价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来自外国的任何异议。持异议的只有南斯拉夫。如果我们现在把第纳尔作为例外，我们就将动摇卢布汇率，对此，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的。

四、就南斯拉夫建设海军和军火工业的问题，有必要再安排几次南斯拉夫代表同苏联代表的会晤。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过给南斯拉夫以力所能及的援助。主要在于南斯拉夫要有一个考虑到我们和你们近期能力的切实可行的计划。否则，作出的计划可能是纸上谈兵，从实际建设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价值。①

① 1948年1月初，南军事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与苏联军方领导人谈判提供军用物资和苏联帮助南实现建立海军的计划的问题。开始时，斯大林表示可以完全满足南斯拉夫的请求，但是到1月底2月初，苏联却开始怀疑实现南斯拉夫提出的计划的可能性。苏联代表认为南斯拉夫的要求超出了实际需求和苏联的供应能力。3月9日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布尔加宁和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建议南斯拉夫代表重新提出一个更现实和更适度的计划。随后谈判终止。铁托在3月11日会见拉夫连季耶夫时表示，南斯拉夫认为，苏联方面已决定延缓对南斯拉夫的军事援助。

30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南斯拉夫意识形态问题给苏斯洛夫的报告

(1948年3月18日)

绝密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莫斯科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安·苏斯洛夫同志

南斯拉夫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观察在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和研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物的言论,可以得到这一结论的根据。主要的错误如下所述:

(一) 在制定国家实际的工作任务和确定今后的发展前景上,南斯拉夫领导人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用其来指导自己的实践。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主要原理,而"实践家企图抛弃理论就违背了列宁主义的全部精神,是对事业的最大危害"(斯大林语)。

(二) 南斯拉夫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及联共(布)这个久经考验的和全世界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步力量都承认的领导力量,采取了不友好和不正确的态度。

（三）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陶醉于巩固人民民主国家和创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先决条件等方面的成绩，过高地评价自己的功劳，在估计自己今后的前途和实行的对外政策中，妄想作为巴尔干地区和多瑙河流域国家的领导力量，已成为冒险主义的人物。对于一些兄弟党表现出不能容许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四）南斯拉夫领导人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困难估计不足。忽视富农作为阶级产生的可能性及其作用，在对待富农的政策上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态度。

（五）在确定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组织建设中实行有害的、实质上是取消主义的政策，把党与民族阵线混为一体。

一、忽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共产党在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斗争中，在联合自己周围所有进步力量的事业中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首先说明他们的所有实践活动是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为指导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十分重视研究理论问题。他们把理论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将革命理论变为工人运动的巨大力量。在俄罗斯工人运动初期，列宁在自己的经典著作《怎么办?》中指出，只存在着两种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没有中间的思想体系。列宁写道："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①

按列宁指示的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不重视理论问题的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实践是有缺陷的和危害极大的，并且正在南斯拉夫工人运动中酝酿着危险性。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完全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分析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中央书记们——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的言论，就

① 参见《列宁全集》，5卷，351～352页，人民出版社，1959。

可以找到这一结论的根据。他们根本不关心在共产党员和非党的南斯拉夫人民群众中宣传马列主义。

在其他兄弟党(比如罗马尼亚)公开宣布自己的最终目标是建成共产主义,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党的思想体系时,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出于不可理解的原因,害怕向自己的人民说明:党必须遵循先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思想体系。

所有南共中央书记战后的讲话都是一些没有经过充分思考的、错误的和有害的观点的大杂烩,不论在什么场合,都不能作为严肃的针对南斯拉夫现实的实践和阐述国家今后沿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理论专著。这首先说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没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原理,忽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没有把它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比如,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铁托在 1945 ~ 1947 年所做的 53 个讲话中,仅有一处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来证明南斯拉夫发展道路的正确性。这是三年中惟一的一次,铁托在讲话中称呼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名字,而其余的 52 次讲话,完全忽视了作为指导所有共产党行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意义和作用。

在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会议的报告中,铁托描述在人民阵线中共产党发挥组织领导作用而取得成绩的原因是:"由于上述革命发展阶段的独特性质,采用了具有南斯拉夫特点的新的方法。"他一句也没有讲共产党的决定性意义首先在于其指导思想是科学和先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甚至在报告的结尾部分,铁托说明现代形势的基本特点时,他对伟大的战无不胜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的功绩只字不提。在他所有的讲话中,没有一字提到统帅斯大林同志——我们时代的伟大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事业的天才继承人。铁托一句也没有讲共产党的伟大先锋作用,首先是联共(布)的作用。

这些事实表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完全忽视了理论问题。铁托 1945 ~ 1947 年的文章和发言全部是讲建设和巩固新国家的实际任务。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好像定有规矩,从来不讲自己关于南斯拉夫发展道路的理论观点。甚至在共产党的理论喉舌——《共产党人》杂志

上(该杂志偶尔出版,从1946年10月起共出了3期),几乎没有专门讨论南斯拉夫发展道路的文章。在该杂志第二期发表的《新型民主制度的原则》一文中,铁托写道,各个国家达到美好公平社会制度的道路,不应该也不可能都在十月革命中被确定好。"这些途径可以有许多共同点,但除了共同之处,每一个国家特殊的条件和内部发展情况决定了他们达到和建立一个美好社会体系所应走的、有自己特色的道路。而在这种具体条件下,我们要达到的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制度。"

这说明,铁托没有把在南斯拉夫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看成共产党的最终目的。南斯拉夫人民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明显地被他限定在"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上。这个理论贯穿在他所有的讲话和文章中。

铁托在1946年11月与南斯拉夫作家的谈话是他忽视马列主义理论意义的例子。在对作家的讲话中他一句也没有说党在培养作家事业上应起的作用,没有讲文学的党性和作家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全部讲话只限于作家的实践和组织问题。

南共中央负责宣传的书记米洛凡·吉拉斯1947年在《战斗报》发表《现时期党的任务》一文,也对党的任务和目的做了限定,他没有讲清共产党应当为什么目的而斗争,南斯拉夫应当走什么道路,比如,吉拉斯在文章中写道:

"只有认清发展的目标和途径,全党动员起来,不惜自己的力量,不怕牺牲,国家才能走出困境。"

综上所述,证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不向南斯拉夫人民宣传共产党的最终目标,不讲南斯拉夫今后的发展道路,只局限于达到和加强人民民主制度的目的。

二、忽视苏联作为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决定性力量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主要的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在它周围团结和联合了全世界的民主和进步力量。

每一个人都知道,是苏联及其军队通过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抵抗了法

西斯的野蛮行径，挽救了人类和世界文明。中欧和东南欧国家，包括南斯拉夫的人民，都感谢苏联的帮助和支持，使他们获得了在新民主主义制度初期建设自己的生活的可能。

现在英美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帮凶正在疯狂地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是惟一能够真正抗拒国际反动派一切阴谋诡计的现实力量。

由此得知，世界上所有真正的民主力量应该全心全意地支持和加强苏联的权威，将其作为和平和民主的堡垒。

从这个方面看来，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对苏联关系上不友好的事实和奇怪的立场至少应引起特别的重视。

他们在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极力低估苏联及其军队在南斯拉夫解放事业和战后建设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比如，南共中央书记米洛凡·吉拉斯 1947 年 1 月在《战斗报》上发表了《南斯拉夫的发展前景》一文，在讲述南斯拉夫人民的成就时他写道："我们的人民取得的一切成绩，是因为成功地找到了自己的力量所在，不但运用了红军在战争中的作用，还利用了苏联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在这篇文章中，吉拉斯还由于"我们的某些朋友"（指苏联的评论家们）把南斯拉夫和一些新民主制度的国家相提并论而感到委屈。他写道：

"简直不明白，有一些人自认为是学者，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却看不到在南斯拉夫国内发生的深刻的变化，在这方面把其他一些国家和南斯拉夫相提并论。

"每一个聪明的南斯拉夫人都懂得的事情……我们的许多朋友却经常搞不明白。"

南共中央书记卡德尔在华沙九国共产党协商会议上的报告中做了如下声明："红军在 1944 年协助了我们的解放，这个事实更加巩固了我们在人民中的地位。"

铁托极力过高估计南斯拉夫在民主主义阵营中的作用和角色，而忽视苏联的作用，他在 1947 年 6 月与保加利亚新闻记者谈话时声称："保加利亚人和苏联一样，应当成为指明正确解决民族和社会问题的灯塔。"在这个谈话中铁托还说，在接近保加利亚人的关系上，"谁也没有权利在这件事

上干涉我们”。

1947年8月25日铁托在和克罗地亚农民的谈话中说:“我们和英国、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对话,是相互平等的。我们声明,不允许像对待殖民地的人民那样对待我们。”

1946年12月南斯拉夫政府拒绝接待苏军歌舞团,尽管歌舞团的出访是应他们的邀请。这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不能友好地对待苏联的又一个例子。

联系青年群众的南斯拉夫少先队组织,组织机构和标志物(旗子、领巾等)与童子军相似,当苏联青年代表团的成员问,为什么南斯拉夫少先队没有采用与我们一致的形式——红旗和红领巾时,拉托·杜戈尼奇(原青年群众中央会议主席)回答说,他们认为不适宜“模仿苏联的少先队组织”。

对苏共中央关于穆拉杰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历史性决议,南斯拉夫共产党机关报《战斗报》只用了几行字,做了简短和不大明白的介绍。同时报纸完全抛弃了决议的原则,只讲俄罗斯的古典音乐。就这样,《战斗报》歪曲了苏共中央决议的实质,错误地向南斯拉夫读者传达了苏共中央的这一历史决定。

之所以有必要在南斯拉夫刊物上全文刊登苏共中央这一决议,还因为这个国家受西欧形式主义音乐的影响很大。

近来,铁托在自己的公开发言中忽视苏联在团结所有进步和民主力量的事业中、在与英美反动派斗争的事业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他今年2月10日在塞尔维亚突击手代表会议的讲话中说,他不赞同联共(布)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经验,不赞同把这一运动作为新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最高形式。虽然铁托这篇讲话的大部分内容是讲国际形势,但他一句也没有说苏联在反对第三次世界大战挑衅者斗争中的作用。铁托没有参加今年2月23日贝尔格莱德苏军建立30周年纪念晚会这一事实,是颇具代表性的。

今年3月6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南斯拉夫与苏联文化合作协会第二次会议,没有一个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出席这个会议的开幕式。

铁托在1947年9月举行的第二次人民阵线代表会议的报告中说到新

民主制度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时，完全忽视了苏联是这个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这一事实。

三、过高地估计南斯拉夫在发展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成就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总书记铁托，过高地估计自己在建设和巩固南斯拉夫人民民主国家中所取得的成就，表现出要在巴尔干地区和多瑙河流域国家担任领导角色的企图。在决定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问题时，南共领导人表现出民族狭隘性和局限性，不考虑其他国家和兄弟共产党的利益，忽视其他民族人民的民族尊严。

举例来说，南斯拉夫政府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正确对待的里雅斯特问题，在与英美政府解决此问题的过程中，忽视民主力量的共同利益，使斗争复杂化。出于同样的原因，南斯拉夫共产党还在公开的刊物上，包括在共产党机关报《战斗报》上，不正确地、不能容忍地尖刻批评了意大利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陶里亚蒂同志的行为。1946 年 11 月保加利亚宪法草案公布，南斯拉夫报纸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南共中央书记卡德尔的助手共产党员戈尔什科维奇在 1946 年 11 月 14 日的《战斗报》上指责保加利亚政府侵犯了马其顿人民的民族权利，文章中写道：

“明显地，这样的安排……与真正民主地解决民族问题、尊重所有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和民族统一，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1946 年 12 月南共书记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在贝尔格莱德对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书记契尔文科夫申明，他们不相信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中央委员会，并认为他们在马其顿问题上的路线是错误的。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中央委员会这种做法是企图得到巴尔干地区的领导权。

尽管南斯拉夫政府和阿尔巴尼亚签定了友好和互助条约，但在整整一年里都没有完成这个条约的条款，没有给予阿尔巴尼亚共和国以经济上的帮助。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对阿尔巴尼亚争取直接与苏联取得联系非常妒忌，按照他们的意见，阿尔巴尼亚只能通过南斯拉夫政府与苏联联系。南斯拉夫领导人控制这个国家，就像是在自己的殖民地一样。

南共中央的书记们试图向兄弟共产党的领导人建议,争取让南斯拉夫共产党充当巴尔干地区和多瑙河流域国家领导的角色。比如,卡德尔和吉拉斯曾建议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人,把奥地利划分成两部分。不难理解,如果奥地利的同志听从了南斯拉夫领导人这个冒险主义的建议,这个危害极大的路线会导致什么结果。

根据奥地利共产党中央书记菲连贝格的声明,南共中央委员会的负责人相当自信地认为,南斯拉夫要比苏联更早地建成共产主义。

四、过低地估计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富农的危险

南斯拉夫领导人醉心于自己在经济建设和巩固政治权力中取得的成就,没有重视国内阶级斗争的事实,并低估了这项斗争的意义。通常,他们只是把对反动势力的斗争和民主制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并没有将它们用于阶级斗争。例如,铁托的讲话没有一处谈到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特别是与富农的斗争,甚至也不使用"富农"这个概念,他称富农为富裕的和殷实的农民。

铁托在自己关于五年计划和发展经济的讲话中,用很大篇幅来谈农业经济,但使用的又是"农民"这个词,而一个字也没有提南斯拉夫农村政治上的困境及富农反对人民政权的残酷斗争。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没有召集过"人民议会"的代表,让他们提高警惕性,提醒他们在国内,特别是在农村,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讲述富农在反对人民政权时所采用的方式和方法。

应当指出,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政治形势下,这种宽容没有任何的根据。主要是农业国的南斯拉夫(农村人口占将近80%)的农业经济,现在还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

土地在南斯拉夫没有实行国有化,而是归农民私人所有。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土地国有化不适合南斯拉夫,打算建设在土地私人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农庄。应当看到,南斯拉夫有近200万占有土地不足5公顷的农户。与此同时,却有很大比例的富农户。因为按1946年施行的农业改革

法规定,私人占有耕地的最大限额为25~35公顷。这样的做法,现在在南斯拉夫农业经济中很有可能助长富农经济,而它们在村子里是反动派的基础,对政府的一切政策都做出坚决的抵抗。

同时,工业生产及其他重要国民经济部门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南斯拉夫的农业经济却是小农生产形式,正如列宁指出的,从这个小农经济中,每日每时都在产生出大批的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分子又会以一切手段,不惜代价地维持自己的生存。

列宁号召工人向富农阶级进行斗争,1918年他在《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一次决战!》一文中写道:

"到处是贪婪残暴的富农、地主和资本家联合起来反对工人与一般贫民。到处是富农以骇人听闻的血腥手段摧残工人阶级。到处是富农和外国资本家结成联盟来反对本国工人阶级。"①

列宁就是这样评价富农阶级的:它是工人阶级凶狠的敌人,反对它的斗争是工人阶级的先锋共产党的重要任务。

众所周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1929年苏联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的问题,赋予了极大的意义。党和政府的这个措施所具有的意义及其产生的后果与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一样的。

按照列宁和斯大林所说的对富农进行斗争的意义,明显地看出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对待富农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政策。它使人联想起布哈林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众所周知,布哈林也是看不到农民分化的事实,在他那里原有的社会集团消失了,而只剩下一个被称为农村的灰色的点。铁托1946年在萨格勒布选举前所作的演说可以证明这种比照:

"我对农民讲他们是我们国家最坚固的基础,这不是为了获得他们的选票,而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如此。"

可见,铁托承认人民民主国家的最坚固的基础不是工人阶级,也不是其先锋队——共产党,而是所有的农民,其中包括富农——这些对人民政权的一切措施已经在进行疯狂抵抗的阶级。富农的抵抗在去年粮食收购

① 参见《列宁全集》,28卷,37页,人民出版社,1956。

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经常阻挠粮食收购计划,蓄意销毁他们的粮食。富农分子渗透到人民政权的地方组织中,使用各种非法手段,企图引起劳动农民对政权机关的不满。

去年10月铁托在参战者代表大会上发言说,人民政权的地方组织在收购粮食的过程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很多时候粮食是从贫苦的农民那里夺来的,而他们的妻子、丈夫牺牲在战争中。铁托答应,归还贫苦农民的粮食,纠正错误。但他没有分析,为什么会犯下这些错误,没有从南斯拉夫农村阶级斗争的角度去探询错误的原因。

由此可见,南斯拉夫领导人,首先是总书记铁托,对作为阶级的富农的增加和作用估计不足,这个阶级不可避免地会对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疯狂的抵抗。南斯拉夫领导人忽视列宁和斯大林所指出的,共产党应当唤醒工人阶级和被剥削的农村群众,提高他们的战斗性,动员他们做好反对城市和农村的资产阶级分子、反对阶级敌人抵抗的斗争准备。

五、对共产党在人民民主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采取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态度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在南斯拉夫的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确定共产党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上,必然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组织原则的破坏。

在一系列党的建设和党的政治工作问题上,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没有遵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理论——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队伍,只有用革命的理论和社会发展的知识武装自己,才能领导南斯拉夫全体劳动群众。

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共产党宣言》一书指出,共产党应担当起思想领袖的作用和无产阶级的组织者。工人阶级政党的存在是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政治成熟的最高阶段。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运用于实践,没有用新的科学成就来发展和丰富革命的理论。在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中,仅

用纯粹的经验为指导,陷入了经验主义。

在1947年9月九国共产党协商会议之前,南斯拉夫共产党实际上是处于半合法的地位。只是在协商会议上,卡德尔和吉拉斯在报告中才声明共产党的存在、它的组成人员及关于共产党工作的一些意见。

1947年9月前,没有以党的名义发表过一篇文章和公开做过一次讲演。

过去和现在都把党混淆和融合在"人民阵线"① 中。自新南斯拉夫成立以来,从共产党的中央到地方基层党组织,都没有以共产党的名义发布过任何一个决定。真正地背离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要组织原则——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南共中央总书记铁托担任国家所有最重要的职务,实际上是一个人领导着国家所有社会政治生活和对外政策。

这都是因为他缺乏最起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知识,是他的领袖欲和自我欣赏、自视过高造成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党的机构成了国家和经济部门的某种附属品。在全国,除了波斯尼亚,部长总理们都是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的第一书记,共产党中央组织书记兰科维奇同时管理干部,又是南斯拉夫政府内务部的部长。

不召开共产党中央的全体会议,不公布党中央和政治局的决议,不吸引党员阶层参与完成党的任务。所有重要问题都是由小集团来决定的(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

国家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生活的所有重要决议,都不是以党的名义,而是以"人民阵线"的名义传达到人民群众中。南斯拉夫共产党既没有纲领,也没有章程。在1947年9月第二次"人民阵线"代表大会上,铁托声明,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纲领,"人民阵线"的纲领(1945年8月通过)就是共产党的纲领。铁托同时承认,"人民阵线"里也有一些资产阶级党派,并且指出,这不会削弱"人民阵线"的统一,而只会加强它。卡德尔在华沙九国

① 南斯拉夫"人民阵线"是全南斯拉夫的政治组织。其前身是南共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成立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解放阵线",1945年8月改名为"人民阵线"。1953年,"人民阵线"改组为"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

协商会议的报告中再次重申了铁托的这个讲话。

这样看来,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加入到“人民阵线”的资产阶级党派、富农、商人和小工厂主支持它的纲领,也就是说,他们和共产党员遵循的是同一个纲领。

铁托的这个明显错误和有害的声明,直到报纸发表吉拉斯华沙九国协商会议上的发言“为持久的和平和人民民主”时,由于报纸编辑部的一再坚持和要求才得以改正。

非常有必要召集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共产党的纲领和章程,及选举党的领导机构,而且时机也已成熟。但共产党的领导人不知什么原因,无限期地拖延党代会的召开。忽视党的建设,背离了布尔什维克的基本组织原则,这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内最大的危险,会导致取消共产党,将党淹没在“人民阵线”之中。

* * *

综上所述,说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指导自己的实践和确定南斯拉夫今后的发展前途方面,他们没有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能够给予革命运动以信心,有助于对周围事件内部联系的理解,并帮助实践家们“不仅能理解现在阶段如何运动和运动的方向,还能知道不久的将来它们应该如何运动和运动方向”(斯大林语)。

南斯拉夫共产党对待苏联和兄弟党的不友好态度导致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错误使他们在推行国内外政策上成了资产阶级的应声虫,在南斯拉夫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蕴藏着极大的危险。

Л.巴拉诺夫

В.莫申托夫

В.列萨科夫

31 铁托就苏南关系一些问题给莫洛托夫的信[①]

(1948年3月18日)

就您3月13日的来电,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现答复如下:

一、有关加加里诺夫的表现,我国政府注意到您来电中所作的解释,至于向我国政府提供信息的南斯拉夫代表,我国政府认为根本不存在诽谤的问题。

二、关于贸易条约,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得出结论认为,苏联政府拒绝签订1948年5月至年底的贸易议定书,事实如下:

2月26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贸部副部长茨尔诺布尔尼亚同志[②] 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商务代表日贝尔纳拜会了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克鲁季科夫。当时他向他们通报说,苏联外贸部改变了自己原先的观点,不能签订5月至年底的贸易议定书。他宣布,现在没有必要派遣南斯拉夫贸易代表团来莫斯科,关于(签订)1949年(贸易议定书)的谈判只能在今年底举行。茨尔诺布尔尼亚随即询问,这是克鲁季科夫的

---

① 苏联驻南大使馆代办阿尔米亚尼诺夫3月19日向苏联外交部报告,铁托与他会谈时告知,对莫洛托夫电报的答复"是以信件的形式并派信使送往莫斯科的,以便通过自己的使馆转交"。

② 波格丹·茨尔诺布尔尼亚(1916—?),历任南斯拉夫外贸部副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共和国总统秘书长等职。

个人意见,还是他可以报告本国政府的苏联政府的观点。他得到的回答是,这是苏联政府的观点,他可以将此观点报告本国政府。在得到克鲁季科夫明确表示(签订)1949 年(贸易议定书)的谈判只能在年底举行以后,茨尔诺布尔尼亚立即返回了贝尔格莱德。

根据茨尔诺布尔尼亚的这一报告,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自然得出结论:苏联政府不准备签订 1948 年 5 月至年底及至 1949 年 5 月的贸易议定书,虽然这一议定书是由期限为两年的南苏条约所规定的。① 然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满意地注意到您来电中所作的表示,即苏联政府愿意签订 1948 ~ 1949 年的贸易议定书。但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提到上述信息的同时认为,因此就存在某种形式的诽谤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三、至于第纳尔与卢布的汇率,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未提出过全面变动汇率的问题,因为它知道这一汇率是以卢布与美元的比价为根据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只是请求在某些部门采取一些特殊做法,因为在那些部门卢布与第纳尔的官方比价特别沉重地加重了南斯拉夫对苏联的财政义务,例如对于文职顾问、军事顾问和教官,以及在苏联学习的我国干部,等等。

四、南斯拉夫关于军火供应的建议是以过去与苏联代表举行的几次会谈为基础的,这些苏联代表并不认为南斯拉夫的计划过分。斯大林同志曾亲自赞同南斯拉夫应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苏联将援建军火工业。② 但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已注意到苏联代表的最新意见,虽然它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南斯拉夫的物质能力,而且它的专家们也正在制定新的、将大大压缩的建议。十分清楚,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考虑到苏联战后恢复和建设向苏联生产部门提出的大量需求,所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只是期待苏联在其能力许可范围内提供援助。以后的计划规模取决于我国自身的能力,这种能力也是相当可观的。南斯拉夫政府之所以特别重视这一计划,原因在于它认为南斯拉夫

---

① 这里指的就是 1947 年 7 月 5 日苏南签订的"换货和支付协定"。

② 指斯大林在 1946 年 5 月 27 日与铁托会谈时的讲话(参见文献 8 和文献 9)。

——鉴于其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当然是在其能力的范围内。

由于这一切，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尽可能快地继续进行关于1948年贸易交换及军火供应的谈判。

1948年3月18日

32 莫洛托夫关于撤回苏联专家致铁托或卡德尔的电报

(1948年3月18日)

兹获悉,基德里奇的助手斯尔曾蒂奇[①] 向苏联商务代表列别杰夫声明:根据南斯拉夫政府的决定,不准向苏联机构提供经济情报。这一消息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曾有一个苏联政府机构可以自由地获得这类情报的协议。[②] 更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南斯拉夫政府机构没有预先通知、也未解释原因而单方面地采取了这一措施。苏联政府把南斯拉夫政府的这种举动看作是对苏联驻南斯拉夫工作人员的不信任行为和对苏联不友好的表现。

显然,苏联驻南斯拉夫工作人员在受到如此不信任的情况下,他们认为不能保证自己不受到来自南斯拉夫机构的类似的不友好对待。

有鉴于此,苏联政府已指示黑色金属冶金部、有色金属冶金部、化学工

---

① 斯尔曾蒂奇,时任南斯拉夫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② 1948年3月9日拉夫连季耶夫致电莫斯科通报说:斯尔曾蒂奇向商务代表列别杰夫声明,南政府有一个决定,禁止国家机构和机关向任何人提供任何经济情报。因此,尽管从前有一个协议,他也不能向列别杰夫提供有关的资料。该决定还责成国家安全机构对这件事情进行监督。斯尔曾蒂奇还说:"基德里奇打算亲自同列别杰夫谈这件事。有必要提醒的是,南斯拉夫政府在去年的夏天就已做出了这个决定。当时,我就同卡德尔谈过,于是他便指示基德里奇向我们提供必要的资料。"在这个协议的基础上,列别杰夫从经济委员会得到了一些有关经济问题的情报。显然,斯尔曾蒂奇的声明反映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对苏联态度的改变。关于这一通报,可参见1948年3月27日斯大林致铁托的信(文献37)。

业部、电力部、邮电部和卫生部，立即把他们各自的所有专家和其他工作人员撤回苏联。

33 铁托关于苏联撤回专家致莫洛托夫的信

(1948 年 3 月 20 日)

致苏联外交部长维·米·莫洛托夫

3 月 18 日,巴尔斯科夫将军① 向我们通报说,他收到了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② 的一份电报,电报通知我们,苏联政府已决定立即撤回其全部军事顾问和教官③,理由是他们"处于不友好行为的包围之中",这就是说,他们在南斯拉夫没有受到友好的待遇。

苏联政府如果愿意的话,当然可以随时撤回自己的军事专家,但是我们对苏联政府为做出这一决定所提出的理由感到震惊。根据这一指责,我们调查了我国基层的领导人对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的态度,深信撤走他们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在他们驻南斯拉夫的整个期间,对他们的态度不仅是友好的,而且确切地说,是兄弟般的和最殷勤的。在新南斯拉夫,对所有的苏联人一贯都是如此。因此,苏联政府没有把做出这一决定的真实原因告诉我们,这确实使我们感到惊讶,使我们不能理解,使我们十分痛心。

其次,1948 年 3 月 19 日,阿尔米亚尼诺夫代办拜会了我,并通报了一

---

① A.H.巳尔斯科夫少将,时任驻南斯拉夫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

②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1895—1975),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武装力量部(即国防部)部长。

③ 根据铁托的请求,第一批苏联军事教官于战时,即 1944 年秋天被派往南斯拉夫军队。苏南之间的这种合作形式一直持续到战后。苏联的顾问和教官被派往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部和各级参谋部,以及一系列军事机关和部门工作。

份电报的内容，即苏联政府还下令从南斯拉夫撤回全部文职专家。这一决定的理由也使我们感到费解和惊讶。基德里奇的助手斯尔曾蒂奇确实曾向贵国商务代表列别杰夫说过，根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项决定，他无权向任何人提供重要的经济情报，如果苏联人想得到这种情报的话，应当到更高一级领导机关，即南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去索取。同时，斯尔曾蒂奇对列别杰夫说，他可以向基德里奇主席索取他感兴趣的情报。你们的人早已被告知，苏联政府的官方代表可以直接从我国领导人那里获得一切必需的和重要的情报。

我方作出这一决定的根据是，过去我们各部的公务人员不管需要与否，都对任何人提供情报。这就意味着他们向各种各样的人泄露国家经济机密，而这些机密可能有时确实已落到我们共同的敌人手里。

我们从未签署过任何如来电中所说的专门协定，规定我们的人不经过政府或中央的同意，就有权向苏联经济工作人员提供与其本职工作无关的经济情报。每当苏联大使拉夫连季耶夫同志向我本人索取必要的情报时，我都毫无保留地予以提供，我们其他主要领导人也是这样做的。如果苏联政府不赞同我们这一从国家观点出发的立场，我们将感到非常惊讶。

同时，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拒绝所谓对苏联驻南斯拉夫专家和代表“不友好和不信任”之类的理由。迄今为止，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抱怨过这类事情，虽然他们每人都有机会向我本人诉说，而我从来没有拒绝过接见任何苏联人。我们所有主要领导人也都是这样。

由此可见，上述理由不是苏联政府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我们希望苏联政府坦诚相告这是怎么回事，并向我们指出一切在你们看来有碍我们两国之间良好关系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一事态的发展对两国都是有害的，而一切有碍我们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东西迟早都必须消除。

苏联政府正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获取情报，我们认为对待这种情报应当慎重，因为这种情报不一定都是客观的、准确的和出自善意提供的。

请再次接受我的敬意。

部长会议主席　约·布·铁托

1948 年 3 月 20 日

34 莫洛托夫关于召回苏联专家与波波维奇的谈话记录

(1948年3月24日)

摘自维·米·莫洛托夫的日记　　绝密

发送:约·斯大林、拉·贝利亚、安·日丹诺夫、格·马林科夫、阿·米高扬、拉·卡冈诺维奇、尼·沃兹涅先斯基、尼·布尔加宁

……相互问候以后,波波维奇说,从贝尔格莱德来的特派信使带着铁托的两封信,由他全权代表转交给莫洛托夫,铁托信的原文是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写的,但转交给他们的已经翻译成了俄文。

莫洛托夫接受了信笺,说已有通报得知特派信使带信给苏联政府。

波波维奇说,由于在专家问题上发生了这样的误会,他应当表示抱歉。

莫洛托夫声明苏联政府不得不在一些方面对南斯拉夫做出反应,鉴于在南斯拉夫工作的苏联专家问题,苏联方面在贝尔格莱德已发表了两个声明。①

波波维奇请莫洛托夫取消从南斯拉夫召回军事顾问和专家的指示,波波维奇说:"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苏联专家将如何应付,他们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需要的。"对于肇事的南斯拉夫一方,波波维奇说,将用最严厉的方法惩处,但不应因此而损失南斯拉夫的利益。

---

① 指1948年3月18日和19日苏联领导人关于从南斯拉夫召回军事顾问和苏联专家的声明。参见前面文件32。

莫洛托夫说，造成苏联专家问题上的责任完全在于南斯拉夫政府。苏联政府在贝尔格莱德的外事交涉中已经说得很明白。

莫洛托夫接着指出，他将过目今天交来的信，但苏联政府完全清楚，造成苏联专家问题上的错误，完全是在南斯拉夫政府身上。

波波维奇问：难道不能纠正现状？因为召回专家将给南斯拉夫的经济恢复带来损害。

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已经通过自己在南斯拉夫的代表阐述了意见，并补充说，苏联政府根据南斯拉夫政府在上述事件中的那种立场，不得不采取这种措施。

波波维奇又一次请莫洛托夫不要召回苏联专家，并声明他认为南斯拉夫对苏联的友好关系没有任何动摇。

莫洛托夫声明，苏联政府不是在嘴上而是在事实上坚持与南斯拉夫友好。苏联政府说的和做的是一致的。

波波维奇问，能否这样理解，所有错误都在南斯拉夫一方。

莫洛托夫回答，在上述问题上是这样。

波波维奇说，南斯拉夫人和铁托很难理解这种观点。

莫洛托夫回答，苏联政府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愿望。

谈话进行了 7 分钟。

附件：波波维奇交给莫洛托夫的两份文件复印件。①

（拉夫洛夫记录）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这两份文件。

35 波波维奇关于会见莫洛托夫致铁托电

(1948 年 3 月 24 日)

元帅[①] 亲收。

今日 4 时 30 分我将您的两封信交给了莫洛托夫本人。[②] 他们正在以极大的兴趣等待着您的回信。他有些生气,话说得很少。他强调说,他们有足够的证据做出巴尔斯科夫和阿尔米亚尼诺夫通报给您的那个决定。最后,他说,在没有了解您来信的全部内容之前,他还不能说什么具体的意见。关于谈话的过程,我已写了书面总结,并将派专门信使带给您。

波波维奇

① 指铁托。

② 指铁托 3 月 18 日和 3 月 20 日致莫洛托夫的两封信(文件 31 和文件 33)。这两封信是由作为专门信使的南斯拉夫外交部一位副处长 Д.斯尔曾蒂奇带到莫斯科的。她 3 月 23 日到达莫斯科并将信交给了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弗·波波维奇。

36 波波维奇关于会见莫洛托夫给铁托的报告

(1948年3月25日)

与莫洛托夫谈话的总结报告

在信使斯尔曾蒂奇同志到达的第二天,也就是今年3月24日,我拜会了莫洛托夫。鉴于问题的重要性,我竭力记住莫洛托夫在会谈时所说的每一句话。我基本上完全做到了。因此,转给您的是谈话的完整情况。

我:我给您带来了铁托同志的两封信,是对您电报的答复。这些信是由专门信使送到莫斯科的。

莫洛托夫:我们正在等待回信。我们从贝尔格莱德得知,你们的信使昨天已经来了,并带来了你们政府的回信。(他看了一下原稿及俄文翻译稿,接着说)现在,暂时还没了解全部内容,我不能对您说出什么更具体的意见。但我们有足够的证据确信,你们的政府是主要的罪人,鉴于这一点我们被迫做出了撤回我们专家的决定。

我:难道您真的确信,元帅同志和我们的政府成员因此而成了罪人?

莫洛托夫:您可以相信您希望相信的一切,而我们苏联人只相信事实真相。

我:如果您真的执行你们的决定,那就会延误我们国家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我们的人民会因此而感到痛苦。我认为,无论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还是为了你们的利益,这一点都是不可取的。难道您不认为,最好是更深

人研究一下事情的全部经过,从而找出主要的罪人?我认为——同时相信您也是这样想的——我们政府到目前为止有真正的充分的证据证明,对苏联一贯真挚而忠诚的友谊是我们政策的保证和基础。

莫洛托夫:苏联赞同我们两国之间保持真诚友好关系的政策,赞同合作,但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苏联对你们国家实行的就是这样的政策。

我:难道您就不能设想一下,您获得的信息是不正确的,你们的决定,或者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可以改变的?

莫洛托夫:我再重复一次,在这个具体事件上你们的政府是有罪的,对此我们深信不疑。我们感兴趣的是你们政府的答复,在没有了解答复的全部内容之前,对此我还不能说什么。

我:像我们的全体同志一样,我坚信,这个问题会弄清楚的,无论什么都不能成为巩固和加强我们之间关系的障碍。

莫洛托夫:你说什么?这不取决于我们。①

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了。莫洛托夫很生气。他从来没有用过这种语调同我们谈话。然而,同我谈话的方式并不重要,而比较重要的是,他们并不认为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应该事先通知您,或者同我们其中的某个人谈谈,如果需要的话同您本人谈,即采用到目前为止仍是解决我们之间问题的最常用的方法——据我看来,这也是惟一正确的方法——来解决有争议的问题。从与莫洛托夫的谈话中我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是从他们绝对信任的某个人或某些人那里获得的情报。同时,要很快解决这个问题会有一些困难。特别是这样一个情况,我记得当您收到电报时,也就

① 在得到苏联撤退专家的通知后,卡德尔曾请求拉夫连季耶夫转告苏联政府,把从事工业建设项目设计和勘测工作的苏联文职专家留下,因为原定他们撤回的期限是在完成苏联对这些工程项目的任务之后。拉夫连季耶夫答应可以将卡德尔的请求转告莫斯科,但是大使馆不能中止文职专家们返回苏联。苏联领导人对卡德尔的请求没有做出反应。在3月22日前的几天里,拉夫连季耶夫收到了莫斯科的指示:"在同铁托及南斯拉夫其他的活动家会见时,有关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最近的一些举动您不要做任何解释。"3月23日,拉夫连季耶夫向苏联外交部报告说,军事顾问们已经停止了在南斯拉夫军队的工作,最后一批军官计划于3月25日动身回国,而最后一批文职专家将于3月27日动身。

是您答复的那些电报，拉夫连季耶夫大使正在莫斯科。他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我通知外交部巴尔干司负责人基尔萨诺夫，说我很希望同拉夫连季耶夫会面。过了两三天，他问我能否在星期日，即本月 21 日，会见拉夫连季耶夫。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星期六晚上，巴尔干司又通知我，拉夫连季耶夫不能来了，因为他被紧急召回了贝尔格莱德。但他不是在星期日，即计划会面的那天，而是在星期一动身的。

还应该向您通报的是，现在，就连最小的事情都很难同外交部交涉。不过，这一点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在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最不重要的问题我们也要等上很长时间才能得到答复。而一些重要的问题，在我们的一再催促和提醒下，也还是得不到任何答复。类似的问题有：关于执行我们去年签订的购买缴获车箱的合同问题，关于我们目前正停留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车箱的问题，关于援助建设新贝尔格莱德的专家的问题，关于为巴基奇同志和泽切维奇少校治病的问题，等等。我向您通报这一点，以便使您了解，他们部里的机构，而且不仅是部里的机构，还有其他的机关，都接到了其政府关于对我国态度的决定。

如果收到您的回信后，他们还是不改变立场的话，我们就应该立即行动，继续努力，以便尽可能快地解决这个问题，巩固两国的相互关系。

我想去贝尔格莱德两天，尽可能收集全部的信息和有助于这个问题解决的具体资料，我认为这样做会更好，更有益处。我建议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在您到达这里之前，这样做是会很有益处的，同时我也坚信这一点，一切双方感兴趣的问题都将得到正确的解决。

请接受我的深切敬意和忠诚。

弗·波波维奇

1948 年 3 月 25 日于莫斯科

37 斯大林、莫洛托夫关于苏南关系诸问题致铁托的信

(1948 年 3 月 27 日)

致铁托同志并南斯拉夫共产党其他中央委员

你们 3 月 18 日和 20 日的回信均已收到。

我们认为你们的答复是不真实的,因而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

一、关于加加里诺夫的问题可以认为已经了结,因为你们否认了对他的指控,尽管我们依然认为有过对加加里诺夫的诽谤性指控。

所谓克鲁季科夫同志讲的苏联政府曾拒绝在今年举行贸易谈判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克鲁季科夫同志断然否认强加于他的那种事情。

二、关于撤回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的消息来源于武装力量部代表的反映和顾问们自己的报告。众所周知,我国的军事顾问是应南斯拉夫政府的迫切要求而派往南斯拉夫的,况且派往南斯拉夫的苏联军事顾问比南斯拉夫政府所要求的数量少得多,因此很明显,苏联政府无意强迫南斯拉夫接受自己的顾问。

但是,后来包括科切·波波维奇① 在内的南斯拉夫军方领导人认为,可以声明必须把苏联军事顾问的人数减少到 60%。他们为此摆出了种种理由。有人认为,南斯拉夫花在苏联军事顾问身上的费用太大;有人认为,南斯拉夫军队根本不需要苏军的经验;有人声称,苏军的条令是刻板公式,

① 原文如此,应为科查·波波维奇。

陈规旧俗,对南斯拉夫军队没有价值;还有人毫不掩饰地暗示,苏联军事顾问白拿薪饷,因为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任何好处。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理解吉拉斯在一次南共中央会议上所发表的那篇侮辱苏联军队的尽人皆知的言论,说什么苏联军官在道德方面还不如英军军官。但是,众所周知,吉拉斯的这一反苏言论没有遭到南共中央其他成员的反对。

因此,南斯拉夫军方领导人不是与苏联政府友好地进行磋商和解决关于苏联军事顾问的问题,而是污辱苏联军事顾问,败坏苏联军队的声誉。

显然,这种情况不可能不在苏联军事顾问周围造成不友好的气氛。

如果认为苏联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同意把自己的军事顾问留在南斯拉夫,那是可笑的。

既然南斯拉夫政府对这种败坏苏军声誉的行为没有采取措施进行抵制,它就应对业已形成的局面承担责任。

三、导致我们撤回苏联文职专家的情报,主要来源于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拉夫连季耶夫的报告,还有专家们自己的报告。

你们的声明,即似乎斯尔曾蒂奇对商务代表列别杰夫说过,苏联专家如要索取经济情报的话,应向上级当局即南共中央和南斯拉夫政府提出要求,完全不符合事实。[①] 请看3月9日拉夫连季耶夫的报告:

"基德里奇在经济委员会中的助手斯尔曾蒂奇把一项禁止国家机关向任何人提供经济情报的政府决定通知商务代表列别杰夫。所以,不论过去有过什么许诺,他也不能向列别杰夫提供所需的有关资料。国家安全机构受命监督此事。斯尔曾蒂奇还说,基德里奇想亲自与列别杰夫谈谈这个

---

① 3月24日,莫洛托夫致电贝尔格莱德的拉夫连季耶夫,援引铁托3月20日信中关于对斯尔曾蒂奇向列别杰夫所作的声明的解释内容,指出:"信中是这样说的,斯尔曾蒂奇似乎说过,苏联人应该向上级机关,即南共中央和政府索取需要的情报。"对此,莫洛托夫命令苏联大使再确认一下这一说法的准确性,因为有关斯尔曾蒂奇声明的情报是3月9日拉夫连季耶夫电告莫斯科的,其中没有类似的内容。拉夫连季耶夫在回信中坚持认为自己的报告是准确的,并说明贸易副代表瓦西里耶夫也出席了斯尔曾蒂奇同列别杰夫的谈话,他可以做证人。拉夫连季耶夫还说:"根据维辛斯基同志的指示,在与卡德尔正式协商后,列别杰夫开始得到了需要的一些情报,不过,拖延了很长时间,而且得到的也不是所有我们感兴趣的资料。"

问题。”

首先,从拉夫连季耶夫的报告可以看出,斯尔曾蒂奇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从南斯拉夫中央或政府那里获得经济情报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在苏联专家以前直接获取必要的经济情报的一些经济机构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认为索取一切经济情报都必须向中央和政府交涉,那是可笑的。

其次,真实情况显然与你们在来信中所述的完全相反,从拉夫连季耶夫的报告看,苏联驻南斯拉夫的代表确实受到了南斯拉夫安全机构的控制和监视。

不妨指出,这种监视苏联代表的做法,我们只有在资产阶级国家才会遇到,而且那也不是在所有的资产阶级国家。

同时应当指出,南斯拉夫安全机构不仅监视苏联政府的代表,而且还监视联共(布)驻共产党情报局的代表尤金同志①。

如果认为苏联政府会同意在这种条件下把自己的文职专家留在南斯拉夫,那是可笑的。

显然,对业已造成的这种情况的责任也要由南斯拉夫政府承担。

这就是苏联政府不得不从南斯拉夫撤回其军事和文职专家的原因。

四、你们在来信中还希望向你们通报引起苏联不满和导致苏南之间关系恶化的其他事实。这种事实的确存在,虽然它们与撤回文职和军事专家没有联系,但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向你们通报这些事实。

第一,我们知道,南斯拉夫领导同志中间流传着种种反苏言论,诸如:“联共(布)正在蜕化变质”,“苏联盛行大国沙文主义”,“苏联正企图从经济上支配南斯拉夫”,“共产党情报局是联共(布)控制其他党的工具”,等等。这些反苏言论通常是以左的词藻掩盖起来的,即“社会主义在苏联已不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只有南斯拉夫才真正代表着“革命的社会主义”。②

---

① 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尤金(1899—1968),苏联哲学家,当时还兼任设在贝尔格莱德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主编。

② 这些言论出自拉夫连季耶夫的汇报。1948年3月1日,南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审查关于1948年2月10日苏联、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三国莫斯科会晤情况和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工作报告。拉夫连季耶夫得到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会议上发言的情报,并向莫斯科作了汇报。

从吉拉斯、伏克曼诺维奇①、基德里奇和兰科维奇等令人怀疑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听到这些关于苏联的言论，当然让人觉得好笑。但问题在于，这些言论在南斯拉夫的许多高级领导人中早已流传，如今还在流传，这自然正在造成一种恶化联共(布)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反苏气氛。

我们当然承认，任何一个共产党，其中包括南斯拉夫共产党，有权批评联共(布)，如同联共(布)也有权批评其他任何一个共产党一样。但马克思主义要求批评应该是公开的、真诚的，而不能是背地里的、诽谤性的，从而剥夺被批评者对批评进行答辩的机会。然而，南斯拉夫活动家们的批评不是公开的和真诚的，而是背地里的和没有诚意的，同时还具有两面派性质，因为他们一面背地里以其“批评”来败坏联共(布)的声誉，一面却在公开场合伪善地颂扬它，把它说得天花乱坠。正因为如此，这种批评就变成了诽谤，变成了企图损害联共(布)的声誉、丑化苏维埃制度的手段。

我们相信，如果南斯拉夫的党员群众知道这种反苏批评是异己的、怀有敌意的，他们一定会愤怒地驳斥它。我们认为，这就是南斯拉夫活动家们背着群众暗地里进行这些批评的原因。

这里不妨回忆一下，当托洛茨基打算向联共(布)宣战时，他也是从指责联共(布)蜕化变质、犯有狭隘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开始的。当然，他以左的关于世界革命的词藻掩盖了所有这一切。然而，众所周知，托洛茨基本人就是蜕化变质分子，而当他被揭露后，他便公开转到联共(布)和苏联不共戴天的敌人的营垒中去了。

我们认为，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足以发人深省。

第二，目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状况令我们感到不安。作为执政党，南斯拉夫共产党迄今尚未完全合法化，仍然处于半合法的状态，这使我们感到惊奇。党的机构的决定通常不在报刊上发表。党的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也从不公布。

在南共党内生活中看不到有充分的民主。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不是选举的，而是指派的。党内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值得

① 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时任南斯拉夫人民军政治部主任。

注意的是，党中央主管干部的书记是国家安全部长。换句话说，党的干部实际上受国家安全部长的监督。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应该控制一个国家的所有国家机关，包括国家安全部在内，而在南斯拉夫恰恰相反，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在控制着党。这大概是南斯拉夫党员群众的独立自主性尚未达到应有程度的原因。

显然，我们不能认为这样一个共产党组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是布尔什维克组织。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看不到有阶级斗争政策的精神。资本主义成分正在农村中迅速增长，在城市中也很活跃，而党的领导并未采取措施加以限制。南斯拉夫共产党被资本主义成分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种腐朽的机会主义理论搞得昏昏沉沉，而这个理论是从伯恩施坦、福尔马[①] 和布哈林那里沿袭来的。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主要领导力量，它有自己特定的纲领，不能混同于非党群众。在南斯拉夫则恰恰相反，人民阵线被认为是主要的实际领导力量，而且有人企图把党融入人民阵线。铁托同志在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说：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有没有什么不同于人民阵线纲领的另外的纲领呢？没有。共产党没有另外的纲领。人民阵线的纲领就是党的纲领。”

在南斯拉夫，这个关于党组织的奇怪理论似乎被认为是一种新理论。其实这里毫无新东西。早在40年前，俄国一部分孟什维克就提议把马克思主义政党融入非党工人群众组织，并以后者代替前者；而另一部分孟什维克则提议把马克思主义政党融入非党工农劳动群众组织，并以后者代替前者。众所周知，列宁当时认为这些孟什维克是用心险恶的机会主义者和党的取消派。

第三，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间谍韦莱比特还留在南斯拉夫外交

---

① 格奥尔格·福尔马(1850—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主张通过议会斗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部担任第一副部长。[①] 南斯拉夫的同志们都知道，韦莱比特是英国间谍。他们甚至还知道，苏联政府的代表也认为韦莱比特是间谍。尽管如此，韦莱比特依然是南斯拉夫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南斯拉夫政府也许正是想把韦莱比特作为英国的间谍加以利用。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政府认为，为了保证博得帝国主义大国的好感而把它们的间谍作为自己的工作人员，是完全容许的，为此目的，甚至可以同意把自己置于这些大国的控制之下。我们认为，这种政策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苏联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自己同南斯拉夫政府的通信往来置于英国间谍的监督之下。显然，由于韦莱比特依然留在南斯拉夫外交部领导层，苏联政府认为自己被置于困难的境地，不可能通过南斯拉夫外交部系统与南斯拉夫政府进行开诚布公的通信往来。

这就是引起苏联政府和联共(布)中央不满并导致苏南之间关系恶化的事实。

如上所述，这些事实与撤回军事和文职专家的问题没有联系，但它们是恶化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受联共(布)中央委托

维·莫洛托夫(签名)　约·斯大林(签名)

1948 年 3 月 27 日于莫斯科[②]

---

① 弗拉迪米尔·韦莱比特(1907—?)，1943 年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派驻开罗的军事使团团长，后任最高统帅部驻伦敦军事使团团长。回国后历任外贸部副部长、外交部副部长。

② 这封引起苏南全面论战的信是由莫洛托夫的助手拉夫洛夫专程送到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随后，拉夫连季耶夫在阿尔米亚尼诺夫的陪同下来到了萨格勒布，将这封信交给了当时正在那里的铁托。

38 铁托、卡德尔关于答复对南共的指责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信

(1948 年 4 月 13 日)

致约·维·斯大林、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在答复你们 1948 年 3 月 27 日的来信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强调指出,来信的语气和内容使我们感到非常惊讶。我们认为,信中之所以有这样的内容,即在某些问题上有这样的指责和态度,原因在于对我们这里的情况缺乏了解。对于你们的结论,我们只能用这样的事实来解释:这些不准确的和带有偏见的情报,苏联政府一定是从自己的机构那里得到的,而这些机构由于对情况不熟,一定是从形形色色的人——或者是某些反党分子,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不满者——那里得到这种情报的。在南共中央全会上,已经完全搞清楚并且得到证实,南共中央委员斯·茹约维奇和安·赫布朗是向苏联驻南斯拉夫代表提供不真实和诽谤性情报的罪人,这种情报既有

关于所谓某些领导人言论的，也有关于我们整个党的。[①] 他们想用这种不真实的、诽谤性的情报来掩盖其反党活动，掩盖其很早就已表现出来的破坏领导人与全党之间团结的倾向和企图。此外，来自这些人的情报既不可能是客观的，也不可能是善意的和准确的，而且通常还具有特定的目的。具体到这件事来说，这种情报的目的是污蔑我们党，亦即新南斯拉夫的领导人，给本来就已经繁重的国家建设工作增加困难，阻止五年计划的执行，从而阻止社会主义在我们国家的实现。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苏联的代表机构至今没有设法首先向我国负责人核对这些情报，并请求南共中央或者政府提供有关问题的资料。我们认为，提供这样的情报是反党活动，也是反对国家的活动，因为这会破坏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

无论我们每个人多么热爱社会主义的故乡苏联，但他热爱同样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自己的国家决不亚于热爱苏联，具体来说就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的千千万万最先进的人们已经为之牺牲了生命。我们深知，在苏联，人们对此也是这么理解的。

使我们感到特别惊讶的是，当卡德尔、吉拉斯和巴卡里奇作为我们党和政府的代表在莫斯科时，[②] 对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进行讨论。从你们的来信可以看出，早在我们的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之前，你们的政府就掌握了上述情报及类似的情报。在我们看来，与军事专家和文职专家的关系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本来在当时就可以向我们的代表团提出。

我们认为，当时有必要通过这个代表团，甚至在此之前，还可以通过更好的方式，告知我国政府，说苏联政府不满意我方人员对待苏联专家的态

---

① 在这次会议上，茹约维奇支持苏联的立场受到一致批判，同时对茹约维奇秘密向苏联大使馆提供关于1948年3月1日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报提出指控。茹约维奇参加了那次讨论对苏关系的会议，并在会后将会议情况通报给拉夫连季耶夫。拉夫连季耶夫向莫斯科汇报后得到了莫洛托夫的指示，3月7日拉夫连季耶夫通知茹约维奇，“他转来的有关南共中央工作状况的情报已收到，我们的党中央对此感谢茹约维奇同志，并认为，他这么做无论是对苏联来说，还是对南斯拉夫人民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他揭露了南共中央中苏联的虚假朋友”。同时还要求茹约维奇今后继续向苏方提供情报。赫布朗因接受审查被软禁而没有出席这次中央全会，但铁托仍在会议上指控他是“苏方对我们中央不信任的罪人”，不过，对此没有提出具体的证据。

② 指参加1948年2月10日苏南秘密会晤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在莫斯科的访问。

度,并采取某种方式消除这种状况。可事情竟弄到如此地步:苏联政府在没有任何正式通知的情况下就决定撤回其军事专家和文职专家,从而使我们面临既成事实,给我们增添了不必要的困难。

至于撤回一些苏联军事专家的问题,我们是由于财政困难而决定把苏联专家的人数减少到必需的最小程度,除此之外,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原因。早在1946年,联邦政府总理铁托就曾正式通知苏联大使拉夫连季耶夫同志,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几乎不可能付给苏联军事专家如此高的工资,请他将此情况连同我们希望苏联政府降低专家报酬条件的要求一并转告苏联政府。拉夫连季耶夫大使带来了苏联政府的答复,说报酬不能减少,要我们自便。铁托随即对拉夫连季耶夫说,既然如此,我们只好在不给我军建设带来巨大困难的情况下,尽快地减少专家的人数。苏联专家的报酬比我国集团军司令员的报酬高三倍,比我国联邦政府部长的报酬高两倍。我国一名中将或上将军衔的集团军司令员那时每月工资是9 000~11 000第纳尔,而一位中校、上校和将军军衔的苏联军事专家,每月则拿到30 000~40 000第纳尔。与此同时,我们的一个联邦政府部长每月的工资是12 000第纳尔。显而易见,我们感到这不仅是一种财政上的负担,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对此很难向我国人员进行解释。可见,我们做出减少苏联军事专家人数的决定,正是出于上述原因,别无其他任何原因。另一方面,我们并不排除我们有些人可能说过某些不合时宜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向我们提供这方面的可靠材料,毫无疑问,我们会采取措施,以便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这里同时需要提一下,也有某些苏联专家的表现并不总是像应该做的那样,这就给我们的人造成了不好的印象,因此也就违背我们愿望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这种议论后来被歪曲了,而这些被歪曲了的议论又传到了苏军司令部。但我们认为,这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不应当损害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

对信中提到的关于吉拉斯旧事的那一部分,尤其使我们感到惊讶。信中说:"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理解吉拉斯在一次南共中央会议上所发表的那篇侮辱苏联军队的尽人皆知的言论,说什么苏联军官在道德方面还不如英国军官。"吉拉斯从来没有以这样的方式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早

在1945年铁托就已对此作过书面和口头说明。[①] 无论斯大林还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当时都同意这一解释。[②] 所以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们把曾被证明是歪曲了的而且是不准确的指责重新作为论据提出来。我们再次强调指出，无论吉拉斯还是我国领导人中的任何人，对苏联军官都没有这样的看法。只有既是苏联的敌人又是南斯拉夫的敌人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看法。

我们的贸易关系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加以解决，以使这种关系能够正确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并不否认，我方在进行贸易业务中有过失误，但我们不能相信这可以成为任何削弱我们贸易合作的充足理由。我们不能认为克鲁季科夫和我国外贸代表之间发生的事情只是一种误会。克鲁季科夫曾明确地对我国代表说，已在贝尔格莱德等候启程赴莫斯科的我国贸易代表团不要来了，因为苏联政府不能签署在1948年进一步交换货物的议定书，他还说，只有到1948年底才有可能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克鲁季科夫把这番话告诉了我国外贸部副部长茨尔诺布尔尼亚同志和我国驻莫斯科贸易专员。当我国贸易代表们问起，这是否就是苏联政府的态度时，克鲁季科夫作了肯定的回答。

我们认为，如果我国贸易机构方面有什么差错——我们相信在供货

---

① 关于吉拉斯当时所说的话，事后吉拉斯曾写信向斯大林解释，他的原话是："从外表举止看，在意大利的英国军官和在南斯拉夫的英国军官对待我们军官的态度要比这里的苏联军官好。自然，英国人有自己见不得人的打算。但是，如果苏联指挥官们不是像对待朋友和同盟者那样对待我们，敌人就会利用这一点。"吉拉斯还承认"本来不应该在军事代表团团长科尔涅耶夫将军面前说这样的话"，但他强调"我们是作为共产党员在他面前说的"。尽管这封信没有发出，但铁托于10月29日也直接给斯大林写了大体同样内容的一封信，信中指出了红军一些官兵的不体面行为，并说"我们的军队和人民对此非常痛心，因为，我们的军队和人民非常崇拜红军，并把他们理想化了"。"我担心，各种各样的敌人会为了自己的目的，即反对苏联和我们的人民解放运动而利用这些事情"。铁托还解释说："有关这一切我很早以前就想向您汇报了，但又放弃了，而是邀请你们的军事代表团团长科尔涅耶夫中将来，请求他尽快采取措施，哪怕只是减少这样的现象也好，同时，我还请求他，让他亲自将这些情况向莫斯科报告。"铁托在信的最后写道："用这件事打扰您，我感到不安，但是我认为这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必须把这一切向您通报并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以使这些现象不再发生。"

② 1945年4月，以铁托、吉拉斯为首的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会谈中南斯拉夫方面就这一问题向斯大林作了详细的解释，斯大林对此表示满意，并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和整个贸易关系中可能有这种事情——那么可以找到某种方式，使我们双方达成一致，并消除一切妨碍我们两国之间正常发展贸易关系的因素。

我们认为，我们双方应当共同研究和消除一切妨碍两国之间经济合作正常发挥职能的因素。

你们在来信中断言我们的国家安全机构监视苏联专家和其他苏联人，这不符合事实。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所以监视苏联人是一种谎言，这是有人捏造的情报。说苏联政府的代表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尤金同志也受到了这种监视，就更离奇了。

我们不明白，有什么人需要这种诽谤，使苏联政府因此而产生误解，上当受骗。我们希望告知我们有关这一情况的具体事实。

从你们3月27日的来信中可以得出结论，我们这里正在进行反对苏联的、自然也是反对联共(布)的批评。来信说南共领导人正在进行这种批评。信中还说，这种批评是背着党员群众进行的，是不真诚的，是背地里的，是虚伪的，等等。同时还列举出吉拉斯、伏克曼诺维奇、基德里奇和兰科维奇等人的名字。这就是说，列举了新南斯拉夫一些最著名的、最受人爱戴的、在我党多次处境困难时都经受过考验的领导人的名字。

我们很难理解，怎么可以提出如此严厉的指责，而不说明这些指责的来源。更令人惊奇的是，竟然把我们领导人的言论同托洛茨基从前的言论相提并论。来信中引述了所谓他们言论的一些片段，诸如："联共(布)正在蜕化变质"，"苏联盛行大国沙文主义"，"苏联正企图从经济上支配南斯拉夫"，"共产党情报局是联共(布)控制其他党的工具"。接着说，"这些反苏言论通常是以左的词藻掩盖起来的，即'社会主义在苏联已不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只有南斯拉夫才真正代表着'革命的社会主义'。"

诸如此类的言论是在长时期内从各种可疑人物那里搜集到的，并带有偏见地被硬说成出自新南斯拉夫领导人之口，于是报告给了苏联领导人。毫无疑问，根据这些言论可以得出错误的结论，可以把它们看做是反苏言论。但我们认为，根据从身份不明的人那里获得的可疑情报做出结论，而对那些在南斯拉夫广泛宣传苏联方面作出巨大贡献、并在解放战争中赢得极高声誉的人们提出在来信中所列举的指责，是不公道的。难道能

够相信那些在监狱中服过六年、八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苦役的人——他们坐牢的原因之一就是广泛地宣传了苏联——会像你们3月27日来信中所描绘的那样吗？不能。而新南斯拉夫当今最高领导人中的大多数正是这些人，他们曾于1941年3月27日带领群众上街反对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的反人民政权，因为该政权签署了反共产国际的协定，并企图把南斯拉夫套在法西斯轴心国的战车上。① 也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对苏联深信不疑而于1941年组织了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起义。② 还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手握钢枪行进在奋起反抗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最前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作为惟一真诚的同盟者站在苏联一边作战，他们之所以在最黑暗的日子里相信苏联一定会胜利，正是因为过去信仰、今天仍然信仰苏维埃制度，信仰社会主义。

这样的人不可能用自己的行动来“丑化苏维埃制度”，因为这意味着背叛自己的信仰，背叛自己的过去。我们认为，评价这些人，不应当根据可疑的情报，而应当根据他们多年的革命活动。

由于这些人——如来信中所说——把联共(布)说得“天花乱坠”，就称他们是两面派，这简直令人感到可怕和受到侮辱。来信中还说：“我们相信，如果南斯拉夫的党员群众知道这种反苏批评是异己的、怀有敌意的，他们一定会愤怒地驳斥它。”是的，如果真的像来信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对此也深信不疑。“我们认为，这就是南斯拉夫活动家们背着群众暗地里进行这些批评的原因。”然而，这些“南斯拉夫活动家们”过去对群众不可能有任何的隐瞒，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对苏联或联共(布)不曾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批评。

这里把领导与群众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说它错误，是因为现在的南斯

---

① 1941年3月25日，在希特勒德国的压力下，南斯拉夫王国政府首相茨韦特科维奇签字同意南斯拉夫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不是“反共产国际协定”)。3月27日，在南斯拉夫许多城市开始了群众性的抗议示威活动，推翻了茨韦特科维奇政府。参加此项活动的有各种派别的反希特勒势力和爱国力量，南共也起了积极作用。

② 这里指1941年7月7日开始的人民解放武装斗争，这场斗争由南共组织和领导，并于1941年夏秋期间席卷了整个南斯拉夫。南共在告人民书中强调指出，苏联进行的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也是我们的斗争”。

拉夫领导人与群众是一个整体，他们在战前一起反对反人民的政权，在伟大的解放战争期间并肩战斗，而今天又在建设国家和实现社会主义方面共同努力，因此他们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不少苏联人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即南斯拉夫的广大人民群众对苏联的好感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在源自沙皇俄国的某些传统的基础上产生的。事情并非如此。对苏联的热爱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它是由现在的新南斯拉夫领导人，首先包括那些在来信中受到如此严厉指责的人，持续不断地灌输到广大党员群众和全体人民中去的。新南斯拉夫领导人正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早在战前就不惜劳苦和牺牲，坚持不懈地向人民讲述有关苏联的真实情况，在南斯拉夫人民群众中播下了热爱社会主义故乡的种子。

例如，莫洛托夫同志就说过，吉拉斯曾指示不要在党校和党员培训班学习《联共(布)党史》。[①] 这是完全不真实的，因为不存在这样的指示，谁也没有作过这样的指示，甚至在目前，我国所有党校和许多培训班还都在学习《联共(布)党史》。在这方面，惟一真实的是，吉拉斯多次在党的会议上讲过，基层党组织中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党员错误地理解了《联共(布)党史》中的某些问题，他们把这些问题与南斯拉夫的发展机械地加以比较。例如，关于革命的两个阶段问题，关于军事共产主义问题，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等等。如果要让这些党员准确理解某些问题，最好先学斯大林的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

在此有必要强调指出，《联共(布)党史》在战前和战争期间一共秘密印刷过四次，战后又用各种民族语言印刷了 25 万册。列宁和斯大林的其他著作也是如此，例如，《列宁主义问题》印刷了 12.5 万册。

关于你们来信中提到的南共党内生活问题，可以看出你们得到了完全错误的情报并产生了错误的印象。因此，我们不能同意你们对我们党的评价。

---

① 这里指的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莫洛托夫的话引自 1948 年 4 月 6 日他与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弗·波波维奇的一次谈话，波波维奇因参加 4 月 12～13 日南共中央全会，在返回贝尔格莱德后将此次谈话报告给铁托。

南共中央的大多数中央委员不是指派的。事情是这样的:在第五次党代表会议上(这次会议于 1940 年 12 月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南斯拉夫的 110 名代表,根据共产国际的一项决议,这次会议拥有代表大会的一切权利),选举产生了由 31 名中央委员和 10 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南共中央委员会。其中在战争期间牺牲了 10 名中央委员和 6 名候补中央委员。在 1940 年选举产生的 7 名政治局委员中有 5 人现在还活着,并且还在工作。政治局邀请了在贝尔格莱德的南共中央委员参加了政治局会议。在南共中央委员会里只有 7 名新委员是指派的,而且原来都是候补中央委员或党的最优秀的领导人。此外,战争期间南共中央委员会还开除了两名委员,所以如今还活着并工作的有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 19 名南共中央委员和 7 名指派的中央委员。因此南共中央委员会由 26 人组成。事情就是这样。

至于说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这里需要指出,南共中央政治局筹备南共党代会已有一年。[①] 我们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应当有所准备,以使其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将是一次通过党章和党纲的代表大会。晚些时候,人民阵线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也将采纳这个纲领。

来信中根据什么断定我们党内没有民主?也许是根据拉夫连季耶夫的情报吧?他是从哪里得到这种情报的?我们认为,他作为大使无权随便向什么人打听关于我党工作的情报,这不是他的职责。这种情报联共(布)中央可以向南共中央索取。

南共主管组织工作的书记同时又是国家安全部长这一事实,丝毫也不妨碍党组织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党没有被置于国家安全机构的控制之下,这种控制是通过南共中央实行的,国家安全部长就是南共中央委员。此外需要补充说明,南共中央干部局局长是泽科维奇,而不是兰科维奇。

说我们党内没有批评的自由,这是不真实的。我们党内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由。在定期的党的会议和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都可自由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可见,有人臆造了这种不真实的材料并作为情报递交给

---

① 在 1948 年 4 月 12~13 日举行的南共中央全会上决定近期召开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在 1948 年 5 月 20 日的南共中央全会上规定了开会的确切日期,即 7 月 21 日。

联共(布)中央。

所谓南共党内不存在阶级斗争的政策和城乡资本主义成分日益增长等,是完全不真实的。举世皆知,十月革命以来,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发生过像南斯拉夫那样彻底的、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那么这种情报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些事实是任何人也无法反驳的。因此,我们不理解,有些人怎么可以把伯恩施坦、福尔马、布哈林和腐朽的机会主义同我们的党相提并论。我们不能不起来自卫,抵制这种错误评价和对我党的侮辱。

来信中还谈到铁托同志在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从中摘录了一小段,① 并把它与40年前孟什维克取消社会民主党的图谋相提并论。

第一,这是40年前在沙皇制度下的事情,而如今是我们在南斯拉夫掌握着政权,即南共在政府中起着领导作用。根据社会发展的进程,人们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组织形式,改变工作方法和领导群众的方式,以便顺利地达到既定目的。

第二,南斯拉夫人民阵线,就其本质而言,不仅相当于某些可以吸收任何人入党的共产党,而且在组织上和开展活动方面还要好些。虽然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现有成员700万左右,但并不是无论什么人都能参加进去的。

第三,南共在人民阵线内的领导权是完全有保证的,因为南共是人民阵线的核心。可见,不存在任何如来信中所说的南共消失在人民阵线中的危险。南共通过人民阵线逐渐实现自己的纲领。人民阵线自愿接受这个纲领,认为它也是自己的纲领。这就是铁托所说的南共没有另外纲领的根据。

对我们作如此的描述,我们感到遗憾。我们也希望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在某些国家,某些共产党不仅改变了工作方式,而且还改变了党的名称,

---

① 关于这个问题,铁托在发言中还说:"南共在人民阵线中起着领导作用。""成立新国家后,在建立人民政权也就是国家机构,建设国家、经济和文化生活等方面,共产党已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领导者。它是作为人民阵线的主要组成部分来完成这个作用的,因为党在人民阵线中起主导作用。"

如在保加利亚和波兰就是这样，这不会没有得到联共(布)的同意。[①] 当然，在这些国家，这些党走这条道路是必要的。但在我们这里，以南共为首组成了人民阵线，南共在其内部严密地组织起来，并把人民阵线的几百万群众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这种做法已经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虽然也有别的党具有与其国内新的特定条件相适应的工作方式和组织形式，却不曾有人责备他们消失在群众之中。

那么，为什么有人怀疑我们这里的那些不容否认和早已为大家熟知的事实呢？我们深信，我党在战时和战后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就说明南共是强大的、团结一致的，它有能力领导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有能力在任何困难的形势下带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前进。

我们党并不是如来信中所说的处于半合法状态，而是完全合法的，南斯拉夫人人都知道它是领导力量。

很遗憾，问题恰恰是你们不了解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的性质，因而批评我们，说我们不公布党的会议和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从联邦政府到其下属机构，一切有关社会和国家生活各个方面的比较重要的决定都是党的决定，或者是根据党的倡议做出的，而我们的人民就是这样理解并接受这些决定的。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强调某某决定是在党的某次会议上做出的。

我们党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今天不仅在本国而且在全世界都赢得了崇高的声望，这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我们在这里还要着重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取得这些成就，是因为它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并且因地制宜地运用了联共(布)的经验。因此，我们不理解你们在信中的断言，说什么我们的领导人在反对联共(布)的同时，却假惺惺地“伪善地颂扬它，把它说得天花乱坠”。

我们不能相信联共(布)中央会对我们党迄今所作出的贡献和取得的成就提出质疑，因为我们记得许多苏联领导人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对此曾多次予以承认。正是这样，我们坚持认为，南斯拉夫社会变革中的许多具

---

① 1942年重建的波兰共产党，改名称为波兰工人党；1944年秋保加利亚共产党开始称为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主义者)。

体方面可能有益于其他国家的革命发展,而且正在被他们采用。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把联共(布)的作用和苏联的社会制度置于次要的地位。相反,我们正在研究苏维埃制度并把它作为榜样,问题只是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以多少有些不同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在现阶段,在我们国家现有的特殊条件下,并考虑到解放战争后形成的国际环境,我们力求采取最适宜的工作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我们这样做,并不是要证明我们的道路比苏联走过的道路好,我们在搞什么新花样,而是因为现实生活每天都在迫使我们这样做。

至于谈到韦莱比特和他为什么现在还在外交部的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卡德尔和吉拉斯告诉莫洛托夫同志,韦莱比特的情况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当时我们没有任何具体证据,甚至今天也还没有,这件事仍在审查之中,我们不想仅凭怀疑就把一个人撤职和毁灭。

对韦莱比特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就要求我们处理他,这不是太匆忙了吗?首先,韦莱比特1939年入党,而在此前,他就为党作过重大贡献。他于1940年接受了铁托委派的一项秘密任务,在萨格勒布用他的名义租用一幢别墅,在别墅里安置共产国际的电台。瓦尔兹作为报务员与他的妻子一起住在那里。① 同时,韦莱比特还执行信使任务。所有这些工作都在敌人的占领下持续过一段时间,这当然意味着他有生命危险。1942年,韦莱比特遵照党的指示参加了游击队,表现出色。后来他接受了在国外的任务,并且完成得很好。我们现在正在审查他的全部历史。如果苏联政府掌握有关他的什么具体材料,我们要求将这些材料转给我们。但不管怎样,我们将立即解除他在外交部的职务。②

可见,你们因此而在来信中提出的指责,实在是令人吃惊的,而且是对南共中央和我们整个政府的侮辱。你们把我们与那些旨在取宠于某些大

---

① 瓦尔兹是南共党员约瑟普·科皮尼奇的化名,曾在苏联受过训练并参加了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他在南斯拉夫萨格勒布的秘密电台工作。这个电台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进行联系。1943年共产国际正式解散后,该电台负责联共(布)中央与许多国家共产党的联系。

② 韦莱比特被解除在南斯拉夫外交部工作的借口是他需要长期休假治疗。苏南公开决裂后,恢复了韦莱比特在外交部的职务。

国而对间谍持容忍态度的资产阶级国家相提并论。以下就是来信中的内容,而我们认为对待一个非常友好的和坚定同盟国的政府这种内容是不能容忍的:“南斯拉夫政府也许正是想把韦莱比特作为英国的间谍加以利用。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政府认为,为了保证博得帝国主义大国的好感而把它们的间谍作为自己的工作人员,是完全容许的。为此目的,甚至可以同意把自己置于这些大国的控制之下。”来信中就是这么写的。人们看了这封信,不可能不由于来信中以如此手段对待一个这样的政府而深感痛心和震惊——这个政府代表着1600万人民,他们站在苏联一边,他们在解放战争中做出了极大牺牲,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今后还将成为斗争中最可靠的同盟者。

如果你们问我们,有没有对你们方面不满意的事情,那我们就会坦诚相告,有很多我们所不满意的事情。哪些事情呢?这些事情虽然不可能在这一封信中都列举出来,但我们还是要举出其中的一些。首先,我们认为,苏联情报机构在我们这个正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里招募我国公民充当其间谍是不正常的,我们只能把这理解为违背我国利益的事情。尽管我们的领导人和国家安全机构对此已提出抗议,并通知你们这是不能允许的,但仍然出现了这种事情。正在被招募的人包括我们的军官、各级领导人和一些对新南斯拉夫持否定态度的人。

我们有这样的证据,有些苏联情报机构的特务在招募我们党员时,挑拨他们对我们领导人的怀疑,试图破坏我们领导人的威信,说他们不称职、不可靠。例如,斯捷潘诺夫上校早在1945年招募我们的一位在我国国家安全部密码编译处工作的好同志时,就肆无忌惮地中伤我国的所有领导人,并挑拨他对他们的怀疑,还说什么“暂时让铁托元帅工作是出于需要”。这样的事情至今还在继续。这就意味着,这种招募不是为了反对某个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我们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招募正在破坏我们的内部团结,使人们失去对领导的信任,涣散人心,败坏领导人的名声,并且成为搜集假情报的来源。苏联情报机构的这种活动,对于正在向社会主义前进并且是苏联最忠实盟友的我国,不能说是忠诚的和友好的。

我们不能允许苏联情报机构在南斯拉夫建立自己的情报网。我们有对付各种外国资本主义分子和国内阶级敌人的国家安全部和自己的情报机构，如果苏联情报机构需要某种情报或需要这方面的帮助，他们随时可以提出要求，并得到满足。我们方面至今一直在这样做。

诸如此类我们不满意的事情还有很多，但这是否能够成为恶化我们相互关系的理由呢？不能。这是一些可以消除和解释的问题。

苏联和南斯拉夫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显然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但为此需要绝对的相互信任，否则我们两国之间就不可能有稳固而持久的关系。苏联人，首先是苏联领导人，应当相信，新南斯拉夫及其现在的领导人正在坚定不移地走向社会主义。

其次，你们应当相信，在现任领导人领导下的今日的南斯拉夫是苏联最忠实的朋友和盟国，它准备在严峻考验中与苏联各族人民同甘共苦。

最后，因为新南斯拉夫直接面对着不仅危及它本身的和平发展，而且也危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甚至苏联和平发展的资本主义世界，所以我们感到，新南斯拉夫尽可能强大是符合苏联的利益的。因此，虽然我们知道苏联由于重建被破坏了的国家而正经历着巨大困难，但在对苏联各族人民不造成物质损失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期待苏联对我们国家的建设和五年计划的实现给予帮助。

根据以上所述，南共中央全会不能认为你们在来信中对我党工作和领导人所作的那种评价是正确的。我们深信，这里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严重误会，为了有利于我们两党为之奋斗的事业，这种误会应当尽快加以消除。

我们惟一的愿望是，对于我们南共中央对联共(布)和苏联怀有的同志式和兄弟般忠诚感情的任何怀疑和不信任应当予以消除，我们永远感谢联共(布)给予我们的迄今指引我们并将继续指引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忠于曾经是并将继续是我们的伟大榜样的苏联，并高度珍视苏联对我国各族人民的帮助。

我们相信，只有通过我们两党中央在发生误会的地方即在我们这里

进行全面的相互交谈，这一误会才能消除。所以，我们建议联共(布)中央派出一名或几名中央委员，他(们)在我们这里将有一切机会严肃认真地弄清任何一个问题。

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建议。

此致

同志式的敬礼

受南共中央委托

铁托、卡德尔

1948 年 4 月 13 日于贝尔格莱德

39 南共中央关于中央全会决定给联共(布)中央的通报

(1948年4月13日)

致联共(布)中央

本月12日和13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南共中央全会,除两人外全体到会,两人中一人(巴卡里奇)因病,即因正当理由缺席,另一人(赫布朗)正在接受审讯。共有25名中央委员出席。全会详细研究了联共(布)中央3月27日的来信以及写这封信的背景,除茹约维奇外,一致得出如下结论:

一、全会对联共(布)与南共之间终于出现的种种分歧深表遗憾,因为这些分歧有可能使我们两党的共同事业受到严重损害。

二、全会确认,南共工作中存在着错误和缺点,但并不是那种据此就可以得出联共(布)中央来信中所述那些结论的错误和缺点。

三、全会确认,那些结论只有在情报不充足和不正确的基础上才可能做出,而这首先是我国某些反党不良分子向苏联机构提供了虚假的、诽谤性的或带有偏见的情报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

四、全会确认,对苏联机构提供那种情报负主要责任的是南共中央委员斯雷腾·茹约维奇和安德里亚·赫布朗。这个多次因错误而受到处分的反党集团企图用诽谤来掩盖其旨在破坏领导人与党之间集中统一的反党活动,说什么我党领导人发表反苏言论,而(他们)想显示自己是苏联的保卫者,并且是反对我们领导人和我们党的(保卫者),但我们党却以多年的工作证明自己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忠于和热爱联共(布)和苏联

的。

五、全会确认，茹约维奇—赫布朗集团反党活动的目的是破坏南共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团结，挑拨和削弱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最密切合作、相互帮助和兄弟般可靠的关系，因此这表明他们既敌视南斯拉夫，也敌视苏联。

根据这一切并鉴于其过去的反党活动，全会决定把茹约维奇开除出南共中央，并对他以及赫布朗在党内进行进一步审查。

六、全会坚信，一切妨碍南共与联共(布)以及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继续发展并巩固兄弟般和同盟者关系的因素必将消除。

七、全会责成中央政治局采取一切措施，以根除党内和人民阵线内所有可能破坏南共与联共(布)之间以及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兄弟般关系的现象。

全会赞成中央政治局为消灭国内资本主义残余而提出的措施。

全会赞成中央政治局为加快筹备应于今秋举行的南共代表大会而提出的措施。

八、全会赞同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附上的信并希望和深信，南共中央与联共(布)中央代表之间将尽快进行必要的个人接触，这种接触尽可能在这里即在实际上可以核查所有事实的南斯拉夫进行，以彻底消除目前误会的一切根源。

40 日丹诺夫关于转交匈共信件致铁托的信

(1948 年 4 月 14 日)

绝密

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书记铁托同志

兹遵照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局的要求,按情报交换途径向你们通报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局今年 4 月 8 日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①

联共(布)中央书记安·日丹诺夫

1948 年 4 月 14 日

① 斯大林向南共中央发出3月27日的信件后,便将这封信抄送给共产党情报局其他各成员国,并且未等南共中央的复函,就要求各党根据联共(布)的材料,对苏南冲突问题表示态度。同时,各党的答复按要求应先交给联共(布),而不得直接交给南共中央。匈牙利共产党的答复是最早的。以后,苏联驻贝尔格莱德的代表还将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兰和保加利亚共产党的答复转交给南共。

41 南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苏联公开苏南分歧致日丹诺夫的信

（1948年4月16日）[①]

致联共(布)中央日丹诺夫同志

4月16日，尤金同志向南共中央总书记铁托同志转交了日丹诺夫同志的信件，并附有今年4月8日匈牙利共产党中央的决议。从这些文件可以得出结论，联共(布)中央已将其3月27日致南共中央的信件转发给了其他党的领导机构。我们对联共(布)中央的这一举动感到非常惊讶，理由如下：

第一，联共(布)中央采取这样的举动，没有征得南共中央的同意，没有等待南共中央的答复，而且根本没有同南共中央一起对3月27日来信中所陈述的论据进行核实。

第二，兄弟共产党因而得到的通报是片面的，他们根本不知道南共中央的意见，所以南共中央受到如此广泛的批评，以致根本无法对这种批评的错误论据进行申辩。[②]

据此，南共中央政治局不能同意联共(布)中央的这种举动，认为这种

---

① 档案原件未注明发信日期，此处所标为起草该信的日期。

② 4月16日接到匈牙利共产党的信件后，南共立即举行了政治局会议，一方面起草了这封给日丹诺夫的回信，一方面决定将南共中央对联共(布)中央3月27日信件的复函转发给共产党情报局各成员国，希望他们在做出判断之前听取双方的意见。然而，除了季米特洛夫私下对吉拉斯说“要坚持下去”外，各党都一律表示支持联共(布)的意见，尽管或多或少有些勉强。当时，法共和意共对此保持沉默。

举动无助于消除和澄清导致联共(布)中央与南共中央之间产生分歧的原因。

42 波波维奇关于会见莫洛托夫致铁托电

(1948年4月19日)

元帅亲收。

在星期六的8点钟,也就是刚刚回到这里,我就通知了莫洛托夫。[①] 我被告知,他很忙,只能在星期一接见我。今天3点钟我同他进行了会晤。我向他转交了三封信。[②] 他说,等他们了解一下信的内容后,再给予他们认为应该的答复,他在此之前已经知道了我们回信的内容。我向他通报了会议的过程,中央全会的团结一致,茹约维奇、赫布朗和古斯廷契奇所从事的敌对活动。总之,我向他阐述了会议的全过程和结果。我的印象是,他基本上没有听进去我所讲的话。他连一个问题都没有向我提出。当我讲完时,他对我说,我讲的这一切与我动身回贝尔格莱德之前他交给我信时我对他说过的话不相符。[③] 当我问他,他指的是什么时,他回答说,准确的他也不记得了,但是,我当时对他讲的我们那里出现的一些现象,他们在信里都已经写了。于是,我建议,让我向他再重复一遍我们会谈的过程,但他

---

① 星期六即1948年4月17日。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弗·波波维奇是在参加了南共中央4月12~13日全会后,从贝尔格莱德返回莫斯科的。

② 其中两封信是铁托、卡德尔4月13日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信(文件38),南共中央4月13日给联共(布)中央的通报(文件39),另一封信不详。

③ 指波波维奇动身回贝尔格莱德参加南共中央全会之前,莫洛托夫约见他时的谈话。谈话时,莫洛托夫将苏共3月27日给南共中央的信交给了波波维奇。此时,南共中央已经收到这封信,但在莫斯科的波波维奇还不了解该信的内容。

根本不愿意听,并站了起来。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上次同莫洛托夫谈话的过程我已经向您作了口头汇报。但是,莫洛托夫这样认为,令我很惊讶,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逐字逐句地复述一下我在动身的前一天同他的两次谈话过程。莫洛托夫是4月6日星期三的午后4点钟接见我的。他对我说,致我们中央的信是根据联共(布)中央的决定由他和斯大林签名的。接着,他又补充说,他们已经决定让我了解信的内容,因为他们能够做到对我什么都不隐瞒,而他们认为,根据一切现象来看,我对这些事情都不清楚。

他简单地向我叙述了信的内容。同时,他还讲了一些信中没有提到的事情,比如,匈牙利人对他提到的吉拉斯的声明,即我们不需要学习联共(布)的历史,又如,以前他们指责过的我们的声明,即南斯拉夫不允许自己成为大国的筹码。他当时还问我,我们中央有几名委员,是否定期开会,等等。他说完后,又问我是否有什么要说的。我说,他所说的一切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判决,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无论是我,还是我们领导人中的什么人,从来都没有想过,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我相信,他们也未能真正理解这样的决定。但是,无论对我们来说多么困难,我坚信,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党是会战胜一切困难的,并将惩处把事情弄到这种地步的罪人。接着莫洛托夫说,他们对我们取得的成绩感到很高兴,信中也写了这一点。还说,他们感到应该更谨慎一些,因为他们相信了吉拉斯,但又确信他在耍手腕。最后,他祝愿我们取得成绩,于是,我们就分手了。

当天夜里12点钟,莫洛托夫又邀请了我。他说,他们决定将信的文稿交给我。当时,我问他,他们是否考虑,等我们的代表团来到时,可以同他们讨论并弄清楚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我认为,只有双方直接会晤并进行相互交谈,才能正确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除此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对此他没有做任何答复。当我问他,根据他们的意见,在这封信之后,信中提到的那些同志是否能够继续留在中央时,他沉思了一下,然后说:“我们不相信空话,只相信行动。”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讨论下去。然后,我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根据他的意见,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封信。他没有明确回答,反而问我,我们的最后一次党代会是什么时候召开的,我们现在的领导人

是什么时候选举出来的。当我告诉他这是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结果时，他说，这已经很久了，解放已经三年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召开党代会，这是不能容忍的。① 然后，他又补充说，对于我们的领导人及其工作的这种看法，不仅他们有，其他党也有。他还谈到了匈牙利人对他说的话，即在热列兹尼卡，人数众多的党的基层组织是怎样进行秘密集会的，他们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也是完全错误的。接着，他又说，他们清楚，我们的任何决议都不以书面形式转发给基层组织，他们认为，这也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仅此而已。如果我能够确信，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事情能得到顺利解决，我将准备接受最严厉的判决。我是完全自觉地和凭良心请求您做出您认为需要做出的决定，如果这是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请不要考虑我。以后，我会努力地、富有成效地履行我的职责，恳请您注意这一点。

波波维奇

① 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是1940年10月召开的。1944年9月至1945年5月南斯拉夫已逐步从德国占领下完全解放出来。

43 莫洛托夫关于会见波波维奇给拉夫连季耶夫的通报(摘录)

(1948年4月19日)

4月19日我接见了波波维奇,他将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对我们信的答复,以及南共中央全会就此问题所做的决议通报一并转交给我。波波维奇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对联共(布)中央信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全会,除一人外,一致同意下列结论:南斯拉夫从来没有任何人做过联共(布)中央的信中所提到的那些声明。波波维奇还说,联共(布)中央的信大概是依据了不正确的和带有偏见的情报,这些情报是从挑拨者以及南斯拉夫共产党和苏南友好关系的敌人那里得到的。鉴于这一点,也就是说,联共(布)中央的信不是友好的批评,而是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指责,因此,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不能接受这样的批评。

我回答说,我们将让中央了解这些信件并在认为需要时说出自己的意见。我还对波波维奇说,他今天说的话与上一次谈话时他对我说过的话相互矛盾,当时他说,我们信中指出的那些情况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里是存在的。……

44 拉夫连季耶夫与贝勃勒关于苏南关系恶化问题的谈话记录(摘录)

(1948年4月21日)

摘自 А.И.拉夫连季耶夫日记　　秘密

发送:维·莫洛托夫、安·维辛斯基、瓦·佐林,归档。

今天贝勃勒[①] 打电话给我说,他想见我,以个人的方式交换一下某些问题的意见。他表示希望来我这儿。……

二、贝勃勒声明他没有受任何人委托,来我这儿是出于个人的意愿。他希望在私下和我谈一些使他特别激动的问题。他指的是苏南关系问题。他不理解,是什么原因引起了我们两国关系的恶化。……

按贝勃勒的说法,南斯拉夫占有特别的地理位置,因此,他们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具有特殊的改革任务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南斯拉夫是苏联的一部分,那么南斯拉夫面临的这些特殊性和特别的困难就不成立了,南斯拉夫也就没有独立地与资本主义斗争的任务了。就因为现在的这种情况——南斯拉夫须独立地克服自己内部的困难和独立地解决对外政策的问题,所以要求南斯拉夫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应有必不可少的效率和那种区别于苏联的政策。这有可能会导致出现双方利益不一致的问题。照贝勃勒的说法,因此,苏联方面有可能不满意南斯拉夫奉行的路线,因为没有在所有的对外政策问题上与苏联进行咨询协商。贝勃勒不止一次地重复,

① 阿勒什·贝勃勒,时任南斯拉夫副外长。

他不清楚导致我们两国关系现在这种状况的原因。

我回答,关于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的改变及他向我提出的那些问题,贝勃勒应该去让自己的领导来解释。但我也说明,我个人不同意贝勃勒所说的,南斯拉夫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它应该有另外的和特殊的对外政策。我说,按照各自的倾向,对外政策只能有两种思想体系——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体系和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国家的思想体系。在实行对外政策时可能出现个别的问题,需要用不同的策略处理,但所有基本的对外政策问题无疑应该出于一个坚定的目的,那就是符合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利益。所以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之间在对外事务方面存在一致的立场是很重要的。我指的不是在一些小问题上进行协商,而是指在那些重要的政策问题上要有协商和一致的立场。有些问题,看上去只是地方上的问题,但它们可能引起严重的复杂的国际事端,是很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区的发展局势,它是与全世界的政治相联系的,任何不小心的一步都可能加深事情的复杂化,况且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想使欧洲这部分地区局势复杂化,以此在世界舆论和自己国家的舆论面前,为他们在此地区的帝国主义行径开脱。

贝勃勒承认一些事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地方性问题会给世界局势以重大影响。

贝勃勒接着说,以他的理解,看来苏联方面认为南斯拉夫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太尖锐了。在布拉格三国外交部长协商会议前,铁托元帅接见了南斯拉夫代表团,并指出他们在国际会议上提出的问题过于尖锐,所以铁托建议代表团发言再温和一些。

我回答,我不是讲这些与铁托元帅有关的事,也不是想用某种形式和通过其他渠道说出莫斯科方面的不满。相反,我清楚,南斯拉夫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比其他东欧代表团积极,总是与苏联代表团联系。因此可以认为,铁托在贝勃勒和西米奇去布拉格前对他们所谈的意见,并不是由于苏联对南斯拉夫代表团在前次国际会议上执行的路线表现出了什么不满引起的,而是铁托本人提出的。

三、在谈话中贝勃勒通知我,由于把一些南斯拉夫军队集中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边界,并向阿尔巴尼亚派遣了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两三

个星期前美国大使凯诺拜访了他。他以个人名义向贝勃勒说明:按他的推想,美国政府不会支持希腊政府在阿尔巴尼亚和希腊边界采取任何调整军事力量的措施。然后过了五天,凯诺重新拜访了贝勃勒,向他说明,他曾以自己名义向贝勃勒说明的事,现在可以看做是美国政府的正式声明。南斯拉夫外交部将此事通报了自己在所有重要国家的大使馆。贝勃勒推想,波波维奇大使一定将此事通报了苏联外交部。

我说,关于此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四、关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关系,贝勃勒说,季米特洛夫从捷克斯洛伐克回来时在贝尔格莱德将停留一两天,讨论保南联盟问题。按贝勃勒的说法,科斯托夫① 向驻索非亚的南斯拉夫大使齐齐默尔说,莫斯科表示支持在近期建立这种联盟。齐齐默尔为此回到贝尔格莱德,现在南斯拉夫政府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但贝勃勒想,在研究这个联盟问题时,将有许多经济方面的困难,因为保加利亚在这方面准备甚少。所以贝勃勒不排除,开始时提出的是政治联盟问题,而后将解决的还有经济联盟问题。

五、临走时,贝勃勒又回到他所关心的南苏关系现状问题。因为改善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使的工作,贝勃勒希望波波维奇能够在这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我回答说,苏联大使馆永远采取客观的立场评价南斯拉夫的情况,不可能有其他的态度。对于贝勃勒的意见,所谓需要改善我们国家之间关系的说法,我回答说,按我个人的意见,需要纠正南斯拉夫所犯下的错误,听取莫斯科对此提出的意见。贝勃勒提出,莫斯科采用了各种情报,可能有些情报不符合真实情况。我回答贝勃勒,莫斯科只采用客观和准确的情报。

我的印象是,贝勃勒是受委托而来的,以不清楚情况为掩饰,来查明大使馆如何解释苏南关系的恶化。

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
A.拉夫连季耶夫

---

① 特赖乔·科斯托夫(1897—1949),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战时在国内领导抵抗运动,季米特洛夫回国前任保共总书记,1946年3月起任政府副总理。1949年作为铁托分子被处决。

45 莫洛托夫致拉夫连季耶夫转贝勃勒的电报(摘录)

(1948年4月23日)

……南斯拉夫政府从它不与苏联协商即向美国人和英国人陈述其对的里雅斯特问题的立场时起,[①] 就违反了不久前签订的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相互协商的协定。[②] 因此,苏联政府认为自己不受上述协商协定的约束,不能把自己关于南斯拉夫与奥地利边界问题的观点通知南斯拉夫政府,而将在就此问题在伦敦举行的四国政府代表会议上陈述自己的立场。[③]

……同时还请通知南斯拉夫政府,波波维奇大使没有通知苏联政府,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几周前向南斯拉夫政府声明美国不会支持希腊政府用武力改变阿尔巴尼亚—希腊边界的措施……

---

① 1947年2月根据法国方案通过的对意和约确定,的里雅斯特及其周围有争议的地区作为自由区分为两部分,分别由英美军队和南斯拉夫军队占领,并在联大安理会与南、意两国协商的基础上选派一名总督进行管理。由于长期协商没有结果,1948年3月20日,美英法三国发表宣言,支持意大利对自由区的主权要求。3月22日,南斯拉夫政府向美英法三国发出抗议照会,同时建议南意直接谈判解决自由区的问题。苏方的指责就是针对这一举动的。4月13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认为西方的建议不能接受。的里雅斯特问题的最终解决是1975年10月通过南意双方签约完成的。

② 指1948年2月11日莫洛托夫强迫卡德尔签订的一份备忘录,文件规定,苏联和南斯拉夫应在关系到两国的重大国际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

③ 1948年4月17日,南斯拉夫副外长阿勒什·贝勃勒向拉夫连季耶夫通报说,南斯拉夫与奥地利在卡林西亚(克恩滕)地区存在着边界划分问题,南斯拉夫方面希望得到该地区一块居住着大量斯洛文居民的土地。上述建议将提交苏、美、英、法四国副外长例行会议解决。贝勃勒表示希望在会前知道苏联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

46 西米奇关于与拉夫连季耶夫会谈的纪要(摘录)

(1948年4月23日)

……

他拿起了记录。[①] 他立即提出了下列意见:您转交给我的复信文本,我将提交给我国政府,我只是想强调一点,苏联政府对于我向您阐述的业已形成的事实不负责任,我也将提请我国政府注意这一点。至于贝勃勒副部长1948年3月21日征求过苏联政府的意见,并同代办[②] 谈过话,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他只是将准备好的作为对西方国家答复的文本的复印件转交给了他,并谈到打算向意大利建议缔结和平条约。对贝勃勒所说的一切,代办都做了记录,最后,还给他读了一遍。记录里面并没有询问苏联政府的意见或者请求同意的内容,这只是一个信息罢了。

他从莫斯科回来时[③] 曾提请我注意,不要期望莫斯科对这个通报做

---

① 指拉夫连季耶夫对西米奇宣读的声明记录。为了答复4月23日早晨拉夫连季耶夫转交给贝勃勒的电报(文件45),当天傍晚,南斯拉夫外交部长西米奇约见了拉夫连季耶夫,并宣读了南政府的声明。声明说:"南斯拉夫政府将拟定给西方大国提出的关于审查对意和约,即意大利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归属问题的建议的答复,提前24小时通报给了苏联政府。它期待苏联政府对如此重要和迫切的问题能提出自己的意见。由于苏联政府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南斯拉夫政府就做出了它认为需要的和对意大利的民主力量有益的答复。南斯拉夫政府认为,这件事不能成为废除关于协商的协定的原因。"会谈时,苏联大使馆代办阿尔米亚尼诺夫在座。

② 指苏联大使馆代办阿尔米亚尼诺夫。

③ 拉夫连季耶夫3月22日回到贝尔格莱德。

任何答复。然而,在已经确定了新闻记者招待会,而照会也转交给了西方大国代表们的时候,他又提请我注意,如此重要的问题,应该同苏联政府商量。实质上,这是对审查和平条约的立场问题。他还要我注意,如果我们同意发表一个声明,要求作为"信息"通报的那个问题只是向苏联提出的,那么,我们还有时间进行选择。

我的意见是,这只是形式上的看法,贝勃勒的过失在于,当已经通报了问题的全部实质后,他没有向代办强调要询问苏联对这件事的意见。对于我的意见,他回答说,苏联政府在没有就这个问题受到询问时,是不会说出自己的意见的。此外,关于相互协商的协定的内容要比对已经形成的意见进行一般通报要广泛得多。

在这次会谈结束时,我再次强调说,这大概只是技术上的失误,而实质问题仍然是我们在的里雅斯特问题和日益临近选举的意大利问题上的利益,最后,由于纯粹的国内政策原因,对西方大国有关审查对意和约问题上的挑拨性建议需要立即做出答复。……我们的立场丝毫也没有使的里雅斯特的问题复杂化,并且有助于粉碎西方大国在选举前进行的挑拨行为,最后,那种认为我们破坏了关于相互协商的协定的说法,与我们的立场所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47 拉夫连季耶夫与别洛夫斯基关于保南联盟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8年4月27日)

摘自 А.И.拉夫连季耶夫的日记　　秘密

分送:维·莫洛托夫、安·维辛斯基、瓦·佐林,归档。

我正式回访了别洛夫斯基[①]。

别洛夫斯基通知说,季米特洛夫从捷克斯洛伐克回来途中,将不准备按最初打算的那样在贝尔格莱德停留。[②] 没有向别洛夫斯基讲明,为什么季米特洛夫改变了自己最初的决定。当此事通知南斯拉夫外交部时,对方对此事表示不满。

别洛夫斯基指出,在《新马其顿》报上刊登了关于保加利亚大国沙文主义的大块文章。这些文章片面和错误地阐述了一系列问题。别洛夫斯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不得不向南斯拉夫人作出说明。他甚至声称,南斯拉夫人显然夸大了马其顿问题,而实际上是想把马其顿问题与保南联盟这个总体问题放到一起解决。

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
А.И.拉夫连季耶夫

---

① П.别洛夫斯基,时任保加利亚驻南斯拉夫大使。

② 1948年4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布拉格与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了保捷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48 联共(布)中央关于南共问题致南共中央的信

(1948 年 5 月 4 日)

机密

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你们的答复及由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签署的关于 1948 年 4 月 13 日南共中央全会决议的通告均已收到。

很遗憾,这两个文件,特别是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签署的文件,与南斯拉夫的前几个文件相比不仅没有任何进步,反而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使冲突更加尖锐。

该文件使用的语气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种语气只能被认为是太傲慢。文件中看不到有弄清真相、老实承认其错误和承认必须改正这些错误的愿望。南斯拉夫同志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批评,而是采取了庸俗化的态度,即把批评看做是对南共中央威信的侮辱,是对南斯拉夫领导人自尊心的伤害。

南斯拉夫领导人为了摆脱他们自己造成的困境,采用了一种“新”方法,即矢口否认自己的错误的方法,尽管这些错误是十分明显的。他们否认 1948 年 3 月 27 日联共(布)中央信中所叙述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和文件。看来,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不懂得,这种矢口否认事实和文件的幼稚的做法决不能使人信服,而只能引人发笑。

(1)关于从南斯拉夫撤回苏联军事顾问的问题

联共(布)中央在其3月27日的信中陈述了撤回苏联军事顾问的理由,同时声明,联共(布)中央的情报是基于这些顾问因南斯拉夫负责官员对苏军及其驻南斯拉夫代表的不友好态度而提出的申诉。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完全否认这些申诉,认为这是毫无道理的。联共(布)中央为什么要相信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的毫无根据的说法,而不相信苏联军事顾问的大量申诉呢?我们有什么理由这样做呢?苏联几乎在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都有自己的军事顾问。必须强调指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我们驻这些国家的军事顾问的任何申诉。这本身就说明,我们在这些国家没有因苏联军事顾问在那里的工作而产生任何误会。在这方面,仅仅在南斯拉夫存在这种申诉和误会。问题只能这样解释,南斯拉夫在苏联军事顾问周围制造了一种特别不友好的气氛,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列举了用于付给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顾问薪金的大量开支,强调苏联驻南斯拉夫将军们收入的第纳尔比南斯拉夫将军高出两至三倍,他们认为这种情况会引起南斯拉夫军事人员的不满。但是第一,南斯拉夫将军除了领取第纳尔以外,还享有住房、佣人、食品等实物福利;第二,付给苏联驻南斯拉夫将军们的那份货币工资完全与他们在苏联国内应得的货币工资相等。苏联政府当然不能同意降低派往南斯拉夫的苏联将军们的工资。

用于苏联驻南斯拉夫将军们的开支对南斯拉夫预算来说可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政府应当及时找苏联政府商谈,并建议苏联政府承担一部分开支。毫无疑问,苏联政府会同意这样做的。然而,南斯拉夫人采取了另一种做法,他们不是和睦协商地解决这一问题,而是开始污辱苏联军事顾问,骂他们是寄生虫,并且败坏苏军的声誉,乃至在苏联军事顾问周围已经形成了不友好的气氛之后,南斯拉夫政府才同苏联政府进行交涉。苏联政府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状况。

(2)关于苏联驻南斯拉夫的文职专家问题

联共(布)中央在3月27日的信中陈述了从南斯拉夫撤回文职专家的理由。联共(布)中央这样做,依据的是苏联文职专家的申诉和苏联驻南斯

拉夫大使的报告。从这些申诉和报告中可以得出结论,苏联文职专家以及联共(布)驻(贝尔格莱德)共产党情报局的代表尤金同志实际上受到南斯拉夫国家安全部的监视。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其来信中否认这些申诉和报告的真实性,硬说南斯拉夫国家安全部没有监视驻南斯拉夫的苏联公民。但是联共(布)中央有什么理由相信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的毫无根据的说法,而不相信包括尤金同志在内的苏联人的申诉呢?苏联政府在各人民民主国家都派有文职专家,但并没有从他们那里接到任何申诉,他们与这些国家的政府也没有发生任何误会。请问,为什么这些误会和冲突只发生在南斯拉夫?难道不是因为南斯拉夫政府对包括尤金同志本人在内的驻南斯拉夫的苏联人采取了一种反对他们的特别方式吗?苏联政府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状况,不得不从南斯拉夫撤回自己的文职专家。

(3)关于韦莱比特和南斯拉夫外交部中其他间谍的问题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声称,在与莫洛托夫同志会晤中,卡德尔同志和吉拉斯同志谈到对韦莱比特的怀疑时,仅仅说过"韦莱比特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这是不真实的。事实上,在这两位同志与莫洛托夫同志交谈时,曾谈到过韦莱比特有充当英国间谍的嫌疑。很奇怪,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认为免去韦莱比特在外交部的任职就等于毁灭了他。为什么不毁灭韦莱比特,就不能撤销他在外交部的任职呢?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关于保留韦莱比特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职位的理由的说法也很奇怪,似乎没有解除韦莱比特职务是因为他正在接受审查。正是因为韦莱比特在接受审查而解除他的上述职务不是更好吗?为什么对一个完全敌视苏联的英国间谍如此宽容大度?

韦莱比特并不是外交部机构中惟一的间谍。苏联代表不止一次地向南斯拉夫领导人反映,南斯拉夫驻伦敦大使莱奥恩蒂奇是英国间谍。[①]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潜伏的老牌英国间谍至今还留在南斯拉夫外交部机构

① 莱奥恩蒂奇是战前南斯拉夫的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由南共领导的人民解放运动,后在南斯拉夫新政府中担任过重要外交职务。目前尚未看到苏联代表于1948年5月之前"不止一次地向南斯拉夫领导人反映"他是英国间谍的材料。

中？

苏联政府获悉，除莱奥恩蒂奇外，还有另外三个名字尚待查证的南斯拉夫驻伦敦大使馆工作人员，也是为英国情报机关服务的。苏联政府这样说，是完全负责任的。

人们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从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的举止看，他俨然是南斯拉夫的主人，而他的人数不断增加的“情报员”可以自由自在、逍遥法外？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刽子手奈迪奇的亲友如此轻而易举地被安置在南斯拉夫的国家和党的机关里，那也是令人费解的。

很清楚，既然南斯拉夫政府坚持拒绝肃清其外交部机构中的间谍分子，苏联政府就不得不终止通过南斯拉夫外交部与南斯拉夫政府进行公开的通信往来。

(4)关于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和苏维埃国家的问题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其 1948 年 4 月 13 日的来信中写道：“我们认为，他(苏联大使)作为大使无权向随便什么人打听我们党的工作情况。这不是他的职责。”

我们认为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的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是反苏的。显然，他们把一个作为代表苏联共产党政府，在南斯拉夫共产党政府时期驻在南斯拉夫的、身负重任的共产党人的苏联大使，与一个作为旨在动摇南斯拉夫国家基础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普通官员的一般资产阶级国家大使等同起来。很难理解，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怎能如此荒唐。这些同志懂不懂得，如此看待苏联大使意味着否定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的友好关系；这些同志懂不懂得，一个代表作为把南斯拉夫从德国人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友好大国的身负重任的共产党人的苏联大使，不但有权而且有义务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不时地就所有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谈。当然，如果仍以与苏联友好关系为基础的话，那怎么可以对这些简单的、起码的道理产生怀疑呢？

应当奉告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与南斯拉夫的看法相反，我们不认为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是普通官员，不把他比做资产阶级大使，不否认

他“有权向随便什么人打听我们党的工作情况”。因为他虽然做了大使,但他仍然是一个共产党员。所以我们把他当做一个同志和一个共产党活动家来对待。他在苏联人中有熟人和朋友。他是否在“搜集”我们党的工作的情报呢?很可能是“搜集”的。那就让他“搜集”吧!我们用不着对同志们隐瞒自己工作中的缺点。我们自己正在揭露这些缺点,目的是清除它们。

我们认为,不能把南斯拉夫同志对苏联大使的这个看法当做是偶然的。这个看法源于南斯拉夫政府的总的立场,因此南斯拉夫领导人往往看不到苏联对外政策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外政策之间的区别,把苏联的对外政策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对外政策等量齐观,认为南斯拉夫对苏联应当实行它对英美帝国主义大国实行的那种政策。

在这方面,铁托同志于 1945 年 5 月底在卢布尔雅那的讲话是极有代表性的。他在这篇讲话中说:“有人说战争是正义的,我们也是这么看的。但我们还要求正义地结束战争,我们要求每个人都成为自己占有物的主人,我们不想为别人付账,我们不想成为筹码,我们不想卷入某种势力范围的政治当中。”

这是针对的里雅斯特问题说的。众所周知,在苏联迫使英国人和美国人作出有利于南斯拉夫的一系列领土让步后,英国人和美国人与法国人联合起来不接受苏联关于把的里雅斯特移交给南斯拉夫的建议,并用其在意大利的驻军占领了的里雅斯特。① 为了把的里雅斯特移交给南斯拉夫,苏联已使尽了所有其他手段,最后只剩下一个手段:因的里雅斯特而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开战并用武力占领它。南斯拉夫的同志不可能不知道,在如此严酷的战争后,苏联已不能再打仗了。然而,这一情况引起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不满,这也反映在铁托同志的讲话中。铁托同志在卢布尔雅那的声明,即南斯拉夫“不想为别人付账”,“不想成为筹码”,不希望南斯拉夫“卷入某种势力范围的政治当中”,不仅是针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也是针对

① 事实上,西方盟军是 1945 年 5 月与南斯拉夫军队同时占领的里雅斯特的,而苏联是在 6 月南斯拉夫被迫撤军后才开始支持南斯拉夫对这一地区的主权要求的。

苏联的。[①] 同时,在这种情况下,铁托同志对待苏联的态度与他对待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他不承认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有区别。

在铁托同志这一没有遭到南共中央政治局抵制的反苏观点中,我们找到了南共领导人在为数不少的南斯拉夫党员干部中说什么苏联已经"蜕变"为企图"从经济上控制南斯拉夫"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诽谤性宣传的依据;我们还找到了南共领导人关于联共(布)企图"通过共产党情报局控制其他党"、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已不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等诽谤性宣传的依据。

当时,苏联政府不得不提醒南斯拉夫政府注意,铁托同志的这一言论是不能容忍的。而由于卡德尔同志和铁托同志随后就此问题所作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萨德奇科夫同志奉苏联政府指示向南斯拉夫政府发表了如下声明(萨德奇科夫同志是1945年6月5日发表这一声明的):"我们认为铁托同志的讲话是对苏联的恶意攻击,而卡德尔同志的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国的读者就是这样理解铁托同志的讲话的,而且对这个讲话不可能有别的理解。请告诉铁托同志,如果他再对苏联进行这样的攻击,我们将被迫在报刊上进行公开批评以作答复,并对他进行反驳。"

铁托同志在苏维埃国家问题上的反苏立场,必然导致南斯拉夫领导人把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与资产阶级的大使们等同起来。

看来,南斯拉夫领导人打算今后仍然坚持这种反苏立场。南斯拉夫同志应当注意,坚持这样的立场就意味着放弃与苏联的一切友好关系,背叛苏联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他们还应当考虑到,他们坚持这样的立场就意味着放弃自己要求苏联给予物质援助和任何其他援助的权利,因为苏联只向自己的朋友提供援助。

为使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明白,我们应当强调指出,这种针对苏联大使和苏维埃国家的反苏观点我们只在南斯拉夫才能看到,而在其他人

---

① 当时南斯拉夫坚持卢布尔雅那声明只是针对西方大国的,苏南关系公开破裂后,南斯拉夫领导人承认铁托的话也是针对苏联的。

民民主国家,我们的关系过去和现在都是友好的和完善的。

值得指出的是,现在与铁托同志完全一致的卡德尔同志,在三年前对铁托同志在卢布尔雅那的上述讲话曾经有完全不同的评价。当时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萨德奇科夫同志是这样向我们报告 1945 年 6 月 5 日他与卡德尔同志的谈话的:

"今天,6 月 5 日,我向卡德尔通报了你们提出的意见(铁托尚未回来)。通报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他想了一下说,他认为我们对铁托讲话的评价是正确的。同时他也同意苏联今后不能再容忍这种言论。卡德尔说,当然,在南斯拉夫处于如此困难的时刻,公开批评铁托的言论对他们来说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们将尽力避免发表类似的言论。但是,如果再出现这种言论的话,苏联将有权进行公开批评。这样的批评对他们来说将是有益的。卡德尔请求向你们转达对这一及时批评的谢意。卡德尔表示,这一批评将有助于改进他们的工作。对于 3 月份政府声明中政治错误的批评,是有很大益处的。卡德尔相信,这次批评也将有助于改进政治领导。

"卡德尔在试图(很谨慎地)分析错误的原因时说,当然,铁托在消除共产党内以前的派别活动和组织人民解放斗争方面都有巨大功劳,但他有时倾向于把南斯拉夫看做是一个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没有普遍联系的独立自在的国家。其次,党内已形成这样的状况,党中央并未作为组织和政治中心而存在。卡德尔说,我们偶尔开开会,做出一些并不重要的决定。实际上我们中每一个人都自行其是。工作作风不好,工作中缺乏集体主义。卡德尔接着说,我们希望苏联不要把我们看做是能独立解决问题的另一个国家的代表,而要看做是一个未来苏维埃共和国的代表,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看做是苏联共产党的一部分,这就是说,我们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南斯拉夫将成为苏联的组成部分这一前景上。因此,他们希望我们坦率地、公开地批评他们,向他们提出意见,以指引南斯拉夫的内外政策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我回答卡德尔说,应从实际出发,也就是从南斯拉夫是一个独立国家、南斯拉夫共产党是一个独立政党出发。我说,你们应当而且可以独立

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但只要你们要求我们提出建议，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拒绝。我们对南斯拉夫有明确的、根据条约承担的义务，而且更多地有道义上的义务，当你们需要我们提供建议和帮助时，只要有可能，我们从来也没有拒绝过。每当我向莫斯科转告铁托元帅的请求时，我都立刻得到答复。但是，只有在你们通过决定或发表声明之前及时地通知我们，提供这种建议才是可能的和有益的……”

我们姑且不谈卡德尔同志关于把南斯拉夫当做苏联未来组成部分、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当做联共(布)一部分的幼稚的和错误的论调。但是，我们想提请注意卡德尔同志就铁托同志在卢布尔雅那的反苏讲话和南共中央的不良习气提出的批评性意见。

(5)关于吉拉斯同志的关于情报机构和贸易谈判的反苏言论问题

我们在3月27日的信中讲述了吉拉斯同志在一次南共中央会议上的反苏言论，他说苏联军官在道德方面不如英国军官。吉拉斯同志的这个言论涉及少数驻南斯拉夫苏军军官的不道德行为。我们把吉拉斯同志的这一讲话看做是反苏言论，是因为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吉拉斯同志在谈到两三名苏联军官的过失时，没有看到解放了欧洲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军队与为了压迫而不是解放世界各族人民的资产阶级的英国军队之间的基本区别。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1948年4月13日的来信中声称，“吉拉斯从来没有以这样的方式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又说“早在1945年铁托就曾以书面和口头的方式对此进行了解释”，“无论斯大林同志还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当时都接受了这一解释”。我们认为应当指出，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的这一说法不符合事实。

请看当时斯大林同志在其给铁托的电报中对吉拉斯同志的讲话是如何反应的：“我了解贝尔格莱德解放后你们处境的困难。然而，你们必须知道，苏联政府尽管遭受了巨大牺牲和损失，但还在尽一切可能帮助你们。可是，这样的事实使我感到吃惊，即你们把驻南斯拉夫个别红军官兵的个别事件和错误普遍化并扩展到整个红军。你们不能如此侮辱正在帮助你们驱逐德国人，并在与德国侵略者作战中流血牺牲的军队。没有家丑的家

庭是不存在的,这并不难理解,但如果因为有家丑而侮辱全家,那就令人奇怪了。如果红军战士得知吉拉斯同志和那些对其言论不予反驳的人认为英国军官在道德方面比苏联军官高尚,那他们就会因受到这样的委屈而大吵大闹。"①

我们认为,吉拉斯同志的这个反苏讲话没有遭到南共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的反驳,这就是南共领导人对苏军驻南斯拉夫代表进行诽谤性宣传的基础,而这种宣传就是我们撤回军事顾问的原因。

吉拉斯同志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呢?它的结果是吉拉斯同志与南斯拉夫代表团一起来到莫斯科向斯大林同志道歉,并请求忘掉他在南共中央会议上所犯的令人遗憾的错误。

显然,事情完全不像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来信中所写的那样。吉拉斯同志的错误不是偶然的。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指责苏联人,说他们似乎在招募南斯拉夫公民为其情报部门做事。他们写道:

"我们认为,苏联情报机构在我们这个正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里招募我国公民充当其间谍是不正常的,我们只能把这理解为违背我国利益的事情。尽管我们的领导人和国家安全机构对此已提出抗议,并通知你们这是不能允许的,但仍然出现了这种事情。正在被招募的人包括我们的军官、各级领导人和一些对新南斯拉夫持否定态度的人。"

我们声明,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的这个讲话充满了对苏联驻南斯拉夫工作人员的恶意攻击,根本不符合事实。

如果要求正在南斯拉夫工作的苏联人缄默不语,不与任何人交谈,那是非常荒谬的。苏联工作人员都是政治上成熟的人,而不是无权关心南斯拉夫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雇佣工作者。他们当然要与南斯拉夫公民交谈,向他们提出问题,向他们了解情况,等等。只有不可救药的反苏分子,才会把这些交谈看做是企图为情报机构招募人,而且是招募那些对新南斯拉夫"持否定态度"的人。只有反苏分子才会认为,苏联领导人不如南共中央政

---

① 如前注所述,南斯拉夫代表团向斯大林解释这件事是在1945年4月,而斯大林这封电报是1944年10月31日发往贝尔格莱德的。

治局成员那样关心新南斯拉夫的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只在南斯拉夫出现了这些对苏联代表的无理指责。在我们看来，这种对苏联工作人员的无理指责，目的是为了证明南斯拉夫国家安全部监视驻南斯拉夫的苏联工作人员是有道理的。

必须提出，来到莫斯科的南斯拉夫的同志通常可以完全自由地走访苏联各城市，同我国人民接触，并且自由地同他们交谈。苏联政府从来没有对他们进行过任何限制。吉拉斯同志最近还来过一次苏联，他在莫斯科住了一阵后到列宁格勒去了几天，同那里的苏联友人进行了交谈。按照南斯拉夫的公式，有关党和政府工作的情报只能向党中央领导机关或政府领导机关索取。但是，吉拉斯同志不是从苏联的这些机关，而是从这些机关在列宁格勒的地方机构得到的情报。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询问吉拉斯同志在那里做了什么，他搜集了哪些情报。① 我们的看法是，他在那里不是为英国、美国或法国的情报部门搜集情报，而是为南斯拉夫的领导机关搜集情报。既然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们就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指责的，因为从这些情报中可以找到对南斯拉夫的同志有益的东西。吉拉斯同志说不出他受到过什么限制。

那么我们现在要问：为什么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共产党人享受的权利就应该比在苏联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享受的权利少一些？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4月13日的来信中再次谈到苏南之间的贸易关系问题，硬说克鲁季科夫同志拒绝南斯拉夫代表提出的继续进行贸易谈判的要求。我们已几次向南斯拉夫的同志解释过，克鲁季科夫同志否认强加于他的这些话。我们同时也已说明，苏联政府从来没有提出过中止同南斯拉夫的贸易谈判和贸易业务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到此为止，不打算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6)关于南共中央政治局在南斯拉夫阶级斗争方面的错误政治路线问题

我们在信中写道，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不存在阶级斗争政策的精神，

---

① 吉拉斯在1948年1～2月访苏期间与列宁格勒有关机构的会谈都是苏联官方组织的，并且吉拉斯的活动一直有联共(布)中央机构负责人列沙科夫的陪同。

资本主义成分正在农村和城市中增长,而党的领导没有采取措施来限制资本主义成分。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矢口否认这一切,把我们这一具有原则性的论断看做是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种诬蔑,并且回避对实质问题进行回答。这些同志的论据只不过是所谓南斯拉夫正在进行切实的、彻底的社会变革。但这种说法却是十分不充分的。这些同志否认在当今南斯拉夫条件下资本主义成分正在加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农村阶级斗争正在激化这一事实,所依据的是一种机会主义观点,即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不是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的那样变得更加尖锐,而是如布哈林之流机会主义者所断言的正在熄灭,他们鼓吹的是一种资本主义成分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腐朽理论。

谁也不会否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联所进行的社会变革的深刻性和重要意义。但是,联共(布)从来没有因这一事实而得出结论说,在我国阶级斗争正在削弱,在我国不存在资本主义成分增长的危险。列宁曾在1920~1921年指出,"我们暂时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在俄国,资本主义比共产主义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这是因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① 大家知道,在十月革命后的15年间,起先是关于采取措施限制农村资本主义成分,后来是关于把富农作为最后一个资本家阶级加以消灭的问题,从未离开过我党的议事日程。在保障南斯拉夫建成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方面,低估联共(布)的这一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对共产党员来说则是不能容许的,因为不能只在城市和工业中建设社会主义,也应当在农村和农业中建设社会主义。

南共领导人回避关于阶级斗争和限制农村资本主义成分的问题不是偶然的。更有甚者,在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讲话中往往闭口不谈农村中阶级分化的问题,农民被看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党也不动员起来去克服由于农村剥削成分增加而造成的困难。但是,南斯拉夫农村的政治形势没有理

① 参见《列宁全集》,31卷,6页,人民出版社,1958。

由让人盲目乐观和温厚宽容。在南斯拉夫，土地没有实行国有化，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和买卖土地，富农手里集中了大量土地并使用雇佣劳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南共用抹杀阶级斗争和调和阶级矛盾的精神教育党，就势必会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困难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使南斯拉夫共产党陶醉于从伯恩施坦、福尔马和布哈林那里搬来的资本主义成分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理论。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某些显要领导人在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问题上背离马列主义路线也不是偶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承认工人阶级在消灭资本主义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方面的领导作用，而南共领导人却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只要指出铁托同志 1946 年 11 月在萨格勒布的如下讲话(见 1946 年 11 月 2 日《战斗报》)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我们并不是为了要获得农民的选票才对他们说，农民是我们国家最牢靠的基础，而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确实是这样的人。”

这个观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完全抵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包括人民民主国家在内的欧洲，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是工人阶级，而不是农民。至于农民，或者更确切地说，农民的大多数，即贫农和中农，可以或者正在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而在这个联盟中起领导作用的依然是工人阶级。其实，铁托同志的上述观点不仅是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而且还宣布全体农民——其中也包括富农——是新南斯拉夫最牢靠的基础。显然，这个观点表达了适合于小资产阶级政治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

(7)关于南共中央政治局在党与人民阵线之间关系问题上的错误政策

我们在上一封信中写道，在南斯拉夫，有人认为国家的主要领导力量不是共产党，而是人民阵线；南斯拉夫领导人削弱党的作用，实际上把党融合在非党的人民阵线中，因而也就犯了 40 年前俄国孟什维克犯过的那种原则性错误。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对此予以否认，说什么人民阵线的所有决定都是党的决定，而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强调，是在党的哪次会议上通过了哪些决定。南斯拉夫的同志的堕落就在这里，他们害怕在全体人民面前公开

地拥护党和党的决定,让人民知道党是领导力量,是党领导人民阵线,而不是人民阵线领导党。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最高组织形式,它居于所有其他组织之上,在苏联,它居于苏维埃和其他组织之上;在南斯拉夫,它居于人民阵线和其他组织之上。党居于劳动人民的所有这些组织之上,不仅仅是因为它把劳动人民中的所有优秀分子都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而且还因为它有自己的特定纲领和特定政策,在此基础上领导劳动人民的所有其他组织。但是,南共中央政治局害怕公开承认这一点,害怕理直气壮地向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宣传这一点。南共中央政治局以为,如果它不着重指出这一点,那么其他政党就没有理由来发展他们的势力,开展他们的斗争。看来,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似乎以为他们用这种廉价的手腕就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规律,就可以愚弄各个阶级,愚弄历史。但这只是一种幻想和自欺欺人。只要存在着对抗的阶级,他们之间就会有斗争,而只要有斗争,这种斗争就会合法地或不合法地反映在各个团体和政党的活动中。

列宁说过,党是工人阶级手中最重要的武器。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使这一武器保持战斗准备状态。但是,因为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收起了党的旗帜,拒绝在人民面前强调党的领导作用,他们正在损坏这个武器,削弱党的作用,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如果认为敌人会由于南斯拉夫同志们的廉价手腕而停止战斗,那是荒谬可笑的。就是这个党,应该保持随时准备抗击敌人的战斗状态,而不能麻痹大意,不能收起党的旗帜,不能以为如果不给敌人以借口,他们就会放弃斗争,就会停止以合法的或不合法的手段组织他们的势力。

我们认为,南斯拉夫这样贬低共产党的作用太过分了。这里说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与人民阵线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关系在原则上是不正确的。必须考虑到南斯拉夫人民阵线中有阶级成分不同的人,其中有富农、商人、小业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各种政治团体,包括某些资产阶级政党。在南斯拉夫,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只有人民阵线,而党及其组织都不是公开地以自己的名义出现在人民面前,这一事实不仅削弱了党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而且使一个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党,不能通过公开的政治活动,通过公开宣传自己的观点和纲领来赢得人民的信任,并以自己的影响争取更加广大的劳动群众。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忘记了党是要发展的,而且只有在公开的对敌斗争中党才能发展。他们忘记了南共中央政治局的廉价手腕和骗人伎俩不可能代替这种斗争,而这种斗争正是教育党的干部的学校。顽固地不愿意承认除了人民阵线的纲领南共没有别的纲领这一说法的错误,这表明南斯拉夫领导人多么严重地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政党的观点。在这里我们看到,南斯拉夫共产党有取消主义的危险倾向,这对南共本身的生存是一个威胁,而最终将导致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的蜕化变质。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硬说孟什维克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融合在非党群众组织中的错误是出现在 40 年以前,因此这些错误与南共中央政治局今天的错误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联系。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大错特错了。这两件事之间理论上的联系和政治上的联系是不容怀疑的,因为无论是 1907 年的孟什维克,还是此后过了 40 年的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同样都贬低马克思主义政党,同样都否定党作为高于所有其他劳动人民群众组织的最高组织形式的作用,同样都把马克思主义政党融合在非党群众组织中。这里的区别仅仅在于:孟什维克于 1906 ~ 1907 年犯了这些错误,但伦敦代表大会上受到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批判后没有重犯;而南共中央政治局不顾这一明显的教训,在 40 年之后还从棺材里拣出孟什维克同样的错误,并宣布它为党的理论。这一事实不仅不能减轻,反而加重了南斯拉夫的同志的错误。

(8)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内令人忧虑的状况问题

我们在上一封信中写道,在南斯拉夫,尽管共产党上台执政已经三年半,但依然处于半合法的状态;党内没有民主,没有选举制度,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南共中央的大多数委员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指派的。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矢口否认这一切。他们写道:“南共中央的大多数中央委员不是指派的”,“在第五次党代表会议上(这次会议于 1940 年 12 月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举行……根据共产国际的一项决议,这次会议

拥有代表大会的一切权利),选举产生了由31名中央委员和10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南共中央委员会”,“其中在战争期间牺牲了10名中央委员和6名候补中央委员”,此外还开除了两名中央委员,“如今还活着并工作的有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19名南共中央委员和7名指派的中央委员”,目前“南共中央委员会由26人组成”。

这个通报不完全符合事实。从共产国际的档案中可以看出,在1940年10月而不是12月举行的第五次代表会议上选举产生的不是31名中央委员和10名候补中央委员,而是22名中央委员和16名候补中央委员。瓦尔特(即铁托)同志[①] 就此于1940年10月底从贝尔格莱德发出的报告是这样说的:“致季米特洛夫同志。10月19日至23日举行了南共第五次代表会议。101名全国各地推选出来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选举产生了由22名正式委员(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16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大会一致通过。瓦尔特。”

如果说经选举产生的22名中央委员中牺牲了10名,那么还有12名经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如果说12名中央委员中已开除了两名,那么还有10名经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说现有26名中央委员,因而如果从这里减去10名经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那么剩下的现有中央委员会里还有16名指派的委员。由此可见,现在的南共中央委员大多数是指派的。

不仅南共中央委员的情况是这样,地方领导人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是被指派的,而不是由下面选举出来的。

我们认为,在一个党执掌政权并可以享有充分合法地位的条件下,党的领导机构的这种构成方式只能说是半合法的,而这种组织本身也只能是宗派官僚主义的。

不召开党员会议或者是秘密召开会议,这种情况是完全不能容许的。这必然破坏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背着工人秘密地吸收党员也是不能容许

---

① 铁托战前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出于保密,取名为瓦尔特·弗里德里希。1935年,铁托作为南共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使用的就是这个名字。此后,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包括斯大林在内,都用这个名字称呼铁托。

的,吸收党员应当起到重大的教育作用,以便使党与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建立联系。

如果南共中央政治局确实重视自己的党,那它就不会允许党内存在这种状况,它应当在掌握政权后,即三年半以前,立即要求党召开代表大会,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进行改组,并完全作为一个合法的政党开展活动。

如果党内存在这样的情况,领导机构不是选举产生的,而只有自上而下指定的,这就谈不上有党内民主,更谈不上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知道,党员害怕说出自己的意见,不敢批评党内的一些做法,他们宁愿保持沉默,以免遭到报复。国家安全部长同时也是中央主管干部的书记,或者如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所说的是南共中央的组织书记,这不是偶然的。显然,党员和党的干部被置于国家安全部长的监视之下,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并且是不能容忍的。例如,茹约维奇同志只是在南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不同意南共中央政治局给联共(布)中央的回信草案,就立即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可见,南共中央政治局不是把党看做有权表示自己意见的独立的机体,而是将其看做是没有权利讨论任何问题、只能绝对执行"首长"一切命令的游击队。这在我们这里被称做是在党内推行军事的方法,这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内民主原则是完全不相容的。

大家都知道,托洛茨基当时也曾企图在联共(布)党内推行军事的领导方法,但他失败了,受到了以列宁为首的党的批判,军事的方法被否决了,而党内民主作为党的建设的最重要原则得到了确立。

我们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内部这种不正常状况对于党的生活和发展是最大的危险。无论是对南斯拉夫共产党还是对南斯拉夫人民民主共和国来说,这种党内宗派官僚主义状况消灭得越快越好。

(9)关于南共领导人的骄傲自大和他们对待自己错误的不正确态度问题

从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完全否认南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中存在任何错误,也完全否认在南斯拉夫少数党的干部中正在进行所谓苏联"蜕变"为帝国主义国家之类的诽谤性宣传。他们认为,这里的问题完全是由于向联共(布)中央提供了关于南斯拉夫情况的错误

情报所造成的。他们认为,联共(布)中央已经成了由茹约维奇同志和赫布朗同志传播的诽谤性的错误情报的“牺牲品”,并坚持认为,如果没有关于南斯拉夫情况的这种错误情报,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就不会存在任何分歧。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问题不在于南共中央的错误,也不在于联共(布)中央对这些错误的批评,而在于茹约维奇同志和赫布朗同志的错误情报,以及茹约维奇同志和赫布朗同志用这种情报“愚弄”了联共(布)中央。他们认为,如果惩处了茹约维奇同志和赫布朗同志,那么一切就都会正常了。这样一来,他们就找到了替罪羊。

我们怀疑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自己是否相信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如果他们仍然坚持这种说法,那是由于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最容易使南共中央政治局摆脱已经陷入的那种困境。他们提出这种荒谬的而且显然是天真的说法,不仅是为了推卸恶化苏南关系的责任,把它嫁祸于苏联,而且是为了诬蔑联共(布)中央,说它急不可待地想搞到所有“带有偏见的”和“反党的”情报。

我们认为,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对待联共(布)中央及其就南斯拉夫的同志所犯错误提出的批评性意见所持的这种态度,不仅是无聊的和虚伪的,而且是极端反党的。

如果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希望弄清真相,如果他们面对事实不感到难堪,他们就应当严肃认真地思考如下一些问题:

一、为什么联共(布)中央关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事务的情报是正确的,没有引起与这些国家共产党的任何误解,而关于南斯拉夫的情报,按照南斯拉夫同志的说法,却是“带有偏见的”和“反党的”,并引起了他们的反苏攻击和对联共(布)中央的敌视态度呢?

二、为什么苏联与别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日益发展和巩固,而苏南关系却在恶化并在继续恶化呢?

三、为什么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纷纷表示赞同联共(布)中央3月27日的信件并谴责南斯拉夫同志的错误,而坚持自己错误的南共中央政治局却处于孤立状态呢?

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

为了揭露南共中央政治局的错误,根本没有必要求助于诸如茹约维奇和赫布朗等个别同志的情报。为此只要从发表在报刊上的南共领导人如铁托、吉拉斯、卡德尔等同志的正式言论中就可以得到足够的材料。

我们声明,苏联人没有从赫布朗同志那里得到过任何情报。我们声明,茹约维奇同志与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拉夫连季耶夫同志的谈话,连南斯拉夫领导人错误讲话和反苏讲话内容的十分之一都没有。对这些同志的惩处不仅是违背党内民主原则的不能容忍的迫害行为,而且证明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反苏立场,因为他们认为,一个南斯拉夫共产党员与苏联大使谈话就是犯罪。

我们认为,南斯拉夫领导人企图推卸恶化苏南关系的责任,以此掩盖这些同志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愿望,以及今后继续推行对苏联不友好政策的意图。

列宁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严肃认真、是否真正履行它对自己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政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教育和训练群众。"①

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明确指出,由于南共领导人拒绝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他们正在极其粗暴地破坏列宁在这一指示中所提出的原则。

我们不得不同时指出,与南斯拉夫领导人不同,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老老实实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诚心诚意地改正了错误,从而使他们的党能够加强自己的队伍,并教育自己的干部。

我们认为,南共中央政治局不愿意老老实实地承认其错误并诚心诚意地改正其错误的基础,是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极端狂妄自大。业已取得的胜利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他们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满不在乎。

---

① 参见《列宁全集》,31卷,39页,人民出版社,1958。

他们不仅自己骄傲起来,而且还鼓吹骄傲,他们不懂得骄傲有可能毁灭南斯拉夫领导人。

列宁说:"过去一切存在过的革命政党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的力量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①

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明确指出,由于南共领导人从来不知道谦虚,而且现在仍然陶醉于自己并不是很大的成就,他们已经忘记了列宁的这一指示。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来信中谈到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功劳和成绩,说联共(布)中央过去曾承认这些功劳和成绩,而现在却似乎对它们避而不提了。这当然是不真实的。谁也不能否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功劳和成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共产党的功劳和成绩并不比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少。然而,与唠唠叨叨、大吹特吹得令人厌烦的南斯拉夫领导人不同,这些共产党的领导人谦虚谨慎,没有大谈自己的成绩。

还应当指出,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对革命的贡献比南斯拉夫共产党不是小而是大。如果说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迄今所取得的成绩不如南斯拉夫共产党,这也不是因为南斯拉夫共产党有什么特殊本领,而主要是因为南斯拉夫游击队司令部被德国空降兵部队摧毁后,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处于严重危机的时刻,苏联军队援助了南斯拉夫人民,击溃了德国占领者,解放了贝尔格莱德,从而为南斯拉夫共产党获得政权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可惜的是,苏联军队没有、也不可能向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提供这种援助。如果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考虑到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他们就会较少吹嘘自己的功劳和成绩,就会表现得礼貌一点,谦虚一点。

南斯拉夫领导人的骄傲自大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他们甚至把那种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承认是属于他们的功劳也归于自己。以

---

① 参见《列宁全集》,33卷,275页,人民出版社,1958。

军事科学问题为例。南斯拉夫领导人要人家相信，他们用新的理论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这个理论把战争看做是正规军、游击队和人民起义三者行动的结合。其实，这个所谓的理论是老生常谈，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来说，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尽人皆知，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国内战争的整个时期(1918～1921年)都是把正规军、游击队和人民起义三者的行动结合起来的，这种结合的规模比在南斯拉夫大得多。但是，布尔什维克从未谈过他们由于运用这种军事行动方法而给军事科学加进了什么新东西。他们一点也不谈这种事，因为这种方法远在布尔什维克之前，在1812年俄国反抗拿破仑军队的战争中，库图佐夫元帅就成功地运用过了。然而，库图佐夫元帅也没有自称是运用这种方法的创造者，因为早在库图佐夫元帅之前，西班牙人(“义勇军”)在1808年与拿破仑军队作战时就已开始运用这种方法了。由此可见，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是军事科学中新东西的那个理论，实际上是140年前的老理论，而他们归于自己的那个功劳实际上是西班牙人的功劳。

此外，应当指出，任何领导人过去的功劳并不能使他们后来犯严重错误的可能性得以杜绝。我们不能只看过去的功劳，而闭眼不看现在的错误。托洛茨基当时也曾对革命有功劳，但这绝对不是说联共(布)就可以闭眼不看他后来所犯的不能宽恕的机会主义错误，这些错误把他推到了苏联敌人的营垒。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来信中建议派一名联共(布)中央代表到南斯拉夫弄清苏南分歧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一途径是不正确的，因为要谈论的不是核查个别事实的问题，而是原则性的分歧。

众所周知，苏南分歧问题已转达给九国共产党中央，他们有自己的情报局。不让其他共产党参与这件事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建议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上研究这个问题。

受联共(布)中央委托

维·莫洛托夫　约·斯大林

1948年5月4日于莫斯科

49 铁托、卡德尔关于处理分歧问题的意见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信

(1948 年 5 月 17 日)

致约·维·斯大林同志、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我们收到了你们 1948 年 5 月 4 日的来信。在此无须赘述这封来信对我们产生了何等恶劣的影响。它已经使我们相信,我们所作的一切解释都无济于事,尽管我们的解释有许多事实作为根据,说明对我们的一切指责都是提供错误情报的结果。

我们并不回避对于原则问题提出的批评,但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感觉受到如此不平等的待遇,因而我们不能同意现在由共产党情报局来处理这件事。九个党在我们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已经收到了你们的第一封信,并做出了表示他们各自立场的决议。① 你们这封来信的内容已经不是个别党的内部事务,而是超出了许可的范围,其后果是目前在有些国家,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不仅我们的党,而且我们的整个国家,都在遭受侮辱,我们的国会代表团在布拉格就感到受了侮辱。

所有这一切的后果,对我们国家来说是极其严重的。

我们想这样来处理这件事,即我们将在实践中证明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公正的,这就是说,我们将百折不挠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仍将忠于苏

① 这里说的九个党是指组成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九个成员。但实际上应是七个党。联共(布)中央 1948 年 3 月 27 日的信在南共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给了情报局除联共(布)和南共以外的七个党。

联，仍将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未来将会像过去一样表明，我们一定实现我们向你们做出的全部诺言。

受南共中央委托

约·布·铁托　爱·卡德尔

1948 年 5 月 17 日于贝尔格莱德

50 苏斯洛夫关于召开情报局会议致铁托的信

(1948年5月18日)

致铁托同志

亲爱的同志:

联共(布)中央建议6月上半月,大约6月8~10日,召开九国共产党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以讨论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现状问题。

关于召开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联共(布)中央建议这次会议在乌克兰南部的一个州召开,联共(布)中央认为这对大多数共产党来说是合适的。一旦得到您的同意,联共(布)中央即确定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的具体地点并就此作进一步通知。

请尽可能地在最短时间内将您对我们关于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的议程、时间和地点建议的意见通知联共(布)中央。

此致

同志式的敬礼

联共(布)中央书记

米·苏斯洛夫

1948年5月18日

51 铁托关于南共不出席情报局会议致苏斯洛夫的信

(1948 年 5 月 20 日)

致联共(布)中央苏斯洛夫同志

亲爱的同志:

您的来信我于今年 5 月 19 日收到。这封信是莫舍托夫同志[①] 交给我的。我们对邀请南共中央派代表出席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的观点,我们已在收到您来信的前两天通过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通知了联共(布)中央。

我们于 5 月 20 日在南共中央全会上讨论了您的来信。全会一致做出决定,由于致联共(布)中央的信里所指出的原因,我们不接受出席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的邀请。

此致

同志式的敬礼

受南共中央委托

铁托(签名)

① 莫舍托夫,时任联共(布)中央国际部副部长。

52 苏联关于对意和约给南斯拉夫的照会

(1948 年 5 月 20 日)

就今年 4 月 23 日外交部长西米奇先生向苏联大使拉夫连季耶夫递交的南斯拉夫政府对苏联政府声明——由于南斯拉夫政府违反了重大国际问题相互协商的协定,苏联政府认为自己已不受该协定的约束——的答复[①],苏联大使馆受苏联政府委托,谨通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南斯拉夫政府声明说,它关于打算就西方大国所提修订对意和约以使的里雅斯特并入意大利的建议向它们做出答复一事,已在 24 小时内通知了苏联政府,它等待苏联政府对此问题的意见,而因为苏联政府没有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见,所以南斯拉夫政府给了西方大国这种它认为对意大利民主力量是需要的和有益的答复。南斯拉夫政府的这一声明与事实显然是矛盾的。大使馆认为有必要提请注意这些事实。

一、今年 3 月 21 日晚,外交部副部长贝勃勒先生只是通过新闻途径,将南斯拉夫政府决定就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修订与的里雅斯特有关的对意和约的建议照会该三国政府一事,向苏联临时代办阿尔米亚尼诺夫作了通报。关于南斯拉夫政府打算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一项正式声明,说它准备以铁托—陶里亚蒂的著名谈判为基础解决的里

① 参见文件 46。

雅斯特问题①,并与意大利政府签订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一事,贝勃勒先生也只是通过新闻途径向阿尔米亚尼诺夫作了通报。但是,贝勃勒先生没有表示愿意就上述问题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

二、3月22日,拉夫连季耶夫大使在与西米奇部长交谈中提请他注意,贝勃勒先生在3月21日向阿尔米亚尼诺夫通报时提出了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因此希望在就这些问题发表正式声明之前,南斯拉夫政府应当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

三、此外,根据3月23日公布的通报,南斯拉夫政府已于3月22日中午就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关于修订对意和约的建议向他们递交了照会。由此可以看出,南斯拉夫政府等待苏联政府在24小时内对此做出答复的说法同样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

四、从南斯拉夫政府的照会中和外交部长西米奇先生3月22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中可以得出结论:南斯拉夫政府在没有征求苏联政府意见的情况下表示赞成修订涉及的里雅斯特问题的对意和约,但南斯拉夫政府当时是完全有可能与苏联政府就上述问题交换意见的,何况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向南斯拉夫政府发送的照会只是供参考而已。

上述事实证明,南斯拉夫政府的答复不符合事实,所以该答复不能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据此,违反相互协商协定的全部责任要由南斯拉夫政府承担。

大使馆谨借此机会向外交部表示敬意。

---

① 1946年秋季,在贝尔格莱德铁托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举行了谈判。陶里亚蒂建议,双方发表声明,在的里雅斯特主权归意大利,但同时享有"真正民主"地位的自治的基础上解决的里雅斯特问题。

53 莫舍托夫递交联共(布)中央信件时与铁托和卡德尔的谈话记录

(1948年5月22日以后)[①]

绝密

1948年5月19日和21日与铁托和卡德尔谈话的记录

今年5月19日至22日在贝尔格莱德期间,我会见了铁托。我19日交给他联共(布)中央的信件[②],21日得到铁托回联共(布)中央的信件。在委托我转交给联共(布)中央信件的时候,除了铁托,还有卡德尔在场。我认为有必要转述铁托和卡德尔当时关于一系列问题的言论。

铁托读完联共(布)中央的信件,做了以下声明:

这封信我们明天在南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讨论。但是我们已经否定了联共(布)中央关于召集情报局开会的建议。我们通过阿尔米亚尼诺夫同志对联共(布)中央第二封信作了内容简短的答复。我们对信中的指责感到委屈。我们不同意召集情报局开会,理由是,事实上,所有的党在讨论联共(布)中央的信时,都已经表明了对我们的态度。这还不够吗?已经不只是各国共产党知道这件事了,从对我们的态度中,可以感觉到这一

---

① 档案原件表明这是给苏斯洛夫的汇报,但未具时间。这里标注的时间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

② 指联共(布)中央1948年5月4日给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的信。

点。例如,捷克人竟如此无理地对待我们的国会议员代表团。尽管处于这样的地位,我们还将像过去一样,保持着对苏联的热爱,真诚地做好我们的工作。

但是这封信我们明天还将再一次在南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讨论。请明天晚上来等答复。

在整个谈话中,铁托显得神经紧张,但他在外表上尽量做得很平静。

然后铁托通知,他们正在准备党的代表大会,问题将在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最后决定。

卡德尔说,党的代表大会原打算在11月召开,现准备在7月。大会上将通过党的纲领和章程。我们的纲领已经老了,它是1920年通过的,有许多错误的地方。

铁托接着说,在代表大会上,我们准备请2 000名代表。这将是一个群众性的代表会议。代表将在区的代表会议上选举产生。我们将邀请其他党的代表。(在这里铁托补充说,如果他们来的话。)然后他历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中央代表所参加过的其他党的代表大会。

铁托讲了很多关于工人阶级的作用和改善他们物质状况的话。卡德尔说的大都是党对富农阶级、对合作社和个人资本的政策。在他们的讲话中,可以感觉到一种小心谨慎,好像怕触及联共(布)中央的信,虽然他们都用隐含的形式谈到了信中提出的那些问题。这些谈话的实质可归纳如下:

——我们建设了许多大、小工厂,铁托说,但在满足工人需要方面却做得很不好,特别是在住房建设方面,在贝尔格莱德我们出现了真正的住房危机。

——我们,卡德尔说,几乎把所有个体企业,不论是工业还是商业,都收归国有了。(铁托补充说,旅店也国有化了,过一两年房屋也将国有化。)个体商业几乎全部被国营和集体制代替了。我们停止了让个体商贩搞批发货物。我们在组织商业贸易时感到干部奇缺。

接着卡德尔转到了农业经济的现状问题。

——我们在农村中有危险的敌人——富农。虽然在土地改革时对富农经济进行了严重的打击,但是我们还有许多占有土地在25~35公顷的

富农户,他们给我们上交40%的商品粮。我问:是自愿的吗?卡德尔说,不是。不得不施加压力。我们给5 000多个,准确地说是5 200个富农定了罪,遣送他们去做木材采运。今年我们还将采取坚决的措施反对富农阶级。产品供给的计划是:贫农和中农卖粮,将获得国家降低价格的工业品,富农上交粮食的一部分可获得国家价格的工业品,其余部分的粮食我们按固定价格收购。现在我们还不能够提出完全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问题,我们对此没有准备好。我们没有农业机械,现在谈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刺激富农。关于发展合作社——不但是销售合作社,还有生产合作社,我们准备过两年以后消灭富农,然后再更多地建立合作社,使现有的农业劳动组合有所发展。但强行建设集体农庄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将生产出拖拉机,调整好农业机器的生产,到那个时候再推进集体化的事业。我们现有的农业机器站证明是成功的,伏伊伏丁那自治州的这种情况特别有代表性。卡德尔说,如果你们到南斯拉夫的农村走一走,可以看见那里最突出的是我们的合作社。我们对合作化充满了希望。

* * *

5月21日铁托一个人接见了我。他关上门窗,请我到桌旁就坐,交给我回信时说:

——这是我们答复联共(布)中央的信件,它是我们通过中央全会讨论后提交的答复。中央全会重申了我们三天前对联共(布)中央第二封信的答复。

由于一系列原因,没有可能在情报局会议上讨论我们的问题。我们认为,在一系列问题上,我们不光比别人处于劣势,而且别人已经在极力地谴责我们,甚至不仅是谴责,而是在教训我们。我指的是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难道我们的资本主义成分比他们更多吗?难道他们的富农比我们少吗?难道我们采购的粮食,包括从富农那里征购的比别人少吗?1947年波兰人仅收购4万车皮粮食,而我们是7万车皮。他们还在考虑剥夺寺院的土地时,我们已经付诸实践了。但我们不能一下子把所有事情都做完。难道我们在对敌斗争中比那些国家——其中包括他们的党正在教训我们的那些国家——流的血少吗?我们不反对批评,但批评要公正、要有

原则性。尽管还可以举出更多应该批评我们的事实，但信中有许多事实被普遍化了，这使我们感到委屈。把我们比做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从来没有站在进步力量一边，尤其是站在苏维埃一边。毫无疑问，如果今后有战争，我们只会站在苏维埃一边。再说，我们能站在哪儿呢？我们的人民热爱苏维埃，他们深信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不惜一切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知道，我们的人民是高尚的。他们经过多次斗争，不只是经历了最近这一次战争，这一点，不能不充分考虑到。仅仅出于这些考虑，也不宜把我们的分歧拿到更大的范围中去议论。我们的人民现在仅仅是猜测，在我们两国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们是有纪律的。至于我们党的干部，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让他们了解了第一封信和第二封信，以及我们的答复。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把握着我们党的方向。

铁托接着说，我们相信，真理是会胜利的，一切问题都会搞清楚。我们两党之间的这些问题本来可以得到更正确的解决。我们不愿意掩盖，说我们以前、现在或将来没有错误，但为什么没能及时向我们指出和分析这些错误？在某些问题上本来就有可能会出现争论和分歧，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下工作。我不赞同说我们的人不可能犯错误，包括我们的领导人。正是信中所列举的理论方法上的错误，它们大多是从所讲的整体问题中摘引出来的，而实际上比信中所写的还要多一些。但是我们认为，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这样的，也许可以来一两个党中央委员，当面讲清楚所有的问题，然后决定，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现在却搞成好像我们反对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和我们一样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我们觉得，这个问题现在可以搁置一段时间，让它缓和一下，然后再重新回来谈这些问题。

——昨天在全体会议上决定，7 月 21 日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已经给党中央全体人员指示开始准备代表大会。我们党为准备大会将会非常忙，我们打算讨论和决定好多重要问题。我本人也将很忙，事实上在这段时间我应回避许多国家事务。我将准备在代表大会上做主要的报告。近两天我们将发表召开代表大会的决定，公布议事日程。在党组织里展开对党纲和党章的讨论。

虽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志因我们对拉夫连季耶夫的不满而抱怨，

但我还是应该说,他在我们之间的关系上是有很大责任的。也许,他是党的人,我不能同他争辩,但他不像萨德奇科夫。他把自己隔离起来,从个别人那里获取情报,这些人不知怀着什么目的,为他提供不真实的情报。对于我们的关系,我不得不说一些可能乍看起来是很小的事情。大概在去年,我们和他在斯洛文尼亚,在经过新的工地时,我对他说,我们正在这里建设非常重要的工厂,建设这个工厂的都是年轻人。我建议他绕新工地看一看。看来这位苏联大使并非没有兴趣参观新工地。但他没有去。可是过了不久,会见卡德尔时,他问在热列兹尼克区正在进行什么建设,谁在建设——是德国人还是南斯拉夫人?这样的问题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侮辱。这个工地离贝尔格莱德10公里,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劳力,差不多每一个到南斯拉夫参观的苏联人都去过那里。当然,去那里的还有怀着各自目的的外国人。但就是拉夫连季耶夫不仅不知道这个建设工程,甚至还提出这样侮辱性的问题。顺便说明一下,他问起的工厂,正是我邀请他参观的工厂的建设工地。他却提出了那些问题。难道我们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吗?当有人这样评价我们人民的时候,会很明显地对他们的工作产生影响。

* * *

5月20日我会见了阿尔米亚尼诺夫,他通知我说,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在5月8日被捕,政治委员会结束了对他们案件的调查。在5月15~16日召开了非常秘密的会议,在会议上讨论了委员会对茹约维奇和赫布朗案件的结论。他们都被认定有罪,罪行归结为他们背叛了祖国的利益。赫布朗好像是因为乌斯塔什分子,茹约维奇是因为与怀有敌意的过去南共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戈尔基奇关系密切。在会议上一直强调南苏友好关系。发言者都事先做好了准备,在他们的发言里,茹约维奇和赫布朗被痛斥为人民的敌人。会议做出要求将他们提交法庭的决定。

B.莫舍托夫

54 联共(布)中央关于驳斥南共答复致南共中央的信

(1948年5月22日)

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你们1948年5月17日和1948年5月20日由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署名的来信均已收到。联共(布)中央认为,南斯拉夫领导人通过这些信件进一步加重了联共(布)中央在其1948年5月4日致南共中央信里已指出会带来危害和极为严重后果的那些不可宽恕的原则性错误。

一、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写道,他们感觉自己"受到如此不平等的待遇,因而我们不能同意现在由共产党情报局来处理这件事"。甚至竟然暗示,似乎是联共(布)中央使南斯拉夫领导人处于这种不平等地位的。

联共(布)中央认为,这些话没有一句是事实。在九国共产党情报局中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的不平等。众所周知,在组建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时所有共产党都是从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原则出发的,即任何一个党都应当向情报局报告工作,[①]正像任何一个党都有权批评其他党一样。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在1947年9月的会议上无一例外地听取了每个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从任何一个党都有批评其他各党的平等权利出发,对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的工作进行了布尔什维克式的严厉批评。尽人皆知,意大利和

① 在1947年9月参加会议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达成的协定中,关于情报局的职能只是规定:"情报局负责组织交流经验,并在必要时在互相同意的基础上协调共产党的活动。"

法国的同志们当时不仅没有对其他党批评他们错误的权利提出异议,相反还以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对待这一批评,并从中得出了应有的结论。下面的情况也是尽人皆知的: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和大家一样,也借此机会在代表会议上批评了意大利和法国同志们的错误,而且也和大家一样,他们并不认为别的共产党因批评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就侵犯了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的权利平等。

究竟为什么南斯拉夫同志们现在如此急剧地转变,要求取消情报局内业已建立的制度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应当处于享有特权的地位,情报局的规章制度对该党不适用,他们有权批评其他党,而自己则不该受到其他党的批评。但是,这种道德标准——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叫做道德标准的话,与权利平等毫无共同之处。这不过是南斯拉夫领导人代表南共要求的那种任何一个党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特权。我们一贯采取这样的立场:任何一个共产党都有义务向情报局报告自己的工作,任何一个共产党都有权利批评其他的党,而如果没有这个立场,情报局就不可能存在和开展活动。南斯拉夫人拒绝向情报局报告自己的工作,拒绝倾听来自别的共产党的批评,就意味着侵犯了各国共产党的平等权利。

二、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其5月17日的来信中重复了他们前一封来信中的判断,硬说联共(布)中央对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批评似乎是以错误的情报为根据的。但南斯拉夫同志举不出任何证据来证实这一说法。尽管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其来信中写道,他们"在原则问题上不回避批评",但这一说法也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对联共(布)中央的批评仍然没有给予答复。或许,南斯拉夫领导人实在说不出什么来为自己辩解吧?

或者是南共中央政治局内心意识到它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但由于想要对南共隐瞒这一情况并对它进行欺骗,因而编造不存在这些错误的说法,同时归罪于无辜的人,似乎是他们向联共(布)中央提供了不正确的情报;或者是南共确实认识不到由于它所犯的错误,南共已经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承认南共中央政治局在马克思主

义问题上无知透顶。二者必居其一。

三、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一方面避而不答联共(布)中央的直截了当的问题,并因其顽固地不愿意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而使自己的错误更加严重,一方面则在口头上保证说他们将在实践中证明他们依然忠于苏联,依然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鉴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种口头上的保证。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已不止一次地向联共(布)中央许下诺言,却从来没有履行过。从他们的来信中,尤其是从最近一封来信中,我们对此更加深信不疑。南共中央政治局,特别是铁托同志,应当明白,他们近来在日常活动中所奉行的反苏和反俄政策,足以破坏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对他们的信任。

四、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抱怨说他们陷入了困境,并说这一切的后果对南斯拉夫是非常严重的。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只能怪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以及与他们一起的南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威信和自尊心置于南斯拉夫人民的利益之上,并且不肯为本国人民的利益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那些对南斯拉夫人民极为有害的错误。

五、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声称,南共中央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拒绝在情报局会议上讨论南共产党内的现状问题。如果这是他们的最后决定,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们在情报局会议上说不出什么来为自己辩解,从而意味着他们默认自己是有罪的人,害怕在兄弟共产党前露面。不但如此,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还意味着南共中央已经走上了脱离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统一阵线的道路,并且准备使自己的党和人民背叛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统一阵线。既然情报局是统一阵线的党的基础,那么(南共的)这种政策将导致(其)背叛劳动人民的国际团结事业,转到敌视工人阶级事业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去。

无论南共中央的代表是否出席情报局会议,联共(布)中央坚决要求在近期的情报局会议上讨论南共党内的现状问题。鉴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

牙利的同志们建议将情报局会议改在6月下半月召开,联共(布)中央表示同意这一建议。

受联共(布)中央委托

维·莫洛托夫　约·斯大林

1948年5月22日于莫斯科

55 南斯拉夫关于对意和约给苏联的照会(摘录)

(1948 年 5 月 28 日)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受本国政府委托,谨在此声明,在任何情况下,南政府都无意违反这个涉及两国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相互协商的协定。我们两国代表团之间在多次国际会议中有过紧密合作,如同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所有原则立场一样,这只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遵循这一义务的证据之一。希望使自己的外交举动与苏联政府所表明的观点相一致,是南斯拉夫政府所有行为的基础。

在这件事情上,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举动也许可以被人解释为它没有完全遵守相互协商协定的规定,尽管外交部的初衷并非如此。受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委托,外交部对这种无论如何也不符合南斯拉夫政府意图和愿望的举动深表遗憾。

至于说到英、法、美向有资格参与做出决定的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就的里雅斯特自由区问题修订对意和约的倡议——作为仅供有关国家参考向南斯拉夫政府发送了这一倡议,外交部愿意强调指出,南斯拉夫政府在修订对意和约问题上的立场与苏联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外交部在给西方大国的答复中为自己拟定的只是策略目标,即有助于揭露英、美精心策划的阴谋诡计,这种阴谋诡计部分地旨在消除 1946 年铁托—陶里亚蒂著名协定的影响。这一策略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与此同时,外交部认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否定的立场没有被充分地

表现出来,但是愿意强调指出,这一举动并没有带来任何损害,任何一方也都没有断言,在上述"倡议"方面南斯拉夫政府赞成修订和约。

其实,部长会议主席铁托元帅于外交部照会和声明之后几天就在自己的声明中斩钉截铁地强调指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同意修订和约。①

根据上述一切可以看出,南斯拉夫政府这一策略举动的意图和效果不是不能友好地解决这一误会的。

外交部对这一举动再次表示遗憾,同时请求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它认为自己不受相互协商协定约束的决定。外交部方面则愿意强调指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心严格遵守相互合作的协定和承担与苏联真正的友好关系所赋予自己的义务。

① 1948年3月26日,铁托在与出席南斯拉夫、意大利人少数民族文化节的一批意大利人士会晤时,谈到南斯拉夫不同意修改对意和约。

56 莫洛托夫关于赫布朗和茹约维奇问题给铁托或卡德尔的电报(摘录)[①]

(1948年6月9日)

……联共(布)中央获悉,南斯拉夫政府已宣布赫布朗和茹约维奇为叛徒和卖国贼。[②] 我们对此理解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决心从肉体上消灭他们。联共(布)中央声明,如果南共中央政治局一定要实施这一意图,那么联共(布)中央将认为南共中央政治局是刑事杀人犯。联共(布)中央要求在联共(布)中央代表的参加下对所谓赫布朗和茹约维奇向联共(布)中央提供错误情报一案进行调查。

立等答复。

……

① 因拉夫连季耶夫5月15日例行回国述职,这个声明是由临时代办阿尔米亚尼诺夫向卡德尔口头宣布的。

② 当时,对赫布朗和茹约维奇的指控没有做任何公开的报道。5月6日只公布了他们被解除职务的命令。5月7日他们被秘密逮捕。5月12日,南共中央通过的将他们开除出党的决议,同样是按照特别秘密的程序发给各共和国共产党的委员会的。

57 南共中央关于赫布朗和茹约维奇问题致联共(布)中央的声明

(1948年6月17日)

致联共(布)中央

对联共(布)中央就赫布朗和茹约维奇问题的口头质问,南共中央声明如下:

一、南共中央从未准备"杀害"任何人,包括赫布朗和茹约维奇在内。他们正在接受正规机构的调查。

二、南共中央认为联共(布)中央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是不正确的,对于把我们党的领导人说成是"刑事杀人犯"的企图愤怒地予以批驳。

三、据此,南共中央认为,联共(布)中央派代表参加对赫布朗和茹约维奇的调查一事根本不能予以考虑。

58 联共(布)中央关于赫布朗和茹约维奇问题致南共中央的信

(1948年6月19日)

联共(布)中央致南共中央委员会

作为对联共(布)中央信件的答复,南共中央在其4月13日的决定中声称,茹约维奇同志和赫布朗同志已被开除出南共中央并接受党的调查,因为他们向苏联情报机构提供了关于南斯拉夫情况的虚假的和诽谤性的情报,其目的是恶化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的关系。

此后过了一段时间,茹约维奇同志和赫布朗同志被捕,后来就被宣布为工人阶级的敌人。

联共(布)中央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南斯拉夫当局想把茹约维奇和赫布朗作为工人阶级的敌人处以死刑。于是,联共(布)中央6月9日给南共中央委员会发出一项声明,坚持要求派代表参加对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向苏联情报机构提供错误情报的调查。联共(布)中央同时声明,一旦拒绝联共(布)中央关于派其代表参加调查的建议和对茹约维奇和赫布朗进行迫害,联共(布)中央将认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刑事杀人犯。

为了对此做出答复,卡德尔同志与铁托同志商量后于6月10日在卢布尔雅那作了如下声明:

"我们对联共(布)中央的这种质问感到惊讶。我们请求宣布:南共中央政治局过去和现在都无意从肉体上消灭赫布朗和茹约维奇,对赫布朗和茹约维奇向苏联代表提供情报的问题没有进行任何调查。"

这是南共中央就茹约维奇同志和赫布朗同志的命运问题所作的第二次答复,这个答复与南共中央4月13日所作的答复是完全矛盾的。

今年6月17日,收到了南共中央就茹约维奇和赫布朗一案问题给联共(布)中央的又一次答复——按次序为第三次答复。答复中说赫布朗和茹约维奇正在接受国家机关的调查,并且对联共(布)中央的质问表示愤怒,不接受联共(布)中央关于派其代表参加茹约维奇和赫布朗一案调查的建议。

很清楚,我们不能认为这个答复是诚实的答复,倒不妨认为是回避答复。

同样很清楚,这个答复与前两次答复是完全矛盾的。

毫无疑问,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茹约维奇和赫布朗案件问题上的说法是混乱的,根据一时的政治需要在不同的时候提出不同的解释,只是不把匆忙编造出来的茹约维奇和赫布朗案件的真实情况公布于众。

仅此一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南共中央不接受联共(布)中央派代表参加对茹约维奇和赫布朗案件进行调查的建议。

从这一答复中还可以得出结论:既然赫布朗—茹约维奇案件已提交国家机关处理,所以对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命运的全部责任如今就由南斯拉夫国家政权的总代表铁托总理承担。

59 情报局关于邀请南共出席情报局会议的信函

(1948 年 6 月 19 日)

共产党情报局将开会讨论南共党内的情况,并邀请南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参与共产党情报局的工作。

如果你们同意,共产党情报局希望你们的代表于 6 月 21 日以前到布加勒斯特①,向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乔治乌—德治同志② 报告,以听取如何到达情报局将要开会的地方的指示。

请通过菲利波夫迅速函复。

莫斯科

① 苏南冲突发生后,共产党情报局总部已迁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

② 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1901—1965),罗马尼亚工人党总书记。

60 南共中央关于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的声明

(1948年6月20日)

情报局将开会“讨论南共产党内的情况”,并邀请南共派代表出席会议。南共中央委员会已接到邀请,并请求将下列意见告知情报局会议:

南共中央委员会一向乐意参加情报局的工作。但是,鉴于送给我们的情报局会议的议事日程,其内容是解决联共(布)中央和南共中央之间的分歧问题,南共中央不接受这个议程,因此不能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我们认为解决分歧的办法,从一开始直到这次情报局会议,一直都被置于错误的基础之上。理由如下:

(1)联共(布)中央给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第一封信,不是出于同志式的批评精神(南共中央可以用同样的语气答复这种信)。至于信中的谴责,由于它的虚伪性,它有损于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因此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2)南共中央认为: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在战前、战时和战后都经受了如此巨大考验的兄弟党,只根据某个人提供的片面情报或对于这些情报的断章取义的摘引,而不是根据对我们党整个活动的分析就提出谴责,这是完全错误的。

(3)联共(布)中央的一些最严厉的谴责,显然是以我们党战前、战时和战后都一贯与之开展斗争的一些反党分子的情报为根据的。南共中央认为,南共党内过去存在的著名的分裂主义残余势力竟然受到联共(布)中央的支持,这是不能容许的。

(4)作为情报局成员的党的领导人,不征询我们的意见,就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联共(布)中央对我党的谴责,以书面声明指责我党,并拒绝我们在给联共(布)中央第一封信的回信中所提出的答辩。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在其所在党的广大范围内,而且公开地做出了有损于我们国家的事情。

(5)联共(布)中央甚至拒不接受我们对他们第一封信的回信中所提出的任何一条答辩,并且在对那封信的复信以及后来的信件中,又发表了对南共更加激烈的但毫无根据的谴责。显而易见,这种立场使我们不可能以平等的地位讨论问题。

所有这些事实就是南共中央不同意在情报局阐明这种分歧的理由,因为我们考虑到这样做的结果只会加深而不会解决分歧。

南共中央指出,它建议联共(布)中央派代表到南斯拉夫来,以便对有争议的问题联合进行现场调查。联共(布)中央不接受这个在我们看来是惟一正确的程序,而是在接到我们的答复之前就将分歧公诸情报局的其他成员党,也就是说,它在给我们发信的同时,就把信的原文也发给了其他党,与此同时,各该党领导人(法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除外)给我们寄来书面声明,表明了他们对我党的看法。

这种行为不能体现互相谅解的精神,也不符合作为情报局的基础的自愿原则。

南共中央继续坚持其主张,即联共(布)中央和南共中央直接接触,在南斯拉夫一起讨论有争论的问题,才是解决现有分歧的惟一正确的途径。南共中央对于联共(布)中央采取目前这样的方式来处理意见分歧深表遗憾,并且再次呼吁联共(布)中央和情报局同意我们关于联共(布)中央和南共中央有必要进行直接接触以解决分歧的意见,认识到不经我们同意而讨论我们党内的情况是错误的,从而将议事日程中关于讨论我党情况的一项予以撤销。

南共中央向各兄弟党致意,并宣布:任何分歧都不能阻止南共忠诚于它同联共(布)中央以及其他共产党团结一致和密切合作的政策。

61 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摘录)[①]

(1948年6月28日)

(1)情报局着重指出,近来南共领导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些主要问题上,实行了一条不正确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这一点上,情报局赞成联共(布)中央的行动,即主动揭发南共中央的错误政策,特别是铁托、卡德尔、吉拉斯和兰科维奇等同志的错误政策。

(2)情报局宣布:南共领导正在实行一条对苏联和联共(布)不友好的政策。南斯拉夫执行了一个诽谤苏联军事专家和损害苏联名誉的下流政策。南斯拉夫为苏联文职专家制定了一种特别的规定,从而使他们受到南斯拉夫国家安全机关的监视,并经常被跟踪。联共(布)在情报局的代表尤金同志和苏联在南斯拉夫的许多官方代表,都曾受到南斯拉夫国家安全机关跟踪和监视。

所有这些事实和一些类似的事实都说明,南共领导人所采取的立场和共产党人的身份是不相称的,他们已经开始把苏联的对外政策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外政策混为一谈,而且用对待资产阶级国家的同样方法对待苏联。南共中央这种反苏立场造成的结果,就是使那些从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武库里借来的诸如联共(布)已经"变质",苏联已经"变质"等的诽谤性宣传广为流传。

---

① 南共中央是通过南斯拉夫通讯社得到这个决议的。

情报局谴责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这种反苏态度，认为它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容的，这种态度只是民族主义者的态度。

(3)在对内政策方面，南斯拉夫领导人正在背离工人阶级的立场，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们否认在自己的国家里滋长着资本主义成分，从而也否认农村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这种否认是机会主义信条的直接产物。这种机会主义信条主张，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不是像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的那样变得更加尖锐，而是熄灭了，这恰恰是布哈林之流的机会主义分子所宣传并断言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

南斯拉夫领导人正在农村推行一种错误政策，他们无视农村的阶级分化，并且认为个体农民都是单独的统一体，这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背道而驰的，是和列宁关于小农生产不断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著名论断背道而驰的。而且，南斯拉夫农村的政治形势并没有使人沾沾自喜、自鸣得意的理由。在南斯拉夫盛行的情况是：个体农民生产占优势，土地尚未国有化，还存在着土地私有和土地自由买卖，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富农手中，并且使用雇佣劳动——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他们会以掩盖阶级矛盾、调和阶级斗争的精神欺骗南共，而这样一来，必然会使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

在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问题上，南斯拉夫领导人正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走上民粹党、富农党的道路，因为他们断定农民是南斯拉夫国家“最稳定的基础”。列宁教导说，工人阶级作为“当代社会里革命到底的惟一阶级……必须是在全体人民为一个彻底的民主转变所作的斗争中和在全体劳动人民和被剥削人民对压迫者和剥削者所作的斗争中的领袖”。①

南斯拉夫领导人正在违背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

就农民而言，即使其大多数(即贫农和中农)可能已同工人阶级结成了

---

① 列宁这段话的出处不详。

联盟,但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起着领导作用。

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态度是漠视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的。

显而易见,这种态度也反映了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相适应的观点。

(4)情报局认为南共领导正在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是国家主要的指导和领导力量,它有自己的特殊的纲领,不能把自己溶解于非党群众之中。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和最重要的武器。

然而,在南斯拉夫,被看做国家主要领导力量的是人民阵线,而不是共产党。南斯拉夫领导人贬低共产党的作用,实际上把党溶解于由极为复杂的阶级成员(工人、从事个体农业的农民、富农、商人、小业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所组成的非党的人民阵线之中,并把党与包括某些资产阶级政党在内的政治团体混同起来。南斯拉夫领导人顽固地拒绝承认他们这样一种信条的虚伪性,即所谓南共不能有、也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纲领,南共应满足于人民阵线的纲领。

在南斯拉夫,只有人民阵线在政治舞台上占据重要位置,而党及其组织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公开出现在人民面前,这一事实不仅贬低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而且损害了作为一种独立政治力量的党的本身,因为党的任务是通过公开的政治活动及公开宣传自己的观点和纲领,赢得人民不断增长的信任,并影响更广泛的劳动人民群众。南共领导人正在重复俄国孟什维克分子关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党溶解于非党群众组织之中的错误。所有这一切暴露出南共党内存在着取消主义的倾向。

情报局相信,南共中央的这个政策威胁着共产党本身的生存,而且终究将出现导致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变质的危险。

(5)情报局认为:南共领导人在党内建立的官僚统治,对南共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一场灾难。南共党内没有民主、没有选举、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尽管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有过一些空洞的保证,但南共中央的大多数委员是指定的,而不是选举产生的。共产党实际上处于半合法状态。党的会议或是根本不开,或是秘密召开,这个事实只能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影

响。像南共这种类型的组织，只能被称为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组织。它正在把一个生龙活虎的、作为独立活动的有机体的党引向灭亡，它正在党内培养着与托洛茨基在当时所提倡的方法类似的军事领导方法。

南共党员最根本的权利受到压制，对党内的不正确措施哪怕只作一点点批评，也要受到粗暴的制止。这一事态是完全不能令人容忍的。

情报局认为，由于南共中央委员茹约维奇和赫布朗敢于批评南共领导人的反苏态度，并要求南斯拉夫与苏联友好，南共领导人就把他们开除出党并且加以逮捕，这种行动是不光彩的。

情报局认为，这种不光彩的、纯粹土耳其式的恐怖统治，在共产党内是不能容忍的。南共本身的存在和发展的利益要求结束这种统治。

(6)情报局认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南共中央委员会的错误所作的批评，给予了南共中央委员会以兄弟般的帮助，并向其领导人提供了迅速改正所犯错误的一切必要条件。

然而，野心勃勃、骄傲自满和自高自大的南共领导人，不是诚恳地接受批评，并以布尔什维克式的态度改正他们的错误，而是以挑战和敌意来对抗批评。他们走上了不分青红皂白地否认他们的一切错误的反党道路，并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一个政党如何对待自己错误的学说，从而加重了他们的反党错误。

由于不敢正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兄弟党中央委员会的批评，南共领导人走上了公然欺骗党和人民的道路，它向全党隐瞒对中央委员会错误政策的批评，向党和人民隐瞒对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同志采取残暴措施的真正理由。

近来，在联共(布)和其他兄弟党批评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错误之后，他们试图新增加一些左的法令。他们匆忙颁布命令，对中型工商业实行国有化，尽管完全缺乏这样的基础。由于匆忙地增加了一种新的粮食税，而对实施办法同样未作准备，因此这只能打乱对城市人口正常的粮食供应。还有，就在最近，南斯拉夫领导人大声疾呼，宣称他们热爱并忠诚于苏联，但是，众所周知，在实践上他们却执行着对苏联不友好的政策。

事情还不止于此。近来南斯拉夫领导人一直信心十足地高声宣讲一

项在南斯拉夫清除资本主义因素的政策。在4月13日给联共(布)中央的信中,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写道:“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在国内清除资本主义残余的各项措施。”

按照这条路线,卡德尔同志4月25日在斯库普什蒂卡的讲话中宣称:“在我国,人剥削人的残余现象不会存在很长时间了。”

在目前南斯拉夫现有的条件下,南共领导人关于清除资本主义分子——从而清除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的主张,只能被认为是冒险的而且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只要不可避免地产生资本主义的个体农民经济在国内占优势,只要大规模农业集体化的条件还不具备,只要大多数农业工人对集体耕作方法的好处还没有信服,要想解决这项任务就是不可能的。联共(布)的经验表明,只有在农业大规模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最后和最大的剥削阶级——富农阶级——才是可能的,而消灭富农阶级也是农业集体化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为了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从而在农村消灭资本主义因素,党需要在农村进行限制资本主义因素的仔细的准备工作,加强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并使社会主义工业能为集体经营的农业生产机器。在这方面仓促从事只能招来不可弥补的危害。

只有在仔细准备和不断执行这些措施的基础上,才能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因素过渡到消灭这些因素。

南斯拉夫领导人仓促地使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切企图,都意味着或者这种冒险是注定要失败的,或者,这只不过是一个自吹自擂、空洞无物、蛊惑人心的宣言罢了。

情报局认为,南斯拉夫领导人正竭力用这种虚伪的和蛊惑人心的策略,表明他们不仅赞成阶级斗争,而且甚至走得更远,但考虑到现实可能性,这样的做法已超出了南共在限制资本主义因素方面所能提出的要求。

情报局认为,既然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这些左的法令和宣言在目前条件下不过是在蛊惑人心,而且是行不通的,因而他们只能有损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的旗帜。

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情报局认为这样的冒险策略是一种下流的花招

和不能允许的政治赌博。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这些左的煽惑性措施和宣言，其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们拒绝承认错误并诚恳改正错误的事实。

(7)考虑到南共党内的局势，并为了设法向南共领导人指出摆脱这种局势的途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兄弟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应该像在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其他共产党的活动一样，以同样的、正常的伙伴关系为基础，在情报局会议上讨论南共党内的情况。

然而，南斯拉夫领导人却拒不接受兄弟党一再提出的关于在情报局会议上讨论南共党内情况的建议。

南斯拉夫领导人企图逃避兄弟党在情报局内提出的公正批评，捏造了所谓他们的“不平等地位”的无稽之谈。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真实的。众所周知，当情报局成立时，各个共产党的工作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即每一个党，正像它有权利批评其他党一样，有义务向情报局报告它的工作。

在九国共产党第一次会议上，南共曾充分利用了这种权利。

南斯拉夫人拒绝向情报局报告自己的活动并听取其他共产党的批评，这实际上就意味着破坏各共产党之间的平等地位，而且事实上就等于南共要求在情报局里享有特权地位。

(8)鉴于以上情况，情报局表示完全赞同联共(布)中央 1948 年 3 月到 5 月间给南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中对南共党内局势的评议，对南共中央委员会所犯错误的批评和对这些错误的政治分析。

情报局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根据南共领导人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容的反党反苏观点，根据他们的整个态度和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这一事实，南共领导人已将自己置于情报局所属各个共产党的对立面，走上了脱离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统一阵线的道路，走上了背叛工人阶级国际团结事业的道路，并采取了民族主义的立场。

情报局谴责南共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反党政策和态度。

情报局认为：鉴于上述情况，南共中央委员会已经将它自己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置于共产主义统一阵线之外，从而也将自己置于情报局之外了。

……

情报局认为:南共领导所犯错误的基础,在于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在过去五六个月的时间里,从前以伪装形式存在的民族主义因素,在南共领导中已获得了统治地位,因此,南共领导已经同南共的国际主义传统决裂而走上了民族主义道路。

由于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内部的民族力量及其能力,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没有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支持,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支持,没有苏联的支持,他们也能保持南斯拉夫的独立,并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认为新南斯拉夫可以不要这些革命力量的援助。

南斯拉夫的领导人由于不了解国际形势,并被帝国主义的敲诈威胁所吓倒,因此,他们认为,用让步的方法可以讨好帝国主义国家。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和帝国主义国家搞交易,以获得南斯拉夫的独立,并且逐渐地使南斯拉夫人民适应这些国家,也就是适应资本主义。在这方面,他们正在悄悄地从这样一个著名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论点出发——"对南斯拉夫的独立来说,资本主义国家比苏联的危险要小一些"。

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显然不了解,或者可能是假装不了解,这样一条民族主义路线只能使南斯拉夫蜕变成一个普通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丧失独立,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

情报局并不怀疑,南共产党内存在着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南共国际主义传统、忠于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健康力量。

健康力量的任务是,迫使他们现在的领导人承认他们的错误,并且公开地、诚恳地加以纠正;迫使他们与民族主义决裂,回到国际主义上来,千方百计地巩固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

如果南斯拉夫共产党现在的领导人办不到这一点,这些健康力量的任务就是取而代之,形成党的国际主义的新领导。

情报局并不怀疑南共将会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62 南共中央关于情报局决议的声明(摘录)

(1948 年 6 月 29 日)

从内容来看,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情况”的决议显然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它是以联共(布)中央发给南共中央的一些信件为基础的。在今年 3 月 27 日的第一封信中,联共(布)中央对南共中央提出了谴责,这封信同时也发给了共产党情报局的其他成员党,但却未将此事通知南共中央。另外,联共(布)中央转来了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支持联共(布)中央的看法的一封信。匈共中央的这封信也发给了其他各党。南共中央还收到了除法国和意大利之外的情报局其他成员党写来的类似的信件。南共中央指出,上述各党在未曾听到南共中央的意见,也没有听取其反驳的情况下,就接受了联共(布)中央的观点,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根据。在联共(布)中央的这封信和其他各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之后,以及在南共中央 4 月 13 日给联共(布)中央的回信发出之后,南共中央分别于 5 月 4 日和 22 日收到了联共(布)中央的信件。这些信件都或多或少地坚持了第一封信中的路线。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情况”的决议,基本上是联共(布)中央这些信件的复制品。

在这些信件中,联共(布)中央指控南共中央,并要求它承认自己的错误,例如:第一,南共领导人对苏联口头上说得好听,而背地里却诋毁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第二,南斯拉夫领导人一直诽谤苏联军队,苏联专家受到敌

视,苏联公民和尤金同志受到安全机关特务的跟踪;第三,党的干部受国家安全部长的控制,党内没有民主和批评,而是以军事领导方法进行统治;第四,南斯拉夫政府希望通过间谍讨好帝国主义,并将自己置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之下;第五,党把自己溶解于人民阵线之中,因而不能再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它已渗透了伯恩施坦主义、布哈林主义和福尔马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因素和平消亡而进入社会主义的理论;第六,某一帝国主义强国的大使在南斯拉夫俨然以主人自居,南斯拉夫人民的刽子手奈迪奇的亲友们轻而易举地在南斯拉夫政府和党的机关里谋得舒适的职位;第七,南斯拉夫领导人把苏联的对外政策与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混为一谈;第八,南共领导成员在关于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问题上已经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第九,德国伞兵摧毁了南斯拉夫"游击队"司令部,结果人民解放运动发生了严重危机,此后苏军前来进行帮助,解放了南斯拉夫,为南共掌权创造了条件;第十,南共过分吹嘘自己战争时期的成就,虽然它的功劳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共产党比起来并不突出。除上述谴责外,还有情报局决议中所提出的谴责,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南共中央政治局向情报局提交的一份声明(该声明将作为附件发出)中已经表明,只有把事情的真实情况弄清楚,只有把谎言和联共(布)中央方面或情报局其他成员国党中央委员会方面在原则问题上的真正不满区分开来,南共中央才能同意讨论联共(布)中央出于诽谤、杜撰以及对南斯拉夫情况的无知而作出的指控。

对于情报局决议的发表,南共中央声明如下:

(1)决议中包含的批评是以不确切的和无根据的断言为依据的,它企图破坏南共在国内外的威望,企图在国内群众中和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引起混乱,并削弱南共党内的团结和党的领导作用。因此,南共中央在4月13日的信中建议联共(布)中央到现场核对它的说法,但却遭到了联共(布)中央的拒绝,这是令人吃惊的。

(2)决议在未举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坚持说南共领导对苏联执行了一项敌对政策。关于苏联军事专家在南斯拉夫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和苏

联公民受到国家安全机关特务的监视的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直到他们被撤回,没有一个苏联代表曾提请南斯拉夫代表注意这件事。苏联公民,尤其是尤金同志在南斯拉夫曾受到监视的说法,完全是虚假的。这项声明,特别是与尤金同志有关的声明,不过是为了让南共及其领导在其他共产党的心目中威信扫地而已。

与此相反,正如4月13日致联共(布)中央的信中所说的,根据南共党员给自己党组织写的大量报告及我国其他公民的陈述,从解放起直到最近,苏联情报机关一直设法要吸收他们,则确有其事。南共中央过去和现在都认为,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一个共产党人执政的、正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国家,是不能允许的,因为这种做法将导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民道德败坏,并将削弱和破坏我国政府和我党的领导。南共中央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南斯拉夫同苏联的关系只能以信任和真诚为基础,并且为了坚持这个原则,南斯拉夫国家机关甚至从未梦想过要跟踪住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公民,或对他们实行任何控制。

(3)决议批评了南共关于处理阶级斗争的政策,特别是南共在农村的政策。关于这一点,还援引了人们熟知的列宁的论述。南共中央指出:在南共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因素的政策中,它正是以上述的和类似的列宁著作中的有关论述作指导的,这一点,决议的作者们——如果他们不辞劳苦的话——或许在我党已发表的文件和文章中读到过,或许了解关于这一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因此,决议中提出的指控以及联共(布)中央对我们的指控,实际上不过是徒劳罢了。客观上,它们不可避免地有助于鼓励和支持城乡反动的资本主义因素,并在居民中引起混乱,似乎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客观上的困难,特别是在供应方面的困难,都应归咎于南共中央及其政策。南共中央认为,作为一种方法来说,根据引自各个斗争时期的只言片语,或是根据个别的、孤立的和歪曲了的事实,来评价其活动,这是不能允许的。南共中央认为,在估价南共的政策时,像估价其他党的政策一样,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党的实践——党在使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斗争中是取得了胜利,还是没有取得胜利,整个资本主义因素是削弱了还是增强了,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是减弱了还是加强了。

(4)南共中央不能不以极大的愤慨否认以下的断言:什么南共领导阶层正滑入富农党的道路,滑入对党的取消主义歧途;什么党内没有民主,党内滋长着军事领导的方法;什么党员最基本的权利在党内受到践踏,对党内的不正当行为的最温和的批评也会招来最剧烈的报复,等等。难道身经百战、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们能够容忍党内这种为男子汉和共产党员所不齿的事态的存在吗?断言我们党内不准批评以及类似的说法,对我们党的每一个党员都是极大的侮辱,它贬低我党昔日英勇的、光荣的业绩和我党当前为重建并发展南斯拉夫国家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南共中央强调指出,不能因为一些党组织尚未进行选举,就断言我们党内没有民主。这些都是战争时期和我党经历过的战后的急剧发展所遗留的问题。当时,在其他共产党内,而且在苏联共产党内,也存在过这些问题。

至于我们党正消失在人民阵线之中,以及领导阶层正走上富农党的道路的说法,它客观上对于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在联合组织(即人民阵线)中实现劳动群众的大团结起到了破坏作用,并使党脱离劳动群众。这一断言的根源,除以上所述之外,在于对南斯拉夫党和人民阵线之间的关系的误解,在于对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的实质以及工人阶级在该阵线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方式缺乏了解。在这个问题上,这一断言的出发点也不是事实,而是一些凭空捏造的说法,继之以引用列宁著作中的著名论述进行论战,而对于列宁著作中的那些论述,南共负责人中谁也没有提出过争论。客观事实,以及在整个战争期间和战后不仅由共产党人,而且由阵线非党人士发表的许多宣言表明:一、共产党在阵线中是领导力量;二、共产党并非消失在阵线之中,恰恰相反,党正在以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的精神教育阵线的广大成员,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提高他们;三、南斯拉夫人民阵线实际上正在为社会主义而战斗,如果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像决议中所说有资产阶级政党、富农、商人、小业主等——在人民阵线中起重要作用的话,或者,如果人民阵线是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联合组织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协议形式的话,那么,为社会主义而战斗必然是不可能的;四、党并未接受人民阵线的纲领,而人民阵线的基本方向和纲领却来自共产党,由于党在人民阵线中的领导作用,事情自然是如此的。

因此,南共中央强调指出,党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使人民阵线的群众队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进一步接近党,把党的政治活动与人民阵线的活动以及人民阵线的全部行动联系起来。

最后,南共中央指出,我党大多数的中央委员都不是指派的,而是选举产生的。联共(布)中央在计算时,并未把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单独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们计算在内。因此,联共(布)中央在它的一封信中提到的南共中央全体会议的22名委员应加上这7名政治局委员。南共中央在战争中失去了10名委员,因而主要从南共中央候补委员中指定7名填补空缺,南共中央为此而受到责备,这是很奇怪的。

南共中央否认关于南共处于非法状态的断言,认为这个断言是荒谬的和不真实的,并且认为这也是对南共在特定条件下和特定时间内的工作方式缺乏了解的证明。南共的工作方式产生于我党长期革命实践的具体条件;这些工作方式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并且是党取得群众信任的一个重要因素。

(5)南共中央否认如下不着边际的谴责:什么土耳其式的统治方式在南共党内盛行;什么南斯拉夫领导人"向全党隐瞒对中央委员会错误政策的批评";"向党和人民隐瞒对赫布朗和茹约维奇同志采取残暴措施的真正理由"。在联共(布)中央公布自己的信件之前,南共中央是不能公布这些信件的。然而,南共现有全部机构都知道联共(布)中央信件的内容,并且所有党员都得到了关于赫布朗与茹约维奇案件的通报。

情报局成员党的代表们,不向南共中央询问详细情况,竟然将赫布朗和茹约维奇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对此,南共中央不能不表示惊奇。南共中央很想知道为什么像茹约维奇之类的人竟受到保护,例如,根据共产国际决定,茹约维奇在1937年同高尔基奇一起被开除出南共;又如,赫布朗曾在乌斯塔什警察面前有过背叛行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欺骗了党,这些人在南共党内进行分裂活动,并干着毁灭党和破坏南斯拉夫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勾当。这难道不是对分裂活动、对叛徒、对瓦解南共的活动进行鼓励吗?因此,南共中央委员会在声明中作为附件公布了有关赫布朗和茹约维奇的材料。

(6)南共中央否认如下的荒谬断言:什么近来南斯拉夫领导人为了匆忙把小型工业和小商店国有化,为了蛊惑人心,采取了一些措施。事实上这些措施在联共(布)中央向南共中央提出指责的六个月之前就准备好了,这是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和发展的结果。

从卡德尔同志演讲中断章取义摘出的引语,只是在一般意义的说法,而他演讲的全文,事实上提出了党在目前阶段逐步摈除资本主义因素的路线。

联系上述这些事实,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近来在情报局的刊物、苏联的报纸以及其他一些党的报纸上刊登的新闻中,一直没有关于南斯拉夫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就,例如进一步削弱资本主义因素的措施,实现计划取得的成就,工人阶级和团结在人民阵线里的劳动人民在代表大会前进行的群众性竞赛,等等。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对有关上述成就的事实保持缄默的人,无法掩盖其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南共中央经济路线的批评纯属是专横的和完全没有根据的这一真相。

(7)南共中央声明,南共领导人中没有任何人认为在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独立的斗争中不需要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帮助。只有那些完全脱离实际的人才会有这类的主张。因此,南共中央必须强调指出,扩大这种帮助与合作不仅依靠南共本身,而且依靠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南共中央认为,这种帮助必须与南斯拉夫的内外政策联系起来,但决不能与南共所不能接受的那种毫无根据的、不符合事实的指责联系在一起。

关于南斯拉夫领导人正在准备向帝国主义做出让步,并在有关南斯拉夫的问题上与他们做交易的断言,完全是捏造的,是对新南斯拉夫最恶毒的诽谤。

然而,南共中央必须强调指出,在一些人民民主国家里,党和国家机关搞了一连串的无缘无故的行动,这种行动对南斯拉夫人民、对他们的国家、对国家的代表人物是一种侮辱,这种行动将削弱上述的合作,恶化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南共中央认为,它不能保证对于未来的类似行动保持缄默。

(8)南共中央认为,南共中央决不会由于拒绝讨论它实际上未曾犯过的错误,就损害了共产主义阵线的团结。这个阵线的团结不是以承认捏造

或虚构的错误和诽谤为基础的，而是以一个党的政策实际上是否符合国际主义这样一个事实为基础的。不过，人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即情报局已经背离了作为它自己的基础的各项原则，这些原则为每个党提供了根据自己的愿望做出决定的权利。然而，情报局不仅强迫南共领导人承认他们不曾犯过的错误，而且号召南共党员在党内造反，破坏党的团结。南共中央永远不能同意在凭空捏造和缺乏相互信任的非同志式的态度的基础上讨论它的政策。这样的基础是一个没有原则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而且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南共中央认为，在讨论中它没有平等的地位，因此它决不能接受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讨论。再者，联系到上述种种情况，南共中央坚决拒绝关于南共已滑到民族主义立场上的指控。从南共的全部内外政策来看，特别是从南共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以及实事求是地解决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方式来看，证明南共的实际情况与对它指控的情况恰恰相反。

上述不公正的指责，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使南斯拉夫全体人员以及他们无私的和英勇的斗争，都蒙受了历史上最大的冤屈。

南共中央清楚地知道，联共(布)中央对南共中央的指责，将被敌人的宣传机关用来诽谤苏联、南斯拉夫及其他民主主义国家。但是，南共中央宣布：它对这一切现象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它不曾有过引起这些诽谤的任何行动。

南共中央号召全体党员紧密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路线和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同时号召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聚集在人民阵线之中，为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这就是用行动充分证明上述指责不公正的惟一途径和惟一方法。

63 南共中央关于召开南共五大致联共(布)中央的信

(1948年7月1日)

致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定于7月21日开幕。代表大会要开若干天。请你们派贵党代表与会,并请不晚于7月15日告知我们能否期待你们的代表团出席和贵党代表是谁。①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8年7月1日

① 这封信是1948年6月29日发给南共中央驻联共(布)中央的代表П.别洛维奇的,委托他转交联共(布)中央。但是,联共(布)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没有派代表参加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因为在情报局的6月会议上,根据联共(布)的倡议,通过了一项建议:劝告所有的党同南共断绝任何关系。7月3日,别洛维奇从莫斯科致电贝尔格莱德:"今天我被召唤到中央,莫舍托夫通知我,鉴于已经出现的情况,从今天起停止我的工作。……明天我必须搬出办公室。"

64 南斯拉夫政府关于召回南公民给苏联的照会(摘录)

(1948年7月6日)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获悉:在苏联,特别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其中学习的那些普通学校和军事学校里,以及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其中工作的其他苏联机构中,苏联机关的行动是不光明正大的,他们诽谤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和国务活动家,特别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理和南斯拉夫元帅约·布·铁托。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获悉:苏联一些机关强迫某些南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公民团体改变其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态度,或者哄骗他们这样做,不许他们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上述事例以及一系列类似的事例表明,苏联正蓄意有组织、有步骤地造成一种局面,使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可能继续留居苏联。因此,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召回其在苏联的全部公民。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惦念着学生、大学肄业生、所有在军事学院和学校里学习的人(包括在苏沃洛夫学院的学生)、伤病员和在莫斯科无线电委员会以及在其他苏联机关里工作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愿意尽快解决有关在苏联培训南斯拉夫公民的协议中尚未解决的全部财政问题。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苏联政府在南斯拉夫公民培训和医疗方面给予的帮助,致以深厚的、兄弟般的谢意。……

65 基尔萨诺夫与费依奇关于从苏联召回所有南斯拉夫公民的谈话记录

(1948年7月6日)

秘密

分送:维·莫洛托夫、安·维辛斯基、H.古谢夫、瓦·佐林、A.拉夫连季耶夫(贝尔格莱德),归档。

7月6日根据费依奇[①] 的请求接见了他。

一、费依奇交给我一份照会,照会中大使馆通知,南斯拉夫政府决定召所有在苏联的南斯拉夫公民回国。鉴于将会产生的预先计划和组织的那种局势,这些公民继续驻留在苏联是没有可能的。(照会附上)[②]

费依奇请求尽快回复此照会。

递交照会时费依奇很激动;关于照会的内容他没有再讲什么,也没有补充任何意见。

读了照会后,我说,我将按照会内容给外交部领导报告。

二、按照佐林同志的指示,我通知费依奇,苏联的战争残疾人组织不打算参加南斯拉夫人准备在今年举办的战争残疾人代表大会。

---

① 费依奇,南斯拉夫驻苏联临时代办。

② 照会没有发表。照会内容是关于苏联方面对在苏联普通学校和军事学校学习的南斯拉夫学生和在苏联工作的南斯拉夫人民民主共和国公民,"为了使他们改变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态度"施加影响的具体事实。

说明:5月10日波波维奇通知我,南斯拉夫人民阵线战争残疾人协会决定在贝尔格莱德召开残疾人代表会议。因此,就关于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是否合适及苏联是否可能派代表团参加的问题,他请苏联提出意见。

谈话进行了10分钟。

萨哈罗夫同志在场。

苏联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代理司长

C.基尔萨诺夫

66 南斯拉夫关于抗议苏联怂恿反铁托分子的照会(摘录)

(1949年5月23日)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于1945年4月11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为期20年的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正如苏联政府清楚地知道的那样,尽管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采取了各种怀有敌意和歧视的行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一次也没有违反过条约的规定,而是一直切实遵守该项条约。

可是苏联政府令人费解的行动,及其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态度,事实上正在把上述条约变成一纸空文。

某些麇集在莫斯科的南斯拉夫叛徒的活动,就是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正在实行故意作对政策的新证据。虽然苏联政府对这些人的个人品德是很了解的,但是他们却得到苏联政府的全力支持,在莫斯科进行着敌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活动。1949年4月初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在4月底就发出了一个反南斯拉夫的文件。苏联报刊和电台大肆宣传这一反南活动。

苏联政府对这些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祖国叛徒的支持,是违反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的,这一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尤其应该遵守。这种支持也完全违反了三届联大二次会议期间苏联代表团团长声明中重申的早已宣布过的苏联对外政策,即"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别国的内政,无权为此目的利用各种雇用集团去破坏别国的基础"。

苏联政府让一个友好同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叛徒在莫斯科麇集并组织起来，给这些旨在反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旨在用暴力破坏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叛徒活动提供援助，这就实际证明苏联政府并不是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执行友好政策的政府。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最强烈地抗议苏联当局给一小撮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采取敌视态度的人提供援助。这是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内政不能容忍的公然干涉。苏联政府应当禁止这种敌视活动，禁止报刊进一步作这种宣传，因为支持这种反南活动，是完全违反现行南苏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的精神和规定的。

67 苏联关于有权帮助南"爱国流亡者"的复照(摘录)

(1949 年 5 月 31 日)

……不应将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现政府的态度与其对南斯拉夫的态度、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态度混为一谈。南斯拉夫政府使自己丧失了指望得到苏联政府方面友好态度的权利,这是因为南斯拉夫政府执行了敌视苏联的政策,因为南斯拉夫政府在南斯拉夫建立了反共的、不民主的恐怖统治,因为南斯拉夫由于反苏斗争及各种事件的必然结果而堕落到加入苏联敌人阵营的地步,因为南斯拉夫政府把南斯拉夫报刊变成了帝国主义法西斯代理人疯狂进行反苏宣传的工具。……

苏联政府曾经决定接受和保护因其民主和社会主义信仰而受到南斯拉夫反民主政权迫害的爱国流亡者,并给予政治避难权。苏联政府宣布,将来还要扩大对南斯拉夫革命流亡者的友好接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像南斯拉夫照会中错误陈述的那样,苏联政府或它的国家机关正在"给这些革命流亡者提供全面的支持"。把革命流亡者得到保护的权利与对他们的活动提供"全面的支持"这样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就有在法律上造成荒谬的危险。……

南斯拉夫照会把南斯拉夫革命流亡者说成是"祖国的叛徒"。苏联政府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南斯拉夫革命流亡者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是南斯拉夫的忠实儿子,是南斯拉夫独立的坚强战士,是南苏友谊大厦的建造人。如果人们寻找南斯拉夫的叛徒,不应当在革命

的南斯拉夫流亡者里面找，而应当在那些企图破坏苏南友谊、削弱南斯拉夫，从而使南斯拉夫遭受了与那些已沦为帝国主义奴隶并丧失了独立的国家同样命运的先生们中间去找。

68 苏联政府关于南斯拉夫逮捕苏联公民的抗议照会(摘录)

(1949年7月25日)

据本使馆所得消息称,南斯拉夫当局镇压长期留居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公民的活动,仍在大肆进行。发生了很多起逮捕苏联公民的事件;不经任何起诉,一般又无任何理由就把被捕的人关进南斯拉夫拘留所,几个月不审讯、不调查。

这就证明南斯拉夫当局对苏联公民的镇压活动的实际原因,并不在于苏联公民犯了什么罪,而仅仅在于南斯拉夫当局发现他们是南苏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坚决拥护者。

必须指出,南斯拉夫当局给被捕者规定了一套绝对不能容忍的残暴的监禁制度,使他们在押期间遭受野蛮暴行、殴打及各式各样的虐待,迫使他们挨饿和患病。拘留所管理部门非法地不准被押的苏联公民接受装有食物的包裹,甚至患病的人也不例外,从而危害着他们的健康和生命。由于南斯拉夫当局方面的虐待和非法行为,使得很多被捕的人处于筋疲力尽的境地,健康状况极为不良。

被押的人为反对这种非人道的制度向拘留所管理部门提出的抗议毫无结果,被押苏联公民的处境日益恶化。这里特别指的是关在南斯拉夫监狱中的那些苏联公民,兹将关在监狱中的三十一人的名单随函寄奉。

为使南斯拉夫政府注意不能如此对待苏联公民,本使馆坚决要求立即停止这些对待苏联公民的专横行为,坚决要求立即释放所有被非法关在南斯拉夫监狱中的苏联公民。……

69 南斯拉夫关于逮捕苏联公民问题的复照(摘录)

(1949 年 7 月 30 日)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政府承认这种白卫军分子为苏联公民,但苏联政府从未向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把他们遣送回国,苏联也从未打算实现这种遣返。相反,特别是在共产党情报局决议公布之后,这类分子以及类似的分子得到了进行反南活动的新动力。他们抱着这种信念进行活动:既然他们是苏联公民,他们每次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行动都将得到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保护。

另一方面,正如苏联使馆来照中所透露的那样,苏联政府毫无理由地认为:正是因为苏联政府在战后已经承认这些人为苏联公民,南斯拉夫当局就应当容忍这种反革命间谍活动。

至于那些被苏联大使馆毫无理由地宣布为苏联公民的南斯拉夫公民,那些姓名也被列入上述名单的南斯拉夫公民,南斯拉夫外交部在其早些时候的几份照会中已多次给予明确回答,证实这些人确实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民,因为他们既未要求解除其公民身份,也未得到同意解除其公民身份。因此,苏联大使馆为偏袒他们而不断进行干预,无疑是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内政的不能允许的干涉。

在这件事上,苏联政府故意指责南斯拉夫当局"无法容忍地"、"不人道地"对待被捕人员,也是企图不让苏联及世界民主公众了解南斯拉夫形势的真相,蓄意歪曲我国人民政府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性质。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以最大的义愤拒绝这些有意捏造的事实,并注意到,苏联政府推到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身上的东西,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经过革命斗争在南斯拉夫建立起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是毫无牵连的,而且是闻所未闻的。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相信,我国外交部先前几份照会中陈述的事实,将会使苏联大使馆认识到南斯拉夫当局所采取的行动是无可非议的;并且相信,苏联大使馆为其自身的声誉和苏联的声誉,将会停止有利于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干预。正是因为这样,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过去没有公布自己的任何照会,尽管公布这些照会本来是可以说明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某些活动的,而这些活动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驻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使团的活动,毫无共同之处。

苏联政府公布了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照会,旨在重新煽动仇视和反对南斯拉夫的运动,支持南斯拉夫反动残余势力,支持所有反革命分子,尽力破坏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制度。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拒绝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来照中出于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蓄意侮辱和仇视行为而提出的一切辩解,并再次宣布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建设,不管他会得到什么人的支持。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将来还要采取法律行动,以反对所有那些企图摧毁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革命斗争中付出了极大牺牲而创建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今天正在以极大的努力来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最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调指出:不许白卫军分子(这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了苏联公民身份)留居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除非他们遵守我国实施的各项法律。

70 南斯拉夫关于与奥地利边界问题给苏联的照会(摘录)

(1949 年 8 月 3 日)

苏联政府很清楚地知道,南斯拉夫政府从来没有背着苏联和大不列颠政府或西方诸强国政府间进行过任何关于同奥地利签订和平条约的秘密商谈。苏联政府同样知道,苏联代表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古谢夫、诺维科夫和扎鲁宾从 1946 年初就坚持让南斯拉夫降低对奥地利的合法的领土要求、赔款要求以及其他要求。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方面已证明自己为了保卫和平愿意通过调解以求解决。……苏联政府同样清楚地了解,苏联代表曾建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此问题争取单独同有关国家达成协议。南斯拉夫方面所提出的所有建议,以及商谈的情况自始至终都随时通知了苏联政府。自 1947 年 4 月 20 日起,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建议,已在致维辛斯基部长的信中通知了苏联政府。1947 年 6 月 14 日,在写给英国公使诺尔—贝克的信中还讲到了南斯拉夫代表团和苏联责任代表当时在莫斯科进行谈判的情况。因此如苏联大使馆的照会中所述,硬说苏联政府仅仅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才获悉由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和解的建议,这是不真实的,而且是荒谬的,因为苏联政府在事先足有两个月就得到了后者的通知。……

……苏联政府既不打算说明苏联代表根据什么逻辑在巴黎决议前,即在南斯拉夫政府和西方国家之间进行的所谓秘密商谈整整两年之后,一直继续支持南斯拉夫对于奥地利所提出的要求,又不说明为什么苏联

政府继续就南斯拉夫代表所进行的干预及南斯拉夫所提要求的范围等方面和南斯拉夫政府采取一致行动。① ……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非常遗憾地注意到,苏联代表赞同的巴黎决议中为保护少数民族权利所作出的保证,恰恰是三年来西方国家要南斯拉夫接受的那些东西,想以此取代奥地利的卡林西亚斯洛文尼亚人以及克罗地亚人的真正自由和真正民族权利,而这种保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圣日尔曼帝国主义条约所恩赐的"保护少数民族"的翻版。这种所谓保证少数民族权利不过是继续强迫奥地利境内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等少数民族日尔曼化而已。……

巴黎决议满足了苏联的要求,保证了苏联的利益,但却完全忽略了南斯拉夫的利益,它表明在巴黎决议通过之前,苏联代表支持南斯拉夫的合法利益并非出于政治原则的考虑,或者因为南斯拉夫的要求有着充足的理由,恰恰相反,它的目的是使苏联能够在有利的时机把这些要求当做与西方国家进行交易的筹码,以期牟取他们自己的利益,而置南斯拉夫的利益和对南斯拉夫造成的损害于不顾。……

---

① 二战后,南斯拉夫对战败国奥地利提出了领土要求。在苏联的支持下,1947 年 1 月 22 日,南斯拉夫正式向美、苏、英、法四国副外长会议提出:获得奥地利卡林西亚州和施蒂里亚州各一块居留着斯洛文尼亚人的土地,对奥和约应保证布尔根兰州克罗地亚人享有少数民族的权利,或者让这些克罗地亚人与即将割让的卡林西亚州和施蒂里亚州若干部分的奥地利居民进行交换,此外还要求赔款 1.5 亿美元。西方三国反对接受南斯拉夫的要求。1948 年 4 月和 1949 年 2 月两次开会讨论这一问题时,南斯拉夫调整了其要求(只对南奥边界稍作修改),西方国家继续反对,而苏联依然支持南斯拉夫。1949 年 5 月 23 日至 6 月 20 日召开巴黎外长会议,由于苏联转变态度,会议一致通过的公报宣布:奥地利的边界将维持 1938 年 1 月 1 日的原状,不向奥地利索取赔款。南斯拉夫对此极为不满。

71 苏联关于南斯拉夫与奥地利边界问题的复照(摘录)

(1949 年 8 月 11 日)

(1)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斯拉夫政府对奥地利提出了经济要求和领土要求,其中包括要求拥有总面积达 2600 平方公里的领土以及将近 19 万居民的斯洛文尼亚卡林西亚和施蒂里亚的斯洛文尼亚边界地区划归南斯拉夫。苏联政府答应支持这些要求,而且确实在外长会议上对这些要求予以支持,和美、英、法进行斗争。

1947 年 4 月南斯拉夫副总理卡德尔先生曾专门写信给安·扬·维辛斯基,信中说他代表南斯拉夫政府就南斯拉夫对奥地利的要求提出了该政府的新立场……因之,南斯拉夫政府早在 1947 年 4 月就认为不仅有必要放弃关于斯洛文尼亚卡林西亚和施蒂里亚地区的狭小地带的领土要求,而且有必要放弃对奥地利的所有的领土要求。此事发生在苏联正在与西方国家的代表举行会议,苏联政府正在坚持斯洛文尼亚卡林西亚应归属于南斯拉夫的时候。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南斯拉夫政府在其 8 月 3 日的照会中把放弃对斯洛文尼亚卡林西亚的要求说成是一种背叛,认为是对卡林西亚的斯洛文尼亚居民利益的出卖,是违背了民族自决权,是一种帝国主义政策的表现,是把斯洛文尼亚卡林西亚变成了交易的筹码,等等。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存在着背叛行为和出卖南斯拉夫利益的话,那么,从卡德尔的信中可以清楚看出,正是南斯拉夫政府,也只能是南斯拉夫政府,必须被看做背叛者和出卖者。

(2)人们本以为,南斯拉夫政府既然已决定采取让步态度并放弃其领

土要求,就会对这种立场承担责任,但南斯拉夫政府却另有打算。它认为苏联政府必须自己宣布这些让步……而南斯拉夫政府却躲在后面,其目的是要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心目中造成一种虚伪印象,似乎南斯拉夫政府仍然坚持斯洛文尼亚卡林西亚应归属于南斯拉夫这一原来的要求,因而,拒绝对斯洛文尼亚卡林西亚提出要求一事不是出于南斯拉夫政府,而是出于苏联政府。换句话说,就是要使苏联政府变成南斯拉夫政府安排的欺骗南斯拉夫人民的工具。南斯拉夫天真地认为苏联政府会参与这一政治骗局。明眼人一望而知,苏联政府是决不会参与这一卑鄙勾当的。

(3)与此同时,就像后来所证实的那样,南斯拉夫政府背着苏联政府在贝尔格莱德和伦敦同英国代表进行了谈判……放弃了对斯洛文尼亚卡林西亚的要求。虽然苏联同南斯拉夫订有联盟条约,但苏联政府至今也不知道这些先生们达成了什么协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这些幕后的谈判中,以牺牲在卡林西亚的斯洛文尼亚人的利益、损伤南斯拉夫的民族权利为代价达成了一项交易。

(4)南斯拉夫照会无中生有地造谣说,苏联政府拒绝否认奥地利新闻报道所说的"斯大林曾答应奥地利总理伦纳确保奥地利 1938 年的边界"。南斯拉夫知道,奥地利的这些新闻报道纯系捏造。……

(5)所有这一切事实已经使苏联政府得出一个结论:南斯拉夫违背了它同苏联结盟所应承担的义务,它的举止不像是一个盟友,而恰像苏联的敌人;某种牢固的联系把南斯拉夫政府或者把该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同外国资本主义阵营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了;南斯拉夫正在愈来愈密切地与帝国主义集团结合在一起反对苏联,并同他们结成一个集团;苏联政府不能再把南斯拉夫政府看做自己的盟友,不能再支持南斯拉夫政府的要求,特别是南斯拉夫政府自己所放弃了的那些要求,可是南斯拉夫政府对南斯拉夫人民隐瞒了这一情况。如果南斯拉夫政府宁愿同帝国主义集团结成统一战线,而不愿同苏联结成统一战线的话,那就让这些集团去支持他们的要求吧。……

(6)……让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都知道,苏联政府认为南斯拉夫政府不是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而是自己的对头和敌人。

72 苏联政府关于南斯拉夫虐待苏联公民的抗议照会(摘录)

(1949年8月18日)

……苏联公民受到迫害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同南斯拉夫所有爱国者一起反对南斯拉夫政府那种人所共知的、不能容许的态度。南斯拉夫政府背弃民主社会主义阵营,投向国际资本主义阵营;它为了讨好国际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从而为自己谋得私利,正在竭力危害苏联……

南斯拉夫政府本身在其照会中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南斯拉夫政府本身也意识到根据这些人的流亡经历就进行谴责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在其照会中硬说他们还有别的罪责,意思是说,某些被监禁的苏联公民对南斯拉夫现政权持否定态度,他们赞同著名的共产党情报局决议,他们帮助传播这一决议。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指责呢?与其说这是对被捕的苏联公民的指责,不如说是对南斯拉夫现政权的指责。南斯拉夫政府提出这样的指责,说明了在南斯拉夫现在实行的是什么样的政治统治。除了法西斯统治的国家外,在其他国家,自由表达民主观点是不会被视为犯罪的。在今日的南斯拉夫,自由表达民主观点却成为对于批评南斯拉夫法西斯制度的人实行非法逮捕和残酷报复的口实。

南斯拉夫政府意识到这种论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是虚伪的,但它为了使这种论点显得有说服力,就把此事与共产党情报局决议联系起来,荒谬地把关于以暴力推翻南斯拉夫制度的宣传,归咎于某些被囚禁的人。可是这种捏造是露骨的挑衅和诽谤。共产党情报局决议根本没有谈到"宣传

推翻南斯拉夫制度”,也没谈到改变这种制度的“暴行”措施。

在欧洲只有希腊和西班牙两国政府(察尔达里斯的政府和佛朗哥的政府)把共产党情报局决议说成是“罪恶的传单”。这两个政府都是实行法西斯主义的。显然,南斯拉夫就是第三个这样的政府,它也把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看做是“罪恶的传单”,因为它把传播决议甚至阅读决议作为监禁数以千计的人的充分理由。这种一致性并非偶然,难道还不清楚吗?……我们只要看一看当前南斯拉夫所发生的事情就会立即明白,在南斯拉夫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人民政府或者社会主义制度。

这个国家已被置于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之下,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向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公开挑衅,在这种情况下,在南斯拉夫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制度可言吗?南斯拉夫一切都在盖世太保管理方式统治之下,每次自由表达思想都受到迫害,一切人权都遭到侵犯,南斯拉夫监狱挤满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者,南斯拉夫共产党已经变成了警察头子兰科维奇的政治警察局属下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政府还有民主性可言吗?南斯拉夫政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声明(据说南斯拉夫正在实行社会主义)并不比当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发表的类似声明更真实些……

南斯拉夫政府显然企图继续虐待苏联公民,对他们进行非法逮捕、拷打和嘲弄。南斯拉夫政府显然并不打算惩办那些应对这种法西斯行为负责的罪犯。如果情况确是如此,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声明,苏联政府不能对这种事置之不理,它将不得不采取为保护在南苏联公民的权利和利益所必要的其他更有效的措施,并斥责那些已经做过了头的法西斯暴君。

73 南斯拉夫关于与奥地利边界问题的再次照会(摘录)

(1949 年 8 月 20 日)

……事实真相是这样的:

(1)1947 年 4 月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一个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把问题提交给外长会议。但是却遭到了美国、英国、法国代表们的断然拒绝,甚至苏联代表对支持南斯拉夫的要求,也是持一种矛盾的态度。苏联政府清楚地了解,在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爱·卡德尔和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波波维奇同苏联代表莫洛托夫以及维辛斯基的几次商谈过程中,苏联代表明白地告诉南斯拉夫代表,外长会议绝对不可能接受南斯拉夫的要求,这些要求有可能统统被拒绝。莫洛托夫外长告诉卡德尔,尽管前景不妙,但苏联代表团将继续把卡林西亚问题作为一个未解决的问题,以此为手段,促使在奥地利的德国财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有利于苏联的正确解决。

苏联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在外长会议上作了进一步的表白,在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反复强调:对于苏联代表来说,主要的问题就是苏联所提出的对德国财产的要求。苏联这一立场自然而然地被西方国家代表理解为,假如在奥地利的德国财产的处理方面有利于苏联,苏联就准备在奥地利边界问题上实行让步。

事实上,关于在奥地利的德国财产问题刚一达成协议,苏联政府就放弃了对南斯拉夫要求的支持。

(2)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不得不把苏联官方的这一政治路线和约·维·斯大林1945年致伦纳总理的信联系起来:

最敬爱的同志,对您4月15日的来函深表谢意。

您可以完全相信,您所关心的关于奥地利的独立、领土完整以及繁荣昌盛的问题,同样也是我所关心的问题。

我愿意在我权限所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对奥地利的需要给予友好的帮助。

未能及时函复,希鉴谅。

约·斯大林

苏联政府认为没有必要把这封信的内容(即将尽一切努力使奥地利—南斯拉夫的边界保持不变这一诺言)通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虽然一个盟国政府可能希望得到这种通知。

(3)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和莫洛托夫的会谈中,力图使苏联代表至少能采取折中的办法解决问题。因此苏联代表团要南斯拉夫代表团以书面形式准备一些供选择的起码要求,这些要求在卡德尔1947年4月20日致维辛斯基的信中都已提了出来。

因此苏联照会中说什么"当苏联政府正在支持南斯拉夫要求的时刻",南斯拉夫政府放弃了对斯洛文尼亚卡林西亚的所有要求,这是不真实的。事情的真相是:苏联政府既已宣布停止支持南斯拉夫的要求,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被迫恳求苏联政府至少支持采取折中的办法来解决卡林西亚问题。

南斯拉夫政府从未放弃和停止过为使斯洛文尼亚卡林西亚与南斯拉夫合并而进行的斗争,只是由于苏联政府的要求,别无他法,才被迫屈从。众所周知,苏联政府不仅没有支持南斯拉夫对斯洛文尼亚卡林西亚合并的要求,甚至对边界进行微小的更正的要求也不予支持。说什么苏联政府愿意为合并斯洛文尼亚卡林西亚而斗争,而南斯拉夫不要苏联这样做,这几乎等于对一个为自己人民解放和国家统一而战的国家的嘲弄。……

不仅在斯洛文尼亚卡林西亚问题上,而且在奥地利条约引起的关系

到南斯拉夫利益的其他问题上，苏联政府已经和西方强国联合起来对付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

74 南斯拉夫关于虐待苏联公民问题的复照(摘录)

(1949 年 8 月 23 日)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很不理解,为什么逮捕几个来历不明、不顾南斯拉夫的友好接待、违犯法令的白卫军苏联公民,竟会引起苏联政府这样一份无礼、粗鲁、没有事实根据的照会。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更不理解,为什么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对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有关儿童的父母和监护人都一再要求从苏联遣送南斯拉夫儿童回国的问题置之不理,对于侨居苏联的南斯拉夫籍公民的返国问题也置之不理,尽管这些公民并没有违犯苏联法律并且是自由的,但是苏联政府迄今不发给他们出境签证。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注意到,关于南斯拉夫一些机构对待某些苏联公民(他们大多是白卫军流亡分子)的行动的那些武断说法完全是捏造的,是虚假的,是侮辱性的。上述那些人,正如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很多照会中已经指出的那样,是由于他们的间谍行为和反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敌对活动,严重违犯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法律而被拘禁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有权保卫自己,禁止这种活动。尽管这些人罪证确凿,但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还是表示愿意解决两国间的争议问题,愿意在最短时期内将被捕的全部人员移交给苏联政府。同时,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还表示愿意让所有居住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苏联公民立即离开南

斯拉夫国境(如果他们有此要求的话),并为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方便条件。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及其最高负责人一直表示愿与苏联政府通过协商解决两国间的争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此重申,愿意与苏联政府一起,按照双方都承担国际义务的原则,并本着这种精神,探讨一切有争议问题的解决办法。

75 苏联关于南—奥边界问题苏联立场的照会(摘录)

(1949 年 8 月 29 日)

……南斯拉夫政府声称,在斯大林致奥地利总理伦纳的信中斯大林"答应确保奥地利 1938 年的边界"。……

……在斯大林这封信中,只字未提"奥地利边界",或"答应确保奥地利 1938 年的边界"的问题,也没有提到"不改变奥地利边界"。这纯系南斯拉夫政府的虚构和编造。……难道说宣布苏联反对瓜分奥地利并赞成它的独立,就意味着承认奥地利边界永远不变和不作任何有利于南斯拉夫的调整吗?当然不是。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土完整问题,与"它不改变其边界"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只有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把这两回事混为一谈。……

毫无疑问,南斯拉夫如果不是惊慌失措,它如果不是由于胆怯而出卖了自己的民族权利,它本来是能够得到卡林西亚的。……

事实表明:第一,早在 1947 年,南斯拉夫政府就曾通知英国政府,说它已经放弃了对斯洛文尼亚卡林西亚的领土要求,而它却对苏联政府隐瞒了这一点。第二,南斯拉夫政府在 1947 年及以后的时期内大耍两面派手法,打着为斯洛文尼亚卡林西亚而战的幌子,实际上在两年以前,南斯拉夫政府就在同英国代表达成的秘密谅解中放弃了斯洛文尼亚卡林西亚。第三,西方国家在获悉南斯拉夫放弃斯洛文尼亚卡林西亚之后,必然更坚定地反对南斯拉夫的领土要求,这使得苏联政府不可能在支持这些要求中

取得胜利。……南斯拉夫政府在这件事情上俨然成了苏联的对手和敌人，并充当了帝国主义集团的代理人。

当苏联政府洞察南斯拉夫政府层层烟幕后面的鬼把戏之后，苏联政府理所当然地不愿参与南斯拉夫政府那种旨在欺骗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卑鄙权谋。当然苏联政府也不会再支持南斯拉夫的领土要求，因为现在事情很清楚，自从南斯拉夫政府于 1947 年同英国政府达成秘密谅解之时起，它本身就不再提出那些要求，从而使得苏联政府不可能继续支持这些要求。

由于意识到自己在斯洛文尼亚卡林西亚问题上采取了绝望的失败主义态度，并且鉴于不可能对舆论界隐瞒卡德尔放弃斯洛文尼亚卡林西亚的信件，南斯拉夫政府为了自我开脱，进行了第三次造谣。它硬说苏联政府强迫南斯拉夫政府就南斯拉夫对奥地利提出的领土要求问题同西方列强达成协议，并且南斯拉夫政府“由于苏联政府的要求，才准备对此争端采取让步政策”。……

事实是，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在 1947 年 11 月回答南斯拉夫外交部询问时说过：“苏联看不出南斯拉夫有什么理由改变其对奥地利的领土要求”，苏联代表在 1949 年 8 月 11 日的照会中回顾了这一点，这就揭露了南斯拉夫政府的虚伪的辩解。

1948 年，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进一步肯定，苏联政府认为改变南斯拉夫对领土的要求是不合时宜的。……

假如苏联政府曾强迫南斯拉夫政府在领土问题上作出让步的话，那么为什么它当时不对卡德尔的来信表示赞同呢？……它为什么当时不采纳他的建议呢？首先，这是由于，卡德尔提出的让步当时看来不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仍然有可能实现南斯拉夫最大限度的领土要求。其次，还由于南斯拉夫政府当时拒绝承担卡德尔的信中所提出的对领土问题作出让步的责任。南斯拉夫政府要使苏联政府（而不是它自己）对这一让步承担责任。……

任何人都知道南斯拉夫政府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民主阵营，跑到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阵营那边去了。……我们希望南斯拉夫政府将认识到，它不能再指望受到苏联政府的礼遇，更谈不上受到什么尊敬了。

76 苏联政府关于废除苏南友好条约的照会(摘录)

(1949年9月28日)

据1949年9月24日在布达佩斯结束的对政治罪犯拉伊克[①] 及其同伙(他们也是南斯拉夫政府的特务)的审判会揭露,长期以来南斯拉夫政府在假惺惺地宣称对苏友好的伪装下,一直执行着极端敌视苏联的政策,进行颠覆苏联的活动。

布达佩斯审判会还揭露出南斯拉夫领导人不仅主动地,而且是在外国帝国主义集团指使下,一直进行并仍在进行着反苏的敌视活动和颠覆活动。

审判会所揭露的事实,进一步说明南斯拉夫现政府完全是外国帝国主义集团的附庸,已经沦为这些集团侵略政策的工具,这必将导致、而且已经导致南斯拉夫共和国的独立成为泡影。

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南斯拉夫现政府已经极为恶劣地违背并彻底撕毁了1945年4月缔结的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

根据上述理由,苏联政府宣布,从现在起苏联不受上述条约产生的各种义务的约束。

---

① 拉斯洛·拉伊克(1909—1949),时任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副总书记,并先后出任政府内务部长和外交部长。1949年5月30日被捕,9月22日以间谍和铁托分子代理人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77 共产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关于南共的决议

（1949 年 11 月 19 日）

南斯拉夫共产党处于杀人犯和特务分子的控制之下

（情报局决议，1949 年 11 月 19 日通过）

由保加利亚共产党、罗马尼亚工人党、匈牙利劳动党、波兰统一工人党、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法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组成的情报局，讨论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处于杀人犯和特务分子的控制之下”的问题，一致同意以下结论：

如果说情报局会议在 1948 年 6 月确认，铁托—兰科维奇集团已经从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过渡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那么，在这次会议之后的这段时间里，这个集团已经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向法西斯主义的过渡，并直接背叛了南斯拉夫的国家利益。

最近时期的事件表明，南斯拉夫政府完全处于外国帝国主义集团的控制之下，并变成了他们侵略政策的工具，这导致南斯拉夫共和国丧失了独立和自主。南共中央和南斯拉夫政府完全与帝国主义集团联合起来，反对整个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阵营，反对全世界的共产党，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

受雇佣的贝尔格莱德特务和杀人犯集团与帝国主义反对派进行公开的勾结，并为其效劳，拉伊克—布兰科夫的布达佩斯案件就充分证明了这

一点。

这个审判表明,南斯拉夫当前的执政者已经从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逃到了资本主义和反动派的阵营里,成为战争贩子们的直接仆从,试图以自己的背叛行径来获得帝国主义分子的垂青,并在他们面前俯首听命。

铁托集团转向法西斯主义不是偶然的,他完全是按照其主子——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命令行事的,正如现在已经查明的那样,这个集团很早以前就已经是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走狗了。

南斯拉夫的叛徒们,顺应帝国主义分子的意愿,其任务是在人民民主国家建立由反动派分子、民族主义分子、教权主义分子以及法西斯主义分子组成的政治匪帮,以便依靠他们,在这些国家里进行反革命的政变,使他们脱离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最后服从于帝国主义的统治。铁托集团已经将贝尔格莱德变成了美国人进行特务活动和反共宣传的中心。

当时,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真正朋友一样,铁托—兰科维奇集团认识到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强大堡垒,是人民自由和独立的忠诚的、不可动摇的保护者,是和平的主要支柱,他们打着是苏联朋友的旗号篡夺了政权之后,按照帝国主义者的指使,使用最卑鄙的谰言,借助希特勒分子军火库的武器,进行诽谤性和挑拨性的反苏活动。

铁托—兰科维奇集团使南斯拉夫政府与帝国主义集团在联合国组织里进行公开的联合,以此来使自己变成了帝国主义的直接代理机关和战争贩子的走狗,卡德尔、吉拉斯和贝勃勒之流在国际政策的重大问题方面,与联合国组织里的美帝国主义反动分子结成了统一战线。

在国内政策方面,铁托—兰科维奇叛徒集团活动的主要结果是:在南斯拉夫取消了人民民主制度。

篡夺了党和国家政权的铁托—兰科维奇集团实行的反革命政策的结果,证明了南斯拉夫的国家制度是反共的、法西斯性质的警察制度。这个制度的社会基础在农村是富农阶级,在城市是资本主义分子。南斯拉夫的政权实际上是掌握在反人民的反动派手中。在中央和地方机关里,都有旧资产阶级党派分子、富农和其他敌视人民民主的积极分子在进行着猖獗的活动。法西斯上层统治集团依靠极其庞大的军事警察机构,借助这个机

构来压迫南斯拉夫的各族人民,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兵营,剥夺了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并对任何一种自由思想的表达进行压制。

南斯拉夫的叛徒们厚颜无耻地煽动和欺骗人民,仿佛他们在南斯拉夫是建设社会主义。事实上,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都清楚,当铁托集团脱离了苏联,脱离了整个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阵营,也就谈不上在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了,而当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屈从于英美帝国主义的时候,它就丧失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支柱。

南斯拉夫经济中的国家部门已不再是人民的财产了,因为国家的政权已经掌握在人民的敌人手中。铁托—兰科维奇集团为外国资本渗入到国家经济中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并将国家经济置于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监督之下。英美工业财团,将自己的资本投入到南斯拉夫经济部门中,并逐渐将南斯拉夫变成外国资本的农业原料附属国。南斯拉夫对帝国主义越来越深的奴役性的依赖,导致了对工人阶级剥削的加剧,并使得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急剧恶化。

南斯拉夫叛徒们在农村的政策带有富农—资本主义的性质。在农村强迫组成的虚假的合作社处于富农阶级及其代理人的控制之下,并成为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工具。

南斯拉夫的帝国主义走狗们将南斯拉夫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对于忠诚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以及为争取南斯拉夫的独立而进行斗争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们开展了一系列的恐怖活动。数千名忠诚于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爱国主义者被开除出党,并被投入到监狱和集中营里,其中有很多人在监狱里受折磨,遭枪杀。南斯拉夫杀害共产主义战士的残酷程度,只有希特勒法西斯匪徒、希腊的查尔达里斯刽子手以及西班牙的佛朗哥的兽性才能与之相比。

南斯拉夫的法西斯分子,将一些忠诚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共产党员开除出党的队伍,枪杀了他们,同时还向资产阶级和富农分子敞开了党的大门。

由于铁托匪帮所进行的反对南共健康力量的法西斯恐怖活动,使得南共的领导权落入了杀人犯和特务分子的手中。反革命势力控制了南斯

拉夫共产党,并擅自以党的名义发表演说。众所周知,很久以来资产阶级就采用这种老一套手段在工人阶级党的队伍中为自己招募特务和挑唆分子了。帝国主义分子也采取这种方法竭力从内部来瓦解这些党组织,并使他们服从自己。在南斯拉夫,他们成功地达到了目的。

法西斯的意识形态、法西斯的对内政策、铁托集团的背叛性质的对外政策,以及完全屈从于外国帝国主义集团,在铁托—兰科维奇法西斯特务集团与热爱自由的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因此,铁托集团反人民的背叛行为遭到了来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保持忠诚的共产党员们,以及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阶级的越来越强烈的抵抗。

根据确凿的事实证明,铁托集团已经完成了向法西斯主义的过渡,并堕入了国际帝国主义阵营。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情报局认为:

1. 铁托、兰科维奇、卡德尔、吉拉斯、皮雅杰、戈什尼亚克、马斯拉里奇、贝勃勒、姆拉佐维奇、伏克曼诺维奇、科查·波波维奇、基德里奇、奈什科维奇、兹拉蒂奇、韦莱比特、科利舍夫斯基等人组成的间谍集团,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敌人,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敌人。

2. 这个特务集团代表的不是南斯拉夫人民的利益,而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它出卖了祖国的利益,使南斯拉夫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自主性。

3. 已经落入人民的敌人、杀人犯和特务分子手里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失去了称之为共产党的权利,只是一个执行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集团间谍任务的机构。

因此,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认为,同铁托集团——被雇佣的特务和杀人犯进行斗争,是所有共产党员和工人党员的国际义务。

全面帮助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进行争取使南斯拉夫回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斗争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职责。

南斯拉夫回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必要条件是:无论是南斯拉夫国内的革命者,还是国外的革命者,都要积极开展斗争,使真正革命的、忠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以及为使南斯拉夫摆脱帝国主义而奋斗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得以复兴。

信仰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力量，在法西斯恐怖活动极其猖獗的条件下，没有可能对铁托—兰科维奇集团进行公开的斗争，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他们不得不走上另一条斗争道路，就如同受到禁止进行合法工作的那些国家的共产党员所走的道路一样。

情报局坚信，在南斯拉夫的工人和农民之中，会出现一股能够保证同铁托—兰科维奇资产阶级复辟的特务集团的斗争取得胜利的力量，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南斯拉夫劳动人民能够恢复人民民主制的历史性成果，这些成果是南斯拉夫人民通过英勇的斗争，以沉重的牺牲代价换来的。情报局还坚信，南斯拉夫的劳动人民必将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情报局认为，共产党和工人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在自己的队伍中全面提高革命的警惕性，揭露并铲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无论他们是用什么旗号来做掩护。

情报局认为，在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队伍中，必须加强思想工作，必须以忠诚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以对于任何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行为毫不妥协的精神、以忠诚于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来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工作。

78 南斯拉夫关于苏联敌对活动提交联合国的控诉(摘录)

(1951年11月9日)

……为了达到侵犯南斯拉夫的主权,威胁它的领土完整及民族独立的目的,三年多以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一直在直接地或通过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政府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政府,进行煽动,组织反对南斯拉夫的活动,并对它施加挑衅性的压力。这些敌对行动表现在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同时他们破坏了两国之间的基本的、传统的关系,以致现有的外交关系名存实亡。显然,这种活动正在造成一种殃及国际和平的局势。

(2)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尽了最大努力避免两国关系的恶化并竭力克制自己。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不顾极其严重的攻击,依然局限于采取通常的及直接的外交步骤,但不幸的是这些步骤都没有成功。这些敌对行动实际上等于一整套的挑衅性压力,而且这种压力还在有计划地加强,只是在事实真相大白时,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辩论维护和平问题的过程中,对这种形势才开始加以注意。在所有这一切未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时,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了自己的"白皮书"。没有一个被指控的政府曾试图否认或反驳"白皮书"中所讲的事实,但是,所有这些政府反而从各个方面继续加强这种挑衅性压力。

(3)因此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有必要正式提请联合国大会注意目前充满危及和平的局势;苏联政府及其唆使下的保加利亚、匈牙

利、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政府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政府已经造成、并且正在蓄意恶化这种局势。

……

(5)苏联与上述六国政府一起,组织了并全面实行了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封锁。上述的一些国家甚至已经中断了与南斯拉夫的所有邮政和铁路交通,从而不仅违背了他们与南斯拉夫之间的条约,而且违背了国际惯例。

(6)三年多以来,苏联政府与上述六国政府一起,一直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发动粗暴的煽动性的运动,其范围之广泛、形式之多样,在国际关系中是空前的。这个宣传的直接意图,在于制造战争的变态心理。这种宣传旨在煽动上述各国人民对南斯拉夫的仇恨,在南斯拉夫人民中间引起焦虑、激动和不安。为了扩大正在广播和报刊上进行的宣传效果,苏联和其他六国的军政最高代表不仅在其公开和正式的演说中侮辱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而且直接鼓动南斯拉夫人民反对并推翻他们的合法政府。

(7)为了同一个目的,他们在组织对南斯拉夫的侦察、颠覆和恐怖活动。他们建立了特别中心,训练恐怖活动的小组。为了进行牵制和破坏活动,削弱南斯拉夫的防御能力,这些恐怖小组在政府机关的直接帮助下正从保加利亚、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派往南斯拉夫。

(8)由于同样的原因,南斯拉夫少数民族人民正在大规模地从他们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居住的地方被迁往别地。这不仅是灭绝人性的行为,而且也违犯了停战协定及和平条约,根据这些协定和条约,各有关国家和政府应保证尊重人权,禁止种族歧视。

(9)在战争期间,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作为希特勒的同盟国,曾占领南斯拉夫的部分地区。现在保加利亚、匈牙利两国政府违背和平条约的规定,正在强迫出生于这些地区的南斯拉夫公民接受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国籍。

(10)上述政府从贝尔格莱德撤走大使和领事,违背国际法和已经建立的国际惯例,对南斯拉夫外交人员肆意进行歧视:毫无道理地退回外交照会,并且不予答复,滥用外交通信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进行诽谤和侮辱性的攻击;上述政府不仅使人民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甚至最微小

的争论,而且不利于维持正常的外交关系。

(11)苏联和其他六国政府单方面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缔结的46项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方面的协定和条约。

(12)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政府悍然违反和平条约的军事条款,增加了武装部队的人数,增加军备数量,并且提高其质量。在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交界的边境地区,一直在进行示威性的部队调动并举行军事演习。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苏联军队的人数及其部署,使这些炫耀性的挑衅行为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并且显然鼓励了这些行动,因为这种挑衅无论在数量上和剧烈程度上都有增无减,以致许多南斯拉夫边防战士和公民,在和上述国家交界的边境线发生的事件中被打死或打伤。不仅事件的数量,而且事件所进行的方式,都证明了上述国家有加剧现有紧张局势的意图。

(13)所有这些,以及苏联、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政府的类似行动,破坏了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普遍接受的国家关系的准则。

(14)为了和平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努力,以及外交部长爱德华·卡德尔先生1950年9月25日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南斯拉夫政府与每个邻国缔结永久和平、互不侵犯协定的建议,都未能取得成就。相反,应对这种事态负责的各国政府仍在不断恶化这种关系,以致在1951年10月联合国大会的前夕,他们甚至仍然拒绝接受有关这些重大事件的备忘录,在这些事件中,南斯拉夫公民在南斯拉夫的国土上被上述国家的特务杀害。

(15)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消除充满危险的国际形势以利于国际和平,用尽了所有的正式外交手段,同时它牢记国际形势日益恶化,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条,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荣幸地要求联合国大会将如下条款——"苏联政府,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政府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政府反对南斯拉夫的敌对活动"——列入大会的议事日程,以便大会加以讨论,并提出它认为适当的劝告。

79 苏联代表关于南斯拉夫控诉提交联合国的答复(摘录)

(1951 年 11 月 28 日)

……索波列夫先生[①] 提请注意,苏联反对把南斯拉夫所建议的关于所谓苏联政府和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政府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政府反对南斯拉夫的敌对活动的项目列入议事日程。然而美国集团却迫使联合国大会考虑这个控告。美国集团曾多次挑动和鼓励对反对苏联和反对人民民主国家的控告加以考虑。每次控告都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南斯拉夫的控告也将是如此。苏联代表团反对把那个诽谤性的控告列入联大的议事日程。

南斯拉夫代表在特别政治委员会(第八次和第九次会议上)所作的声明,只不过是连篇谎言和污蔑,它充分证明了南斯拉夫的控告是挑衅性的。很明显,南斯拉夫政府企图把舆论和南斯拉夫人民引入歧途,掩盖南斯拉夫统治者的不端行为。

(4)事实真相是什么呢? 南斯拉夫把边境事件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并让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政府对边境事件承担责任。事实上,正像上述各国政府对南斯拉夫政府提出的许多抗议中所说的那样,这些事件都是南斯拉夫当局挑起的。例如,1949 年在阿—南边境上发生 124 起事件,1950 年发生 65 起,1951 年头七个月内发生 56 起。南斯拉

---

① 苏联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代表。

夫突击队数次越界入侵,南斯拉夫飞机飞越这一地区的阿尔巴尼亚领空,投掷敌视阿尔巴尼亚政府的传单。在保—南边界上,1949 年南斯拉夫当局挑起 63 起事件,1950 年挑起 123 起事件。在匈牙利边境上,仅 1950 年一年中南斯拉夫当局就挑起 795 起事件。

(5)索波列夫先生引用了南斯拉夫当局挑起的一些典型事件,这是最近在那些边境地段发生的事件,它们构成了各该政府提出的抗议照会的主题。南斯拉夫政府正在明目张胆地利用所有这些事件进行造谣惑众的宣传。

(6)不是苏联政府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政府从事反对南斯拉夫的敌对活动,而是南斯拉夫政府自己在进行针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颠覆活动。这个事实在布达佩斯对叛徒拉伊克进行审讯时已经真相大白,同时也证实了南斯拉夫企图推翻匈牙利政权。在索菲亚对叛徒科斯托夫的审讯[①]也已证明,在战争期间,铁托元帅与联合王国和美国政府的代表达成了一项协议,规定不许即将被红军解放的巴尔干国家背离西方集团,为此目的,保加利亚将并入南斯拉夫版图。

(7)这就证明了南斯拉夫政府是应美国和联合王国的请求并经其批准,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颠覆活动的。

(8)这也确切地证实,南斯拉夫政府长期以来完全受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支配,而且现在它不过是他们侵略政策的工具。

(9)南斯拉夫政府肆意违反 1945 年 4 月 11 日与苏联政府签订的友好互助条约,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苏联于 1949 年 9 月 28 日向南斯拉夫政府送交照会,说明苏联认为自己对 1945 年的条约不再承担义务。

(10)更有甚者,南斯拉夫的外交代表利用他们的特权在他们奉命驻在国中从事间谍活动,并在那里组织颠覆活动,此类活动已为在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举行的审讯中揭露的无数事实所证实。南斯拉夫驻莫斯科的外交官曾散布敌视苏联的宣传。因此他们已在授予他们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掩护之下,粗暴地违犯国际法的条例。

---

① 特赖乔·科斯托夫(1898—1949),1949 年 4 月被捕,12 月以间谍和铁托分子代理人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参见第 246 页注。

(11)居住在南斯拉夫的苏联、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侨民,受尽了种种暴行虐待,尽管他们的政府曾提出抗议,特别是1949年8月18日苏联向南斯拉夫提出了照会。而且,南斯拉夫并未试图隐瞒下列事实:这种迫害决不是因为受害者犯下了什么罪行或过错,而是因为他们公开主张维护苏南友谊。

(12)下列事实说明了南斯拉夫政府的态度: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独立,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在这个国家里人权和民主自由遭到肆无忌惮的侵犯。南斯拉夫当局挑起边境事端,是为了制造战争变态心理,证明他们把南斯拉夫变成侵略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桥头堡的政策是正确的。英美统治集团曾指派南斯拉夫充当这种角色,已由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参议员们的某些声明予以证实。另外,南斯拉夫部队总参谋长波波维奇将军访问华盛顿和美国陆军总参谋长柯林斯将军访问南斯拉夫的结果,导致了南斯拉夫军国主义化的大力发展,从而给南斯拉夫的经济生活带来严重的恶果。一些美国军事代表团负责这种军国主义化,它们所起的作用和驻在其他国家(主要是希腊和土耳其)中的类似的军事代表的作用毫无区别。

(13)因此,不是苏联(它的军队曾把南斯拉夫从德国的占领下解放出来)构成了对这个国家独立的威胁,而是这个国家目前的统治者,通过他们的政策,使这个国家的利益隶属于他们英美主子的利益。

(14)在谈到所谓苏联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封锁问题时,索波列夫先生提请注意:1945年至1947年苏联曾以商品形式对南斯拉夫提供总值达4.51亿卢布的援助,并给予总计7.95亿卢布的贷款。由于苏联忠于尊重其他国家主权的原则,它并没有对该项援助附加任何有损于南斯拉夫国家利益的条件。苏联在1948年缩减了援助额,后来又完全停止援助,这是因为南斯拉夫从一开始就没有履行它的义务,并且在1949年终止了根据贸易和贷款协定应交的款额。与南斯拉夫的辩解相反,正是南斯拉夫而不是苏联破坏了贸易协定;南斯拉夫同样破坏了它同阿尔巴尼亚的贸易协定、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铁路协定,以及多瑙河航行公约和其他协定。由于破坏了这些协定,南斯拉夫严重地损害了有关国家,特别是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的经济,致使这两国的经济发展趋于停滞。更有甚者,当南斯

拉夫要求阿尔巴尼亚考虑改善两国关系问题时,南斯拉夫竟暗示两国关系的改善应采取将阿尔巴尼亚并入南斯拉夫的形式,此后于 1949 年 11 月 12 日它废除了同阿尔巴尼亚的友好条约。

(15)还可以列举更多例子证明南斯拉夫奉行敌视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政策。然而在声明保留必要时在辩论后一阶段的发言权的同时,索波列夫先生表示他暂时不再列举更多的例子。他所公布的事实足以证明,南斯拉夫政府的诡辩是毫无根据的诽谤,其惟一目的是转移南斯拉夫人民对他们的领导人奉行的、变南斯拉夫为美国侵略政策驯服工具的背信弃义政策的注意力。苏联代表团确信,所有这样的花招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80 铁托在南共六大指责苏联帝国主义的发言(摘录)

(1952年11月3日)

苏联帝国主义者因为他们丢掉了南斯拉夫的自然财富这样一块肥肉而恼怒不已,苏联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卖身投靠西方。……在马林科夫的报告[①] ——欣喜若狂的征服者们的一篇名副其实的杰作——里,他称我们为反苏的美国代理人。……但是,这只狼披上了羊皮也是枉费心机的,因为它绝对骗不了任何人。我们太熟悉他的声音了。他一直唱着他热爱和平的老调,不过是为了欺骗人民,掩盖他那货真价实的帝国主义面目,并以此哄骗世人安然入睡。但是苏联领导人灵魂过于污浊,劣迹异常显著,以致任何人也不会再相信他们了……

在德黑兰会议[②] 之前,我们一向很信任他们,但是他们渐渐地彻底破坏了我们对他们的信任,所以当他们利用我们的信任以达到他们不正当的目的时,我们才认识了他们,认识了他们的真面目,认识了他们的罪恶目的,认识了他们的虚伪和残酷……对所有那些相信苏联大公无私、相信它是小国的保护者的人来说,这是第一次精神上的打击,是第一次对苏联和苏联政府政策的正确性发生怀疑的强烈感情。从德黑兰会议到今天,苏联已向全世界暴露了它全部的帝国主义大国的淫威。今天,我们可以大胆地

① 指马林科夫1952年10月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指1943年11月在德黑兰召开的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会议研究了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并讨论了分割德国、波兰疆界以及巴尔干等战后安排问题。

说,尽管苏联大耍廉价宣传的骗局(例如它宣称为和平而斗争等),但整个苏联的国际政策使苏联成为目前国际紧张局势的最重要的制造者。

难道不是它把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曾经是独立的东部国家变成欧洲中心纯粹的殖民地了吗?至于早在战前奴役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事,就更不用说了……

斯大林在德黑兰同他过去一直攻击、现在仍然攻击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起,把南斯拉夫平分成利益范围。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完全背叛了社会主义原则,走上了沙皇俄国的道路,即大俄罗斯国家利益的道路,亦即用帝国主义方法以促进他们国家利益的道路,同时力图用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来掩盖这一点。

1948年我们和苏联之间发生的冲突并不是偶然的……当我们清楚地看到苏联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外交政策上也正在抛弃社会主义原则,公开走上帝国主义扩张主义道路时,这种冲突就发生了。……

就苏联而言,这种非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可以在苏联的现实中,在那个国家的整个国内结构中——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结构中找到这些原因。在国内的发展方面,苏联很早就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转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史无前例的官僚制度了。……

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正确地估计了苏联对我国的攻击,虽然当时这种攻击的原因尚不清楚。……那次代表大会之后立即发现,苏共领导人在我党的队伍中有一些代理人……他们已被内务部招募,其中一些人奉命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攻击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但是代表大会的代表一致谴责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信件,以及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给这些叛徒们浇了冷水,因而他们不敢在大会上进行分裂活动。这是苏联领导人继赫布朗和茹约维奇事件之后,在分裂我党和我国人民团结的活动中的一次新的和巨大的失败。第五次代表大会一致批准中央委员会对斯大林、莫洛托夫信件的复信,以及关于我党不参加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的决定。但是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这个争论的决议中,表达了我们希望并愿意尽一切努力改善我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并且以友好的方式解决争端。

第五次代表大会采取这种立场是有几个原因的。首先,我党的普通党员——尤其是一般人民群众——对冲突的全部背景一无所知。第二,当时的形势——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就是说,不仅是我国广大工人群众,而且是许多党员的认识程度问题,因为多年来我党一直在党员中培养对苏联的信任和热爱,把苏联作为一个真正的在困难时期能够依赖的伙伴。所以,当所有这些在实践中被证明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时,当我们这些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已经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苏联想让我国做些什么以及总的说来它的政策想要干些什么的时候,许多党员和人民群众仍然是一无所知的。我们发现,很难相信苏联竟然会像后来实践证明的那样,对我们抱着如此不光彩的企图。

对苏联的幻想慢慢地破灭了,但苏联共产党情报局在我国人民最感自豪的每一件事情上对我们的诽谤和污蔑,却加快了这个幻想的破灭进程。苏联通过经济封锁对我国施加的压力;通过边境挑衅,杀害我边防战士,进行军事威胁;扣留在两国间发生争论之前派往苏联学习的青少年,使其不能与父母团聚;以及其他许多针对我国的敌对行动。这些事件加快了我们对苏联的幻想的破灭进程,使南斯拉夫每个正直的人都看清楚了苏联的本质。

在我国边境上的挑衅逐年迅速增加。同时苏联特务在1949年进行了936起挑衅,在1951年挑衅次数上升到1 517起,而今年的前十个月已达1 530起,致使到目前为止我边防战士及公民40人在这些事件中死亡。所有这一切,加上他们散发的大量诽谤性宣传材料,已经暴露出他们对我们国家抱着敌对的意图,却并非像他们最初宣传的那样,仅是反对我们党的领导人。

虽然苏联和其他东部国家对我党和我国人民的攻击自始就是异常激烈的,而且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加强这种攻击,但它并没有像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以及共产党情报局所希望的那样使我们党的队伍发生动摇。